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缅怀毛泽东（上）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缅怀毛泽东

历史航船的伟大舵手

宋任穷

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我最早接触毛泽东同志，是在 1927 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下面的文字是记叙我近五十年来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接触以及从中得到的启迪和教诲，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纪念。

在黑暗中点燃了希望的火炬

1928 年 8 月，我所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没有赶上南昌起义，暂时驻在江西铜鼓。县委派我随省委秘密交通员一起到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九月中旬，我从省委赶回团部时，感到团里的气氛有些异样。团党委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毛委员已经从安源到了这里，以他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经过缜密部署，统一领导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和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以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共约五千人，胜利地举行了举世闻名、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让我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委员报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尽快见到毛泽东。当我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说：我在南昌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后为托陈取消派，同陈独秀、彭述之一起被开除党籍），还见到了刘士奇（湖南人，曾任吉安特委书记，后遭张国焘杀害）。汪说，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我们的队伍往西朝宁冈方向走。我把江西省委的密信以及剩下的组织上给我的盘缠钱都交给了毛泽东。他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你一路辛若了，先休息去吧。

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又一次有力反击。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9 月 19 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在那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赣边界转移。

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当时，究竟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哪里，事关重大。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

北段离政治都会太近；南段虽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好，党的组织、群众基础等方面也比较好，而且远离大城市，敌人的统治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江西省又没有正规的地方部队。毛泽东确认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同时还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汪泽楷讲的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就是指袁部）和王佐部两支革命武装。袁部驻在井冈山下的茅坪一带，袁本人是共产党员，袁部已建立党的组织。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各有几百人，六十余支枪。参加袁、王部队的，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过党的影响，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阶级有深刻的矛盾，有很强的反抗精神。这两支部队，专打土豪劣绅，劫富济贫，不侵犯群众利益，比较守纪律，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他们还掩护过避难的共产党员。这两支部队特别是王佐部的问题是，由于长年住在山区，缺乏有力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存在着浓厚的绿林习气和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

在宁冈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对袁、王二部采取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并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通过袁部争取团结王佐部。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井冈山站住脚的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应袁、王的请求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他们部队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给了他们一部分枪。此时，袁文才、王佐部各有两个营，每营两个连（后扩充为三个连）。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袁、王部队工作的，曾任连党代表、团宣传科干事等。蔡协民、何长工已先期被派到袁文才、王佐部，担任团的党代表，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我们在毛泽东和团党委的亲自指导下，积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连队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做到每个班都有党员，每个连都有党的支部。还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帐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袁、王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袁文才、王佐部都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很有战斗力的工农革命武装。

1928 年 4 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到达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使我们的武装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大大增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力量。

在井冈山，由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党的领导集团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深入发动群众，我们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军事“围剿”，打击了国民党驻江西的反动武装力量，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安，指令湘赣两省的敌人于 1928 年 12 月用重兵对井冈山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实行经济封锁。

面对敌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毛泽东等研究后认为：在当时的情下，如果死守井冈山，恐难持久，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由一部分主力红军守山，大部分主力红军打出去，到敌人后方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共同商定：彭德怀、滕代远率一部分兵力（包括王佐部）留守

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包括袁文才部）向闽粤赣边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是在客观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决策。此时，我找到毛泽东，请求随部队下山，他开始同意了。后来，因有些同志也要求下山，毛泽东才对我讲：要求下山的人多了，这就不好办了，山上也需要一部分同志留守坚持，任务也是艰巨的，你也不要走了吧。我便留了下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这条道路的起点。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伟大，后决定分兵下井冈山同样伟大。当时的中国是由数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他们在中国培植各自的势力，互相之间有矛盾，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矛盾，在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敌人统治又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部分红军主力下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创举，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我党还领导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多在几省的边界地区，它们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拨正航向，使红军在长征中摆脱困境

1934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数十万大军，设置层层封锁线，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全歼我军。而我们大搬家式的行军，队伍臃肿累赘，速度缓慢，沿途处处被动挨打。此时，由于毛泽东受到排挤，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李德坚持错误的军事指挥，我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便已折损过半。在这危难的时刻，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定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以甩掉等候在湘西的十几万敌军，摆脱困境。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使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贵州南部的许多县城，于 1934 年底到达乌江南岸。

1935 年 1 月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军事路线；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从此，毛泽东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仗打得机动灵活，出奇制胜，使敌人对我们的去向捉摸不定，红军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整编部队，提高战斗力，保护老同志

遵义会议后，红军广大指战员精神为之一振，个个信心坚定，士气高昂。我们这些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人对此体会更加深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在

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取得了歼敌七万多人的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王明路线开始统治党中央，但还没有控制红军领导机关，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继续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战，仍然取得了粉碎敌人“围剿”的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积极推行王明路线，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不符合当时敌我情况的错误口号，在战略战术方面采取所谓“短促突击”，进行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苦战一年仍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突围长征。在中央苏区，在王明等人散布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论调的影响下，我们不少同志在开始的时候总认为共产国际要比中国共产党的水平高，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洋包子比国内的土包子强。后来，大家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鲜明对比中，逐渐认识到上述看法是一种盲目性。从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深深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和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撤销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红军重新由毛泽东等指挥，这是全党全军企盼已久的事，此讯传来，我们都竭诚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对部队的整编，精简不必要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对原来编在军委纵队休养连的一些老同志也分别作了安排。一次，毛泽东把陈赓和我找去，对我们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年纪都大了，行军、作战时要很好地照顾和保护他们。林、谢二者已安排到别的单位，中央决定把董、徐二老安排到干部团。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一定要把二老保护和照顾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渗透着对老同志的深切关怀。干部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董、徐二者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心尽力保护和照顾好他们。

红军干部团是长征出发前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的，陈凑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夫，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1935 年 1 月底，一渡赤水前，彭德怀、杨尚昆率三军团在贵州赤水河畔的土城与敌四川王牌军遭遇，后期命我干部团参战，统归三军团指挥。这是一场恶仗，我团伤亡百余人，令人十分痛惜。我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说：“干部团的学员是从部队择优选调的，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听后心情沉重，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出敌不意，指挥全军巧渡金沙江

我红军三渡赤水后，敌人向川南集中，企图堵截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出敌不意，突然改变了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当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在向云南进军的路上，毛泽东时常同干部团一起行动。毛泽东宏图大略，胸有成竹，任它风尘仆仆，阴雨绵绵，甚或风雷滚滚，大雨滂沱，他总是那样稳健，那样从容不迫，真是“胜似闲庭信步”。一天，他骑马在雨中徐徐而行，对陈赓和我讲：现在，我们已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

贵阳和昆明，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火速抢占金沙江渡口，以便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说着，他对天气表现出忧虑，说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是影响我们渡江哩！

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甩掉敌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后，非常振奋。正如毛泽东预料的，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而金沙江两岸却布兵不多，显得空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我干部团接到从中路迅速抢占皎平渡并架桥的命令。为加强领导，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伯承同志亲自随我团三营一起行动。三营先遣连机智神速地抢占了皎平渡。接着，为掩护部队渡江，又成功地奔袭了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靠着找到的七条船，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渡，红军大部分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担任殿后任务的五军团，处境十分艰苦，他们顽强战斗，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也从皎平渡过了江。红军渡江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金沙江南岸，这时，渡江船只已被我们烧毁，敌人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巧渡金沙江战斗，成为军事史上的奇迹。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粉碎张国秦的阴谋，率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35 年 6 月 17 日，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东北，而且直接威胁我华北地区，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毛儿盖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右路，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在左路。此时，干部团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大学，随党中央编在右路。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韦国清任代理团长，我任政治委员。恃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后，张国焘违背他在会议上同意了的北上抗日的方针，坚持让部队再过一次草地往南返。他不仅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对中央和一方面军进行裹胁。毛泽东、周恩来等得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大学连夜出发，继续北上，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张国焘得知红军大学北上的消息后，胆大妄为，居然派人传来什么紧急命令，让红军大学立即停止前进。此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大学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板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了上来，阻止我们前进，气氛异常紧张。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毛泽东从容不迫，以平稳、庄重的语气，耐心他讲解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可南下。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力，而在陕西、甘肃，敌人的势力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毛泽东要李特把上述意见转告张国焘。李特眼看威胁右路

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说：张国焘要红军大学的学员留下。毛泽东顾全大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和干部回去。此时，毛泽东又让我们立即把红军大学的全体干部和学员集合起来，说他要对大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又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事实的发展完全为毛泽东所料。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阴谋。

及时纠正错误肃反，维护和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了解到这里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了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当地党政军的许多领导同志无辜被捕，个别好同志惨遭杀害。他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纠正了错误，挽救了陷入危险局面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亲自接见刘志丹，亲切地安慰他说：你们受委屈了。毛泽东对刘志丹以及以他为领袖的陕北红军寄以完全的信任，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同时，又任命刘志丹为临时组建的北路军的总指挥，统一指挥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陕北骑兵团和红二十八军向北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同我和其他几位派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谈话，再三叮嘱我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刘志丹，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刘志丹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也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当地干部要尊重和学习外来干部。作为政治委员，我同刘志丹之间推心置腹，互相信任，没有丝毫芥蒂。这支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战斗力很强，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不幸的是，刘志丹在红军东征中的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部队回到康城后，我即到总部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英勇牺牲的经过，并报告毛泽东：二十八军经过多次战斗，虽然人员不断伤亡，减员近半，但部队士气仍很旺盛。刘志丹牺牲后，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如同刘志丹在世时一样听从指挥。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赞刘志丹培育了一支很好的部队。此后，毛泽东派总政治部的同志到二十八军进行考察，了解到部队情绪稳定，士气旺盛，素质确实不错，决定继续保留二十八军建制。

在毛泽东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

毛泽东指引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937 年 8 月，为了实现一致抗日，经过两党协议，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我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一二九师领导下，主要在冀南地区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没有到过延安，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主要通过电报。我们就是通过这些不断从延安拍来的电报，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冀南地区以及整个华北地区抗日斗争中重大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都以最快速度用电报发到各抗日根据地，这对于我们开展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在《论持久战》

中，毛泽东在详尽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中日双方的人力、军力、物力、财力之后明确指出，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持久战才能取胜，并进一步提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读了这部著作，使我们的思想顿时豁然开朗，信心倍增。这部不朽的名著，好像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通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政策》等，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正确贯彻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以及正确执行对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和策略，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我们虽然身在前方，战事频繁，环境残酷，但是仍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党内进行整风，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文章。整风运动对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工作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大推动了我们的各项工作。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最深的收获之一是提高了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认识。过去，我们长期做群众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是零碎的和感性的，经过整风学习，才真正提高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高度。毛泽东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段富有哲理的论述，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读后得到深刻的启迪，因而大大增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

延安时期，毛泽东著作的数量最多，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走向完善和成熟的时期。我虽然没有机会当面接受毛泽东的教诲，但是毛泽东的著作成为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武器，也为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南下到豫西、豫皖苏、南京等地工作，由于战事紧张，仍然未能同毛泽东见面。

制定各项基本政策，缅怀革命先烈

全国解放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全国解放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讲“话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篇讲话成为全国解放后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文件。

新中国的成立来之不易，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由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在欢庆新中国戒立的时候，我们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捐驱的革命先烈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深切悼念之情。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应当归功于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新中国宣告成立前夕的 1949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个碑文由周恩来书写后刻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

1950 年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在分别十四年之后，我重新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约见率部举行昆明起义的卢汉将军，我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毛泽东和卢汉将军寒喧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正义行动。称赞卢汉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我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对卢汉和我讲，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毛泽东同卢汉谈完后，我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我和叶子龙在长征时就认识。两人谈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派人让我到他那里。毛泽东说：十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于是，他便很随便地同我谈起来，话题很广泛，右往今来，天上地下，什么都谈。他首先讲到，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嘱咐我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还问起我下井冈山后脱离部队的那一段情况，我再一次向他作了详细的叙述。在谈到陈昌、夏明翰时，我告诉他陈、夏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对陈、夏的评价很高，说陈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时常有书信往来。他称赞陈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在组织进步青年出国勤工俭学时，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陈留下来在国内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陈昌于 1928 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我们还谈到。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还告诉我，不久前他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他亲笔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并从稿费中拿出三百元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据我所知，毛泽东资助过不少烈士的遗属和后代。毛泽东还谈起他 1920 年结识夏明翰的情况，还向我问起井冈山时期曾任三十一团书记官，后调任三十二团第二营党代表的康健的情况。毛泽东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在谈到几位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时，他满怀深切悼念之情，眼中不时含着泪花。此时，刘伯承应约来见毛泽东，我们的谈话便中止了。

不要大元帅的军衔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这是我军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以前，由罗荣桓提名，我从中共中央西南局调到北京任解

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徐立清一起协助他工作。罗荣桓当时是总干部部部长，也是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年，总干部部除了日常的军队干部任免外，用了很大精力搞军衔制。

实行军衔制，在我军还是第一次，从上到下都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搞法。我们不仅要仔细地研究各方面的情况，还要对个别对军衔抱过高期望的同志做工作，难度比较大。

毛泽东和党中央很重视这项工作。一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汇报，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主谈。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评出的元帅、大将都不止十个。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一个一个地问在座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刘、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转身又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的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怦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最后评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设大元帅，只评了十个元帅，十个大将，五十七个上将以及一批中将、少将。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闫红彦等少数几位同志外，其他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毛泽东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大都是我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在全党全国全军享有崇高的声誉。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军衔，对全军是很大的教育，大大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多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工作胜利完成。

亲自做出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1955 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我国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汇报。听完汇报后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会后，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并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核工业发展工作。

1956 年，周恩来曾对我讲过，中央有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的考虑，毛泽东的意见请郭沫若当主任，我作郭老的助手，任副主任。后来，又决定不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了。同年 11 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和核工业部），任命我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任副部长。三机部成立后，中央书记处多次听取汇报，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大力支持，表现了很强的全局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一切优先。有些单位主动找上门来，问我们还要什么。三机部的全体同志艰苦奋斗，同心同德，情绪十分高涨。因此，虽然是白手起家，遇到不少困难，但各项工作进行得都比较顺利。

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们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

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 年 9 月我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同时，我转达了刘晓大使的意见：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使馆从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考虑，倾向于毛泽东接受邀请，亲赴莫斯科。

1960 年，全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苏联的一些技术设备陆续运来后，有些同志要求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而且很坚持。部领导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人家的东西首先要弄明白，学到手，然后再进行改造以至创新。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见他。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弹，235，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我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作出决定：对没有掌握的苏联设计“不准改”，对苏联供应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作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这样，及时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核工业建设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明确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因而，在外援突然断绝后，我们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很快地实现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转变，保持了继续前进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术，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1960 年冬，周总理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毛泽东到来之前，我们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答应给的样品也不给了，部里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延迟到 1964 年。康生大言不惭，说什么太迟了，应该 1962 年爆炸，说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都有好处，等等。这类的话，他讲了很多。毛泽东来后，了解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便只讲了一何话：康生，要原子弹在 1962 年爆炸，那就叫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康生明明知道 1962 年不能实现原子弹爆炸，却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用心不善。以后的实践证明，1964 年爆炸的计划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继续坚定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圣人。他也有过失，特别是在晚年犯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党和国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举世瞩目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在我们党的失误中，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不言而喻，有重要的责任。就我个人来讲，曾担任党中央委员、一个部门和地区的负责人，同样也有一份责任。比如，我曾经积极支持过“大跃进”运动，积极参加过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有过扩大化的错误。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是不公道的。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要缅怀他的伟大功绩，继承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更要认真思考和总结建国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经验教训，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发扬成绩，减少失误，开拓更加光明的未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为更好地建设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毛主席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

赛福鼎·艾则孜

毛主席离开我们转眼已有 17 个年头了，但是，人民对毛主席的怀念，并没有因时光的消失而冲淡。1990 年冬以来，我去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看到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这些地区带来一片生机，除了一些边远山区以外，人民生活已向小康水平迈进。人民都非常满意目前的生活，都说这是因为党的政策好。更使我惊喜的是，这儿到处——办公室、商店、出租汽车、农民家里——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问起原因，回答是，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毛主席开创的。没有毛主席、邓小平等人领导的好，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这是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真诚的感情呀！使我真正的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越加怀念毛主席，越加热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越加珍惜目前的大好时光。

毛主席在自己的一生中，做出了在我国历史上极其光辉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系列壮举，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他家有六位亲人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他的大弟弟毛泽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

毛主席的一生，是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战斗不息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为了受苦受难的中国各族人民，他呕心沥血，操劳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有了他，中国人民才能象今天这样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是最公正的，17 年后，人民仍以感激的心情思念毛主席，是非常自然的了。

从 1949 年到 1976 年毛主席在世的 27 年间，我和毛主席有过无数次接触。除了向他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之外，我还多次在毛主席家做客，拉家常。每次接触，都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无穷的启示。回想起来，40 多年来，我能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这和毛主席的关心、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每当我追忆起和毛主席相处的时刻，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谆谆教诲，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一阵阵热流在我心中涌动，久久不能平静。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之际，又勾起了我无尽的思念，但因篇幅所限，我主要谈谈使我感受最深的几件事。

毛主席看望我们

我怎么都忘不了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1949 年 9 月，以新疆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各族代表团，应毛主席的特别邀请，代表全疆各族人民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不幸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以后，又应毛主席的特别邀请，由我率领第二个代表团于 9 月 15 日来到北平。

新疆三区革命，是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为了在新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而爆发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毛主席的文章，认定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还听到有关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量神奇的传说，他们早已在我们的心目

中树起了崇高的形象，因而，亲眼看看“东方的列宁”，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现在，这一夙愿终于要成为现实，我急切地盼望尽快见到毛主席。

9月16日晚，我们去中南海怀仁堂看京戏。我们被安排在第一排的中间就座。演出开始，在阵阵锣鼓声中，只见一位美丽的女子，迈着轻盈的碎步，步入戏台中央。她的出现，引起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她的唱、念、做，是那样的动人、传神，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使我入了迷，这时，陪同我们的一位同志指着戏台上的女子说：

“他叫梅兰芳，是个男的。他以善长男扮女妆演京戏而出了名。”

他的话，更使我惊奇不已。他的介绍和眼前的现实怎么都协调不起来。我半信半疑，审视梅兰芳的唱腔和每一个动作，想找出一点属于男子的特征，但都是徒劳了。

这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正在我为看不到台上的演出而焦急时，周总理出现在他的身边，对我说：

“毛主席看你们来了！”

我定睛细看，只见毛主席面带笑容，慈祥地看着我。我急忙起身，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伸过来的手。主席说：“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我由于过于紧张、激动而又兴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谢谢！”

在毛主席身边又出现了一位笑容可掬的人，把手向我伸过来：

“欢迎你们！”

“这位是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周总理介绍说。

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总理热情和蔼的态度使我无比感动。原来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的领袖人物可望不可及那种神秘、缥缈的想法，瞬间便无影无踪了。由于过于激动，我除了不断地重复着“谢谢”外，一时未找到比这更好的语言。

毛主席和其他代表一一握手后对我说：

“今天请你们看戏，明天再见。”告别后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周总理一边向我告别，一边说：“毛主席准备明天专门接见你们。”并握着我的手：“明天见。”说完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走了。

代表阿里木江看着毛主席他们的身影，呆呆地站在那儿，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反应过来后，深有感触地说：“呀！他就是毛泽东吗？！没想到是这么谦虚可亲的人”。”

“布尔什维克都是这么和蔼可亲、心胸宽广的人！”留学美国，曾在苏联工作过的代表涂治教授用钦佩的口气说。

大家都陷入幸福的遐想之中。梅兰芳的表演，成了模糊的幻影，他那少女般动人的演唱变得离我们好远，好远，忘记了我们是在看戏。我的思想、情感完全被毛主席吸引着了。我的心在急速地跳动着，久久平静不下来。我在想，蒋介石、国民党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对各个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而毛主席、共产党不仅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存在，而且给予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同等的权利。我们作为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代表，特邀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参与管理国家大事，这真是破天荒的大变化。我越想，心情越加激动。

戏演完了，人们往外走去。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来看戏的，但戏的情节和结局，我什么都说不上来。在返回的途中和回到住所以后，大家仍激动

地谈论着自己的感受。

夜深了，我洗漱完毕上床就寝，但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我翻身起床，打开日记本，记下了这一难忘的感受。看看手表，已是第二天凌晨了。我又躺在床上，在不断地遐想中，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入睡的。

第二天，周总理谈了昨天晚上毛主席来看望我们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毛主席非常喜欢看京戏。当演出开始场内的灯熄灭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方入场就座。不久，毛主席就问周总理我们是否也来看戏了。当得知我们也来了之后，毛主席就起身要来看望我们。周总理提醒说：“不是已安排明天接见他们吗？”毛主席边走边说：“我知道，先去看看他们。”这时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也跟着过来了。

听了周总理的讲述，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来看我们，这是对新疆各族人民和三区革命的亲切关怀和重视。他对我们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怎么能不使我们感动呢？它使我更加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可爱。当然，这一殊荣是属于新疆各族人民和三区革命的。

向死难烈士致哀

我们急切地等候着毛主席正式接见我们的时刻。9 月 17 日下午三时，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步人中南海接见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见到我们来了，便离座肃立，以沉痛的心情，向以阿合买提江等死难烈士们致哀。整个接见厅，变得极为庄严、肃穆。入座后，毛主席悲痛地说：“阿合买提江·哈斯米、伊斯哈克拜克·木奴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汉·苏古尔巴也夫、罗志等同志的牺牲，不仅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在新疆解放区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你们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十多万军队，对解放大西北乃至全国做出了贡献。”

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毛主席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如此悲痛，而且极为真诚。没有想到，将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看作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我更没有想到，对三区革命给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听到这些，我内心的感激之情由哀而生，激动的泪水如泉而涌。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一次巨大飞跃。

毛主席的话，使我那颗既感激又激动的心久久无法平静下来。我不断用毛主席的话告慰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所有在三区革命中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们：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是光荣的。你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请你们安息吧。我还想尽快返回新疆，向三区人民和全疆各族人民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对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哀悼之情和对三区革命高度、公正的评价，以此来鼓舞各族人民，使他们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毛主席是我的引路人

由于长期受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早在三区革命时期，我就渴望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因当时我们无法和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而且在新疆没有党的组织，我的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如愿以偿。这次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接触后，我渴望成为共产党员的心情更加急不可耐了。10月22日,我鼓起勇气正式向毛主席递呈了10月15日草就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毛主席看后很高兴，23日批准吸收我为正式共产党员，并批示彭德怀同志待新疆分局成立后再办理组织手续。这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毛主席是我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

在毛主席家做客

1950 年夏，我来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会址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闭幕后，不少外地来的同志都去和毛主席握手告别。我也想去和毛主席告别，听听他对新疆工作还有什么指示。我看毛主席一边往外走，一边和人们握手告别，其间他不停地左顾右盼，好象在寻找什么人。见此景我不敢去打扰他了。就在这时，他发现了我，径直向我走来，我也急忙迎上前去。“你什么时候回去？”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问。

“我明天就回去。不知主席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走，我们谈谈。”毛主席边说边往外走，我在后相随。

“你的翻译呢？”快出门了，毛主席问我。

我马上把尹善同志叫过来。没想到毛主席一直将我领到家里。一进院门，江青迎了出来。

“饭好了吗？”毛主席将我和江青互相介绍过后问江青。“都已摆好了，可以吃了。”

“准备好的菜都撤了，准备清真菜，请赛福鼎同志一起吃。江青面有难色、欲言又止。

毛主席请我在家做客，我没想到，感激之情自不待言。为了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又将准备好的饭菜撤掉重新做，更使我既感动，又不安。我一再表示谢意，提出回饭店吃饭。但毛主席并未考虑我的话。

“这好办。你给北京饭店打电话，请他们派一回族厨师，带上牛羊肉过来做。”

“让孩子们也一起吃。”毛主席又专门交待说。

毛主席说完领我进入客厅，示意让我坐在沙发上。毛主席真诚地待我，使我过意不去。我对毛主席说：

“主席、你今天太累了。不用管我了，你休息吧。”

“随便聊聊，这也是一种休息的好办法。”毛主席看看指间的烟不多了，狠狠地吸了一口。灭掉烟蒂，换了一支，点燃后，不慌不忙他说。

你们新疆是块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宝地。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它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自己强大的汗国，但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保卫了我们国家的边疆，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维吾尔族人民还多次派远征军帮助中原王朝平定叛乱。现在北大任教的翦伯赞就是你们维吾尔人，他是湖南桃源县人，但祖藉是新疆，是明代受朝廷之命平息武陵叛乱后定居在湖南的维吾尔人的后裔。你可去湖南看看那里的维吾尔人。尽管他们的语言变了，但从他们的

习俗，服饰、语言中，仍可找到维吾尔民族的特征。维吾尔人纯朴、善良、勤劳、好客、宽宏、大度，这些都是维吾尔族人民突出的美德。其他的少数民族，也都具有这样的美德。维吾尔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新疆是个好地方，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好人民。

毛主席讲到这里，心情显得沉重他说：

但因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清朝和国民党，还有一个盛世才，长期以来，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各族人民处在悲惨的境地。

“接着他充满信心他说：让各族人民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

毛主席的话，使我既惊奇，又激动，更使我钦佩。使我惊奇的是，他对新疆的历史，维吾尔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那样的熟悉和了解；使我激动的是，他根据大量史实，讲了许多赞扬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话，使我增添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使我钦佩的是，他把新疆各族人民看做是骨肉同胞，看做是自己的父老兄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真正的情怀。他那一颗金子般的爱心比海洋都宽阔，这怎么不使人钦佩呢。

工作人员进屋报告：“可以吃饭了。”我们同桌用饭的，除了毛主席，江青、我、尹善外，还有毛岸英、毛岸青、毛远新，还有一位毛主席亲属的孩子。

“这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一开始，毛主席就将我介绍给孩子们，并指着毛岸英对我说：

“他是我的大孩子，叫毛岸英。在苏联学完大学回来。”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用俄语和他对话。询问他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和他对苏联的印象等等。我们对话时，毛主席注意地听着，露出满意的神色。

“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

“完全及格，讲得流利而标准，而且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的性格。”我满意地说。

“我的俄语不行，但看得出来，他讲俄语不困难。”毛主席说完，对毛岸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用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说完，毛主席看了我一眼，继续对毛岸英说：

“我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们会欢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为师，好好为他们服务。为此，首先你要学会维吾尔语言、文字。”“欢迎你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你很快就会爱上新疆人民的。而且掌握了俄语后，你也能很快学会维语。”

毛主席和我的一席话，在毛岸英心中激起巨大波澜。他急切地问我：

“你什么时间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

我想给予肯定的答复，但又不知毛主席是否已下决心。我用祈望的眼神看看毛主席，希望他答复。毛主席有所安排地说：“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以后再去新疆。”

说完，毛主席的视线移向毛远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显得有些悲哀。

他说：

“你爸爸就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你将来更应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未完成的事业，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新疆人民没有忘记你爸爸。他在新疆办公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都完好地保存着。你长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会欢迎你的。”我说。

为了改变一下气氛，毛主席问毛岸英：

“刚才赛福鼎同志说，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讲得好，真善美都是甜的。我是问你，哈密瓜为什么那么甜？你知道吗？”

“可能是新疆的气候、土壤和内地不一样的缘故吧。”毛岸英考虑了片刻，用没有把握的口气回答。

“你说呢？”毛主席问毛远新。

毛远新眨了眨眼，想了想，摇摇头，表示答不上。毛主席说：“有三个条件，这就是土壤、气候和栽培技术。第一，新疆的土壤是碱性土壤，这种碱性物质的化学名字叫碳酸钠；新疆的气候是大陆性气候，炎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适于植物多纳少吐；这两条是主要的，再加不可缺少的第三条，就是群众长期以来从选种到种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技术，所以哈密瓜是甜的，一般甜度达 16%，最高可达 20%。”“赛福鼎同志我讲的对吗？”

“对、对。”我急忙用佩服的口气说。

这天在毛主席家里，我既是客人，又是学生。毛主席给我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课。而且这一课是在非常轻松的谈话中进行的。除此，我还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完全可以和列宁齐名。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平时对孩子们要求严。为了防止孩子们产生优越感，脱离群众，他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们上学，尽量让孩子们住校多和同学一起生活，树立集体观念。孩子们回家来，一般不让孩子和自己同桌吃饭，而让孩子们去食堂和工作人员一起吃。这天他特意让毛岸英等人同桌吃饭，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气氛，也是为了让我和孩子们互相认识、熟悉。这一点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和孩子一起吃饭，本是平常的事，没有想到毛主席从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样的高度去看待这极平常的事。他的心只装着人民。实际上，毛主席这样做也是对孩子们最大的疼爱。

让新疆人民不要忘记他们

1950 年 2 月，我参加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就在这次访问期间，苏方告我，阿合买提江等人的尸体已找到，并做好装运处理，拟移交我方。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请示他们怎么处理。

“将烈士们的尸体运回新疆安葬。让新疆各族人民不要忘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英雄们。”毛主席指示说。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由我亲自将烈士遗体护运回新疆，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将他们安葬在三区革命的摇篮——伊宁市。（依照家属和群众的要求，达列力汉的遗体葬在他的家乡阿勒太市）。自那以后，凡是去过伊宁市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朱德、罗瑞卿等，都去烈士陵园向烈士墓默哀致意。正如毛主席所讲的，新疆各族人民没有忘记为了他们而献出了生命的烈士。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经常去烈士陵园扫墓，组织各种纪念活

动，以表达对烈士们的怀念之情。烈士陵园已成为对各族人民，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要尽快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

1957 年，我参加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活动结束准备回国之前，毛主席问我：

“你打算从北京回去呢，还是从这儿直接回去呢？”

“我打算从这儿直接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

“也好。俄罗斯人过去压迫过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汉族人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做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去。”毛主席欣然同意我的安排，并指示我要学习苏联的好经验，尽快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

毛主席曾经不只一次地指示我们说：

“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

新疆和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接壤。新疆有的民族，在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也有，因此关系比较密切，互相往来会亲访友的比较多。当时双方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那时新疆的各族人民是以羡慕的眼光看待和谈论苏联中亚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的。针对这一点，毛主席向我们提出要求：

“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

毛主席不仅明确指出了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且教给了我们达到目标的手段。这就是在新疆要反对和克服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要加强民族团结，尤其是要加强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毛主席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1959 年，有一次毛主席听完王恩茂同志和我关于新疆工作的汇报后再次指示我们说：

“在新疆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为此，首先要搞好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这里的关键是要搞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为了这三个“搞好”，毛主席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你（指王）要做好汉族干部的工作；你（指我）要做好民族干部的工作。”真是苦口婆心，谆谆教诲。

我们努力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了，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了。与此同时在一些干部中产生了一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危险苗头，发生了拜城饿死人的事件和边民

外逃事件。这些情况引起了毛主席极大的关注。1963 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派罗瑞卿，谢富治去新疆检查工作。他们在新疆各地视察了一、两个月才返回北京。过不久，我来北京参加人代会。一天，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见到了毛主席。

“罗瑞卿和谢富治同志专程去上海向我汇报了新疆的工作。你们工作有成绩，也有不少缺点……。”说到这儿毛主席稍微考虑了一下说：

“汉族干部要谨慎，民族干部要畅所欲言。”

毛主席用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新疆当时的情况，指出了要害问题，完全正确。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但毛主席仅仅说是个“缺点”，这包含着对下级干部的爱护和体谅。他只是把问题点出来，让我们自己去认识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毛主席的一贯作风。

永远怀念毛主席

由于有毛主席亲自掌舵，新疆这条航船躲过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暗礁，顺利地向着彼岸既定的目标航行。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新疆各族人民，他将一颗伟大的爱心无私地奉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能有如此伟大的情怀。由于毛主席的关心和爱护，正如他所希望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了，在新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族人民没有忘记是毛主席、共产党使他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使他们过上了甜密的生活。他们用一切美好的言词和超出人们想象的举动，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在新疆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让天下的森林都变成笔，

让天下的海洋都变成墨，

让天下的人都变成诗人，

也写不完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由一个农奴变成国家主人的库尔班吐鲁木，日夜思念恩人毛主席，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特意精心培育了两个大甜瓜，不畏路途遥远，骑上小毛驴，驮上两个甜瓜上了路，要去北京见毛主席，献上甜瓜，表达维吾尔人民的心意。

这是多么感人的言行！它完全是维吾尔人民纯朴感情的表露，也是对毛主席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回报。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毛主席在天之灵，实现您寄希望予新疆各族人民过上的好日子已经不远了，请您安息吧！毛主席曾多次表露过去新疆的愿望，他很想去新疆亲眼看看所发生的变化，看看各族人民的生活。有一次他还风趣地告我：“我还要去王母娘娘洗过脚的天池洗个澡呢！”

各族人民，也都望眼欲穿地盼望毛主席去新疆亲眼看看他们的生活，多么希望毛主席去他们家做客，用自己最美好的食品招待毛主席。但是终因工作繁忙，路途遥远，毛主席的新疆之行一推再推，未能如愿以偿就离开了我们，竟然成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憾事。

结束语

每当我回忆起二十七年间和毛主席相处的时刻，他对我的关怀，对我的谆谆教诲，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惦记，我的心就激动不已，他的音容笑貌就清

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毛主席的形象，是永远不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的。1990年毛主席诞辰97周年那天，我怀着无限思念和无限崇敬的心情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我见到，广大群众，其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个体经营者……他们排着队，向着毛主席纪念堂鱼贯而行……。看到这一情景，我得到极大的慰藉。我缓步走到毛主席的遗体前，只见毛主席安祥地仰卧在翠柏和鲜花丛中，往事闪电般地映在我的眼前，我的眼湿润了，深深地向毛主席鞠了一躬……。回到住所，我的心久久平静不下来，我提起笔，将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写成了一首诗。现将这首诗抄在这里，就算做这篇短文的结束语吧。

我以敬仰的心情
默立在毛主席遗体前。
我的心充满了
对毛主席无限尊敬和
无限思念之情。
我在沉思，我在默念：
啊，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你安息吧！
你战斗不息的勇敢精神，
你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将世世代代铭记人民心中。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一心声
发自陕北农民心底深处，
反映了
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深厚感情。
这一响彻中国大地的歌谣，
一直在激励人民继续战斗。
我仰望碧蓝的天空。
见到空中高悬着用火红的大字组成的语句：
啊，毛泽东！
你仍活在各族人民心中，
你自强不息的精神永垂不朽！
你是马克思的忠实学生！
你是中国伟大的列宁！
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从这些灼热的文字
迸发出闪闪星光射向了九霄。
我向毛主席遗体再次深深地鞠一躬。

毛主席擂引社会主义道路

荣毅仁

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今年，是他老人家百岁周年。跟全国亿万人民一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毛主席，追思他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丰功伟绩，回顾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步的历程。

五十年代中期，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一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中的我国广大工商业者，既有愿意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又有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倾向和悲观落漠的消极情绪。就在这历史性的关头，毛主席相继于 1955 年 10 月 29 日和 1955 年 12 月 8 日,在与全国工商联领导成员和代表的座谈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他高屋建瓴地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指出了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光明前途，又具体做了政策安排，在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进程。我本人亲聆了这两次讲话，毛主席生动的语言，诙谐的比喻，深邃的哲理，尤其是他在阐述革命道理时所表现出的满腔热情，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两篇讲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典范。

我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解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怕共产党，跟国民党政府倒有不少关系。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我自己“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以后逐步加入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行列。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是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与几天前还在城里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痞相比，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就这样，我比较顺利地过了抗美援朝关和“三反”“五反”关。但是，在灵魂深处，对放弃剥削，背叛原来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毕竟缺乏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存在不少糊涂认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新中国的命运如何？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前途？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私营企业主关心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洞察幽微，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者的忐忑不安的心理。他在两篇讲话中，从大家的思想实际出发，开门见山地提出人们关心的前途问题。然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明确指出，只要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事业是很宽广的，并且将一天天发展。他风趣地要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这番话，引起了会场上一片会心的笑声。是啊，当时我们已经从亲身的经历看到，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内战外患的废墟上，仅仅用六年时间，就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她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再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她的

迅猛发展是可想而知的。毛主席的讲话还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在旧社会继承父辈事业的十几年中，即便以我们当时所具有的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乃至与当权者的交谊，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别的民族工商业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事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就只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而这条道路对每个真正要做独立的、正直的中国人的工商业者来说都是穷途末路。因此，按我当时的心境，虽还未能真切地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家思想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蓝图，但确已树立起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向光明，就大有前途的信念。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无产阶级的广博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根据这个思想，毛主席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中国戾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之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根据这个思想，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在这两篇讲话中，毛主席指出，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后，民族工商业者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但他们不但“不是国家的负担”，而且还是“一笔财富收入”，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所以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有用的，很有用的”。他还鼓励说，几年来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各民主党派工作是有进步的，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一步。他号召工商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针对有的工商业者对党和政府是否能真正贯彻赎买政策思想上存在疑虑，有的人甚至“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关门痛哭”，毛主席在讲话中反复论述了对资产阶级实行付定息的赎买政策。当时我国初起步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国际上遭到帝国主义封锁遏制，国内百废待兴、建设资金匾乏；在推翻三大敌人后，劳资矛盾逐步上升。因此，对于政府的赎买政策，在工人阶级内部存在一定抵触情绪，连有的中小资产阶级也不尽赞成。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郑重宣布：定息一定七年，到期如不能解决问题，再拖一个尾巴也可以。并指出，定息“时间太短不好，赎买就真正赎买，不是欺骗的”。对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要说服，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要虎头虎尾，不要虎头蛇尾。因为赎买的对象主要是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对当时党内有的同志主张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团结对象的“中小路线”进行了批评。他说：“大资本家人少，但他们的资本大，比中小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毛主席高瞻远瞩，言而有信。他的话教育了大家，也稳定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不安心绪。

毛主席在 1956 年 12 月 8 日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了我的名字。在阐述应该实行“大中小路线”时，他以我为例，说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在国际和国内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使坐在听众席中的我百感交集。我为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和重视所深深感动，他的话是激励我改造思想、脱胎换骨的有力鞭策。

我常常回想起，解放后短短几年中，我曾几次有幸见到毛主席，同他一起吃过饭，听到他的教导，得到他的亲切关怀。我首次见到毛主席，是 1950 年 6 月。当时，我作为特邀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荣

幸地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为首次列席的代表举行的宴会。在我走上颐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人民领袖的谦逊，温暖人心。当潘汉年同地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握住了我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主席的手，又柔软，又有力。他还问我，“老先生（指我父亲荣德生）好吗？”此时，我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释，仿佛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的不是一位大国大党的领袖，而是一位相识已久的师长。我问候了毛主席，回答了他的提问。在宴会中，毛主席鼓励我们说，要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地做下去。做好事越多，越有名誉。替人民做好事越多，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怀的。1955 年 10 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曾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他说，去倒是去过，只是没有公布。1956 年 1 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陈丕显同志的电话，要我速回家中。我匆匆赶回，丕显同志已在那里等我。他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我们到申九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他一下车就对我说：“我来了！”当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

毛主席要工商业者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讲话，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策励着工商业者提高认识，转变立场，自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最终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此时，我头脑里冒出了一个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是否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这个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矛盾，而由于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可以用不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呢？我反复思考，终于在 1956 年 6 月 30 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公开提出了自己上述的想法和问题，希望马列主义学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帮助。问题一经正式指出，顿时波澜迭起。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的报刊还为此开辟了讨论专栏。一些好心的朋友，甚至为我捏着一把汗。1957 年 2 月 27 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其中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毛主席的讲话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心，消除了存在的思想顾虑，鼓舞着我和所有的民族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改造，不断前进。

距毛主席两次讲话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给神州大地带来了巨大变化，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但动摇不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抚今追昔，重温毛主席的讲话，深感他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光芒永照我心

耿飚

每当我回忆起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时，一个高大的形象伴着那亲切的湖南乡音，常常浮现脑际。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虽然我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并不多，但是他的指示和教导，无时无刻不在指挥着我的工作和战斗；他的思想和言行，每时每刻都在鼓舞着我和战友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奋斗。

一

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毛泽东同志并直接聆听他的指示，是在 1931 年 5 月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当时我正任红一方面军三军九师参谋长。5 月 16 日拂晓，在徐彦刚师长和刘英政委率领下，我们九师正奉命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路强行军，走了一程，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看来前面兄弟部队已和盘踞中洞一带的敌军交战。师长立即下令跑步前进。但是，从这里到中洞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这时，总部的一个通信员迎面跑来，大声说：“叫你们几位师领导到前面去！”我和徐师长、刘政委策马飞奔，拐过一个山嘴，就看见了毛总政委和黄公略军长。

毛总政委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拉着一位老倌子，正对着一条山间小路指指点点地交谈着。看见我们滚鞍下马，毛泽东同志便迎上来对我们说：“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这条小路，直插中洞！”

我恍然大悟：原来刚才毛总政委是向老倌子了解通往中洞的捷径。

黄军长正蹲在地上标地图，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口授，把这条地图上没有的小路标出来。

上次龙冈大捷后，我们参谋部在这一带调查地形时曾经侦察到这条小路。听向导说，这是猎人、药师和贩私盐者才肯走的小路，荆棘丛生，崎岖难行；但是取这条小路到中洞是直线，比那绕个大圈的大路要近得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它标在地图上。现在，我拿出地图，与黄军长的地图一对，不错，正是这条小路！

毛总政委走过来，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对！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接着又说：“你们快去吧！我上白云山去，等候你们的捷报。”

我们立即从这条小路插过去，迅速到达中洞，和红七师、红八师一道围歼了敌公秉藩师。一个成了俘虏的敌军官瞪着惊疑的眼睛说：“娘呀！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渔家傲》中所描写的：“飞将军自重霄入。”这个“重霄”并非“天上”，而正是这条名不见地图的崎岖小路。

后来，我经常想起毛总政委的“打仗就是要事先进行侦察、调查”这句话以及他亲自向老倌子进行调查时那种认真的神情。在以后的每次战役或战斗前，我总是按照他的这个指示，对敌情、地形、气候等进行周密的调查。

毛泽东同志不仅重视军事调查，而且重视向群众作社会调查，在这方面，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等地的调查报告，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1932 年春，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东征漳州。攻克漳州后，4 月 21 日，在东路军总部驻地——漳州芝山南麓的红楼，举行了各军的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下一步行动计划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各个部队要分散到漳州附近各地，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

会后，红三军进驻漳浦，我们九师驻在旧镇、盘陀、霞美、东山岛等地。在驻地，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工会、农会和赤卫队。为了便于开展社会调查和联系群众，我们还号召湘赣籍的干部战士学习闽南话。由于我们学会了许多当地话，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军民关系更加如鱼得水，工作也就开展得更加顺利。

毛主席还经常要求我们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研究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我们第一大队在通渭附近的青石嘴消灭了敌军的一个骑兵团。当时随一大队行军的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 听说西北有‘ 四马 ’（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人），今后要注意这些‘ 六条腿 ’（指敌骑兵）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的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 ”

我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泽东同志笑着说：“ 这叫‘ 射人先射马 ’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你们可以编一个‘ 打骑兵 ’的歌子，让大家学。 ”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打骑兵的经验，用于实战。那时宁夏马鸿逵的骑兵一直尾随我们。毛主席说，不能把这条“ 尾巴 ”带进陕北根据地。我们一、二纵队便集中兵力，在杨城子以西地区把尾追的三个骑兵团彻底击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我从部队调到外交部，任我国驻瑞典王国大使。赴任前，周总理带我们首批驻外大使十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开展外交工作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其中也提到了调查研究工作。

他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在部队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你们到国外也要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的各种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还说：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任何民族总有它的优点、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人家的长处。你们还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只有懂得当地语言，才能阅读报刊、进行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才能做好调研。（以上均为讲话大意）

毛主席还对我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我在任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丹麦公使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经常去参观工厂企业，了解他们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

调查研究是从事一切工作的基础。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以及他自己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榜样，对我一生的战斗和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和鼓舞作用。

二

毛泽东同志善于在革命力量弱小和革命艰难的时刻，拨开迷雾看到光明的前途，并为我们指出通向胜利的道路。

记得我在湖南水口山矿当童工的时候，毛委员几次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来水口山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我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于 1925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 10 月，毛委员又派何叔衡同志到水口山传达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指示以水口山为中枢，实行工农大联合，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遵照这个指示，水口山党组织一方面着手建立工人武装，一方面举办工人培训班，培养出大批农运骨干，到附近农村去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我也被派往我的家乡醴陵县去开展农运。后来，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在宋乔生同志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在毛委员和朱德同志直接指挥下进行战斗。不久，我也带领一支农民游击队参加了红军。

1935 年 9 月，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我们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我所在的红一师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杨得志同志，肖华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9 月底，我们第一大队占领了通渭城。10 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王若飞等同志骑马来到通渭城内大队部。当晚，他们就住在我们驻地。为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我没敢休息，与哨兵一起警戒在首长们的住处周围。

刚过半夜，毛泽东同志披着衣服从屋内走出来，伸手做了个扩胸动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仰望着夜空中璀璨的繁星。过了一会，他回头发现了我，便说：“ 那不是耿飚吗？ ”我走过去向他敬礼，说道：“ 主席这么早就起床了！ ”毛主席指指别的领导住的地方，示意我不要声张，接着，他从衣袋里摸出香烟，拉着我说：“ 走，我们走远点。 ”我们边抽烟，边遛达，边说话。毛主席问我：“ 你怎么没有休息呀？ ”

我说：“ 你们都在这里，我们得负责啦！ ”

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来回摆摆：“ 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有一个大队嘛，敌人不敢来！ ”

我说：“ 名义上是大队，可总共才四个连哪！ ”

由于长征途中耗员太多，我们已由原来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毛主席从我的话中听出了这种情绪，就笑着说：“ 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扩大嘛！ ”他那夹着香烟的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划了个大圆圈：“ 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

他那充满豪情的声音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因一夜未睡而感到困乏的身子忽然精力倍增。

我久久地回味着这两句话：

“ 以后再扩大嘛！ ”

“ 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

我似乎察觉到：一个以陕甘地区为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东进抗日的伟大计划，已在毛主席的胸中酝酿并逐渐形成。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二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我奉调到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学习。

在红大，我和同学们最爱听毛主席讲课。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在讲课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相结合的原则，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针对国内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原则，为中国抗日战争如何到达胜利之途指明了方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一方面假意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还请求美国政府派遣特使来华进行“调处”；另方面却在美国帮助下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想凭借其军事优势来消灭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

对此，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通过谈判揭露敌人的战争阴谋，另方面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丢掉对蒋介石的和平幻想，奋起抗击敌人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引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弱转强，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我们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革命战争，不仅创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役战术理论，而且亲自指导和指挥许多战役取得胜利。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下面，仅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谈几件事：

1932 年夏，蒋介石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于 8 月初召开了兴国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进，首先消灭盘踞在乐安和宜黄的敌人，然后分别向西、向北，威胁并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

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军委于 8 月 8 日发布命令，规定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由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所属部队配合，发动乐安、宜黄战役。

8 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签发了进攻乐安的训令。为什么先攻乐安呢？原因之一是乐安位于宜黄西南，距我们红军的出发地较近。还有一个原因是，乐安的守敌为两个团又一个营，由敌军一个旅长指挥；而宜黄的守敌有四个团，由敌师长亲自统率；先打弱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的用兵方法。

我军相继攻克乐安、宜黄后，按照兴国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应西渡赣江夺取吉安，或向北进击夺取抚州等中心城市。但是，毛泽东同志早在东征漳州以前，就明确反对临时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决定和“左”倾路线；现在，在敌人第四次“围剿”即将到来之际，他认为更不应该去进攻敌人兵力雄厚的大城市而消耗红军力量。所以，他和朱德总司令商量后一致认为应该改变原来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转而攻击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宜黄东面的南城。可是，当我们把三个军团调集到南城外围准备进攻时，发现驻守南城的敌军有三个师，而且城防工事很坚固。根

据这个情况，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经过冷静、缜密的考虑，果断地决定我军主动撤离南城地区，回到新占领的地区发动群众，做好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这样，就使红军避免了陷于长期苦战、久攻不下的消耗战，保持了战斗力，从而取得了战略主动，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准备了条件。

按照具体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原定的计划，这些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指挥乐安、宜黄战役中，采取的正是这个方法。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军事上，他认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主张集中力量，击敌一点，而且要先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

解放战争初期，我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在我军撤离张家口，主力南下转战平汉路后，有一段时间仗打得比较被动，甚至没有打过一次歼灭战。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给军区发来电报，指示我们要打好歼灭战，必须“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部署以后的战役，果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使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特别是在清风店地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敌军一个军部、一个整师又一个团，俘虏了敌军长和副军长等，为尔后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

平津战役中，毛主席神机妙算、运筹帷幄，更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战略家的杰出才能。

当时，华北敌军总指挥傅作义将六十万军队从西面的归绥起，向东沿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和滦县，直达海滨，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毛主席按照“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个富含哲理的道理，决定把平律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对敌军分割包围，将其一字长蛇阵截成数段；第二，先解决两头，即依次歼灭西面的张绥（张家口、归绥）之敌和东面的津唐（天津、塘沽、唐山、滦县）之敌；第三，最后解决北平之敌。有的同志把这个部署形象地叫作“腰斩长蛇，砍头断尾”战术。

但是，要完成这个分段歼敌的部署，必须使傅作义留在北平而不从海上南逃。这时，毛主席展示了他那高超的指挥艺术：

首先，命令原来围攻太原和归绥的我军：缓攻太原，撤围归绥，使傅作义感到西线尚有可为而舍不得东逃；

同时，指示正在进行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的刘邓陈粟大军，对已经围住的数十万敌军暂不发动总攻，从而使蒋介石下不了命傅作义南逃的决心。

唯物辩证法着眼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毛主席正是把这种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军事指挥，通过不同战场间的联系来使敌人“听从”我们的调遣。

接着，毛主席又命令我军对张家口围而不打，迫使傅作义不得不派出其“王牌军”第三十五军从北平赶赴张家口救援。

当时我在华北第二兵团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我们兵团部接到毛主席电示，要我们歼灭敌三十五军。当我们把敌三十五军围困于新保安城内，正准备发动总攻予以歼灭之时，又接到了毛主席的电令：

“杨罗耿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对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

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务使各敌不能逃跑，以利我东北主力陆续入关，完成对平、津、塘、唐诸敌之部署。”

对西面的敌人围而不攻，以便完成对东面之敌的包围。这是毛主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指挥的又一个光辉体现。后来，天津与北平被我军隔断围困后。我们才分别攻歼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继而天津也被我军攻克，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取得全面胜利——这些都与毛主席杰出的指挥艺术分不开。

四

记得毛主席说过，领导的职责在于制定政策和使用干部。好的领导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他本人不仅善于使用干部，而且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在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我们在赤水、土城一带与敌军展开了激战。刚开完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现场指挥。鏖战一天后，鉴于敌援兵将至，军委和毛主席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转移。当时我任红一师参谋长，军团长林彪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挥部队渡河。我指挥工兵分队架起两座浮桥，部队在浮桥上整整过了一夜，才全部渡过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

当我回到师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挥部队过河时，毛泽东同志曾派总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我们红一师的几个领导同志到他那里去。由于我不在，所以只有李聚奎、黄甦、谭政三位同志去了。据他们后来告诉我，毛主席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还讲了我们应采取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部队整编问题。这说明毛主席对我师干部的关怀。

更使我感动的是，毛主席见我未去，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捎给我，信中表扬了我和红四团的同志们前几次架桥任务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队通过。毛主席指的是长征初期在滞水上架桥以及后来在乌江上架桥的事。那时我任红四团团长，率领全团作为前卫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消灭守敌，为大部队和中央纵队开道。当到达道州时，受阻于城外的滞水河，我们在敌人火力下架好浮桥，冲过河去，攻占了道州，接着布置警戒，掩护中央纵队渡过了潇水。后来到达乌江时，汹涌的急流又挡住了去路，对岸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江面，妄图使乌江天险变成红军难于逾越的障碍。但是，我们红四团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急流中架起浮桥，消灭了对岸守敌。当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来到江边时，对岸已经没有枪声。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其实，架桥开路是我们前卫团的份内之事。想不到毛主席却一直记住此事。现在他又写信表扬。所以，当我捧读毛主席的信时，心中无比激动。时隔数十年，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清晰可忆。

毛主席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当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他除了来校讲课外，还经常来看望我们。“红大”开始设在瓦窑堡，后来迁往保安，保安北靠长城，在古代是边陲要塞，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就是我们的校址。这些山洞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扑面飞出一群群蝙蝠。“红大”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现在全成了清洁工。我们大家动手，清理好卫生后，又自己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

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的同志说：“嗬！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

毛主席来看我们时，表扬了我们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建立“最高学府”的精神，接着风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毛主席所说的“参禅”，是“参”马列主义之“禅”；他说的“悟道”，是“悟”中国革命之“道”。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我们通过学习，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毛主席在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在和干部谈话时从来不用训斥的口吻，而常常用商量或劝说的口气，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教育干部。

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军委要调我到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去任参谋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见周副主席是用商量的口气说的，便说：“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好，四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副主席告诉我：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不愿去红四军工作的事。所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时，我心中有些不安，准备挨批评。

可是，到了毛主席住处后，他笑着对我说：“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那天虽是冬日，却不冷，我们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主席说：“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我说：“你讲的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我们又谈了当年醴陵农运和水口山工运的情况。

接着，毛主席看着我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我说：“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同志和颜悦色地说道：“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我问：“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我又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同志停下脚步望着我：“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我认真地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毛主席笑了：“嗨，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四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就这样，毛主席在笑谈中说服了我，教育了我。我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 129 师 385 旅，我任参谋长，后又被任命为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当时我们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地准备开赴抗战前线。不料，一个月后传来命令：385 旅只有 769 团开赴前线，而旅部率领 770 团留在后方，

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说实话，让我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后方，心理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我就去找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向他们要求让我到前线去。他们耐心地与我谈话，要我安心留下来。我接受了他们的劝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心里还总有些遗憾。

后来，中央军委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由肖劲光同志任留守处主任。不久又组建留守兵团，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明了留守和保卫革命大本营的重要性。大会后，在会餐时，毛主席找到了我，依然是那样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耿飚啊，听说你想到前线去指挥打仗，是不是？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 769 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他还打了个比喻：鸟有窠，毛毛有摇监，革命要有根据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和他那风趣的谈话，坚定了我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工作的信心。

毛泽东同志还常常虚心地征求和听取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乃至批评。

1943 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消，改为联防司令部。那时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和曹里怀同志同住一室。我们两人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同志的问题，有些看法。我们讨论了几条意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向中央反映。次年秋，我在党校毕业，面临分配工作。我给毛主席打了个电话，要求见见他，一来谈谈我对分配的想法，二来想把这几条意见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一下。毛主席给我回了个条子，要我马上去他那里。毛泽东同志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我十分高兴，就约了曹里怀同志一起去。我们赶到毛主席住处，先谈了我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意见和两条建议。

毛主席仔细听后，连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给我？”我赶紧把早已写好的五条意见，交给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大截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点头，还用铅笔在上面划出重点，批了些文字。

时隔数十年，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一个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下情的伟大形象，便浮现眼前！

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

王鹤寿　吕东

一个光辉的名字——毛泽东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七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和这个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辉煌业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爱戴，所以，他已经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庄严称号永远载入我们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史册。在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谨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着重在我们转入工业部门工作之后，他对冶金工业的亲切关怀，以及对包括我们个人在内的冶金系统干部、群众的谆谆教诲，记述于后，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仰和思念。

迎接恢复生产和开展建设的艰巨任务

我们两人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转入工业部门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规划建国宏图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经济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无数爱国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又无能解决，为此而抱恨终身的一个大问题，在人民取得政权已成定局之际，由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庄重地提了出来，这就到了必须解决而又完全能够解决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被派到工业部门工作，自觉责任重大。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形势的必然到来，他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重视经济工作和不愿干经济工作的思想，明确地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必须准备从现在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转到经济战线上去。我们下定决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要象铆钉钉在钢板上那样，牢牢地钉在工业战线上。但是要钉住，就得钻进去，这谈何容易。当时我们在东北工业部。东北的工业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特别严重，百废待举。鞍山、本溪、抚顺等钢铁厂全部停产，高炉、电炉冻结。另一方面，我们接管工业的干部大都是来自军队和农村，对现代工业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主观和客观上的双重困难，我们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抓住重点，先从鞍钢着手，恢复东北工业，学习工业管理也先从这里开始。为此，我们率领东北工业部处以上干部深入到鞍钢的工厂、矿山。从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到炼钢、轧钢等生产工序，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听，从头到尾，向内行学习，向专家技术人员（包括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的专家以及尚留在鞍钢的几位日本技术人员）请教。那一段时间，我们上午实地观摩考察，下午听技术人员讲课。一边学习，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研究恢复生产的方案。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各钢铁企业恢复和建设发展迅速。鞍钢从 1948 年 2 月第二次解放到 1949 年 7 月就恢复了生产。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即委派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

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表示祝贺，与此同时，本溪、抚顺等钢铁厂也先后投入了生产。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鞍钢的恢复和改建。在他 1949 年 12 月出访莫斯科时，签订的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 50 个工程项目（后来逐步增加到 156 项）中，鞍钢列于榜首。1949 年底，中央派李富春同志率老解放区技术干部 10 人组成中国代表团，与苏方经过充分协商，于 1950 年 3 月签订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这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对我国技术援助的第一个议定书。

1952 年开始，中国政府批准了东北工业部拟定的鞍钢建设计划任务书，确定鞍钢的建设规模为年产钢 350 万吨。从此，鞍钢以建设七号高炉、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三大”工程为中心，进行了全面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根据东北工业部的建议，1951 年 12 月 13 日李富春同志亲笔给周总理和毛泽东同志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毛泽东同志于 17 日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在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派遣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担任厂矿领导工作。据统计，从 1949 年到 1953 年，派到鞍钢的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 500 余人，有力地加强了鞍钢生产建设的领导。因此，鞍钢“三大”工程建设的进展极快，到 1953 年底，这“三大”工程全部建成投产。鞍钢全体职工当时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向他报告这一喜讯。毛泽东同志亲笔回信：“你们 1953 年 12 月 21 日来信收到了。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 1953 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鞍钢和整个钢铁战线广大职工的极大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1950 年 2 月，毛泽东同志访苏回国途经沈阳时，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已经开始运到全国各地时，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连声讲道：“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对我们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示，那就是要我们不仅抓好当前的生产建设，更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在鞍钢和整个东北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造就出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还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的精神，从实践中锻炼干部，总结经验，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办法是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矛盾，用抓中心工作的方法，集中力量加以解决。通过部署一项工作，解决一个问题，把工作推进一大步。而且要求我们自己和各级干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经验。1951 年 1 月 5 日，东北工业部对各企业发出了“建立专题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次总结报告只透彻他说明一个问题或一件工作。一月、一年或几年下来不断地积累经验，从而根本地提高工作质量，达到培养干部和造就人才的目的。我们当时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先后部署了献纳器材、恢复生产、创造生产新纪录和建立责任制等中心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极为关心东北工业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我们的工作进程给予密切的关注。在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中，鞍钢炼钢厂创造了超过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缩短每炉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新纪录，全

厂职工于 1952 年 12 月 2 日写信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当即于 12 月 14 日回信：“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十二月二日的来信。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 1953 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一个时期抓住一项中心工作，而辅之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工作。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促进工作、提高干部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也完全符合他所写的《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我们在领导东北工业的过程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它的重大作用。所以，当 1952 年下半年各大行政区撤销，我们两人调中央重工业部任职之后，立即组织力量对关内各企业的情况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研究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确定了 1953 年要抓好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和加强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等三项中心工作。并于 1953 年初以重工业部党组名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关于目前工作检查及一九五三年中心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亲自批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转这两个报告的要点，于 3 月 31 日发至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党组。他在批语中指出：“重工业部党组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的缺点在全国国营和地方国营工矿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单位可能还更为严重。重工业部经过具体的检查将这些毛病揭发、分析和批判以后，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动员全体干部、全体职工，来逐步地克服这些毛病，这种做法，就是一种最实际的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工作方法对改进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和培养干部，效果确实比较显著。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我们在进城后必须紧紧抓住生产建设事业的恢复这个中心，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注意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转入工业部门之后，感到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教育经济工作干部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腐防变。1952 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在斗争实践中对东北工业部系统少数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和揭露出来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并于 1952 年 2 月 1 日，向东北局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报告说，现有的材料表明，企业中不但掌管大批资财的部门有贪污腐化的老虎，不直接掌管资财的部门和个人，只要有一定权限职责，管理不严，有漏洞的也会有。并且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方针措施。毛泽东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后，认为报告所述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在 2 月 10 日就作了重要批示：“各同志：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这个重要批示对于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廉政建设，坚持反腐败斗争，一直是重要的鼓舞。

归结起来，我们转入工业部门之后，入门过“三关”。以恢复生产，开始建设为中心是一关；钻研业务，培养干部是一关；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腐防变又是一关。这“三关”，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引下走过来的。

探索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道路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取得了重大胜利。党中央及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我国进入了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时期。为了逐步实现总路线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一五”计划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指导方针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恢复时期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终究底子大薄，工业十分落后。1952 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43.1%，而重工业尤为落后，其产值在工业产值中只占 35.5%。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保证国防的巩固，才能装备各行各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可靠的基础。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向钢铁战线全体职工发出号召、提出要求，希望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1955 年他在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讲：我国地大物博，现在每年只有二百万吨钢，实在不象话。我们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们要争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说，超过美国用木到一百年，我同意。1956 年 8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又讲：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 22 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可能达到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同志在思考如何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是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建设的。这从投资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五”计划国家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总投资占 42.53%，为 250.26 亿元。在工业投资中，钢铁工业的投资为 37.93 亿元，占工业总投资的 15.16%。钢铁工业的建设成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们两人由东北工业部调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不久，遵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充实和加强基本建设战线、组建了一支工种齐全的基本建设队伍。从勘探、设计、施工进行系统的组建。到 1957 年，各冶金建设公司下属的工程公司从 1952 年的 8 个扩充到 83 个，有了矿山、土建、机械、电气、金属结构、筑炉等专业队伍，基建队伍职工达 15.9 万人。二是整顿企业，有步骤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把钢铁企业的生产与技术等各项管理逐步引上正轨。三是兴办钢铁科研和教育事业，建立了钢铁研究院、北京钢铁学院（在东北工业部时期创建了东北工学院和有高级专家的沈阳金属研究所）等一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培养技术人才。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钢铁工业迅速发展，职工积极性高涨。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张明山、王崇伦、马万水等一些先进工人的带动下，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兴起来了，钢铁生产与建设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到 1957 年“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国共生产出钢 535 万吨，生铁 593.6 万吨，成品钢材 436.4 万吨，铁矿石 1937 万吨。当年度鞍钢生产生铁 338.1 万吨，钢 291.2 万吨，钢材 191.8 万吨。鞍钢已建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

毛泽东同志看到我国钢铁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胜利，非常高兴。1957 年 11 月，他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钢……。中国人民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这充满激情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振兴中国钢铁工业的期望和信心。

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胜利，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比较顺利的。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发展形势，开始考虑如何走中国自己的路子，能否使我国工业化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他的出发点是，苏联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苏联的弯路和教训我们能否避免。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我国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实践，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就提到我们全党的面前。基于这个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于 1956 年 2 月开始，连续一个多月听取了 34 个部委的工作汇报。2 月 25 日，我们代表重工业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钢铁工业现状和发展规划，其汇报要点：一是钢铁工业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当时钢铁工业生产水平与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二是我们钢铁工业的水平还十分落后，我国 1955 年钢的实际生产量，仅相当于美国 1886 年水平，落后 70 年；1956 年钢的计划产量为 447 万吨，仅相当于苏联 1928 年的水平，如按人口平均，则落后情况表现得更为严重。在产品品种质量等方面，我国钢铁工业更是十分落后。三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进行建设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之美国、苏联建设钢铁工业的初期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水平（冶炼、轧钢等机械、仪器设备及冶炼技术等）要高一些。我们提出了今后几个五年计划有可能超过苏联的发展速度。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我们的汇报。当我们汇报到取得的成绩时，他很高兴，不断地插话询问。听到我们讲钢铁工业还十分落后的情况后，对我们说，要迎头赶上去，坚持不懈地干，总是可以赶上去的。当我们汇报到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比苏联快一点时，毛泽东同志说，应该是可以的。第一，是因为有苏联的成功经验，又可以少走苏联走过的弯路；第二，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市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积极性。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当面直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我们主管的部门的工作情况。他要求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殷切期望，特别是他借鉴苏联经验，对走我国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给了我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经过听取 34 个部委的汇报，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正式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还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它可以少搞。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为了加强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部门的领导，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40 次会议通过，重工业部于 1956 年 5 月 12 日分为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分管冶金工业部。从此，我们既得到直接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陈云同志的指示关怀外，

又有幸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周总理的更多关怀、指导、检查和督促。“一五”计划即将结束，“二五”计划即将开始之际，在实践中，我们逐步感到中国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和苏联不同。我们冶金工业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从技术到管理许多方面照抄照搬，出现了不少不符合实际的作法。如何克服教条主义，探索我国工业发展的道路的问题，已经在我们头脑里有所酝酿。正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开始有所认识，但还是比较模糊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发表了，使我们心中豁然开朗，感到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很快组织冶金部党组全体成员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集中半个多月坐下来“务虚”，认真地学习领会《论十大关系》。大家共同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不但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而且研究了苏联 30 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和方针。并且比较深刻地理解到《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正确处理工业以至整个经济、整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基本关系，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联系到冶金工业的实际，第一个要正确处理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能完全照抄苏联钢铁企业由中央主管部门“一家独办”，越大越好。而要量力而行，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办钢铁企业的积极性，除了中央办一些大的钢铁厂外，还要用很大的力量帮助地方办些中小型的钢铁企业。大型钢铁厂的设备，当时中国不能制造，而中小型的设备中国能造，办起来能快。中国交通运输不发达，中小型钢铁厂就地生产，就地利用，可以减少运输压力。所以要结合中国国情，采取大、中、小结合的方针。于是，我们在 1957 年 3 月召开了全国冶金系统的厂矿长会议，专门阐述了我们学习《论十大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走中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道路的体会和设想。从此，在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直接启发教育下，中国钢铁工业开始有了自己的谋略，形成了中国式的战略布局。

1957 年 8 月 4 日，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所谓“三大”即当时已经开始建设的鞍钢、武钢、包钢三大基地，“五中”即指选择了五个有发展前途的、可以建成年产 30 万到 100 万吨钢的中型厂，即：山西太原、四川重庆、北京石景山、安徽马鞍山、湖南湘潭，前四个是扩建，后一个是新建。“十八小”即指通过调查，规划在十八个省、自治区建设十八个年产 10 万到 30 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当时我们设想所谓“三大、五中、十八小”的钢铁企业扩建与新建完成后，将来都会有大的发展，“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布置，是我们学习《论十大关系》的结果，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贯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具体行动。新的方案上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极为重视。陈云同志幽默他说：“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同志也高兴而幽默地说：“你们有了十八罗汉，好嘛！”

“三大、五中、十八小”方案执行的结果，现在，当时的中型钢铁厂现在已发展为大型钢铁厂，小的也都己成为地方骨干企业，而且在数量上还有很大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除以后新建的攀枝花、宝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外，现今的钢铁工业还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扩大和发展起来的。“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方案和布置，是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产物，是他的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指导思想的具体的体现。这一方案执行的结果，不仅在钢铁

工业的发展速度上，而且在布局的合理展开上，都起了历史性的奠基作用。

1958 年 1 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通知我们两人还有高扬文、徐驰去他的住所。我们扼要地汇报了当时钢铁工业生产建设的情况后，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来是统一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地方不大发展。西欧就不同，卢森堡只有一个地委专区那么大，法国和一个省（山东就是一个法国）差不多大。我们要注意发展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个省有一个钢铁厂、两个钢铁厂。各个部应该有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帮助各省搞钢铁厂。你们要把你们的眼光，注意到六亿人民。

这次谈话后，我们立即组织冶金部党组成员反复研究，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1958 年 3 月根据党组的研究，由王鹤寿执笔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两个报告，一个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一个是《争取有色金属产量飞跃，占领有色金属全部领域》。第一个报告在论述了如何使干部又红又专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苏联经验，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后，提出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第二个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有色金肩工业的规划。针对有色金属行业不能满足军工、机械部门和冶炼高级合金钢的需要以及有些人对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两种情况，论述了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性，提出了“ 现在的冶金工业是有色金属时代 ”的论断。这就是说一般普通钢材已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而耐高温高压高速的钢材以及各种特殊性能的钢材必须是具备各种不同性能的合金钢，而合金钢有赖于有色金属中的各种稀有金属。同时尖端工业需要稀有金属合金日益增多。报告提出：“ 要用最大的力量攻占全部有色金属 64 个堡垒（元素）。 ”

毛泽东同志对这两篇报告极为重视和赞成。同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说：“ 冶金部党组开会搞‘ 务虚 ’，这种办法可以搞一搞。抽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人，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先准备一篇报告、文章，谈得要有说服力。总之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是唯物论。对本质的问题要看得见，抓得起。 ”在这次会上谈到理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 什么叫理论，理论就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冶金部总结了实践经验，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对于学习外国经验怎样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克服照抄照搬的倾向，通过“ 务虚 ’ 达到了理性的认识，这就是理论。 ”4 月 5 日中共中央对我们的两个报告作了重要的批示。

1958 年 1 月“ 南宁会议 ”和 3 月 ” 成都会议 ” 批判了“ 反冒进 ”。这时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一次又一次地提高了生产指标。1958 年钢产量国家原计划是 620 万吨。后来提出第二本账定为 700 万吨，接着又加码到 800 万吨，争取 850 万吨。1958 年 6 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找王鹤寿谈话，问：“ 今年钢产量能达到多少？ ”王鹤寿根据部党组在成都会议后测算的数字回答说：“ 可以超过原定的 620 万吨，争取达到 800 万吨。 ”毛泽东同志又问：“ 能不能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 ”王鹤寿回答说，这有困难，回去我们再研究。

1958 年 8 月 16 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 书记挂帅、全民全党大搞钢铁 ”的号召。8 月 17 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工业生产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钢铁和机械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并确定了 1958 年的钢产量达致 1070 万吨，比 1957 年翻一番。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工业 ”

以钢为纲”的口号。从 1958 年到 1960 年，连续三年搞了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虽然指标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我们在测算时也表示过困难，但我们在主观上是想依靠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与支持，使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因此，对“大跃进”的思想，当时是完全接受和宣传的，为了达到钢铁生产翻一番，就在钢铁生产上大搞“小土群”、“小洋群”，钢铁工业孤军突出，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而且对钢铁工业本身，也带来了质量下降、设备失修、矿山失调、浪费巨大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这些重大失误和巨大损失，我们作为冶金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每一念及，深感内疚。

毛泽东同志毕竟是伟大的领袖，是尊重实践的。毛泽东同志襟怀坦白，不掩盖高指标的失误。他在庐山会议前期，曾说过，钢铁产量翻番是他提出来的，错误应当由他负责。1961 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作了自我批评。直到 1970 年，针对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钢铁翻番的情况，他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提出的是，当着“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充分暴露出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同意周总理、陈云同志倡议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 1960 年 6 月 14 日在上海会议上明确提出：“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这个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毛泽东同志总是时刻地关注钢铁工业的发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在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狠抓经济工作，钢铁工业从破坏中开始恢复，1973 年钢产量达到 2500 万吨。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很高兴，他兴奋地说：“从 1960 年到 1970 年，钢铁工业总是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之久上不去，现在上来了，已达到二千五百万吨了。”直到他临终前一年的 1975 年，他还说：“要多搞点钢，多搞点油，加强战备。”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晚年，仍念念不忘把中国的钢铁工业搞上去。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从工业布局上还着重论述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战略，基于这种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对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决策。1956～1957 年间，我们和冶金部党组成员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结合冶金工业实际提出的“三大、五中、十八小”的规划方案中，就有准备在西南和西北再建设“两大”的计划。其中包括在西南建设攀枝花钢铁厂。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王鹤寿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提到准备建设攀枝花钢铁厂时，毛泽东同志询问了西南地区矿产资源情况，积极表示赞成建设攀枝花钢铁厂。大家顿时感到平时党组议论来议论去的一个大问题落实了，当即把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事列入了具体议程，并抓了两件事：一是正式成立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筹备处（当时叫西昌钢铁公司筹备处），二是组织开展攀枝花磁铁矿（含有色金属钒、钛）的选矿和冶炼科学研究工作。随后就在西昌地区建了一个小钢铁厂，作为冶炼钒钛磁铁矿的试验厂。后来，由于“大跃进”错误的影响，到工业调整时下了马。

1964 年 5 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国际

形势严峻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提出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问题。他说：“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我睡不好觉。”“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同年 9 月，他还带有批评性地说：“把川黔、滇黔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把这两条路停下来，又不打别的主意，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毛泽东同志督促大家尽快地把三线——战略后方的工业、交通、国防基地建设起来，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把攀枝花钢铁厂作为三线建设的代表提出来了，还专门委托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接着，周总理又亲自主持，与冶金部共同研究决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规模、设计原则、设备制造，以及建设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964 年春，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又亲临攀枝花，对照设计图纸，拍板批准了设计方案。随后，国家计委、地质部、铁道部、机械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等各部委相继迅速行动起来。就这样，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决策下，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李富春同志的直接主持制定下，我们拉开了大规模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序幕。

冶金部从鞍钢、本溪钢铁公司抽调大批建设队伍、冶炼系统的技术职工与四川省委合力创建攀钢。广大钢铁建设大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远离城市和没有铁路、没有平地的狭窄山坡上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毛泽东同志还及时提出“攀枝花矿高钒高钛，如果钛铁分离不开，铁炼不出来，你们后悔不后悔”，促使我们组织人马夜以继日地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创造了高炉冶炼高钒钛磁铁矿新工艺。1970 年 7 月 10 日，攀钢流出了铁水，1971 年又流出了钢水。

当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展开后，毛泽东同志比较放心了。1965 年 1 月，吕东同志曾向中央写过专题报告，反映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顺利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了很高兴，在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1965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长远规划汇报时说：“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所谓钢铁基地，只有一个攀枝花是不够的，那里只能生产大型钢材，而军事工业用的钢材不能完全解决。”所以，在建设攀钢的同时，我们又在西南、西北布置了一批钢铁企业。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探索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时，不仅关注着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业布局和品种质量等战略问题。还十分注意探索中国特色的工业企业管理，一直在考虑如何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和平建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怎样使它和工业企业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企业管理的新路子。1960 年 3 月 22 日，他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热情地肯定和倡导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针对《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一套权威性的管理办法）而言，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并不是象国家宪法那样的安邦治国的总章程。《鞍钢宪法》的提出，带有那个时候的时代特点，是有局限性的，有些提法，也确实不是很确切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63 年 12 月 16 日，冶金部总结了近几年来冶金工业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议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看到报告后很快作了重要指示：“我已收到冶金部学习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于 1964 年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我们冶金系统把学解放军和学大庆结合起来。整个钢铁战线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出现了马鞍山钢铁公司、鞍钢无缝钢管厂、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铁厂等十个大庆式企业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输电队、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等一大批先进集体。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出现过如“大跃进”那样重大的挫折和失误，但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失误，钢铁工业又在康庄大道上继续发展了。探索，失误，纠正，再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同志当年领导我们探索前进，也为当今的改革开放，搞有中国特色的钢铁工业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当年钢铁工业的水平，当然不能和当今相提并论。但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探索的结果毕竟如列宁所说：“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言传身教

我们两人从转入工业战线起，直到“文革”爆发后离开，在将近 20 年的冶金工业领导岗位上，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建设和发展中国钢铁工业的一系列指示；亲身经历了在他亲自决策指挥下我国钢铁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进程；还从毛泽东同志指导冶金工业的光辉实践和思想中，学到了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宝贵精神，真是言传身教、终生难忘。当然，这也包括着周总理、陈云同志对我们更经常、更直接的思想指导与实际工作中的指示帮助。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他自己就在实际行动中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夙兴夜寐，考虑着国内外的大事，还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地亲自视察了钢铁战线上的许多工厂、矿山。据我们所知，他去过的就有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大冶铁厂、上钢一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厂、河北邯郸钢铁厂等钢铁企业。他每次深入钢铁企业总是上矿山、登炉台，亲自观察，仔细询问。1953 年 2 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到大冶钢厂视察了炼铁、炼钢、轧钢、锻钢、热处理等车间。他看到钢铁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忘我劳动，异常高兴，满怀期望地说：“一定要在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上把工厂办大办好。”1958 年 3 月 28 日，毛泽东同志到重钢视察。他详细询问了中板轧机的年代、规格等情况，并一连三次靠近炼钢平炉炉门，仔细观看这台命名为“青年炉”的冶炼状况，高度赞扬了“青年炉”年青炼钢工人的劳动热情。毛泽东同志直接向工人、车间主任、总工程师了解情况，当他得知重钢虽是个老厂，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焕发了青春，平炉炼钢实现了双槽出钢，70 吨的炉子可以炼 120 吨钢

时，他微笑着连声说：“好！好！好！”1958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同志乘船到武钢视察。武钢当时的办公地点，都是一排排简易低矮的平房，毛泽东同志在平房里坐下来，满怀兴致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厂区总平面图，听取了武钢领导人的汇报。他赶到现场，要和工人们一道庆祝一号高炉提前建成出铁。在高炉下面，他关心地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是不是有把握？”当听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万一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当然，他是看到了一号高炉首次出铁的全过程才离开的。当他了解到炼焦能够回收大批化学产品的情况后，一再对武钢的领导说：“你们也可以回收，应该多搞些。你们这样的企业，应该办点化学工业，办点机械工业，办点建筑材料工业，各种工业都办点，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32 年后的今天，武汉钢铁公司、首都钢铁公司等大型企业都已办成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集团公司了。1958 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同志又亲临马鞍山视察钢铁企业。下火车后，毛泽东同志到了炼铁厂。他不断地问：“烧结矿是什么原料烧成的，比普通矿石有什么好处？”“你们有哪几座矿山？”当马鞍山钢铁厂领导汇报到建中型高炉，“在过去要建设投产，一般地得用三年时间。由于广大工人、干部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投产了。”毛泽东同志极为高兴。那时，九号高炉刚出完一炉铁，毛泽东同志接过现场工人送去的蓝色看火镜，从九号风口聚精会神地观看高炉内矿石、焦炭的熔炼情况，并问，“这座高炉是什么时候投产的。”“这个炉子一天能生产多少铁？”铁厂领导同志回答：“将来一天能出三百多吨。”毛泽东同志还掰着自己的手指算着说：“一天三百多吨，十天三千多吨，一个月一万、一年就有十二万吨了。”他又问：“这样的炉子有几个？”当听说全部建成后有五座时，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地说：“那么一年就可以生产六十万吨了。”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详细了解了马鞍山铁矿资源、运输条件和炼铁厂情况后，才作了重要指示：“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马钢五座高炉全部建成后，毛泽东同志于 1959 年 10 月 29 日又一次亲临马钢视察。

毛泽东同志视察上钢一厂是在 1958 年中秋之夜。白天他已经在别的企业视察一整天了，工作人员劝他晚上休息，但他却在中秋节的半夜 1 时 30 分来到上钢一厂，来到中秋夜班劳动的工人群众中，这对该厂干部群众当然是极大的鼓舞，而对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是不顾疲劳、连续作战了。

毛泽东同志搞调查研究，特别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1960 年 9 月 30 日凌晨 3 时，毛泽东同志提笔给王鹤寿写了一封亲笔信，信曰：“请查云南、贵州、广西 1960 年能产多少吨铁、多少吨钢。这是第一件。这三省煤炭（有无焦煤）、铁矿的地下蕴藏量，三省各有多少。这是第二件。以上二件，请你查明告我，于今日（9 月 30 日下午）写明送我为盼！”收信后，我们即按信上的指示进行查核汇报。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研究规划我国西南边疆钢铁工业的发展，随时都在思考着情况。

五十年代，我国炼钢方面到底是发展平炉好还是发展转炉好？还是争端初起，未见端倪。在 1956 年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宴请一部分先进生产者代表。他和一级冶金工程师、恢复鞍钢的功臣、老专家王之玺在一桌吃饭，王坐在他的身旁。他向王仔细询问了转

炉炼钢的工艺过程，转炉和平炉比，有什么优点和缺点，王之玺作了详细介绍，他认真地听取情况，但并不下指示作判决，他那虚心求教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使老专家激动不已。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人，但难免也有失误的地方，重要的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发现了错误，就公开揭露和纠正，并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大办钢铁高指标的失误，一直到 1964 年李富春和李先念同志向他汇报工业建设方针时，他还严肃地说，高指标浮夸风的教训要永远记住，高指标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群众路线。他自己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典范。他十分关心钢铁工人的生活，注意职工的劳动保护和生产安全，更是非常尊重群众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1948 年 2 月 19 日，鞍钢解放后，炼铁厂配管工人孟泰以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姿态，带领 10 多名工人，在几个月之内收集上千种材料、上万个零件，建立了后来被誉之为“孟泰仓库”的小库房，为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几座高炉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950 年 9 月 25 日，孟泰作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1959 年 10 月，钢铁战线的老英雄孟泰又参加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孟泰再一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孟泰说：“一个劳动模范首先要起三大作用，就是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通过你们的作用把大家都带动起来。”孟泰说：“我一定要把主席的话贯彻下去。”

五十年代初，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王崇伦创造了“万能工具胎”等胎具，解决了矿山凿岩机零部件和抗美援朝军工产品零部件加工不过来的重大生产关键问题，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54 年 9 月，他作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人代会，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讨论宪法草案时作了大会发言。毛泽东同志对王崇伦的发言听得很认真，带头给他鼓掌。发完言后，毛泽东同志特别亲切、热情地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握着他的手和他交谈，问他：“你的‘万能工具胎’是什么样？你们鞍钢的生产很好吗？”王崇伦用手比划着告诉毛泽东同志，并说：“鞍钢工人当家作主了，生产热情特别高，钢铁产量早就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现在，我们正在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毛泽东同志说：“好啊，你们干的不错，你为国家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你回去，要带动大家学技术、搞革新，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多做贡献。”

1951 年 8 月 31 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反映工资不合理的状况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当时工资标准混乱，重工业工人工资偏低，该厂相当一部分工人生活困难，工人反映相当强烈，希望能够较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发了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批评得非常严厉。毛泽东同志看了来信，即于 9 月 12 日写回信：“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常委会同志们：八月三十一日的来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事隔不到一个月，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解决。

1958 年 3 月 28 日，毛泽东同志在重钢视察时，看到成品车间里有一处篾棚，就关切地问重钢的领导人：“修这个竹房子做什么？”重钢负责同志

回答说：“是堆放钢板的。”又看到轧出的钢板是靠工人抬运入库的，微微皱起了眉头，即刻向在场的重钢领导提出：“是不是可以搞些机械化运输？”重钢领导同志当即回答：“我们一定抓紧这方面的工作。”1958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同志到大冶铁矿视察。因为他是当天早上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后，就坐汽车来铁山矿场，所以，矿长请他休息一下。他刚向工地办公室迈出了几步，看到一个山洞，就问铁矿党委负责人：“这是什么？”“是避炮洞，爆破时避炮用的”。矿党委负责人回答。毛泽东同志立刻走进这个小洞，一边观看洞顶，一边关切地问：“这个洞顶很薄，能顶住石头吗？”深切地关心矿工们的安全。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独立自主。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同样身体力行，坚持独立自主。这在《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领导我们探索中国自己发展经济道路的过程中，使我们体会最深。到 1958 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同志更加注意在广大干部中培养这种精神。1958 年 6 月，李富春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毛泽东同志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我们正是遵循这条路线，在 1960 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专家和工人群众，克服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自力更生建立了马鞍山火车车轮轮箍厂，解决了当时铁路运输面临瘫痪的危险。以后又自行设计、自造设备、自行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攀钢。并且在这个期间自力更生，技术攻关，钻研尖端，为“两弹一机”，为卫星上天，提供了关键性的冶金方面的新型材料。毛泽东同志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然不是不要对外交流。建国初期，他就强调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到了 70 年代，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被逐步打破，中国和法、英、美、日等国相继建交：1972 年，毛泽东同志就亲自批准从德、日两国引进了投资总额达 40 亿元人民币的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这是当时最大的建设工程。

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领导冶金工业的实际活动中，从自己的实践中深刻地感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阐明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体会是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获得的。我们相信，这比单从书本、文件上学习到的要深刻得多。

饮水思源永久追念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年头了。他去世后，在我们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所确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所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钢铁战线形势有了蓬勃的新发展。1991 年，我国钢产量已达 7000 万吨以上，已经是世界上第四位的钢铁大国。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对钢铁工业的亲切关怀和宏观上的战略指导，不能忘记他为钢铁

工业的发展所倾注的大量心血。时至今日，我国的钢铁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除了宝钢等新建基地外，绝大部分钢铁工业还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所打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奠基人。我们永久地纪念他。

岁月流逝，物换星移。今天情况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我们要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冶金工业的一系列指示，比如关于开发矿业，不搞无米之炊的指示，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关于贯彻质量第一的指示，关于综合利用的指示，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等等，仍然是我们发展钢铁工业的重要指南，其基本精神具有强大的持久的生命力，让我们永远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遵循邓小平同志指示的路线方针，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不懈地奋勇前进！

对毛泽东同志的若干回忆

刘澜涛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经过八十一年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幸。中国共产党内有了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这又是党和人民的大幸。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也承认领袖人物所起的巨大作用。由于有了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国革命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重新站起来了，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是我们的灯塔，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生前，我同他的接触是不少的。值此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写出对他的若干回忆，以纪念这位历史伟人。

我是 1925 年五卅运动时在陕北参加革命的。当时已经知道南方有一个毛泽东，是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陕甘的党组织是直属李大钊领导的，西安是西北革命的中心，进步报纸、刊物出版很多。在陕北也能多少看到一些进步书刊，其中有的对毛泽东评价很高，在我年轻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开始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的烽火燃烧很快，党内外报刊上不断出现朱毛红军的消息，我对他们的敬仰特别深。1931 年我调到北平（今北京）工作，不久即被捕。在监狱里，我们经过斗争取得了看报纸的权利，经常可以看到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我们难友们特别关心的是红军的动向、中共中央的情况。毛泽东等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我们在狱中非常兴奋。特别是我这个陕北人，为党中央到了故乡而更加高兴，相信今后的中国革命一定会迅速高涨。这时候，毛泽东这三个字在我头脑里已经成为一个崇高的名词，但是还没有见过这个伟大的著名人物。

一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 1937 年。

1937 年我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时，向组织上提出，希望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北方局批准了我的请求。大约 6 月初我动身去延安，到达陕西三原县云阳红军总部，我兴奋地戴上了有红五星的红军帽，然后赶往延安，途中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延安后不几天，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延安援助平津将士的市民大会，要我作为来自平津前线的代表，在会上作报告。这个会是 7 月 18 日在延安东门外广场召开的，有几千人参加，这一天，阳光明媚，天气很好，宝塔山下，人群拥挤，毛主席到了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这位我敬仰已久的人物，略现清癯，精神极好。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先要我介绍平津情形。我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战情绪，以及日寇对我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残暴罪行，我说，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讲完后，毛泽东同志同我亲切握手。接着，大会就由他报告卢沟桥事件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大声疾呼地指出，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

他的讲话慷慨激昂，全场群众情绪愤慨，磨拳擦掌。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落，气氛热烈，纷纷要求奔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是我到革命根据地参加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也是我多年来在白区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的热烈壮观的革命景象。这次延安各界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大会和第一次见到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不久，当时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找我谈话，对我说：现在工作需要人，中央决定你不住党校了，你是陕北工作的老领导，希望你回陕甘宁边区工作。我服从组织决定，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边区党委办了一个刊物，叫《党的工作》，当时由我主管，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反对自由主义》是那时候写的，我拿到这篇文章的底稿后，感到太好太重要了，就发表在《党的工作》上。这是关于我们党的建设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篇幅虽然不长，然而内容丰富而深刻，针对性很强，对于当时党内的自由主义不良之风，起了极好的针砭作用。即便在现在，也仍是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时期毛泽东同志给我的印象，不但对国内党内的大事、大政方针掌握正确，指挥若定，是一个舵手，而且工作作风十分细致深入，即便是对小事也十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里举一个例子：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势已定。但是在双方会谈中，蒋介石对共产党所属部队的编制和陕甘宁特区这两个问题，一直不松口。直到 1937 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战争已经威胁到他的政治、经济统治中心江浙，他 才同意将北方的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既然有了编制，很自然就要有防区。1937 年 10 月中旬，毛泽东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林伯渠同志，要他提出把佳县、吴堡、米脂、绥德、清涧五县划为八路车补充区，为八路军直接后方，防务由八路军留陕部队担负，以利抗战。国民党方面同意了。10 月下旬，我方设立了陕北五县警备区，党内设警备区特委，我是警备区秘书长兼特委统战部长。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警备区写了一个关于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布告，四六体行文，内容是团结抗日。我们带了布告出发，在离开延安头一天宿营的晚上，毛泽东同志派了骑兵通讯员快马赶来，说是布告上要改两个字。我们到警备区后，布告改两个字贴出。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改的两个是什么字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毛泽东同志这种认真负责、一点也不马虎的作风，不但当时使我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就是今天忆念及此，仍然感到值得我们以及后人学习的。

二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调我到敌后根据地晋察冀去工作，我离开了中央直接领导的、模范的陕甘宁边区。

从此，我开始在一个革命根据地参加全面的领导工作。晋察冀边区当时在彭真、聂荣臻同志领导下，是抗日模范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曾经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作序说，晋察冀边区“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即新民主主义。我在祖国北方晋察冀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战斗和生活了十一年，党领导了我，人民教育和鼓舞了我，

对于如何建设和发展一个革命的根据地，我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党和军队同老百姓完全融为一体，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真正是鱼水关系，使得我们在极困难极艰险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根据地的工作中，他也经常关心着我们。他对晋察冀参议会的工作、精兵简政等都有重要指示，1943 年中共北岳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他还专门来电指出“望以发展生产力重心”。晋察冀分局及军区主要领导成员的任命名单，也是他亲笔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是与毛泽东同志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1944 年秋，我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住在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一次在杨家岭食堂吃饭时，我见毛泽东同志来了，就上前向他请示：什么时候向你报告工作？他笑着说：先住下，不要急。几天后我就得到通知到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去报告工作。在此之前，我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夜间工作，白天是他睡眠的时间。这次出乎我的意料，白天找我谈。他的兴趣很浓，对我说有充分的时间，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到晚饭后很长一段时间，中间没有休息，连吃饭也是边吃边谈。主要由我报告晋察冀的各项工作，同时也谈我自身的经历。他主要是听，有时提问，有时插话，插话幽默风趣，常常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里说以下几件事例：

我讲到在米脂上学时的一段革命经历：1928 年 5 月 3 日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了陕北米脂县城，青年学生对日本侵略者在山东济南蛮横肆虐，对中国十多名外交特派人员挖眼割鼻、集体枪杀的残暴罪行，怒火中烧，觉得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极为愤慨。我们把学生组织起来，利用四乡农民赶集的日子，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喊口号，贴标语，轰动全城。我是个赤贫家庭的穷孩子，平时对地主老财有气，这次就把标语贴到了地主老财的银匠楼。学生一走，地主老财把标语撕了，还骂学生胡闹。这事被我们知道了，就组织人再去贴。再贴后，又被撕掉了。于是我们就拿着棍子去砸毁了银匠楼。地主吓得从后门逃出去藏在破庙中一口空棺材里。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从棺材里揪出来扭送到县衙门，痛斥这个地主破坏爱国，要县长把他关押起来。县长害怕学生和群众，勉强把地主暂时收留起来。事情闹大了，陕北军阀井岳秀派了一个旅长来查处，找到校长要抓人。校长暗地通知我们，我们跑了，井岳秀又下令通缉。从此，我就转入地下活动。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听了陕北米脂这一段往事，他说：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厉害。五三济南事件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个新的反帝潮流，你们进行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还仔细听我讲述在北平被捕入狱的情况。1930 年我在陕北绥德被捕，没有暴露党员身分，经党营救出狱。但陕北待不下去了。1931 年春节过后，党组织派我到河北工作。我到了北平，还没有正式工作，河北省委遭到大破坏，我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捕后关押在国民党的军人反省院，我们在狱中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到了看书看报作操等权利。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关心政治，学习党的路线和历史。我把从 1931 年被捕到 1936 年组织营救出狱的情况向毛泽东同志作了详细报告。毛泽东同志听后说：你们出狱情况中央很清楚。这时他笑着说：监狱也是一种很好的共产主义学校。

我在报告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时，讲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方针，特别是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情况。当时晋察冀分局发布了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因为是 1940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通常称双十纲领）。双十纲领是晋察冀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的全面施政纲领，在晋察冀边区的发展和建设中起了团结教育人民、坚决打击敌人的作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参议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党委、参议会、人民政府三者关系的问题。边区参议会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又是一个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组织。我们的双十纲领，是经过边区参议会正式一致通过的，这样成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这就使共产党的领导、参议会的组织和边区人民政府三者的关系密切连在一起，既加强了党的领导，又达到了各个阶级、阶层广泛团结起来的目的，使人民政府有了广泛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对这种作法表示赞成。我说：晋察冀边区实际上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向陕甘宁边区学习来的。毛泽东同志说：“党政不能是一个东西。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参议会变成政府的东西，这个方法好。”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实行党政分开，仍然是重要的。

当我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晋察冀边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整风学习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指示的情况时，说大生产运动不但在巩固的根据地有条件搞，在游击地区也可以搞，而且能搞得很好，一手打仗，一手生产，劳武结合，生产战争两不误。毛泽东同志听到这里，很感兴趣。我还谈了一些实例。不久，《解放日报》发表了张平凯关于晋察冀游击区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毛泽东同志还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他还把文章的底稿给我看过。这篇文章作为《解放日报》的社论发表了，叫《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建国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

1945 年 2 月，我参加了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接着参加了七大。七大以后，参加了七届一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日本投降了，当时，延安沸腾了，全城狂欢，到处放鞭炮，我们把铺床的草帘于也拿出来烧了，以示庆祝。抗战胜利后，大家的愿望是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自己美好的国家。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一场同国民党蒋介石的严重斗争。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蒋介石的军队远在云贵川大后方，却命令包围着日伪军所占城市的抗日根据地的军队不准受降，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军民的无比义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针锋相对，由朱总司令命令党的各路大军前进，迫使日伪军投降，解放沦陷区广大人民，并向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三次电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共商国是。8 月 23 日、26 日，党中央在枣园连续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我们应该顺应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他说：为了和平，为了民族利益，一定要到重庆去。但是你们不要因为我去了重庆而软弱，你们要坚强。蒋介石现在是一面邀我们去谈判和平，一面又在发兵打我们，我们的方针是蒋打我也打，蒋停我也停，不要受我出去谈判的影响。你们前方对国民党进攻来的军队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这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感到毛泽东同志真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战略家，他那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宽宏的气魄，就像泰山一样，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非常谨慎，对中央的工作作了周密安排。他说：书记处五个书记，前方两个后方三个，我和恩来去重庆，少奇、朱总、粥时在延安，主席由少奇代理；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建议通过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他还说：我们去了是否会成为

城下之盟呢？不会的。签字的手是长在我们身上的。

8 月 28 日，聂荣臻同志和我都到飞机场送毛泽东同志等赴重庆。当时大家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重庆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特务横行，而且蒋介石历来狡滑奸诈，惯于施展阴谋手段，此行有很大的风险。看到党的领袖为了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去，心中是既敬仰又关切。之后，聂荣臻同志和我们乘美国人的飞机回到了晋察冀。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发动边区军民向日伪军积极进攻，大城市一时进不去，就攻占中小城市，张家口就是那时解放的。我们解放了广大的沦陷区，委任了一批行政长官，形成了强大的气势，长了人民的志气。

三

1947 年 3 月到 1948 年 3 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领导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粉碎了胡宗南的进攻，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扭转了战局，使中国革命战争到了转折点。1948 年 3 且 23 日他们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于 4 月 13 日到达晋察冀的阜平县城南庄。聂荣臻同志和我十分兴奋地去迎接他们。毛泽东同志是坐吉普车来的，下车后他很高兴，说：晋察冀的群众工作好，群众发动得好，我们从五台山来，一过龙泉关。就好象到了当年江西的兴国、瑞金一样。我们晋察冀中央局的同志和晋察冀的军民，都万分高兴，感到今后可以就近更直接地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了。

毛泽东同志等到城南庄后不久，约在 4 月底 5 月初，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中央五位书记分开又会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研究了发展战略进攻问题，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并加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问题，以及其他的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部署问题。城南庄是个很小的集镇，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开过这样一个重要会议，这是我们晋察冀根据地党和人民极大的光荣。

在党中央到来之前，1947 年 4 月，刘少奇、朱德同志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亲临指导工作，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11 月，河北重镇石家庄解放。1948 年 2 月 16 日，刘少奇同志致电中央说：晋察冀、晋冀鲁豫分为两区，原来是因为披敌人封锁分割，所以我们不得不依敌人的封锁线来划分行政和工作区域，现在正大、德石两路和石家庄之敌已消灭，分界的客观原因与必要已不存在，我想提议两个解放区的党委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20 日，毛主席复电刘少奇同志要他召集有关领导人讨论此问题，以及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军报诸问题。3 月 7 日，他为中央起草了给中工委的电报，说：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当象延安解放日报那样，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华北局的：办大党校、大军校也是同时担负为华北又为全国训练干部的责任，由于中央目前还没有力量顾及此事，似以由中央会同华北局规定方针和计划，然后交华北局办理为宜。5 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华北局办了《人民日报》（进北平后成为中央的报纸），办了华北军事政治大学，还办了华北局党校（1954 年与马列学院合并成为中央高级党校）。华北局成立后，全地区有六千万人口，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有力后方，对华东、华中、西北的战争都有支持。

现在回顾 1948、1949 年的情景，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年代，多少年来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眼看将要被彻底推倒，人民将要取得全

国政权坐天下。我们每个干部都深深感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无比正确，认识到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必定从胜利走向胜利，都无限热爱和信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也深深感到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问题也是千头万绪，需要着力解决。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少干部，新解放区的革命、管理、剿匪，那么多的大城市解放了，需要大量的干部，如何为此而进行准备？当时我是华北局负责人兼华北局组织部长和党校校长，就从事这项工作。形势发展很快，大军南下，大片土地解放，国民党的旧政权要彻底打破，人民的政权要建立，干部需要老解放区大量支援。组织部忙于抽调干部，我亲自组织南下干部的领导班子，搭好一个个从区党委书记到县委书记的各级领导班子随军南下。党校不但是培训干部的地方，而且还是个“蓄水池”，哪儿缺少干部向哪儿输送，当时起到这个重要作用。

即便如此，干部还是不足。而新解放的城市中却有大量失学失业青年和贫苦知识分子，他们向往革命或希望找到职业，愿意在人民的天下参加工作。另外，国民党旧的政权机构摧毁了，但对其工作人员要给出路，中央的政策是包下来的政策。毛泽东同志说：全国大解放，打败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是军事办法。社会上这么多失业人员，不管要乱，要管。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也要管。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不能让人流离失所。为此，华北局 1949 年 2 月进北平后，办起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采取大量招生与严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第一期入学的有 1 万 2 千多人。课程少而精，以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三个问题为主题，再配以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等学习。三个月左右毕业。办学的效果很好，绝大多数学员经学习后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打下了确立新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所以出现了人人争说“猴子变人”的情况。学习期间还安排劳动锻炼，进行尊重劳动人民的教育，初步改变了旧社会知识分子轻视劳动和对劳动人民自高自大的错误观点，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是科学的真理。我们也认识到办这样的学校，由于入学人员的情况复杂，其中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但最基本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办学的结果证明，绝大多数学员是可以毕业参加革命干部行列的。

1949 年 7 月，革大第一期结业，我们就它的教育情况和主要经验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对此事很重视，很快就看了，并批给了各中央局、分局和野战军前委，说“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负责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活，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学校的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后来，革大还办了政治研究院，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此学习，毛泽东同志也肯定了其作法和经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包括天津分校）一直办到 1951 年冬才结束，培养了大批干部，解决了当时党和国家的急需，使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在，它的学员在各种岗位上，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来作出了很好的贡献，其中有些同志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相当负责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我也受到过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毛泽东同志批评起人来是很严厉的，有时甚至是很挖苦的。记得在城南庄时，有一次我到毛泽东同志住的房间里去，他一见到我，就沉着脸说：晋察冀有电台，电台没有油了？没

有骑兵通讯员了？马都死光了？晋察冀是出人才的，是有知识分子的地方，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他大声说着，批评着，我体会到这是责备我们请示报告少了。这件事我们有一段时间做得不好，受到他的批评，我心悦诚服，心中很内疚。毛泽东同志这样严肃的尖锐的批评，真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以后，我在华北局、西北局的工作中，严格执行了请示报告制度，这与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教导是分不开的。

四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报告，报告中向全党告诫：不要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败仗。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作出了几条规定，如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等。毛泽东同志曾经对大家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可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说：新中国建立后，很多人要做“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都是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奋斗，不要以为当“官”了，就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同李自成差不多了。

1951 年河北省和华北局发现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报经周总理批准，决定逮捕法办。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极为重视，亲笔批示：“刘青山、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一场尖锐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目的是使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是为了制服资产阶级。这场斗争，就其教育意义来说十分巨大，影响也很深远。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提起反对贪污腐化，人们就想到“三反”、“五反”，党的干部都引为戒止，注意保持清正廉洁。

还有一点是，毛泽东同志心中一直关心着人民，关心着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除了经常深入工厂农村，与工农群众直接接触外，还很注意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倾听群众的呼声。田家英曾经对我谈过，毛主席着群众来信的数量是惊人的。我在华北局工作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给华北局或我本人叫我们办理的群众来信就不少。对此，我们是极为重视的，接到后就派人调查，进行处理，件件落实，最后还要向毛主席作出交代。他对此比较满意。毛泽东同志布置的工作，是必须向他报告结果的，决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一推二拖，最后不了了之，这在他来说是决不能容许的。这是他的伟大风格之一，也是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所开创的新中国建设事业，现在正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阔步前进。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人民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的伟大形象也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力平整理）

毛主席指引石油工业发展的航程

康世恩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回忆往事，思绪万千。作为一个老同志、老党员，我永远难忘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伟大历史功勋，永远难忘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全党全国人民胜利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可以说，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学习和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石油工业能甩掉落后帽子，进入世界产油大国的行列，正是在毛泽东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巨大支持下取得的。这里我想从一个侧面，回顾五十年代向毛泽东同志汇报的一段往事，作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深切怀念。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调查研究的作风，对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和调查研究的方法，有过一系列精辟论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名言对全党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1956 年，毛泽东同志为了探讨和研究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曾亲自找了几十个部门的同志分别座谈，听取汇报。我作为石油工业部负责人之一，有机会向毛泽东同志作过汇报。毛泽东同志那种严格认真、虚心调查、追根求源的科学态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毛泽东同志对石油工业的殷切期望和要求，给石油战线广大职工以巨大鼓舞和支持。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十分亲切。

1955 年 9 月，我带领石油工业部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学习，回来时已是 1956 年春节前夕。刚到家，李聚奎部长就告诉我，要向毛泽东同志作汇报。当时规定汇报要由部长亲自谈，不准带副手和秘书。由于李聚奎同志来石油部才几个月，作为特殊情况，允许石油部多去一位副部长汇报。李聚奎同志要我抓紧准备，我听说有些部门已经谈过了，就打电话问水电部刘澜波同志和计委孙志远同志，应该如何汇报。澜波同志说毛主席问得很详细，曾问他电力是怎么发出来的？孙志远同志告诉我，从石油如何生成？是什么样的矿藏？怎么勘探、开采？直到石油发展战略，都要详细准备。

春节这几天，我顾不上休息，抓紧准备资料。石油地质勘探我还比较熟悉，但炼油有些问题不那么清楚，我就找炼油研究院专家请教，2 月中旬，写出了汇报提纲。

2 月 26 日，我和李聚奎同志按照通知，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汇报时在座的有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小平、陈云、富春、先念、一波等同志。总理向毛主席介绍了我，主席问我是那里人，问我的经历，然后开始汇报。我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他就问开了。主席先问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我说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古生物标本，这是主要标志。主席说对，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我说这是按照世界某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和剖面来划分和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侏罗纪来自欧洲的侏罗山；震旦纪来自中国的南口，等等。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又问石油是怎么生成的？我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主席说，你赞成那一种学说？我说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主席问，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呢？我讲了石油生成的环境及温度、压力等，要经历几百万、上千万年，逐步演化才能生成石油和天然气。主席又问，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我一一作了回答。“怎么找油

呢？”“什么叫构造？”我拿纸边说边画，说明各种储油构造。接着主席又问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来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我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还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个一个写出来，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讲了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用油要低凝固点，不然就冻结了。主席说：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随后主席又问中国怎么找油？我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玉门老君庙油田当时是我国主要右油生产基地。新疆克拉玛依已有一口探井出油，正在继续勘探；同时在青海柴达木、陕北和四川已着手普查勘探，另外，东北松辽盆地、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都是找油很有希望的地区，目前缺少勘探手段，正在抓紧准备。毛主席说，美国人（注：毛主席这里是指美国有些地质学家）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毛主席这段话语重心长，对我们既是鼓励、期望，又是极大的鞭策。我汇报说，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1955 年天然石油年产量才 42 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一年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投资才 2 亿多元；新疆、玉门等地都是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主席很有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毛主席这些指示，成为石油工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尽快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打开石油工业的新局面，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必须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鼓舞着石油战线广大职工不怕困难，艰苦奋战，决心以实际行动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为以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石油会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我在汇报中谈到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迭在一起。主席说，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我还汇报找油要经历从普查、详探到开发三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步的普查。毛主席说，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我谈到苏联重视区域勘探，整体解剖，所以勘探成果大；我们对区域勘探研究不够，因而还未掌握寻找油田的规律。主席说，这是经验咧，你们要有全面规划。我汇报到苏联一年打井很多，石油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也大。主席说，我们一年也要钻一百万米井（注：1956 年钻井为 51 万米）。我讲到石油部成立晚，干部少，主席当即插话说，调一些给他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以后每年都给石油部门调来一些干部，分配大批大专毕业生和转业战士，保证了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

这次向毛主席汇报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在我脑子里打了很深的烙印。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工作那么繁忙，仍然十分重视取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找了中央三十四个部门的领导同志，一一听取汇报。毛主席调查研究得那么仔细，从最基本的知识到发展战略，都是毛主席关心的内容。毛主席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使我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正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于 195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的经验，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问题，作了精辟阐述，这些基本思想至今仍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次汇报使我联想到，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坝位。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毛主席就指出：“边区有着丰富的宝藏，首先延长石油居全国第一，并闻名于世界，过去曾由外人投资开采，结果失败而去，现在边区当局仍在小规模的实行开发。当外货来源几近断绝的今日，在现代工业中占有重要价值的石油，是极应设法大力开采的”。[1]1944 年毛主席又亲自为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题写了“埋头苦干”四个大字，鼓励石油职工。延长石油工人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埋头苦干，他们已从过去规模极小的年产数百吨原油，发展到今天年产原油 40 多万吨，成为延安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建国以后，毛主席于 1952 年 2 月又亲自发布了军委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 19 军 57 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命令中说：“你们过去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在当时石油队伍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57 师一万多名官兵成建制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给石油工业充实了新鲜血液，带来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过专业培训和生产实践，他们很快掌握了各种石油专业知识，成为各条战线的生产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已锻炼成长为石油工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我国石油工业的振兴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就在毛泽东同志听取石油部汇报后三年多时间，即一九五九年九月，松辽盆地的第一口探井松基三井喷出了原油。松辽地区可能找到一个大油田，这一喜讯迅速报告到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党中央极为重视这一新情况。1960 年初，石油部根据松辽盆地几口探井接连出油的新发现，提出在大庆组织石油会战。毛主席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一创举。1960 年 2 月，毛主席、党中央迅速批准石油部党组关于组织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周总理还亲自到哈尔滨听取石油会战情况汇报，指示要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会战的全部工作。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有个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现在石油部也有个大会战”。他对石油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全国石油厂矿力量组织起来，打歼灭战，多次给予赞扬。当石油会战取得初步成果，一个特大油田已经胜利在握的时候，毛主席又热情给予鼓励。1964 年初，毛主席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讲到大庆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说：“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 600 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炼油厂。”毛主席还在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中，对石油部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对广大石油职工和政治工作人员，是极大的鼓舞。石油系统的队伍建设，在大庆会战和以后的历次会战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对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各项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不久，毛主席作出了“工业学大庆”的重要决策，激励着大庆油田和广大石油职工向更高的目标攀登。这个期间，周恩来总理先后三次到大庆视察，带来了毛主席对石油工人的关怀和期望。周总理在充分肯定大庆取得成果的同时，多次指出大庆要坚持“一分为二”，靠两分法前进。在“文革”十年中，大庆处于最困难的日子里，周总理在大

---

[1] 见《抗战中的中国经济》，1940 年抗战书店版第 564 页。

庆军管命令中亲自加上“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并特别强调，这个命令是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他还指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周总理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大庆油田和广大干部。正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在每一个重要时期，给大庆油田和石油工业无微不至的关切和支持鼓励，广大石油职工才能在“文革”十年中排除干扰，坚持生产，并且在 1976 年使大庆油田原油产量上升到 5000 万吨，1978 年全国石油产量上升到 1 亿吨，使中国石油工业跻身于世界几大产油国的行列，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回顾这一段历史，使我深切感到，大庆石油会战的每一个成就，石油工业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与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支持、鼓励分不开的，都凝聚着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实际所取得的胜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更要世世代代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患想的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工作。只有这样，石油工业才能不辜负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期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创建新的业绩。

对毛泽东同志指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几点回忆

马文瑞

1954 年秋天，经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我被任命为劳动部长。当这一任命的消息传来时，中共中央刚撤销西北局，我还在西安处理善后，因而来北京上任较晚。上任后不久，我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的一个宴会，在北京饭店的客厅里，忽然见到了毛主席。他一眼认出了我，微笑着半打招呼半开玩笑地说：“马文瑞同志，你来了？很好！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了！”我已有两三年没见到毛主席了，他比以前显得更加精神，容光焕发，精力充沛，说话还是那样诙谐风趣。

在延安时期，我曾多次见到毛主席。在中央和西北局召开的某些会议当中，在抗大和中央党校的课堂里，在延安的群众集会上，都曾亲聆过毛主席的教诲。但我们单独接触的机会不多，时隔这么久，想不到他对我还是这样熟悉。他的富有风趣的话，不但缓和了突然见面的紧张气氛，而且使我感到调我来京的任务重大，必须奋发努力。

我是陕北本地生长起来的干部，毛主席在陕北生活、工作的十三年中，我一直在陕北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工作。回忆起和毛主席的接触，我不能不想到他对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正确指导和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大政方针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政策，都是在他亲自主持或直接领导下制定的。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的成长壮大等方面，都倾注了他的心血。高级干部都因深受他的言教和身教，才逐步成熟起来。正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具体指导，陕甘宁边区才建设成为一块模范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毛主席运用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指导了全国各根据地的建设，终于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一、正确解决陕甘苏区的肃反问题

1935 年 9 月，当时的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错误的肃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许多好同志抓起来，如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以及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和我等一大批干部统统被抓，关进了牢房。开始时的罪名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又变成了“右倾取消主义”、“反革命”。有的同志遭受严刑拷打，有的甚至惨遭杀害。我们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戴上了脚镣，受到严密的看管，晚上睡觉要翻身还得报告，经过准许才可，否则即挨打骂。据说，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这时苏区的形势十分严峻，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在内部，执行“左”倾路线的人乱捕乱杀，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苏区边境的群众大量外逃；在外部，国民党调集重兵，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

正在人心惶惶、万分危急时，这年 10 月，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中央和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就知道在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一块根据地，于是率领中央红军全力向陕北开进。在进入根据地后，毛主席即向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同在吴起一带打游击的龚逢春、张明科等干部谈了话，听说刘志丹等许多创建陕甘苏区的干部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有被处决的危险。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肃反扩大化有切身的

感受，他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同志赶到瓦窑堡，传令停止肃反，等候中央处理。不久，中央也来到瓦窑堡，把我们这些人从监狱放出来。周恩来副主席还找我谈了话，肯定了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并就我的工作问题征求了意见。没过几天，我就被分配到陕北省委工作，任省委秘书长。其他同志也先后安排了工作或学习，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同志兼）兼红二十八军军长，后来参加了著名的东征，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样，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下，一次重大的肃反错误得到迅速纠正，一场严重的危机得到解决。否则，全国仅剩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很可能被“左”倾路线所断送。

毛泽东同志在果敢迅速地解决陕北危机的同时，组织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一道，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当时他亲自指挥的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不但有力地击败了敌人的进攻，鼓舞了军民士气，而且提高了西北红军配合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毛主席所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陕甘苏区就这样成了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更加健康、稳步发展的道路。

二、建立和发展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5 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为了及时动员全党在政治上作好战略转变，1935 年 12 月 27 月，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的主张，同时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1936 年夏红军东征结束后，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是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二是红军西征，创造陕甘宁新苏区；三是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争取东北军一起抗日，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一着，因此中央对于争取东北军是十分重视的。毛主席曾在一次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东北军当时内外处境，说东北军到处漂泊，寄人篱下，不甘亡国亡家，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有可能同红军联合抗日，要积极争取。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任书记。根据地各地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在靠近东北军的地方设立办事处，以动员力量接触东北军官兵和做争取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陕北省委也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委员有陈治中、张耀宇等，下设安塞、高桥川两个办事处，我兼任安塞办事处主任。在办事处的领导下，建文了安塞，高桥川两个市场，三天一集。我们准备了粮食、柴草、蔬菜、肉蛋和其他农副产品，吸引东北军官兵来采购，相机向他们做工作。做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散发宣传品，让文工团演出文艺节目，同东北军官兵交朋友，还到他们的驻地、哨所谈话，进行抗日宣传。总的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工作的广泛开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记得有个晚上，经过安排，我到延安城里东北军的一个团部同团长和团

副谈话。我向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表示赞成。但该团长却说：“你们共产党、红军那么艰苦还坚持干，可歌可泣，我们佩服，我赞成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你们毛委员长（指毛主席）敬奉的都是外国人（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使人不可理解。”我解释说：“马克思、列宁虽是外国人，但他们并不是外国的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革命家，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对人类是很有贡献的。他们的学说是科学的，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可以救国救民。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根本问题是看他们的学说和做法对中华民族有没有好处，能否救国救民。你们是孙总理的信徒，他的三民主义，不也是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学说中受到启发吗？”他们听了，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连连点头。为了不让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人发现，他们在天亮前派人把我送回。

我们党在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对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做了大量争取工作。毛主席曾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同杨虎城将军会谈。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多渠道、多层次地做争取工作，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认清了形势，了解了我党的政策，愿意联共抗日。1936 年 9 月 6 日，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首先基本形成。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顽固坚持打内战的蒋介石。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争取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密切配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国内形势的转变，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对我党的政策作了调整：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减租减息，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公民权；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部队的番号；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毛主席付出了巨大劳动。每一政策和措施的提出，他总是先在党内外作好思想政治工作，用深入浅出的比喻提高领导干部认识，然后抓典型，抓样板，带动广大干部前进。

在这一革命的重大转折时期，毛主席高明的领导艺术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告戒全党同志，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争取千百万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又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卢沟桥事变前，主要反对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开始抗战，主要反对投降主义，抵制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对共产党的引诱。与此相反，王明 1937 年底从苏联回国，他由“左”倾机会主义者一变为右倾投降主义者，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国民党也趁机对我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一些共产党员在这个转变时期把握不住正确的方向，经不起复杂斗争的考验，有的甚至脱离了革命。

在陕甘宁边区就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些地主闹着收回土地房屋，国民党特务制造谣言，甚至进行暗杀，煽动土匪打家动舍，破坏捣乱，个别干部竟投向了国民党。我当时任陇东地委书记，在陇东地区的镇原县，就有三

个干部经不住国民党的拉拢利诱，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毛主席一方面及时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文件，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予以坚决打击；同时在党内批驳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提出在抗日的原则下保存党和阶级的独立性，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针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妄图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明确提出了自卫、胜利、休战的反磨擦斗争三原则；在斗争中，坚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贯彻了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既坚持了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使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发展，蒸蒸日上。

三、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延安时期，毛主席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领导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我党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通过整风，使我们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为我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对陕甘宁边区广大干部的影响尤为深刻。

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带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农民意识，边区党内存在的某些历史问题、路线是非等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显得准备不足。这样就很难领导边区人民取得抗战和后方建设工作的胜利。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策，既解决了全党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边区党迫切所要解决的问题。延安整风，中央是从 1941 年 5 月开始。1942 年 2 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不仅中央各机关、学校、单位积极投入，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部署下，也作出具体安排，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央把各地负责干部调回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办了中央高级党校，毛主席亲任校长。在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干部都曾先后到中央党校学习。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过两次，第一次是在 1942 年，第二次是在 1944 年。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参加这两次整风学习收获很大，终生受益。1942 年学习，开始是学习整顿三风文件。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曾亲自到校作报告。学习文件和讨论，是在校部统一领导下，由各支部组织进行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党的历史经验，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1944 年学习，整风运动已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学习的文件有两大本，是中央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次学习，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结合党的历史和个人的思想实际，钻研文件，认真讨论，从理论和路线的高度进行分析，学习的空气十分浓厚。有些问题一时存在分歧，出了课堂，在山道、河畔散步时，

还在三三两两地探讨、争论，充分体现了个人自觉学习为主，相互启发为辅的学习方法。当时大家还注意从马列毛主席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逐步培养了认真读书、学习理论的耳惯。这样经过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讨论，大家的认识逐步达到了一致，思想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为党的七大作了重要思想准备。这时刚从前方回来参加整风学习的人，有一种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截的感觉。记得我第二次进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任第六支部的支部书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从前方来，编在我们支部，他在会上发完言常要加一句："我没参加过整风，看法没有把握，说得不对，你们可要帮助啊！"

在整风当中，思想方法和路线问题提得很突出。毛主席曾在一次报告中讲到：犯主观主义和路线错误，严重的要导致亡党亡国亡头。比如萧劲光同志就差点亡头，萧劲光在中央苏区差点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处以极刑。毛主席的教导，对于我们长期在地方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在政治思想上是个突破，视野大为提高。我们不少同志有与萧劲光同志类似的经历，因此大家都感到毛主席的话讲得很深刻，切中要害。

1942 年 10 月下旬，在中央直接指导下，西北局以整风精神召开高干会议，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党的整风取得了重大进展。会议内容包括整风（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等七整）问题、统一军政军民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财政经济问题。会议进行了两个多月，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 300 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大会在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达之前的历史时，边区党内的老干部习仲勋、张秀山、李卓然、张邦英、王世泰、贺晋年和我等共有 46 人在大会上发言，认真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肯定过去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清理，并开展了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弄清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而错误路线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作怪。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几个问题意见》的总结报告，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和拥护。毛主席在会议开幕时讲了话，在会议当中讲解了《联共（布）党史》的六条结论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作了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会议结束时，又作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讲演。他的讲演以"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为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领导方法，强调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问题。指出必须在具体指导上下功夫，取得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才能使一般号召不致落空。毛主席把唯物辩证法巧妙地运用于领导方法，既提高了干部对辩证法的理解，又使干部改善了领导方法，他的这一思想至今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会议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统一领导和当前任务三大问题，加强了边区党的团结。应该说，这是边区党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指导下，在整风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四、发起和指导大生产运动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抓的另一件对全党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使我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度过了经济难关，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陕甘

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如同延安整风一样，是我国革命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它昭示人们：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去夺取胜利。大生产运动。中所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时至今天，仍是我们建设伟大强国的重要法宝，需要我们大力继承和发扬光大。

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由于脱产人员逐步增加和支援前线，财政支出随之增大。1939 年后，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停发了八路军的军的，还在一些地方制造反共磨擦，使边区陷入极度困难，如同毛主席所说：“ 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 ”毛主席说他自己也曾因为没有油吃，爬坡头昏眼花。1939 年 2 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生动地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形象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饿死或解散，一条是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我们当然只能选择后者。

有一件事，一直是广为流传的佳话。1940 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度过暂时的困难，决定征收 20 万担公粮，这在当时有些偏重。就在研究征粮工作的会上，一位县长被雷电击伤。便有群众说“ 雷怎么没有击了毛泽东 ”。毛支席听到后，立即引起深思，不但没有追究流言制造人，而且经过调查研究，先减少了公粮征购任务，接着向边区军民发出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伟大号召。1940 年 12 月 3 日，边区政府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在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身体力行，亲自参加挖地、种菜、捡粪、纺线等劳动。他们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主席的号召精神，及时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订优待移民、难民政策。从国民党区逃难到边区的老百姓，边区给予公民权，鼓励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使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当时我任陇东地委书记兼三八五旅政委。陇东地区 7 个县，约 30 万人口，地广人稀，宜农荒地很多。三八五旅部队在王维舟旅长的带领下，在合水县大凤川小凤川大规模开荒种地。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地委，领导全区的各项生产事宜。发动地委机关干部开荒种地时，自己也参加生产。有一次我去山上收割庄稼，碰上在家乡务农的大哥来看我，他在欣喜之余，怕我干不惯农活，要替我干。我告诉他：这是我份内的生产任务，必须自己完成，谁也不能代替。当时地委除大力组织农业生产外，我们还积极发展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外贸。三边地区的定边、盐池两县出盐，国民党地区由于日寇的占领封锁，许多地方缺盐。我们在陇东成立了盐业公司，大力组织盐业生产，把盐运到西华池等口岸出售。华池县县长李丕福很积极，经常亲自带队，赶上成百头毛驴运盐，一路浩浩荡荡，颇为壮观。国民党地区的商人为了赚钱，贩盐的很多，有不少是宝鸡、四川来的，我们用盐换回根据地所急需的棉花、布正、火柴、办公用具等，大大缓解了边区经济生活上的困难。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十分普遍。据统计，1939 年，全边区开荒 105 万 5 千多亩，其中，中央机关、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边区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开荒达 11 万 5 千亩，秋后收细粮 9572 石。1943 年 1 月，毛主席提出本年要达到“ 丰衣足食 ”。这年全边区开荒 97 万 6 千余亩，耕地总面积由 1939 年的 1008 万亩增至 1338 万亩，粮食总产量由 137 万石增至 181 万石。部队的生产成绩尤为突出。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累计开荒达 26 万亩，种植粮

食、蔬菜、烟草等，创造出“陕北江南”，粮食除了自给以外，每年还上交一万石，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在边区高干会议期间，西北局对领导生产做出显著成绩的王震等22名干部进行了嘉奖，我是22名同志中的一个。奖状是毛主席颁发的。我的奖状上，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密切联系群众”六个大字。这不仅是对我的勉励，也是对我的希望。此外，每人还奖给了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可惜这张珍贵的奖状在解放战争时期丢失了，但毛主席对我“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却如同座右铭，始终激励着我，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政策，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而且教育和锻炼了干部。1944年第二次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吃饭经常是四菜一汤，生活显著改善，大家都很满意。国民党用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边区，想要困死我们，他们的阴谋彻底失败了。而在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正如毛主席后来高度概括的：“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五、纠正边区土改中“左”的编向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全面进攻我解放区，1947年春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和党中央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我们西北局机关也在此时撤离。撤离前毛主席和党中央原拟先住黄河沿岸，毛主席曾说：黄河两岸度春秋。但为了牵制国民党部队，减轻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和保卫边区、指挥西北解放战争，毛主席决定不过黄河，利用陕北地面辽阔、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坚持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毛主席转战陕北，不但极大地鼓舞了西北战场的军心军心，也鼓舞了全国人民，“毛主席还在陕北”成了当时奋勇杀敌的动员令。到1948年春，我军在各个战场转入全面反攻时，毛主席才渡过黄河去河北平山。在这段时间，毛主席不仅以极大的精力和高度的智慧指挥了全国（包括西北）的解放战争，对土地改革也予以深切的关注。

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新的解放区不断扩大，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主持召开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对开展土改工作作了决定，不久，西北局在绥德义合镇举行会议，根据平山土改会议精神，对边区土改工作作了部署。会后在开展土改工作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左”的偏向，如有的把中农划成富农，把富农划成地主；有的发动群众以吊打等方式斗争地主；有的损害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陕甘宁边区有一大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和半老区，本来对过去土地分配上某些不合适者采取调剂土地，填平补齐的办法作一些调整就可以了，可是有人仍照搬新区的平分土地的做怯，使不少地方发生过火行为，引起群众的不满。1948年1月，毛主席住在米脂杨家沟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及时提出纠“左”，并亲自给驻在绥德义合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写信，具体指示习仲勋同志去绥德地区、马明方同志去延属地区、我去三边、陇东和关中地区指导土改，纠正偏差。我接到指示后立即出发，在三边、陇东紧张工作了两个多月。从陇东回来时，延安已收复，陕西形势大变，关中没有去成。纠“左”以后，土改

工作得到健康的发展，群众生产与支前的积极性更高了，有力地推进了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毛主席刚到陕北的时候，全国只剩下几万党员，三万多红军，只剩下陕北这一块根据地。到 1948 年毛主席离开陕北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 370 万以上，军队已发展到 200 万以上，我军已打退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得以进攻。全国解放在望了。毛主席在陕北 13 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土地革命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大部分时期，他在这里不仅有力地指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工作，还领导了全国不同历史时期复杂的革命斗争，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明的军事指挥艺术、使中国革命走向了全面胜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从始至终掌握和贯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段时间成熟起来的。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毛主席的倡导和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我们共和国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正因为这一切，毛主席在陕北赢得了人民的热爱，享有崇高的威望，《东方红》的歌声，就是发自陕北人民的心声。

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毛主席已经逝世十七个年头了。但。我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亲切教导永铭心头——回忆与毛主席的几次交谈

孙晓村

解放前，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我通过朋友和其他关系借到了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过很多篇，在学习过程中，有个感觉，正像黑夜行路，得到一盏明灯照耀，又像是走了一夜路，渐渐看到东方的曙光，心里对毛主席非常敬仰和佩服。

我与毛主席见面，第一次是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之前，毛主席接见一部分来自外地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也被邀参加。（因解放战争期间我一直在上海，北平解放后，有的同志先到了解放区，我在上海还有些事，来得晚一些）。记得当时会见就在现在的对外友协的大厅里，大家见到毛主席，一一上前握手问好，祝贺胜利。轮到我时，我也上去与毛主席握手，表示敬意并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报了姓名，毛主席说："知道，你是研究农村经济的，你们办的《中国农村》刊物不错，你后来还搞救国会，这是一个爱国的人应当做的事。"这几句话，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受到鼓舞。

我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召开关于1950年国家预算的会议，那次我作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参加会议。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讲话的原话，我现在记不确切了，领会深刻的有几点（大意）：一是全国解放，取得了胜利，大家很高兴，但我们面临的困难还不少，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二是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是有办法的，是有希望的。这几句话，当时很鼓舞人心。此后见主席的次数很多。1955 年冬天，我带了一个农业科学考察团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顺路去苏联考察农业，历时两个多月。刚回来，主席召开农业会议，我去参加了。那天讨论的问题是中央提出的农业发展纲要文件。我站起发了言，介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苏联的农业成就和我认为有待改进的方面，主席听了后，点点头，说：人家好的经验我们还应该学习。那天参加会的人员中，研究农业的人较多，其中有一位西北农学院院长，名辛树帜，毛主席对他说：你是辛辛苦苦独树一帜，你应该讲讲啊。这话一说，大家都笑起来，会场空气顿时显得活跃。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善于运用风趣幽默的语言，使大家心情轻松，发言踊跃。

还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我作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被邀参加。我当时还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那天开会我到得较早，主席出来散步看到我，问：听说你们农大教师现在对参加农业劳动，到农村参加实践，思想上能接受，这是好事。那么你做校长的人怎么办呢？我看你也去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当然你还有别的事，可你就是去劳动一下，哪怕拿锄头耙几耙，掘点土也是好的，做出个样子也很好。否则你连去都不去，怎么以身作则，带领一班人呢？主席讲得合情合理，使我很受感动，很受教育。

为了说明主席讲的这番话，需要补叙一下我参加农大工作的过程。北京农业大学是解放后由三个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老解放区迁来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组成的，成立了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主任委员是华北农学院院长乐天宇同志，副主任委员是北大农学院院长俞大级同志和清华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同志。农大的师资条件很好，都是很有名望的农学家。那时在五十年代，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正在开始提倡，农大负责人乐天宇同志急于使农大的教学联系实际，很快采取措施。这在现在看来是

应该这样做的，但在当时五十年代初要这么做似乎急了一些，没有考虑知识分子的改造要一步一步来，特别是思想工作要做在前，否则他们就不能接受。因此学校里，意见很多，教师学生纷纷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反对乐天宇同志这样急于求成的做法，教师怠工，说“不必教学，到田里去算了”，学校教学几乎瘫痪。在这种局面下，1951 年 3 月中央决定撤销校务委员会，先整顿秩序，稳定人心，我被派去担任第一任校长。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指引下，我们经过学习，做了大量工作，到 1955 年形势不同了，知识分子已愿意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培育良种，合理施肥，防治病虫害等，以提高农业生产。有些教授认识到知识分子接近工农，与工农结合的重大意义，同时对基础科学教学研究也不放松。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教导如及时雨，给我以极大鞭策和启迪。

还记得一天清晨 5 时，我那时担任民主建国会秘书长、接到主席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主席今早 7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要召集一个会议，要我立即通知参加会的人员。我当即通知了民建参加会的同志，但我心里对这样早开会感到奇怪，匆匆吃点早饭，6 时左右我就到了怀仁堂。因到得早，会场还没有什么人，一会儿，主席就漫步走了过来，我起身表示敬意，说：“主席起得那么早”，他说“不，你不知道，我之所以通知早开会，是想开完会，事情商量好以后，我可以早些去安心睡觉”。可见，主席是一夜未睡，我常听说主席、总理彻夜办公，这次又得到证明。那天到会的人，每人吃一小碗面条后，开始讨论。会开完，主席才讲“我去休息了”。这种为国家、为人民通宵达旦地工作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全国政协第三届全体会议之前，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协商通过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政协副主席名单（草案）。在会上，无党派的陈叔通老先生站起发言，伺意名单（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常委党内再加一位章蕴，党外再增加一位孙晓村。毛主席就问：“章蕴来了没有”，得知她未参加这个会，毛主席又问：“孙晓村来了没有”，我即站了起来，主席很风趣他说：“你是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是五亿农民的领袖啊”。我当时感到出乎意外，很窘，没有讲什么。主席说：陈叔通老先生的提议很好，我们就同意通过吧，会议一致通过了。我担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提名就是这样来的。

此外，再简述几件我所知道的黄炎培、陈叔通、施复亮等与毛主席的一些交往和谈话。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之后，陈叔通等一些老先生向毛主席提出，要组织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不忙，是不是先把《共同纲领》学好以后再学”。毛主席还答应去与周恩来总理商量，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讲《共同纲领》的意义，以及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因为这样比较好，后来就这样做了。为了进一步满足党外人士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的要求。1957 年成立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最初请中央党校代办，第一任院长是吴玉章老兼任的。

毛主席很关心民族工商业者的学习改造问题。有一次他约了黄炎培谈话，讲到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工商界人士有些意志消沉，提议说：是杏鼓鼓他们的劲，你在北京作个报告，发到全国，你的话他们肯听的。黄炎培回来与我们商量，决定在北京市民建会向全体会员作报告，他草拟出报告稿，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在稿上作了批语和修改，特别把一些要求过高的话去掉，旁边加注说明：这样的要求只能是对少数进步的工商业者提，

还不能号召广大的工商业者都去做。可见毛主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的话要使他们能接受，否则要求过高，实际办不到，会适得其反。

在这次报告后，民建召开二中全会。会上，我们对有些老同志，例如章乃器同志的一些论点开展批评，章乃器同志亦提出反批评，交锋很尖锐，最后批评章乃器同志的意见得到大家赞同，章乃器对其中有些意见，也表示接受。会后黄炎培将会议情况写信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亲笔回了信大意是：你们二中全会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民族工商业者中间也能够开展，这很有利于相互帮助，提高认识。

1956 年党号召整风，希望大家提意见。那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施复亮同志说；“你出去跑跑，听听意见，人民对你们比较肯讲真心话，这样对我们党整风有帮助。”施复亮告诉了我，后来他出去跑了不少地方，确是大有收获，向中央作了反映。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毛主席重视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具有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

解放初期，地方上常常向北京送一些土特产品，请中央领导同志品尝，我们也曾分到过。记得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总理约了各省的书记、省长等负责人在小会议室开会，他说：“我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找你们来谈，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约定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这话讲了以后，这种情况就没有了。

六十年代初，我陪黄炎培到杭州养病。一次到杭州龙井茶的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黄炎培要买一缶送给毛主席，茶场的同志听说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的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只好带回北京，写信送给了毛主席。事后，我听梅家坞的同志说，毛主席通过另外的渠道，让党内同志又把这缶茶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且表示感谢。这种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

毛主席善于以各种方式，随时随地作调查研究。每年春天总要请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和李济深等人吃顿便饭，交谈交谈，其中常常谈到的是教育问题。主席总是认真倾听各种意见，虚心求教。

毛主席喜欢散步，有时天气好，他就邀陈叔通一起在北京旧城墙上散步谈天。陈叔通老先生曾是前清翰林，他告诉我，毛主席特别注意向他了解清朝官吏制度、科学制度，问得很详细。这也说明主席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注重研究历史和现状。

毛主席很谦虚，有一次他与黄炎培讲，你某年某月在上海作演讲，是讲勤工俭学的问题，下面有一个听众，是区区，就是我。并说黄任老是诗人，你的诗，我很喜欢。黄任老便将自己的诗汇集一部，送给毛主席，主席欣然接受。主席喜欢作诗填词，他有些诗词作好后，就请黄任老、陈叔老看后提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首《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主席这首词填好后，曾二次送请黄任老和陈叔老提意见，作修改。

黄、陈二老还曾对我讲过一件事。那是北京和平解放之初，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夕，傅作义将军在北京，当时绥远的问题还没解决，董其武的部队尚未起义。傅作义将军有个建议，主张他亲自去绥远，劝董其武起义。这事商量时大家有不同意见，担心万一傅作义到绥远时蒋介石派飞机把他接走。毛主席相信傅作义将军的为人，认为不会这样。最后毛主席与周总理决定派专机把傅作义送到绥远，果然董其武很快就起义，并与傅作义同机飞回北京。

这件事做得非常好，为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劳。

从秋收起义到古田会议

张宗逊

望着影集中的一幅照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是 1937 年 5 月毛泽东同 18 位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同志在延安的合影。毛泽东亲笔在照片的顶端深情地写上：“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数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他生前一直很喜欢这幅照片，解放后全国的许多报刊多次刊登，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许多展览馆长期展出。

岁月易逝，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当年参加照相的人所剩无几，毛泽东也逝世十几年了。但是，战友们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后浴血奋斗的许多往事，却永远难以忘怀，回想起来就使人激动不已。

秋收起义爆发

1927 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年，4 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 月汪精卫撕下革命的面具向产产党人开刀。“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会议决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革命基础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武装起义。

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起义，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返回原部队担任起义总指挥，在毛泽东统一领导下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一路凤餐露宿，穿山越溪，倍受艰辛。有一次，他从安源去铜鼓的途中，在浏阳遇到民团盘查被扣留，险遭不测，由于他沉着机智才得以逃出：到达铜鼓。

在毛泽东和卢德铭还没有到达部队以前，八七会议的精神已经传到部队，大家非常振奋，当时由余洒度负责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起义军编为一个师，余洒度任师长。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一部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安源工人纠察队与安福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团长王新亚；驻铜鼓县的浏阳工农义勇军及平江农民自卫军和警卫团各一部组成第三团，团长苏先骏；此外，刚收编的邱国轩部几百人编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

在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1927 年 9 月 9 日，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长沙”的口号鼓动下，斗志昂扬的三路大军，先后从驻地出发。师部率第一团 9 日由修水出发；10 日第二团由安源出发；11 日第三团由铜鼓出发，作战地图的箭头像一把把利剑直指长沙。由于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敌强我弱，起义军的指挥员又大都缺乏实战经验，应变措施不当，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毛泽东及时分析了形势，如果仍按原计划向长沙进军，很可能造成全军覆没。9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上坪召集第三团负责人开会，决定尽快与一、二团联系，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在文家市收拢部队，重新布置下一段的军事行动。我一团在卢德铭同志带领下，于 9 月 19 日赶到文家市同三团会合。

1927 年 9 月 20 日上午，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块草坪上，全师举行集会，这是秋收起义后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师长余洒度在队前宣布：现在请毛

委员讲话！这时，千万欢满怀期望的眼睛，一齐投向毛泽东。只见他身材魁梧高大，留着长长的头发，上穿刚过膝的兰布半大褂子，兰色的粗布裤子，足蹬草鞋，一付江南农民打扮。他向前跨了几步，站到队伍面前，以坚定的目光扫视一下部队，开始了讲话。他说：不久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决定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目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继续打长沙了，待以后人民武装力量壮大了，我们一定会打长沙的。大革命由于投降主义的领导暂时失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不会停止。广大工农群众中蕴藏着浑厚的革命积极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革命队伍一定会逐步扩大，革命终究会取得胜利。毛泽东对形势精辟的分析和必胜的神态，深深地感染了广大指战员，像强劲的东风扫去乌云，改变了部队由于连续受挫而产生的沮丧情绪，提高了坚持斗争的信心。

三湾改编前后

文家市会师以后，毛泽东一直跟随部队行动，一路上他的身影经常出没在行军队伍中，找干部战士谈心，调查研究，并设法找到当地的同志调查本地和周围地区各方面的情况。面对着重重的困难，他在冷静地观察和思考怎样把这支部队建设好？到哪里才能立住脚？

秋收起义出师不利，在短短几天中，起义部队伤亡和跑散过半；文家市仅仅从组织上把部队收拢起来，许多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部队在文家市休息了一天，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在芦溪附近担任后卫的三团，突然又遭到朱培德部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在这危急的时刻，总指挥卢德铭带参谋胡景玉就近指挥，掩护部队转移；不幸中弹牺牲，胡景玉也同时阵亡。连续不断的挫折，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自动离队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排出发时三十多人，行军几十里，到目的地时就只剩几个人了。“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许多军官竟半公开地互相询问。以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骏为首的一些军官对革命悲观失望，先后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队伍。他们大多是不辞而别：有的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跑回家去，有的投靠了敌人。总之，大浪淘沙，暴雨之后泥沙俱下，只有坚信革命必胜的人们，犹如中流砥柱，在风浪中搏击。

俗话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着部队生死存亡的问题，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坚定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找出部队失利的原因，并决心利用在三湾短暂的停留期间，抓紧对部队再次进行整顿。

1927 年 9 月 28 日，部队到达三湾。这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只有十来户人家，座落在永新县西乡的山区，部队住在以三湾为中心的几个自然村中，毛泽东就住在三湾村的一户农民家中。毛泽东在三湾首先召开了前委会，决定了部队整编及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

9 月 29 日，也就是到达三湾后第二天，部队在三湾村山坡下面收割完庄稼的稻田里集合。毛委员首先宣布了部队的整编决定：将工农革命军第一、三两个团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缩编为七个连，团辖一营、三营，暂缺第二营，每营编三个连，另单独编一个第四连（即特务连）。团直属队有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及卫生队。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形势。他

说：部队秋收起义后，受到了一定损失。但是，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经验，革命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还有这样千把人的队伍，只要大家齐心奋斗，还怕革命不能成功吗！针对有些人灰心动摇，毛泽东宣布：干革命靠自觉，执意要走的不勉强，发给五块钱路费欢送；要留的欢迎。这样，人数虽然少了一些，但却精干多了。

改编后，一团团长为陈浩，副团长韩庄剑，参谋长徐恕，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卫生队队长姓王，忘记了名字、党代表是何长工。我调到团部任参谋，谭政同志任文书。

三湾改编，确定了在部队中健全各级党组织，支部要建在连上。北伐时期，团部设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工作，连不设支部，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党支部建在连上之后，排或班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把团、连政治指导员制度，改为团、营、连党代表制，从而加强了党的组织力量。部队还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这支部队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0 月 22 日，我军主力（约七八百人）进占大汾镇。当天晚上，毛委员来到四连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他开始向连党代表罗荣桓询问了这批发展对象的大概情况，接着亲自参加并主持了入党仪式。仪式是在四连宿营地一家地主房子的阁楼上举行的，参加入党仪式的有八名新党员，还有连党代表罗荣桓，连长曾士峨和我（任副连长）三名党员干部。阁楼里正面放着一张桌子，上面点着一盏油灯，光线不太明亮，但可清楚地看见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党旗，旗是用一块小红布制做的，上面写有“ccp”三个大的英文字母。十几个人坐在桌子周围的几条凳子上，气氛显得很庄严。毛委员在靠近桌子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同罗荣桓交谈了几句后，就亲自主持入党仪式。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领导民主革命，现在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毛委员简短他讲完话，站起来，面对红旗，带领大家宣誓。只见他魁梧的身体和举起的右手，像一座塑像，宣读着誓言：“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这庄严、洪亮的声音，在古老的阁楼中回荡。

宣誓过后，会场气氛又活耀起来，新老党员互相鼓励。毛委。员又鼓励大家：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做宣传，多做群众工作……。人间苍桑，几十年过去了，这次入党仪式的情景依然深深地记得。

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形成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玫编只是初步奠定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许多方针政策的全面落实，则是经过较长的一段斗争才解决的。

行军路上

10 月 23 日破晓，部队在大汾镇突然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萧家壁部的袭击。在匆忙撤出中，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络，走向桂东方向，直到 12 月中旬，才随

朱德、陈毅同志的部队与团部在茶陵会合。团直属队和一营向井冈山转移。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连长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命令我带一个排，负责护送毛委员。在秋收起义前后几十天的长途行军跋涉中，毛委员的脚背被草鞋磨烂了，走路一拐一拐，行动很困难。只见他不时的微微皱一下眉头，有时被崎岖的山路猛地硌一下脚，禁不住轻轻吸一口冷气。看到他艰难行军的样子，我和战士们一次次提出绑一付担架抬着他走。但毛委员总是说：没什么？我能行。一次次的拒绝了。有时说完还有意的抖擞精神，迈上几大步，并说道：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觉得，毛委员是读书人，并不善于长途行军，但他竟能如此经得住艰苦，很令人佩服。

这天在行军的路上遇到了王佐从井冈山派出来搞侦察的朱诗，柳（此人以后担任过红四军三十一团便衣队队长），毛委员就亲切地和他交谈起来。当天晚上，天下着檬檬细雨，部队在黄幼附近一个叫荆竹的地方宿营。我们十多个人就和毛委员住在一间农民的茅草房中，这座简陋的房子很小，里面只放着一张旧床，此外没有其他东西了。我把床铺分给毛委员，安排朱诗柳和我们一块睡在地上。不料，毛委员却出人意料地非常诚恳地邀请朱诗柳与他同睡到一张床上，这使大家都觉得有些诧异。因为毛委员和他并无深交，而且朱的形象并不敢让人恭维。他衣服槛楼，又瘦又脏，黄中泛黑的脸，突颧骨，只有两只有神的眼显示出此人的机警。使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抽大烟的人。大家都有碍于毛委员的面子，虽然表面上态度不冷不热，心里却多有嫌弃，这么一个人，竟然和毛委员挤到一张床上去，真是……。

连续的行军，十分疲劳，战士们几乎是倒头便呼呼入睡了。我因责任所在，躺下后先想想警卫上有没有疏漏，又听着毛委员和朱诗柳的慢慢交谈。毛委员问：井冈山有几个大村子？多少人口？生产些什么东西？从井冈山到五斗江、拿山、黄拗有多少路？上井冈山经过一些什么地方？还问了附近的萧家壁等地主武装有多少人，多少枪，农民对他们怎么样等等。朱诗柳详细地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和朱诗柳诚恳亲切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从此可以看出，毛委员是多么的尊重群众和善于调查研究，这才是成大业的胸怀，而我竟以某种印象对待别人，相比之下自感惭愧。

中村圩两三事

1928 年 3 且 10 日前后，第一团进到酃县中村圩，住了十多天。毛委员在这儿曾给排以上干部上了一次政治课，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我和全连的干部都聆听了这堂生动的课。

·在湘南暴动中，部队一度存在乱烧房子的现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者还振振有词，说什么“只有不断地烧杀才有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毛委员在讲课中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是指产业工人，并不是无产的游民。执行烧杀政策是很危险的，它只能使革命斗争变成恐怖行动，脱离人民大众，把自己孤立起来，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

对于盲动主义烧杀的做法，工农革命军一团的领导认识上并没有完全一致，就在毛委员讲课之后不久（大约一个月），部队曾进驻汝城县城，撤出的那个晚上一位团领导又命令我带一个排去烧房子。当时，我很为难。不执行命令军纪是不允许的，又想到毛委员曾讲的课再去烧房子是不对的，真是

左右为难。于是，我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执行这次任务。没有按命令逐户去放火，只选了大一点的两家商号去烧。在放火以前我们先把主人叫醒，告诉他们要烧房子，我们一边点火，主人就一面用水灭火，我们没有走出多远火也就扑灭了。以后，由于全团指战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就基本上杜绝了烧房现象，这一转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在中村圩还有一件事印象也很深，有一位排长和教导队长吕赤（四川人黄埔四期）在擦试打土豪缴来的手枪时，排长不慎走火，吕赤中弹身亡。这类事以前都是团领导处理，这次，毛委员改变以前的办法，让团的士兵委员会处理。团士兵委员会是在“三湾改编”时成立的，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以后又加上军事民主，称为三大民主。通过士兵委员会的活动，使广大干部战士懂得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培养了士兵主人翁的精神、在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克服军阀主义残余等方面都起到很大作用。干部战士关系融洽，革命热情空前提高。这次，团士兵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首先报告了士兵委员会三个月的工作情况，接着，介绍了这位排长手枪走火的经过，宣布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并经毛委员批准的处理意见：决定给走火的排长打四十下手板的处分，以示惩戒。通过这件事团士兵委员会的威信更高了。有的干部发脾气并爱体罚战士，战士们就说：你再这样就找士兵委员去！干部马上就改变态度，表示不搞体罚了。

赣南、闽西的斗争

1929 年 1 月 14 日，红四军主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到赣南、闽西活动。目的是调动分散湘赣军阀的兵力，以便打破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由三十二团留守。为隐蔽我军实力，前委在项山决定改变部队番号，红二十八团改称一纵，红三十一团改称三纵，大约四五月间由军属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的两个营又组成了二纵。每个纵队编有两个支队，我，们所在的三十一团三营改称为三纵队九支队，我任副支队（营）长，罗荣桓是支队党代表。

毛委员很重视侦察敌情的工作，当时没有无线电侦听设备，军队情报主要靠派人出去侦察和收集报纸，毛委员就曾多次派我们出去收集报纸。下井冈山不久，部队在大柏地打的一个大胜仗，就是根据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布置的。二月初，部队到端金地区活动，我奉命带一个大队（连）进入瑞金县邮政局收集报纸。报上的一行消息引起我的注意：“独七师刘士毅萧致平团，经瑞金尾随共军，朱、毛部不久将被歼灭。”这说明敌人正向瑞金开来，我当即将这重要的情报报告了军部。军部遂决定部队不在瑞金停宙，而到大柏地去，相机歼灭该敌。部队于 2 月 9 日进到大柏地，2 月 10 日在大柏地休息了一天。11 日阴历大年初一，红军在大柏地布置了伏击阵地。萧敌自持追击红军有功，大摇大摆准时进入我伏击地。这时，我军发起猛烈进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队形很快被我军打散。但敌人仍凭借着优良武器抢占了几个制高点与我拼争。我们九支队（三营）是军的予备队，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我奉命带一个大队投入战斗，从正面向敌人冲锋，配合友邻将敌人打垮，又追击了二十多里路，这一仗歼灭了萧团，俘获敌人八百多名，缴获枪八百余支。

继大柏地战斗之后，红四军又在长汀遭遇战中取得胜利，击毙福建第二

混成旅旅长郭凤鸣，俘敌几百人，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条，敌情大为缓和。红军在长汀休整了半个多月，在这儿正式更换了纵队、支队的旗帜，全军每人发一套军衣和两块谬洋的零用钱，这是井冈山斗争以来生活最好的时期。

3 月 28 日蒋、桂战争爆发。毛委员根据变化的形势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夺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湘西。在三省扩大红军队伍，造成群众割据。为实现这个战略计划，乘赣南敌人空虚，4 月 1 日，红四军离开长汀乘势向赣南发展，兵分几路占领了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及附近的广大地区。经过四十五天的工作，赣南数县几百里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5 月 20 日乘闽西之敌空虚，红四军再度入闽。红军隐蔽集中于龙岩的大池、小池地区，然后进攻龙岩，守敌陈国辉一部被我击溃，残敌逃往漳平、永福，5 月 23 日红军进入龙岩。为把陈国辉的主力从广东牵回龙岩加以歼灭，红四军于当日下午离开龙岩，南下坎市。敌人果然中计、在漳平、永福的残敌见我离去，一面急电陈敌返闽，一面回窜龙岩。6 月 3 日，红四军三纵再打龙岩，陈国辉率其主力，人不下马，马不解鞍，急如星火地从潮汕回援。红军主力撤离龙岩，二、三纵和闽西红军在大池集结，一纵从坎市开往上杭大洋坎集结，故意减轻陈敌回龙岩沿途的威协。敌不知是计，主力很快回到龙岩。红军迅速将敌包围，遂子 6 月 19 日向龙岩发起进攻。龙岩没有城墙，工事也不多，红军三纵从城西北攻城，一二纵从东面攻。九支队和七支队担任三纵的主攻任务，是日拂晓，第一次冲击就占领了敌连、排前哨阵地，并攻克了控制龙岩的制高点，接着配合友军直插城内。陈国辉化装后带几个人从城南逃脱，两个旅的主力全部被歼，红军再次占领了龙岩。

战斗胜利结束，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指战员们深为毛委员、朱军长的高超指挥而佩服。

朱德军长很高兴，战斗刚结束许多地方还散发着一缕缕青烟，他就骑上缴获的自行车到各处视察。那时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自行车，战士们看到朱军长骑在两个轮的车子上能跑得那么快都争相观看。毛委员也为这个时期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战斗的接连胜利而激动，他在《清平乐、蒋桂战争》的一首诗中曾写道：“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欣喜之情跃于纸上。

从红四军七大到九大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检验，领袖是在斗争中成长。毛委员的许多英明预见和斗争策略，那时还没有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1929 年 6 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领导层对建军的方向、政策产生了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党的领导到底是只管政治不管军事还是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虽然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没有独到的见解，会上没有发言。这次会议，争论激烈，没有统一的意见。、通过选举，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

七大之后，毛委员离开红四军到蚊洋去养病，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朱德主持红四军的工作。

9 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又召开了八大，我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仅讨论了当时的具体工作，对重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陈毅同志 9 月到上海之后，向当时担任党中央军事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中联系整个红军建设的经验，针对红口军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后简称为“九月来信”）。11 月初，陈毅同志从上海返回部队。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于 11 月 26 日到达长汀，重新回到部队工作。28 日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红四军的九大，许多材料上说只开了三天，其实，这个会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12 月中旬，毛泽东先在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联席会，可以认为这是“古田会议”的预备会，预备会开的时间较长，一直开了半个多月。各级党代表及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既有领导同志的讲话又有与会人员热烈的讨论。大家联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红军发展的经验教训，重点讨论了在龙岩城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军方向问题，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深深地教育了与会代表，使大家对毛委员的主张加深了理解。我们九支队的党代表罗荣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红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于 12 月 28 日到 30 日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因为党代表联席会已经统一了认识，正式会议开得很短，只有两天，第三天朱德军长集合中队以上的军事干部进行演习，除演习沿用北伐军的班、排、拴的横队集合队形外，还增加了班、排、连的纵队集合队形，即我军现在《队列条令》上）规定的集合队形，并把散兵形由一字形改为人字形。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分为八个部分：（1）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废止肉刑问题；（7）优待伤兵问题；（8）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第一部分是整个决议的核心，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方法，强调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还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徽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遵照党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根据两年多肾军建设的实践经验，集中大家的智慧而写成的，是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形成了我军的建军原则；是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红四军及闽西、赣南的武装部队，通过学习和贯彻这个决议，首先受到教育，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部队面貌为之一新。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全国的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执行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深切怀念伟大领铀毛泽东

李聚奎

春去秋来，又是一度黄花秋风。徐徐的秋风，吹红了香山层林，也撩起了我的深沉思念。

也是这个季节，十七年前酷暑刚过，秋风乍起，我们共和国和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匆匆离去了。

从六十七年前参加北伐至今，我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同志麾下的一个兵，是毛泽东思想把我从山野荒郊的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村青年，哺育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天南海北哪一个岗位上，也不管是在职还是处于逆境或是离休后的日子，毛泽东同志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眼前耳旁出现。我忘不了宝塔山下延河畔他给我们讲课作报告，是那样的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忘不了天安门城楼上他亲呢地抚摸着我的孩子的头，叫他们“小老乡”，和还不甚懂事的娃娃谈笑熔乐；忘不了丰泽园里菊香书屋他听我汇报我国石油工业的情况，开始了对国民经济三十四个部门的调查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忘不了中南海的游泳池边他对我纵论天下大事，笑谈环球凉热；忘不了创办解放军后勤学院时他给我和全体教职员学员写信，告诫我们“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和正规化”；更忘不了在我投身革命洪流初期和人民军队处于最危急困难的时候，他对我的教诲和培养。正是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切，指明了我的人生之路，奠定了我终生信仰的基石。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 1928 年 12 月 9 日。那是我们跟随彭德怀同志取得平江起义胜利、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之后，湖南的敌人集中兵力由岳阳、例阳、湘阴分三路向平江进攻。红五军经过激战于 1928 年 7 月 30 日撤出平江城，辗转在平江、修水、铜鼓、万载、通城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两个多月的频繁战斗，部队从两千多人减员到七百多人。10 月间，湘鄂赣三省敌人又对我们发动“会剿”。红五军突出敌人包围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一部分兵力由黄公略同志领导留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斗争，主力则由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率领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12 月 8 日，部队到达宁冈县属的茅坪，第二天开去新城参加与红四军的会师大会。路上，遇到了红四军的队伍，我们就在路边的日里集合，让红四军先走。这时，一位三十来岁，留着长发，目光炯炯，身穿灰色中山眼，没有戴帽子，面庞清瘦，身材高大的同志走过来了。彭军长连忙给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毛委员。随后，他要求部队安静下来，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毛主席在队伍前面走过来走过去，边讲边抽烟，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的道理。他讲，“工农兵弟兄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军阀也是少数。”说到这里，他问大家：“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我们大声回答：“多数人打得赢！”毛委员高兴他说：“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他又伸出右手的三个指头说：“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这是

我第一次聆听毛主席的讲话，他那平易近人，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讲明深刻革命道理的神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就是这一番话，就是那一身朴实的服饰，那一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就让人感到他是一个伟人，一个了不起的人，崇敬、信赖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而在这之前，虽然彭德怀同志也常常给我们讲，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任凭敌人多么疯狂的围攻清剿，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坚如磐石，朱毛的红四军是我们的榜样，但我们对这些话半信半疑。现在到了井冈山根据地，接触了根据地的群众，见到了红四军的队伍，特别是见到了毛委员，听了他的讲话，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亲切、温暖、鼓舞人心，我们的疑问都消失了，都从内心深处感到，彭军长领我们上井冈山这条路走对了。

红四军和红五军的会师大会是 12 月 11 日在宁冈县新城的广场上召开的。那天，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标语。两军官兵和当地群众一万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主席台是用麻绳捆木头临时搭起来的，比较简陋。朱军长、毛委员等领导同志上去后、台子就垮下来了。那时，部队里有些老兵还讲迷信。比如行军打仗，旗子没有掌好倒下来了，非得把掌旗的打顿屁股取个古祥。台子垮了，有的人就议论开了：“这可不吉利呀，今天会师就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军长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同志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同志们，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因为没有捆好，所以垮了。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接着，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高兴他说：“今天我们红四军、红五军胜利地会师了，走到一起来，革命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红军、更多的根据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随后彭军长、滕党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两军会师以后，不几天我们就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们上山以后，就向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学习建军、建政、建党的经验，以红四军为榜样，把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作为红五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很快，地方的民主政权和农民、妇女、儿童等革命组织都纷纷建立起来了，地方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红五军也在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这过程中，我对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刻多了，也和毛委员相识了。1930 年 12 月反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时，我们在毛委员的指挥下于 12 月底对张辉瓒的龙冈指挥部实施包围。当时，我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任团长。30 日围歼张辉瓒残部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张辉瓒负隅顽抗，集中火力向我九师方向猛烈冲击，妄图打开一个口子突围，就在这时我负了伤，子弹从我的右大腿打进，从屁股打出，穿了一个大洞，血一个劲地往下流，师长徐彦刚、政委朱良才正好赶到，命令二十六团进入战斗，让担架员把我抬下去。经过小别山红军指挥部时，毛主席正向前方观察，看到有担架过来，就问：“担架上抬着谁呀？”“二十七团团长。”担架员回答。“啊，老乡！”毛主席边说边走过来，亲切地问我：“伤着筋骨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仗打得怎么样？”我回答说：“马上就要结束战斗了，我下来时已经打到敌人指挥部了。”毛主席高兴他说：“好！胜利在握！”听到毛主席亲切的话语，我心里升腾起一般暖流。其实毛主席因公务繁忙，和我们的接

触次数并不多，时间也并不长，但他对我们这些普通的基层指挥员，甚至连一些战士，也都知名知姓知根知底。毛主席过人的记忆力和他对同志深厚的阶级感情，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自 1930 年冬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到 1934 年秋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每一次我都参加了。前两次反“围剿”作战，我在红三军九师任二十七团团长；三、四欢反“围剿”作战时，我在红三军的八师、七师、九师三个师里先后任师长；第五次反“围剿”前，又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其间；由于工作岗位的局限，我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但有一点我和战友们的感受是很深切的，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逢凶化吉，根据地能扩大，部队能壮大，革命政权能巩固。反之，尽管还是这些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在浴血奋战，还是那些可敬可亲的根据地群众在全心全意地支持党和红军，但根据地总是缩小，红军总要减员，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

长征开始后，我仍任一军团红一师师长。1934 年 11 月，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高耸人云的大山。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军速度缓慢，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湖南、广东敌军从两侧夹击我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尾追迫近，情况十分危险。一天，红一师正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时，军团首长电话命令我带一个团撤出战斗到前面开路，掩护全军通过粤汉路，我即带三团赶到最前面。途中，我们遇到了随中央纵队行军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他们正在路旁休息，见我带着部队来了，还没等我开口，周副主席就说：“你们来得好快呀！”我一听，知道首长们已了解我们是来担负开路任务的，就没说什么。接着，周副主席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图上已标好的箭头，向我布置了“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的任务。周副主席说完后，毛委员又对我讲：“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来。”最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也是从他受王明路线的排斥而离开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一年多没有见面了，此时见到他我特别高兴。尤其是又听到他所说的大方向是什么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过去很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毛泽东同志的话音刚落，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连声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后来的一个月里，虽然广大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不怕牺牲，，英勇苦战，突破了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部队打垮了，有的部队打散了：从苏区带来的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扔进了湘江；全军减员过半。直到 12 月中旬我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贵州黎平，18 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早在湖南通道中央会议上就提出过的进军贵州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这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

毛泽东同志之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它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可以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端，是尔后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的基础。

不过，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干部得知这次会议精神，是在离开黎平以后的行军途中。19 日，我们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恰遇中央纵队的前梯队从这个镇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我们师部。那天，我们司令部炊事班刚好宰了一口猪。我们师的几个领导一面让炊事班准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几位领导同志插话，笑声不断，毛泽东同志说话最多。他关切地询问我们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复疲劳没有？开饭时，他们见端上了好几盘肉，高兴得很，记不清是谁竟喊了起来：“嗬，还有这么多肉呢！”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谈，笑语满堂，连半个多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20 日左右，我们在向剑河前进途中，聂荣臻政委向一军团的师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当我们听到“鉴于目前新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时，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当我们听到“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我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随后，我们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向遵义挺进，一路上连战连捷，进军迅速，于 1935 年 1 月 3 日渡过乌江，又占领了遵义城。1 月 15 日到 17 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际上确立了，党的路线从此也就转到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了。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车分兵三路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红一师为全军开路，1 月 26 日在离赤水县约三十里的黄坡洞陷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此时，我中央纵队与三、五、九军团已抵达土城。但紧追不舍的四川军阀部队与我后卫五军团形成对峙，一场恶战在土城地区展开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两昼夜后，鉴于土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援军即将赶到，我军原定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人所阻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下令部队连夜撤出战斗，于 1 月 29 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一位参谋到渡口来，要我和一师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到他那里去。耿飚参谋长因指挥部队过河未能去，我们三个赶到毛主席那里时，他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在遵义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周副主席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揭发批判了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及长征初期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为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他对周恩来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勇于坚持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们一听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向。

毛泽东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机动灵活，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也由于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强调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用意，按我当时的理解，除了要我们不要忘记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外，着重还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军委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捧，而且“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的第三个问题是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我说：“部队在扎西以后要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行！没有问题！”我回答说。“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是吧？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三千多人。”毛主席又说：“三千多人编一个团又大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主席，聆听他的指示。当时，黄殁政委、谭政主任和我听到这些指示，对我们红军的光明前途、对我们党的光明前途认识更为深刻了，对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具体工作也更清楚有底了，大家特别高兴。回来后立即向师里的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同志们都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同志讲的办。后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长征开始前后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时写道：“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每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就倍感亲切，我们红一师、我们的红军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到达延安的。

在这之后，我在金沙江畔、泸定桥头又见到了毛主席。1935 年 8 月，一、四方面军会合，我调到四方面军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后，与毛主席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一直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尤其是在我参加革命初期，和我在红军时期的师团领导岗位上，毛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亲手培育使我终身受益，每每想起就不能不深深地崇敬他，深切地怀念他。我是人民军队中的普通一兵，由于工作经历的局限，和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军队的伟大统帅毛泽东的直接接触是有限的。但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就是从自己和毛主席有限的直接接触中，也不难看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和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指引我们把握

今天、创造未来，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与我们党的历史、与我们军队的历史、与我们中华民族翻身解放、繁荣昌盛的历史紧紧地紧紧地联在一起，不可分离。

回忆长征前后毛主席的几件往事

钱江

一、在红一军团总司令部见到了毛主席

我是江西吉安富田横坑村人，1915 年 8 月生，幼年父母双亡，与弟弟两人成为一对孤儿，备尝人世艰辛，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帮人做杂活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高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发了朦胧的革命意识。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的家乡吉安成为对敌斗争的前线。1929 年红军来到富田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担任了儿童团团长和少先队副队长，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故事。知道他们领导的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土地革命活动中，是穷人的救星。他们对穷苦人和霭可亲，平等待人；对敌人英勇奋战，毫不留情；他们指挥红军作战，战无不胜。因此我由衷地对朱总司令、毛委员产生了敬仰之情，对红军十分羡慕。

1930 年 10 月初，红军攻占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我已经是共青团员，就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分配在红十二军当杨立三的公务员，杨立三调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副官长时，我随他分配在总司令部公务班。我想，这下子我就在朱总司令、毛委员身边工作，所以高兴极了。这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处，一个副官处，机构精干，人也不多。11 月，我被调到卫生所当卫生员，仍旧编在公务班，班长是朱总司令的公务员康东生，同班还有参谋长朱云卿的公务员李力田。毛委员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军团政治委员，他的公务员编在另一个班。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是在行军路上，李力田指给我，哪一个是毛委员，那一个是朱总司令。只见毛委员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目光慈祥，头发较长，身着普通灰军服，平易近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革命领袖这样俭朴，没有官架子，和我们红军战士一个样，我更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打倒土豪劣绅和蒋介石，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那一年冬天总司令部移驻小布，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毛委员说了话。那天毛委员和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一面看病，一面向卫生所长邹南山询问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况。他问卫生所共有几人，忙不忙。邹南山作了回答，同时把我介绍给毛委员说：“最近增加一个小鬼帮忙，司令部人不多，工作不算忙。”毛委员立即向我端详了一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钱昌鑫。他又问我是哪几个字，“是日曰昌吗，是哪个‘兴’？”问得我不好意思。邹南山回答说：“是三个金字的鑫。”毛委员接着笑笑说：“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呀！小心打你的土豪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邹南山又向毛委员和贺子珍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并说我长得有点像贺大姐。贺子珍笑着说：“他是我的小弟弟”。毛委员听了也笑着对我说：“钱昌鑫，你就做她的弟弟吧。”这时说得我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后来就传开了，说我是贺子珍的弟弟。毛委员谈吐幽默，亲切感人，一下子打消了我对革命领袖的神秘感，特别是温暖了我这个孤儿的心。

1931 年 9 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总司令部转移到了瑞金叶坪。这时进行组织调整，人员也充实多了。我从卫生所调到宣传队当宣传员。一

个多月后，又要调我去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无线电。（入学不久，以我们这训练班为基础，组建成军委无线电学校）。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总司令部之前，我想去看看毛委员、朱总司令，贺子珍大姐和康克清大姐。在 10 月份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了毛委员的住处，是大会堂右侧一座楼房。我上楼走到毛委员的房门口见毛委员和贺大姐正在工休，我向他们行了军礼。贺大姐招呼我进屋里坐。进屋后，毛委员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向毛委员报告了要离开总司令部去学无线电的情况。毛委员问，还有谁去。我说还有宣传队的刘士清。毛委员一面剥袖子，一面对我说：“小钱，要好好学习无线电，掌握技术。只要用心刻苦学习，是能学好的。学好后回来工作。”他又说：“无线电是我军的一项新的技术工作，有了它，就可以随时沟通各军团、各军、师之间的通信，可以用来侦察敌情，还可以收发新闻，用处可大呀！所以无线电比一般的技术工作更重要。”毛委员一面教育我好好学习，一面把剥好的柚子分给我吃。他说，这是院里柚子树上长的，刚摘下来，新鲜好吃。我一面吃柚子，一面环视屋里的陈设。屋里只有桌子，床铺和几把座椅，两个文件箱子。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些书，文件，简朴极了。1980 年我回到了阔别了四十多年的瑞金参观，看见这个院子和这间屋子，还按原样摆设，我深深地沉浸在回忆里，无比地怀念毛主席和贺大姐。

二、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932 年 4 月我在汀州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结束，先后分配到红三军军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粤赣军区搞报务工作。1933 年 6 月调到瑞金军委二局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当时是曾希圣和钱壮飞分别在前后方担任正副局长。我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常到二局来，但是一直没有见到毛主席。原来在宁都会议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排挤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1934 年 10 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我们编入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的二大队。直到渡过湘江进入湘西后，才听说毛主席又过问红军的工作了。当毛主席知道了二局的情况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时，曾派人送来猪肉表示慰劳。我们当时对“左”倾错误领导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及过湘江时遭受的严重损失不满，因此当毛主席派人送猪肉来慰劳时，心里想，毛主席又过问红军工作了，情况可能会好起来。直到遵义会议后，情况才起了根本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渡赤水中的一些情况。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就经常向曾希圣局长了解二局工作的情况并给予指示。在江西时听刘伯承参谋长讲过，毛主席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重大作用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有了这项工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比是玻璃杯中“押宝”，看得清，押得准，赢得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还十分严峻。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 8 个师尾追我们进入贵州，王家烈的黔军虽然战斗力差，也还有 5 个团，北面川军刘湘命令潘文华在长江布防，此外还有滇军和湘军。我们 1 月 19 日从遵义出发，军委的意图是在沪州上游北渡长江，四方面军来接应再共创川西革命根据地，因此首先要歼灭刘湘的若干部队才有可能渡江。1 月 27 日总部进到土城，我军与川军郭勋棋旅打响了。当时我们对川军的电台还没有来得及严密的侦察

控制，因此对川军兵力也还未完全弄清。战斗打了一天多，才弄清郭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郭旅被击溃，但由于土城一带川敌兵力太集中，加上深沟石岩，不便迂迴，故未能全歼；而合江、赤水、古蔺还有川军 3 个旅，再坚持下去，可能造成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形势，情况变化对我不利。弄清这些情况后，总部下令在 29 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往古蔺地区前进另找战机。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情况：28 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军情况。29 日我们进抵古蔺地区后侦知敍永有川军范子英旅驻守，我军继续向扎西（威信）前进。2 月 5 日我们进至石相子，这时对川滇两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川军有 7 个旅向古蔺、敍永跟进，滇军 3 个旅也已到达滇黔边境的镇雄、毕节并向扎西扑来，又有南北夹击之势。同时了解到蒋介石嫡系的 8 个师都在贵阳附近休整，遵义则只有王家烈 5 个团据守，最为薄弱，因此军委 10 日在扎西开会决定东进杀它个回马枪。我们于 19 日从太平渡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从 24 日到 28 日连克桐梓、娄山关，再次解放遵义。蒋介石派他的嫡系吴奇伟的五十九师和九十三师来救援，被我大部歼灭，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大家高兴极了。

蒋介石吃了败仗，3 月 2 日飞重庆调集大军增援遵义，并且改长驱直入为长追稳打的方针，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那套办法，固守防堵，令周浑元军和吴奇伟一个师进到鲁班场筑碉堡固守，企图围歼我军在黔北。军委了解了敌人这个企图后，决定将计就计，使敌军北调。3 月 16 日我们到仁怀后从茅台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推进。蒋介石以为我们又要北渡长江了，因此也命令他的主力向北尾追，命令川军撤出遵义返转土城。而南面的乌江，他就没有设防。军委除令九军团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外，3 月 21 日我军又突然南下，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日夜兼程，向南急进，顺利地通过周浑元在鲁班场一带设置的封锁线。我们于 3 月 31 日渡过了乌江。这时蒋介石发觉我军主力南下，离贵阳只有 50 余里，他与宋美龄、端纳都在贵阳，兵力空虚，于是急调滇军孙渡率 3 个旅驰援。蒋介石看到红军忽又东指，以为又要入湘，于是命令他的嫡系向石矸，镇远方向急进，命令滇军向贵定、瓮安方向前进。这些敌军调动，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毛主席早说过，如果能把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于是红军于 4 月 9 日从贵阳、龙里间的大马路上穿过，迅速隐蔽地折向西南，经紫云、贞丰、兴仁等县，以每日行军七八十里至百十里的速度，昼夜兼程，进入云南，于 4 月 27 日到达曲靖地区，把蒋介石尾追的部队远远地甩开了。由于红军行军神速，沿途一些地方民团还未得到上级通报，因此竟把红军当作中央军来欢迎，过曲靖时我们军委纵队也被当作中央军欢迎过，真使我们暗暗好笑。红军的先头部队 27 日前在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截获一辆由薛岳副官押运的汽车，车上装有西南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套色军用地图和许多云南白药，这种地图和白药对当时红军来说，真是无价之宝。5 月 2 日到达团街后北向金沙江前进，5 日赶到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在江边中屋山一个石岩洞中架起天线工作，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同志也在这个岩洞中进行指挥。记得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都遇到了困难，毛主席等人十分焦急，立即命令都转到皎平渡口过江，一直到 9 日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才松一口气。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为主动。四渡赤水的胜利的确是长征中的一个转折点。诚如后

来萧华同志在长征组歌中歌颂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与在江西的三次反“围剿”和解放战争中在陕北的蘑菇战术一样，这些都是毛主席军事指挥中辉煌的一页。当然，当时军委二局的技术侦察工作使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及时了解敌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对我们说：你们是“好的二局”，“有了二局，长征就好比是打着灯笼走夜路”，这对我们是终身难忘的极大鼓舞。

三、在巴西的危急关头

长征渡过金沙江后，又经过会理、彝族地区，到安顺场，过大渡河，到泸定、天全。在中坝还遭到敌机轰炸，终于在 6 月 17 日过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了。我们与四方面军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同志相处得很好。后来在毛儿盖地区住的时间较长，8 月 21 日才从这里出发，按中央决定分了左右路军，军委二局随右路军北上。过草地，十分艰苦。8 月 27 日出草地，经班佑到巴西。这是一个藏民村子，前敌总指挥部住在这里，二局住在村南的一所房子里。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三军团驻在另一村，相距几里路。我们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传说，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大家对此十分反感，私下议论，主张跟毛主席北上，不愿意南下再过草地。9 月 9 日，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我们工作的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来到二局，通知曾希圣局长，说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随同中央立即北上，应秘密作好出发准备；同时要他和曹祥仁（当时是一科科长，解放后曾任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和浙江省委书记，已故。）邹毕兆（当时是副科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国防工办主任。）三个同志立即到三军团驻地去，并且告诉留下的同志迅速准备，待命行动。他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守秘密。我们得到通知后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议论着，盼望着时间过得快些。当时日常行军准备是很熟练的，我们立即悄悄地把器材。文件和生活用品收拾好。10 日凌晨，尊照预定计划大家迅速行动，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驻地，就地停止待命。这时才见到叶参谋长一个人牵了马从我们的来路走过来，见了我们就开玩笑说：“我开小差来罗！”（后来听说那晚上他的马未卸鞍，走的时候连警卫员也未告诉，是只身牵着马出来的。）我们也笑着向叶参谋长说：“我们是开大差来罗！”不久天大亮了，二局的队伍带到集合的地方，见到曾局长、曹祥仁、邹毕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不久彭老总来了，毛主席也来了。他们看到二局的同志很高兴，都笑着问好。毛主席当时对集合在那里的全体直属机关同志讲了话。他说：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张国焘不想北上，决意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而且还企图阻挠我们北上。我们不得不带着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了。四方面军的同志跟张国焘走，不北上，我们不勉强他们。我们一、三军团先走，开辟一条北上的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南下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走下去是会碰壁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四方面军的同志会跟着我们开辟的这条道路来的。当时空气是很紧张的，但是毛主席镇定自若。说完后我们立即上路。11 日到了俄界，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开会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我才听说 9 月 9 日张国焘曾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中央，是叶剑英把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党

中央才下决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原来我们二局的同志当时是处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是毛主席又一次使我们转危为安啊！

四、阶级情谊，恩重如山

我们北上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发现在二局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丢了。他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一出发就是用担架抬着的，9 月 11 日沿达拉沟行进时，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一个一个迅速跑步通过，估计就在那里出了事，当晚发现后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我们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骨干。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们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普通战士的。

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全军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下令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虽然这匹马背上已烂了个大洞，在关键时还可能助一臂之力。领导上当时把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一直好不了，在毛儿盖又误食了野菜毒菌，身体非常虚弱，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值班。9 月 14 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前进到了麻牙，9 月 16 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离腊子口约十余公里）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不平，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让它驮着跟我走。当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往后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么高，到处又长满荆棘。我混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想，别的不说，就在山上冻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轻轻的只有 20 岁，难道就死在这大山里吗？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的老黄马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踹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扒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我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的队伍了。这时我想大声叫问红星二大队在哪里？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在饲养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白龙江山区的这一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7 日白天住在山下一个小村里休整，身体慢慢恢复过来，18 日就过腊子口，进入汉人区，到甘肃境内的哈达铺了。出了山区，观到地里金黄色的庄稼，精神倍增，老黄马也上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部队继续北行到了通渭，在西兰公路上打了敌人的汽车，缴获了一批物资，曾经分给我一块黑色礼服呢面料，我一直背到陕北在被服厂做了一件大衣。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既有一匹马，又有一副担架，所以可以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实际情况开始要我去。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肯去。因为我心里嘀咕，

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担架呢！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到一旁让路。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么病呀？”我一见毛主席突然像离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激动到了极点，眼泪止不住花花地流下来。我 11 岁时母亲死了也没有这样地流过眼泪。心里有话要说，硬是哽咽着说不出来。毛主席立即叫警卫员要扶我上他的担架，我直摇头。等了好一会，毛主席只好说：“那就慢慢走吧，我们快到根据地了。”第二天 10 月 19 日我们就到了吴起镇。在长征中行军，贺子珍大姐平时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湾，才见到贺大姐，她把毛主席用过的一条半新的夹裤送给我，并且说：“这是主席穿过的，还能穿，给你应应急吧。我想，一定是毛主席见到贺大姐时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了，不然她怎么知道我的病情呢？”

岁月流逝没有冲洗掉我记忆中的这些往事。阶级情深，恩重如山。我参加红军后当小兵时就有两点鲜明的感受：第一点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与旧社会地主老财对待穷人截然相反。革命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领袖和群众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有意见在会议上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平时在工作上下级要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点是我们这支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

旧社会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们当红军是好崽当好兵，好铁打好钉。这支军队好似一个家庭，又像是一所学校。我 15 岁参军后离家很近，一点不想家。第二次反“围剿”走到富田，路过家门而不入甚至怕家中亲人见到来拖后腿。我爱这个革命大家庭胜过爱自己的家。

五、两次谆谆教导

到了吴起镇，休整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又移驻甘泉象鼻子湾。在号房子时发现这个小村住不下全部人，于是军委二局留在象鼻子湾，中央军委其他人员住在下寺湾。到达象鼻子湾时天下着鹅毛大雪。趁着总部直属队还在等待设营人员分配房子时，毛主席站在一块大磨盘上向大家讲了一次话。他说：我们终于到达根据地了，现在首先要和陕北的同志搞好团结，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同四方面军分开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指张国焘搞分裂活动），大家不要再议论了。其次，大家也很清楚，一年前我们离开江西的时候，队伍浩浩荡荡，人那么多，现在队伍变得小多了。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病故了，我们要怀念他们。有的同志负了伤、生了病，没有能走过来：还有由于种种原因而掉了队的同志，我们都不要责怪他们。我们走了一路，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回想起我们在江西开创了那么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现在到了陕北，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也要会开创一个大场面，甚至比在江西还大。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使我们心里热呼呼的，都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1936 年夏天，毛主席随红军东征返回陕北。军委二局当时也从瓦窑堡迁到保安。我们有些同志受当时时局发展的影响，思想有些波动。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有一天就到保安二局的驻地来看望大家，又向大家讲了一次话。那天正碰上我当班，讲话的内容别的同志后来向我传达了。大意是要我们安

心从事这项技术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他特别讲了一个修桥的故事。说鲁班爷要修石桥，石桥修到最后快完工了，就差一块石头，怎么打也打不出这块不大不小的石块来。一天有一个为修桥人天天打草鞋的老翁，其实是张果老的化身，他把锤草用的那块石头送给鲁班爷，不大不小，正好砌上，石桥终于修好了。你们二局的工作就好比这块石头，是革命的石桥少不了的。这和后来我们讲的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是一个意思。

此后我再直接见到毛主席就比较少了。抗日战争后期我调到南下支队。1946 年 7 月中原突围后回到延安。毛主席当时住在王家坪，我向尚昆同志提出，希望能见一见毛主席。但心里想，主席这样忙，有没有可能？哪知不过一小时就答复同意我去。那天是 4 月 6 日。我一进窑洞就敬了礼。主席看着我不说话。我只好自己报告，我叫钱江，原名钱昌鑫。主席立即说：“噢，钱昌鑫啊，七八年不见了，你还没有死啊！”我忙向主席问候，接着谈了前线的同志当时对和、战问题及主席去重庆谈判的一些看法，主席针对这些思想对当时形势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他说：要知道反动势力对于人民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听了这番话，使我思想上清楚多了。以后 1949 年初在平山西柏坡、1950 年 4 月在中南海，毛主席又对我们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特别使我感动的是 1958 年我们机关开完党代表大会后，到中南海由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接见照相。毛主席一见到我还是叫我钱昌鑫，并问我为什么这样瘦。我告许主席因患十二指肠梗阻作了胃切除手术，已经好多了。我心里想，毛主席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记得我这个老战士呢！现在我们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 17 年了。我仍然深深地怀念他。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有预见。在巴西北上时，他说将来四方面军会跟上来，刚到陕北他就说我们还将开创出一个比在江西更大的局面。这些预言后来果真一一实现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沉着冷静，成竹在胸，能绕过暗礁，逢凶化吉。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真理。

（钱听涛协助整理）

永不陨落的星

贺晋年

在我的案头，摆放着一本书——《陕西五千年》，书中概述了陕西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闲暇时，我常翻阅此书。薄一波同志曾风趣地对我说：“只有贵省才有资格写这本书。”是的，我的家乡陕西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最早活动和定居的地区之一。早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清姜河畔相传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故乡。西周自　　周原发祥，文王访贤，周公辅政，开创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秦人从千河渭水两岸崛起，襄公开国，穆公称霸，建都雍城三百年，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陕西历史上的光辉篇章。然而，最使陕西人民引以为豪的，还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建立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大本营。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出发点。每每掩卷长思，胸中激情总是难以遏制。五千年的文明史，英雄人物辈出，群星灿烂，如果说，天空中每一颗星都代表一位英雄豪杰，志士仁人，那么，毛泽东主席就是那最亮的北斗星，是一颗永不陨落的星。秋天的夜晚，仰面凝视北斗星，心中怀念毛主席，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一段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5 年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地区的侵略以及蒋介石继续推行卖国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川北的懋功地区会合后，继续北上。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也于七月十五日开始西征北上。党中央、毛主席及中央红军的北上，预示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又急又气，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一举扑灭西北人民的革命武装。他急忙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亲任总司令，发动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中央代表团，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的过程中，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进行错误的“肃反”。劳山战斗刚结束，刘志丹等领导同志就被捕，部队中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榆林桥战斗前又有谣传，要逮捕我和张达志同志，我们的心情很沉重，部队指战员情绪也很不稳定。

11 月 13 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首先制止错误的“肃反”，并将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从而拯救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红十五军团派出部分部队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仗全歼敌一〇九师，又在追击中于黑水寺歼灭敌人一〇六师一个团，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5 年 12 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东征。当时，我任八十一师师长，正率部围困甘泉。城中守敌系东北军一二九师和一一〇师各一部，共一千余人。到 1936 年 1 月下旬，我师围困甘泉已七十余日。为了表示红军联合东北军抗日的诚意，总部命令我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集结待命，准备渡河东征。

1936 年 2 月 15 日，我八十一师向黄河边进发，到达清涧县袁家沟。部

队刚安顿下来，毛主席就派人喊我去他那里。同行的有张明先（政委）、李寿轩（参谋长）、李宗贵（政治部主任）、覃应机（特派员）。毛主席是 2 月初带一部电台离开延长到这个小山村的，这里离黄河很近。警卫人员把我们引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这是一孔砖砌的窑洞。推门进去，只见炕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炕边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上，除了一些书籍文件外，只有一支毛笔，一个墨盒。主席的铺盖也极为简单，只有两床薄薄的被子。毛主席身披一件蓝布棉大衣在炕上蹲着，正俯身研究军用地图。见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笑着说：“啊！你们来啦，坐下来谈。”主席边说边下了炕，光着脚踩在一双旧棉鞋里，我们落座后，毛主席点燃一支纸烟，深深吸了一口，便问道：“哪一位是贺师长啊？”和主席面对面地直接谈话，这还是第一次，我不免有些紧张，听到主席发问，我便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答道：“报告主席，我就是。”主席微笑着点点头，似乎他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之所以要发问，不过是想验证一个自己的判断力罢了。他连连摆手，示意我坐下，又操着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缓缓而言：“我晓得你这个人，在瓦窑堡还见到你好几封信呢！怎么，不想在军队里搞了，是不是？”我真没想到，主席一下便提到了写信的事。那是在中央到陕北后不久，我听传说十五军团要将我从八十一师师长的位置上调到七十五师任副师长，便想不通。认为自己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打败仗，为何降职使用。当时年轻气盛，又加上错误路线搞“肃反”弄得人人自危，心情不舒畅，便给陕甘晋省委写了几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并要求离开军队，到地方上去工作。这些信怎么毛主席也知道了呢？后来才知道，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同志送给毛主席看了。我想，这下要挨批评了，刚要解释一下，主席话锋一转，说：“今天不谈这个事了，东征你还是要去，在八十一师当你的师长，由总部直接指挥。”接着，主席给我们讲起国内外的局势，告诉我们东征是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调动敌人，同时可以扩大红军，筹粮筹款，扩大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讲形势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当时发文件很少，也难看到报纸和书籍，开会听报告就是学习，也是提高自己的好机会。主席还详细地询问了八十一师的情况，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

从主席那里出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又听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说，这些日子主席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彻夜不眠，批阅文电，召开会议，起草命令，还把各师的主要领导同志部分别召集来一一谈话。大战在即，有这么多的大事需要谋划，而他却把我这几封信挂在心上，把我这“土生土长”的西北军事干部挂在心上。说实在的。我这个人舍不得离开军队，对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三天不打仗手就发痒痒。写信要求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只不过是一时无可奈何的气话。主席短短的几句话，释去了我的重负。后来在东征战役中，我又几次遇到主席，并聆听他的讲话，受到莫大的教育和鼓舞。兑九峪战斗后，奉总部的命令，我把战斗力最强的二四一团一营调给总部，担负警卫任务，并派团长王思温和高维嵩同志去加强部队领导，确保毛主席和总部机关的安全。

东征回来后，我即调入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当时林彪任校长，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自己打了不少仗，但住校系统学习一些理论，这还是第一次。和一些长征过来的同志在一起交谈，他们常提起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的惨痛教训。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军队才能打胜仗，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记得毛主席曾在

红大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使自己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升华。

毛主席每个星期来红大讲一堂课，每次讲三个小时左右。主席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厚厚的一迭毛笔写的稿纸。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席讲曹刿论战。主席生动、清晰地描述春秋时期这个有名的战例，使人仿佛身历其境。主席通过这个弱国战胜强国的战例，喻示了当时弱小的红军一定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

主席告诉我们，他以后还要讲政治工作、建军路线等问题。可惜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油印本。带回部队之后，可成了宝贝，不少同志，都借去阅读，还有的同志把这篇文章抄录下来，以便随时翻阅。

在红大以及随后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时期，通过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使自己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进一步确立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这个信念，维系了自己的一生，即使在自己历经坎坷、遭受磨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

大约是 12 月下旬，毛主席派人叫我和王平同志到他那里去。主席那时住在保安的一孔旧石窑里。我看到主席为了处理“双十二事变”，操劳过度，脸庞有些消瘦，但目光仍炯炯有神。毛主席郑重宣布了中央军委将八十一师恢复二十七军番号，由我和王平同志分别任军长和政委的决定。他说：八十一师是一支在陕北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部队，打过许多仗，是一支好部队。不论是陕北红军，还是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不要分什么彼此，干革命还是人多一点好。他还告诉我们，在刚结束的西征中，八十一师有些战斗减员，没有得到补充，也有些新战士害怕艰苦，开小差跑回家去了。主席特别嘱咐我：你是陕北人，又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熟悉情况，你去把那些跑回家去的战士找回来，不要过多指责他们，不要把他们当逃兵对待，只要回来了就好。要对干部进行教育，要爱护士兵，注意管教方法，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沉思了一下，幽默地说：“我给你们写个命令吧，空口无凭啊！”说着，打开桌上的墨盒，拿起毛笔细细蘸着，又铺开一张白纸。这时王平同志站了起来；说：“主席，我要改个名字。”主席放下笔，诧异地抬起头来：“噢，你不是叫王明吗？（在此之前，王平同志，原名王明。）为什么要改呢？”王平同志说：“我们不是还有个叫王明的吗？”主席双手扶着桌子，若有所思地说：“是啊，我们还有个叫王明的。那你改个什么名字呢？”王平同志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就叫王平吧。”主席爽朗地笑了，连声说好。拿起毛笔，随着笔杆潇洒的挥舞，几行道劲的墨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任命
贺晋年为红二十七军军长
王平为红二十七军政治委员

毛泽东

离开主席那里后，我和王平同志都争着保管这份命令。争来争去，还是王平同志的“理由”充足一些，因为他是政治委员，理所当然由他保管。王平同志将这份珍贵的文件装在皮包里，一直随身携带。后来他到晋察冀工作

时，一次过唐河不慎，皮包被河水冲走了。直到今天，我们还为此惋惜！毛主席亲笔给我们写的命令，那是多么珍贵而有纪念意义的一件革命文物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工作。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生活十分艰苦，境内匪患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北三面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封锁，东面邻接黄河千里河防，日军随时准备向我进攻；而留守部队整个兵力开始不足一万人，并且财政困难，留守任务相当繁重。在这种险恶的局势下，有些部队的同志片面强调战时情况特殊。对地方同志说话口气粗，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记得在 1939 年，我任三边[①]警备区司令员时，一次去延安开会，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带我和曹里怀、文年生、丁国珏等同志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汇报到军队与地方关系有时不够融洽时，我带点埋怨情绪说：“军队和地方关系紧张，我们部队有责任，但地方也有责任。比如这次我从定边来延安，途中下大雨，赶到一个老乡家要求住下。但老乡硬是不让住，非要我去找区政府开条子不可。我说再冒雨来回跑几十里路，还不淋成落汤鸡？最后，好说歹说总算让我们住下了。”说完这件事，我又补充了一句：“边区解放这么长时间了，老百姓对军队也应该有个正确看法。”毛主席听完我的话，站了起来，先是说：“啊！有这样的事？”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和蔼地说：“我看，这是个好事情嘛！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敢不让你这个司令员住，说明你是人民的军队。若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来了，老百姓敢不让住？只有老百姓把你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和你一条心，这样你才能打胜仗，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凡是军队和地方关系紧张的地方，军队首先要检讨自己。

毛主席的这番话，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使我对人民军队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既批评了你，又让你心服口服，那充满哲理的精辟话语，至今还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在延安留守兵团那段日子里，我多数时间驻守三边。但每次到延安，总要到毛主席那里去，或请示工作，或是汇报问题。主席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放着书，我每每去请示汇报工作，十有八九是碰见他在看书或是在写作。主席不管多忙，时间多晚，都热情地接待我。我搞过兵运，闯荡过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等省区，也带领部队打过一些恶仗、硬仗。我读过几年绥德师范，在陕北红军里面，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但在主席那里，我常常拘谨得像个小学生。这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的约束，更重要的是主席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巨大的磁力，能牢牢地把你吸引住。他善于在纷纭繁杂的事物里，敏锐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胸怀博大、学问精深，与我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时事等诸方面，妙语连珠，许多典故常常是信手拈来，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诲人不倦似潺潺流水，但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妥协。而动起怒来，好似火山爆发，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他处理重大问题异常果断，绝不拖泥带水。那还是在 1941 年 10 月，驻在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我三边分区进逼，侵占了我边区一部分地盘，挑起了摩擦斗争。三边分区西邻宁夏，北接内蒙伊克昭盟，是延安的北大门，地势居高临下，是战略要地，又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如果三边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毛主席在接到我的紧急报告后，拍案而起，勃然大怒，立即召见王震同志和我，亲自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由

[①] 指安边、定边、靖边。

王震和我分别任正副司令员，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野战兵团由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和四支队、留守兵团的警一团、保安司令部的保二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大约有六千余人。毛主席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盐池是边区的命脉，三边是延安的门户，绝不能让何文鼎占到丝毫便宜。要记住你们此行绝不是做做样子，“何”来必打！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11 月 6 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主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随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一部分队伍向前开到人烟稀少的内蒙四十里铺、黑头梁、白泥井一线，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当时，在安边地区还驻有国民党地方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十一旅。我们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做的较好，此时已取得了十一旅保持中立的承诺，这是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入侵的一个很有利条件。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的防范，就未敢继续向我边境推进。到 1942 年 1 月 14 日，何文鼎部悄悄地龟缩回绥远原防地。事实证明，毛主席所采取的措施是极其英明、极其果断的。

1943 年春，我兼任旅长的警备三旅，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号召，在以前小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同边区党政军民一道，开展了以开荒种粮为主的大生产运动。除一部兵力担任边境守备任务外，主力全部投入大生产。八团开赴甘泉县之清泉沟屯田垦荒，其余各团根据驻地条件，就近开辟生产基地。旅政治部文艺宣传队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还排演了秧歌剧《兄妹开荒》。首次登台演出即在部队引起强烈的反响，激发了人们艰苦奋斗，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的革命热潮，我那时也会哼几句歌词呢。旅部警卫班有一个才解放过来半个多月的俘虏兵名叫薛再清，年仅十七岁，为了多开荒地，超过他人，有天晚上等全班同志都熟睡后，悄悄穿上衣服溜出门，扛着镢头跑到地里，趁着月光开荒。当指导员查铺发现他的铺盖叠得很整齐，而人却不在时，还以为他开小差跑了，便备马追寻。后来在地里找到他时，他已完成了一天的任务。七团七连一班班长张治国，三十三天挖甘草一千五百八十斤，创造的价值可供三人一年的全部费用，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荣获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六位中央领导亲笔题词的奖状。八团二连战士郝树财，日开荒四亩三分，创边区个人日开荒最高纪录，被评为边区甲等劳动英雄，以“气死牛”之雅号，誉满边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亲自给他奖励了纪念品和一把镢头。

通过大生产运动，使部队得到很大锻炼，改进了部队的思想作风，增强了全体指战员的体质，改善了官兵关系，提高了战斗力，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巩固了边区，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支持长期抗战，准备对日大反攻，积蓄了物质力量。

当毛主席听取了我放大生产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后来，毛主席还亲笔为我写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题词。

时光飞逝，延安时期的那段历史距今天已经将近五十年了，毛主席离开我们也已十七年，但毛泽东思想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同毛主席在一起的情景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忘。毛主席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毛主席的丰功传绩，润泽千秋。毛泽东思想就象一颗永不陨落的北斗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是在它的正确指引下，给束了在茫茫黑夜里苦苦求索的历史，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王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茫茫大海，莽莽荒漠，靠北斗星指引方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科学。

难忘的教诲

陈先瑞

1993 年 12 月 26 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岁月流逝，往事依旧。每当我回想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转战南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心中就更加激起对他的深切思念。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我有幸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多次向他汇报工作，当面聆听他的教诲。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三次找我谈话，他那亲切的教导和深切的关怀，令我终生难忘。

一

1937 年下半年，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相继开赴抗日前线。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我们红七十四师留在西北，先改编为一一五师留守处，后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我担任团长。部队改编不久，我就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在职参加学习。毛主席第一次找我谈话，是在 1937 年底。当时，我刚到抗大学习不久。有一天中午，校长办公室通知我，让我下午 3 点到毛主席家里去。接到通知后，我心里既兴奋又紧张。见一见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当面聆听他的亲切教诲，这是我心中盼望已久的事情。现在，眼看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突然而来的喜讯，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下午 3 点，我准时赶到毛主席的住地。我刚进门，毛主席便迎上来，握住我的手，从我的籍贯、年龄到家庭等情况，详细地作了询问。毛主席说：“你叫陈先瑞，国民党的报纸把你的名字写成‘陈光瑞’，不管是‘先’还是‘光’，反正你在陕南坚持斗争挺有点名气，在国民党那里是挂了号的。人家动用几万军队围攻你们，就是没搞倒你们，这说明国民党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一万大洋，你知道吗？一万大洋可不少啊！”毛主席谈起我的情况如数家珍，使我感到很惊奇。看到我吃惊的样子，毛主席爽朗地笑了。

我在桌边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毛主席在桌子对面坐下，从旁边的书堆上拿起一包烟，点着了一支抽起来。趁这个机会，我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屋里的陈设既简单，又朴素，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条凳子，毛主席坐着的一边靠墙堆满了书和书箱。毛主席穿着一身旧的灰棉衣，高高的个子，头发往后梳着，看上去根本不像我想象中的领袖人物，而是很简朴，很普通、很实际的一个人。然而他那魁梧的身材、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宏亮浓重的湖南口音却又给人一种很不平凡的感觉。

毛主席在谈话时，有说有笑，妙趣横生。在他的感染下，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轻松愉快，毫无拘束感。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说：“鄂豫皖边区闹革命是比较早的，出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你十五岁就当红军了，也是一个红小鬼呀。”接着，毛主席又问我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时期和长征中的情况，以及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情况，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你们在陕南干得好，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进攻你们，你们不但没垮，反而发展壮大了。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他接着又说：“我们过去天

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现在有了陕甘宁这块根据地，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

最后，毛主席又问我参加抗大学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困难。我说，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自己是有决心学好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党决定办抗大，就是要有计划地把高级干部调来培训。现在，我们有很多红军干部，革命信念很坚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实战经验，但就是理论水平不高，文化学习不够，军事理论素养较低，光实干，不会讲，不能写，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挥艺术，这是不行的。我们办抗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批批来，一步步提高。你这次来学习，也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的。你们部队的任务很重，好在离部队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随时回去处理。你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联系过去的斗争经历，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在谈话中，毛主席涉及的范围很宽，从人类的进化到天文地理，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旁征博引，纵论古今。他虽然什么都谈，但又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他那渊博的知识启发你，使你有一种求知的渴望，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通过谈话了解、熟悉和教育干部，这是毛主席教育干部的一种艺术。

我们从下午 3 点一直谈到 5 点多，毛主席才站起来说：“就谈到这里吧。请你来作客，就要给客人饭吃呀！”于是，警卫员把饭菜端了上来。饭吃得很简单，一晕三素，外加一盘辣椒。毛主席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说：“菜不好，但要吃饱，到我这里作客可不能饿着。”晚饭后，我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今后常来作客。

在返校途中，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回想起和毛主席谈话的经过，我感到深受教育和鼓舞，从心眼儿里更加尊敬、热爱毛主席。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以优异的成绩报答毛主席的关怀。

二

1938 年 5 月的一天，我刚听完课回来，就接到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这是毛主席第二次约我谈话。

接到信后，我立刻就向主席的住所跑去。毛主席见我来了，放下手上的文件说：“别急，坐下来谈。”他先向我详细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然后严肃地说：“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接着，毛主席又说：“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的、公开的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斗争的尖锐复杂

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到这，毛主席站起来，一边在屋内来回踱步，一边说道：“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作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接着，毛主席又提高了声音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等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说到这，毛主席有力地挥了一下手，又用很和缓的口气说：“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毛主席的这一番话，使我对当前的斗争形势，特点看得更清楚了，心里顿时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和毛主席告别后，我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并结合这一反面事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深入的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

我们部队自从改编为留守部队后，一直在陕甘宁边区执行任务，先后担负过为第十八集团军运输物资，护送前后方来往的干部，接收训练青年学生，配合兄弟部队抗击日寇的进攻，参加几次对国民党的反摩擦斗争。但是和前方的部队比起来，仗打得少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求战情绪十分高昂，都盼望开赴前线，多打几个胜仗。

这一天果然让我们盼到了。1944 年 10 月的一天，上级通知我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接到通知后，我立即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一进门，就看到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干也来了。毛主席向我招招手，让我坐下，然后笑着对我们两个说：“你们不是早就想到前方去吗？这次就答应你们的要求。中央决定，尽快在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决心把警一旅二团（我带过的部队）和七七〇团放出去。这两个团都是红军者部队，在西北搞了七八年，这回要老虎出山显显威风了。”

讲到这里，毛主席又向我们分析了河南的形势。当时，河南的形势十分紧张。1944 年 4 月以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会战，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在河南的 40 万大军不战而逃，使郑州、洛阳、许昌、南阳等 30 余座城镇沦入敌手。为了驱逐日军，开辟中原抗日根据地，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联系起来，中共中央于 7 月发出了向河南进军的命令。9 月，由太行军区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第一支队，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进入日军占领的箕山、嵩山地区。尔后，又从太岳军区抽调两个团进入陇海路、新安、渑

池地区。中原李先念部也派部队向西进入嶝岈山地区，这次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组成河南军区，进军豫西，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

在分析了形势之后，毛主席强调说：“河南地处中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关系到能否把华中、华北和陕北联系起来的战略全局。因此，你们肩负的任务很重要。”接着，毛主席又向我们交代了具体任务。他说：“你们这两个团改编为两个支队，你们各率一支，迅速进入伊川、登封、妆阳地区，战略目标是三点、（开封、郑州、洛阳）、一线（陇海线）。这两个支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红军骨干多，部队素质好，战斗力强。到达预定地区后，要迅速扩大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站稳脚跟。脚跟站稳了，就有了开展工作的根基，就能打开局面。”

我们到河南去，统一归河南军区领导。毛主席知道我们了解河南军区个别领导人犯过错误，对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信心不足。因此，他语重心长地说：“有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中央的方针还是团结教育他们，给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改正的机会。犯错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们会改正错误的。你们去后，要尊重、服从河南军区的领导，主动工作，注意团结，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好这一任务。”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争情况，毛主席还告诉我们可直接向中央汇报。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警一旅二团改称豫西第三支队（又称第三分区），由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担任地委书记。我率三支队进入豫西以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河南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粉碎了日寇发动的“扫荡”，很快在登封、汝阳一带站稳脚跟。不久又进军伏牛山，在伏牛山东南地区，成立了鲁山、南召两个县级政权和 5 个区的区政府，使两万多人口获得解放，南召是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地盘。我部进攻南召时，高树勋派代表前来要求谈判。为了团结抗日，我带领一个班亲赴谈判地点，与高树勋进行谈判。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报的协定。这一谈判结果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这次谈判，还为后来争取高树勋部在内战前线起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开辟了豫西敌后抗日根据地。毛主席已经和我们永别了。在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之际，回想起毛主席对我的谆谆教诲，倍感亲切和温暖，更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缅怀。当前，我们正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要在有生之年，为谱写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贡献力量。

毛主席关怀人民海军建设

刘道生

每当我回忆人民海军在艰苦中创业、在战斗中成长、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生前十分重视人民海军建设，他离开我们虽已 17 个春秋，但他有关海军建设的亲切教诲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

1949 年 1 月 8 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提出：“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同年 3 月 24 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并勉励起义官兵做“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1949 年 4 月 23 日。在强渡长江天险的人民解放军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的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百余年来屡遭外国侵略者从海上入侵的中国，开始建立了一支人民自己的海军，这是中国历史伟大转折关头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推动下，国民党海军纷纷起义，投入人民怀胞。1949 年 5 月 18 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给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官兵复电中，称赞他们的起义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它说明“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勉励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为了勉励起义官兵，毛主席于 1949 年 8 月 28 日，在北京接见了华东军区海军领导人张爱萍和原海军高级军官林遵等人，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林遵等人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指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奋斗。”毛主席还坚定他说：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能够把海军建设起来的。1949 年 9 月 21 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不几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给国民党海军“长治”号军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又把建设海军与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联系起来，勉励起义人员“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接着，毛主席给初建的华东军区海军作了“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的题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主席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百忙之中，对人民海军的建设作了这么多的重要指示，可见他对人民海军建设的重视。

毛主席不仅为新创建的人民海军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而且亲自选定人民海军领导机构的主要成员，确定人民海军的地位，建设规模和办公地点。

1949 年 10 月中旬，在人民空军的筹建工作基本就绪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了当时还在湖南工作的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对萧说，

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我们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的意见。当萧劲光表示自己是个“旱鸭子”，不懂海军，且晕船挺厉害，担心不能当此重任时，毛主席笑着说，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成天出海！我给你配个得力助手，给你当副政委（毛主席当时所说的这个助手就是我）。并意味深长地说，20 多年来，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派谁去当司令员呢？你俩（指萧劲光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懂得我军的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们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我看选定你们来当司令，还是合适的。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要搞海军就总得有个人去领头。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还嘱咐萧劲光：回长沙后，继续抓好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调海军的事等待中央的正式决定。大约在 12 月中下旬，中央军委来了电报，明确指示：“为统一管理措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为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允许由原兵团直属队抽调部分机关与干部，以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基础。”接命令后，萧司令员先我离开长沙赴京，我一面移交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还在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部大门口挂上海军司令部的牌子，招收青年学生参加海军建设。1950 年 1 月 12 日，军委发布了任命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的正式命令。1950 年 4 月 8 日，毛主席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令字第二号命令，任命刘道生为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4 月 14 日，我们在北京借用协和医院的礼堂召开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4 月下旬，毛主席又签发任命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为海军副司令员的命令；6 月，任命罗舜初为海军参谋长，这就是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前后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

在组建海军领导机关工作中。首先碰到的两个问题。一是海军领导机关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战略决策单位，还是军委总参的一个业务部门？二是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哪里？是设在北京，还是设在沿海的某一个城市？围绕这两个问题，争议比较大。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当时的许多筹建工作难以进行，而且关系到海军的长远建设。我和萧司令员反复研究这两个问题，我们借鉴苏联和美国海军的经验，认为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人民海军的建设必须从长远着眼，我们海军的领导机构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而不能是一个兵种，更不是一个业务部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这样才能及时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同对，便于和军内外各有关部门密切联系，及时洽商解决问题。因当时在高级领导同志中有不同意见，我们由萧劲光司令员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陈述了以上意见，聂总给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挂了长途电话。毛主席回话说，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毛主席访苏回来后，萧劲光又当面请示主席。毛主席问：“你们机关搞了多少人？”萧司令员回答：“大约九百人。”毛主席说：“人不多嘛。海军是个决策单位，应该在北京。没有房子，可以自己盖，你们写报告，我们来批钱。”海军是个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北京。这两个重大问题是由毛主席决策才确定下来的。

海军是一个技术密集、非常复杂的军种，建设人民海军，需要大量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人才，因此，抓好干部的培养，重视知识和人才，是海军建设的关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早在 1949 年 5 月就决定：“ 以黄河部队（原“ 重庆 ”号舰员）为基础，组建安东海军学校。 ”安东海校在 5 月份就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授命由辽宁省政府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兼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主任的张学思负责，在原安东海校的基础上，筹办第一所正规化的海军学校。为此，并派张学恩赴苏联考察，参观苏联海军学校，聘请苏联技术专家。经张学思四处奔波并与苏联顾问多次商议，学校的校址、学制、教员配备、招生人数等问题迅速得到解决。1949 年 11 月 14 日他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的报告，聂代总长据此于 11 月 16 日向毛主席呈送了《关于海军学校问题》的报告，毛主席接到报告后当日批示：“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阅后退聂。 ”11 月 22 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在大连创办海军学校。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下达了为海军学校选调学员的指示，强调“ 此次学员选调关系我海军建设工作极大，请中央局切实负责保证。 ”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关怀下，人民海军第一所培养水面舰艇基层军官的正规学校在大连诞生。我们仅经过 70 天的准备，于 1950 年 2 月 1 日正式开学。该校及时地为人民海军培养了急需的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机电等专业技术人才。

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我们迅速把海军各级和各方面的组织机构建立和健全起来，同时开办了大连海校、航空学校、炮兵学校、鱼雷快艇等学校。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边打边建，突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初步组成了一支有一定护航能力和运输能力的海上力量。1950 年 5 月，人民海军广东江防部队在协同陆军解放万山群岛战斗中，以我仅有的 10 余艘小型舰船击沉击伤敌舰艇 10 余艘，并缴获各种舰船 10 余胳，创造了人民海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光辉战绩，毛主席当即电令嘉奖：“ 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例，应予学习和表扬。 ”

1950 年 8 月，海军召开了首次建军会议，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我国当时的国情出发，讨论海军三年建设计划，制定了海军建设方针，确定了“ 从长远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和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以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 ”。但在当时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有不少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军有了空军这个独立的军种，可以担负起海空的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成立航空兵；有的甚至举例讲国民党海军也没有航空兵。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海空作战和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同特色，舰艇在海上作战如不能随时得到空中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我们要从长远着眼，从现代海战的特点出发，要建立一支足以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海军，不能没有海军航空兵。因此，我们从创建海军开始，就把海军航空兵建设作为重点发展的兵力之一。

1952 年 1 月 8 日，海军给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副主席并聂荣臻代总长呈送了《一九五二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尽快组建航空兵的领导机构和部队。毛主席批示同意，并指示从空军陆续抽调几个驱逐机师给海军，并把沿海几个固定的机场拨给海军。海军造了向苏联购买 343 架飞机的预算，周总理批了 232 架，批语上写着“ 拟同意海军的空军顾问所提出的

海军的空军建设方针”，并请苏联顾问“回国后，先向其海军当局试谈一下，看他们在原来帮我们的海军三年计划外，是否再送一批空军器材。”毛主席批示：“照周批办”。就在这年 4 月，海军航空部成立，任命曾克林为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命顿星云为海军航空兵司令员。6 月，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成立，曾克林兼任师长。从此，海军航空兵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部队。

人民海军创建之初，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是缴获和接收国民党的各种旧装备。这些舰船性能落后，陈旧不堪，为执行战斗任务，我们一面积极进行抢修，一面改装从香港或国内各航运公司购买的商船、渔船。但仅此是远远不能满足海军发展需要的，而国内自行研制生产，当时条件很不成熟，因此，向国外购买，就成了武器装备的另一个来源。起初，我们通过香港向西方有关国家购买舰艇、设备和材料，但在 1950 年下半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禁运政策，我们只能向苏联购买。毛主席对此十分关心。早在 1950 年 2、3 月间，他就两次批准为海军签订订货协定，为海军购置装备的总金额达一亿五千多万元。1950 年 10 月上旬，毛主席就海军 1951 年的军事订货问题亲自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说：“为使更快地巩固中国国防，我以中央政府名义，请求帮助增加顾问、教官，及 1951 年计划中所需舰艇、飞机、武器、装备。”并列举了当时希望得到的订货数字和顾问、教官人数。1950 年底，毛主席还亲自打电话给斯大林，提出为海军购买两艘潜艇。

在现代海战中，潜艇占有突出的地位。1950 年冬，萧劲光司令员在苏联考察，向苏联海军部门正式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训练潜艇艇员的要求，苏方答应了。回国后，海军报经中央和军委，向苏方正式提出这一要求。1951 年 3 月，苏方决定帮助我们训练四艘潜艇艇员，海军即组成了潜艇学习队。1952 年 9 月下旬，海军将在青岛建设第一个潜艇基地的方案上报聂代总长，并转呈军委主席、副主席审批。11 月，军委即将原川北军区直属机关的 500 多名干部战士调归海军，海军便把这支力量用来筹建潜艇基地和潜水艇学校。1954 年 6 月，旅顺潜艇学习队学习结业，独立操纵的两艘潜艇就是毛主席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购买的。从开始成立潜艇学习队，建设潜艇基地，直到这支部队建成以后，一直得到毛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1958 年，毛主席还发出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号召，为人民海军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及日臻完善指明了方向。

在人民海军建设初期，曾经有过一种意见，认为海军的后勤工作，统一由各地陆军部队联勤领导就行了，海军没有必要成立各级后勤部门。借鉴苏联海军建设的经验，海军于 1952 年 2 月 26 日，给毛主席和周恩来、彭德怀副主席并总参、总后领导写了《关于后勤组织问题》的报告。彭德怀副主席看了以后，于 8 月 2 日给毛主席写信，提出：“海军后勤建立垂直系统，直属军委联勤，不经大军区，减少层次似相宜。”8 月 3 日，毛主席在彭副主席信上批示：“同意这个意见”。自此，人民海军单独成立了各级后勤部门，有了适合自己特点的保障体系。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主席十分关心海军建设，但由于抗美援朝，加之国家的财力有限，因此，海军的发展计划一再改变。毛主席作风很民主，亲自来海军做工作，讲清道理，使我们愉快地服从中央决定。

1952 年 2 月 14 日下午，天刚下过大雪，突然接到空军电话通知说，毛主席到了空司，马上要到海司。当时，海军司令部在建国门内路北一个新建

的院子里。放下电话，萧劲光司令员即令警卫员到门口去看看情况，没有想到警卫员刚下到楼梯口，毛主席就到了。我和萧劲光等海司领导赶到楼梯口把毛主席迎进来，陪同毛主席一起来的有罗瑞卿、刘亚楼等，我们向首长们敬了礼，然后一起到司令部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坐下。当时海军参加会见的其他领导伺志有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罗舜初。毛主席望着室外的皑皑白雪，兴奋地说：瑞雪兆丰年，看样子今年是个好年景！交谈中，毛主席问及当时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情况，随后，郑重而又亲切地对我们说：“今天，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现在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我们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来计划了2亿卢布，准备再给海军购买几艘驱逐舰，几十条鱼雷快艇，但这样外汇就不够了，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国内的钱有，不成问题，就是外汇不够。”事关抗美援朝大局，国家财力有限，毛主席又亲自来做我们的工作，我和萧劲光当即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空军、海军都是党的军队，就这么办，把有限的外汇先给空军买飞机吧！在场的其他几位海军领导同志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就这样说定了。国内的钱，有。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打下个基础。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过去不是造过一千多吨的船嘛。”我们说，江南厂，还有其他一些造船厂，都可以造，先造几十吨的小艇。去年青岛造船厂就已造出了几条小艇，今年打算让江南厂再试制几条大一点的。毛主席听说国内船厂可以造小艇，很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造小艇、来得快，花钱也不多，还能起作用，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大约谈了一个来小时，毛主席离开海军司令部驻地时，我们并没有组织夹道欢送，但海军机关的很多人员都自发地站在院子里等候，怀着兴奋的心情欢送毛主席。

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主席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他乘坐“长江”舰由武汉至南京沿江而下，四天三夜同船员们一起航行，一起生活。在视察中，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对水兵们说：“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同志们要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海洋。”他反复用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教导大家，他说：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谈到当时国际斗争形势时，他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有了军舰，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干，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视察中，他在为“长江”、“洛阳”、“南昌”、“黄河”、“广州”五舰题词时，接连5次都题写“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由此可见其含义之深。

1953年底，我经罗荣桓主任批准，带队去苏联军事院校学习。

1956年9月，我从苏联临时回国，列席党的八大会议。此时，我们的国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海军也走过了初创阶段的艰难历程，我感到由衷地高兴。一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大草坪上照相，毛主席见到我，笑着对身边的同志说：“这个小青年，现在也长大成人了，你在苏联学习怎么样？”我向毛主席简要地报告了学习情况，毛主席听后勉励说：“你们学习很艰苦，也很努力，要好好学习，回来建设我们人民的海军。”看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孔，聆听他的教导，我不禁想起红军时期见到毛主席的几次情景。

长征前夕，我刚十八岁，从红军大学调到红二十二师当政治部主任，守卫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那时，部队刚刚丢失了筠门岭，更由于执行“左”的错误政策，失去了人民群众支援。周子昆师长、王开湘政委、孙毅参谋长和我几个新到任的干部正感到束手无策，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南线，到我们师搞调查研究，告诉我们如何纠正“左”的错误的做法，主动出击，巩固阵地。当时，他鼓励我：“你这个小主任，要好好干。”

到了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四川懋功附近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兵强马壮，我们衷心为革命队伍的壮大而兴高采烈。万没料到，不到两个月，当我们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带领下到达班佑时，已经到达阿坝的张国秦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命令在右路军的原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川康，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幸亏徐向前同志反对，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避免了两败俱伤。为实行原定计划，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得不带领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到哈达铺。

哈达铺，暮云低垂，天色阴沉。零零落落的几处篝火，几处炊烟，没有欢笑，没有歌声。我们全都知道了红四方面军不再北上。红一方面军原已受到重大损失，剩下不足一万人，又留下一部分部队在左路军中，本来很少的部队就更少了。尽管走出了长征最艰险的路段，但大家心里都像被什么堵住了，为革命队伍的分裂而痛心。有些同志由此觉得革命胜利更加遥遥无期，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来到队伍前。毛泽东同志讲话了，他脸色苍白，头发长长的，人显得更瘦了，但嗓音还象从前那样亮亮的，听起来叫人安心，使人感到亲切。他说：“我们北上是正确的。陕甘宁有一支红军部队，有块根据地。到了那里，我们就到家了，就有了立脚之地，就能发展、壮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要吃亏的。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很好的。我们现在北上，就是要起火车头的作用！有我们带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定会跟上来的。”说到这里，他挥了挥手，加重语气，越发肯定地说：“是的，不出一年，他们一定会跟上来的。”

时隔一年，果真如毛泽东同志预言的那样，红四方面军跟上来了，红二方面军也长征过来了。就在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后不久，一天，我接到通知去见毛主席，在毛泽东同志住的窑洞里，我见到张浩、聂洪钧同志。张浩同志真名林育英，新从苏联回来，是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的代表，这时，已担任党中央白军工作部副书记、党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我向毛泽东同志敬礼后，他连声说：“好，你们三个人都到了，有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三人齐声说：“请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说，“为帮助红二方面军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决定派你们三个同志到红二方面军去，在张浩同志领导下协助他们做好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说到这里，毛主席停了停，看看我们的反应后继续说：“你们到红二方面军去，最紧要的一条就是要多讲人家的好处。过去，我们对待红四方面军有错误，错在有人讲他们的缺点多了。你们去了，不要讲人家的坏话，多看人家的长处！”这时，我插嘴说：“我是从红六军团调中央红大学习的、也算是红二方面军的。”毛主席听了，笑着说：“你对红二方面军的同志熟悉，那就更好了。”毛主席又嘱咐了我们许多要注意的事情，并要我们去当时任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同志那里领受具体工作指示。想到这里，我深深感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心中充满了

对毛主席的无限敬意。1957 年 8 月 1 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央军委决定海军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接受中央领导同志检阅。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正在青岛开会。一天，萧劲光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青岛陪伴一位中央首长。我问是哪一位，他告诉是毛主席，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在青岛，我经常陪毛主席去游泳、散步。有一次，我陪毛主席在萧劲光同志的住处吃饭，萧对我说：“今天这顿饭的菜和海参是毛主席带来的。”吃完饭下楼时，毛主席说：“现在一些右派，想和共产党轮流执政，闹翻天……”我们当即向主席表示：“我们海军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陆军为基础，以工农为骨干，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建立起来的。我们海军是人民的军队。”毛主席说：“希望你们把海军抓好。军队要起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军队是党领导的，靠得住，海军是好的。”一次，我跟萧劲光司令员去向主席汇报工作。在介绍了青岛基地建设和这次阅兵的准备情况后，还扼要地汇报了海军建设的基本情况。当说到海军经过近 8 年的建设和训练，装备方面有很大进步、技术、训练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这次在青岛举行的海上阅兵，海军的主要兵种空、潜、快都要出动时，毛主席很高兴，当即表示要看看海军。十分遗憾的是就在阅兵的那几天，主席患了感冒，未能亲自到海上检阅，毛主席便委托周总理代表他在 8 月 4 日上午检阅了海军青岛部队。当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海上阅兵式结束不久，毛主席在感冒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又接见了青岛基地大尉以上军官，并和大家一起照了相。

从海军建军开始，毛主席就十分强调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萧劲光提出了建设海军的一些具体意见。有些同志认为海军建设花钱多，不大赞成，毛主席说：“不要着急，我是始终主张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但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 1958 年的一次会议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提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照耀下发展海军，建议经过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建造 40 万吨战斗舰艇，其中包括导弹艇，鱼雷艇若干艘，和其它一些中小型舰艇。有些同志要批评我的意见，毛主席郑重地说：“刘道生的发言可能急了一点儿，但要保护他的积极性。他主张发展 40 万吨，这个数字并不大嘛。打个比方，蒋介石的海军象个蚊子，风一吹就把蚊子吹跑了。我主张要把人民海军建成‘海上铁路’。”毛主席的讲话，不是针对我个人讲的，是他对海军建设的关怀和支持。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关心人民海军建设。1975 年 5 月初，他对海军领导同志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说到这里，他伸出一小指头。5 月底，我们以海军党委名义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个海军发展规划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由此可见，建设一支强大海军是他的一贯思想。

毛主席对人民海军建设的关怀是令人难忘的，他对海军建设所作的重要指示，对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整个国防建设都有重大作用。我们今天重新回顾毛主席的指示，缅怀他老人家对人民海军建设所倾注的心血，就更应该加倍努力，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人民海军事业！以此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崇敬怀念之情。

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

吴冷西

从《先锋何在？》谈起

1957 年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后不久，5 月 18 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我得到通知赶到毛主席的卧室时，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常委）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这是我年初出国访问（1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主要是考察英国、法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通讯社）归来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的气氛还是和过去一样融洽、随便。

我进门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脚靠左一边，紧挨小书桌坐下（可以说，这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书桌写点什么）。毛主席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我问：“你看过 5 月 13 日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我回答说，“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主席说，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的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毛主席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

一、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毛主席说，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 3 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 1955 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致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二、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毛主席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三、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毛主席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

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四、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 3 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

毛主席原来靠着床头斜躺着，这时直起腰来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看来现在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都是适应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象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四十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对西方报纸封锁我们的消息举了许多实例，也谈到了西方许多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也不刊登。大家还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我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范围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着又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 年关于农业合作

化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 2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 4 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这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毛主席说，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

毛主席说，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展开时讲的。当时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过 3 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首先鸣放起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从 5 月 16 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国新闻界代表人物开座谈会，征求对新闻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座谈会的意见，发表在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新闻界存在三条路线，并指出归根到底是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新闻学、新闻观点、新闻政策。

在这以后，6 月间展开了反右斗争。新闻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有些批判扩大化了，绝对化了，是错误的，其恶果是伤害了许多有才华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许多人错划成右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他继三天前（5 月 15 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篇文章之后，专门谈新闻问题，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党内一些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必要的但不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毛主席这次谈话，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当时的各种议论，他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并认为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可以使我们认真改进新闻工作中的缺点。这次谈话在新闻理论和工作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政治家办报

6 月 7 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

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这里指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 5 月 25 日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主张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并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在这以后，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怅”，辱骂他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 6 月 6 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毛主席谈到这里，话题一转，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 3 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 月 10 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很严厉，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 4 月 10 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 4 月 6 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

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在毛主席以上谈话过程中，我想了想我去人民日报不适当。这时我插话对毛主席说，我从 1941 年以后就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至今，离理论工作比较远，对学术、文艺很不熟悉，很难承担起人民日报这样多方面而又很繁重的宣传任务。

毛主席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批评我犯了党内一些负责同志“怕教授”的通病，讲了一大段话。但他没有在当时就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说，这件事情今天不作决定。要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十天以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 月 8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十天，6 月 13 日晚，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没等我坐好就开门见山地问我：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人民日报？

我把那几天想到的理由说了一遍，再三强调我不适宜负责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希望中央在决定之前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谁知毛主席听了之后一面摇头，一面很干脆地说：没有什么要再考虑的了，中央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晚就要去。你先以胡乔木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央再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担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 4 月 10 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 2 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 3 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 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作系统的宣传。

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

谈到这点意见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主席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

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主席还就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说的理由也是实情，开始可能有困难，以后会好起来的。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 年 4 月和 12 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 1956 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1957 年 4 月 30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对他们讲到他想辞去国家主席。事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他要从 1958 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 月 8 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 年 12 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 年 4 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主席说，有了这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主席接着逐条作了解释，讲了很长的一大段话。

说完了以后，毛主席就要我当天晚上跟胡乔木去人民日报上班。我当晚去了，同乔木一道安排第二天（6 月 14 日）报纸的头版版面（因为有一篇社论，题目是《是不是立场问题》，还有一篇编辑部文章，就是毛主席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安排好之后，胡乔木叫我当晚不要上夜班了，等明天跟邓拓同志谈了再说。

实际上，我 6 月 15 日晚上才开始以乔木助手的身份去人民日报上班，任务是管新闻报道和版面的安排，看八个版的大样。我看了把意见告诉胡乔木，

由他决定如何改动并签字付印。社论、学术文章和文艺稿件，仍由邓拓同志负责。

6 月 28 日晚，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才正式决定我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第二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

7 月 3 日，邓小平同志在居仁堂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各部部主任以上负责干部讲话，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并勉励大家团结互助，通力合作，办好人民日报。

冷静的促进派

1958 年 10 月 25 日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我原以为，大概是谈发表毛主席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两周前毛主席要我和田家英把《世界知识》杂志编辑的毛主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加以补充（主要是增加 1957 年和 1958 年的言论），并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一个按语，在报上发表。加以过去几个月中，从 8 月下旬炮打金门、马祖开始，毛主席十分注意国际问题，所以我想大概是谈这方面的问题。

当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田家英已在座，手里拿着我们编好的关于纸老虎的言论的大样和按语。田家英先给我看了经毛主席修改过的按语，主要是修改按语最后一段。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篇文稿在 10 月 27 日发表。

处理完此事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谈国内问题。

接着，毛主席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 11 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 12 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他要我们 11 月 5 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 8 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赫鲁晓夫 7 月底到 8 月初访华），不久又发生金门打炮。毛主席说，他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他列举了一连串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谈了他的独特见解。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他指出人民日报在金门打炮事件过程中有一篇社论偏离了中央的方针。（详见我写的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严师的教诲》，载于《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

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

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 10 月 1 日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缀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这是在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 1958 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这次谈话以及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一再告诫我，要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涉及的问题较多，时间也较长，一直到中午过后。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饭。饭厅就在北房五开间的中间堂屋。可能是预先告诉了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他四个菜是湖南腊肉，豆鼓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较特别是一个苋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这是最后吃的，也是毛主席的习惯，有时代之以烤红薯。毛主席喜欢吃饭时喝一两杯酒。这天喝的是茅台酒，第一杯是主席请我们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饭过程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

从毛主席住处出来，我同田家英商量一下，就分头找人组成调查组。我在北京挑选了三位记者，又请河南分社选一位记者在新乡等候，正好两男两女，连我在内一共五人。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 10 月 28 日乘火车离京南下，当天抵新乡下车。我们

同新乡地委商定，第二天开始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的一组先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

我和记者们 10 月 29 日一早上路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十三万五千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里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同我们谈他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后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 245 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配，农副业和工业、手工业产品也全部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们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热情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 900 万斤，到 10 月底只收到 159 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谈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的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的疑问和顾虑。

我们在 11 月 1 日从修武转到新乡县（田家英同时也从新乡去修武）。那里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一县一社，只挂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每年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 5 个大队 79 个生产队，人口 3 万，耕地 9 万亩，年总收入 1218 万元，是新乡县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实行的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 78 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那时就是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别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 800 多人，1900 亩地，总收入 31 万元，人均分配达 104 元（1957 年即为 96 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工炼铁去了。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 4000 户、2 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 15 个营 50 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

行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 224 户，开始时有 150 户男女老少都分开住，现在仍有 60 户集中住在八个地方，男女各住四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原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社员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做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11 月 5 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在新乡稍停。田家英也从修武回来。下午，我同他一起到毛主席专车上去。毛主席正在听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同志的汇报，他叫我们到郑州后再向他汇报。我同田家英晚上商量好：到郑州向毛主席汇报时，可以先扼要介绍一下修武和七里营的情况，然后着重谈所看到的公社化后的问题，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的问题，主要是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和七里营的十六包的问题。

11 月 6 日，我们随毛主席到郑州。当晚毛主席就要我们到专车上去汇报（他外出视察工作时常食宿在专车上，有时甚至开会也在专车上）。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我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谈到：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末，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谈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 42 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每人 21 尺布、2 斤棉花、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织不做了），共 18 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 2 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 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 10 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 1 次戏，6 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在我们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

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

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 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 4 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毛主席在我们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毛主席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

毛主席从 11 月 6 日起主持郑州会议，否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十五年至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后一文件提出 1972 年要生产二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不要再议也不要修改，搁置起来。

从 11 月 8 日到 10 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湖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剥夺农民，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郑州会议原来是为武昌会议作准备），就在 11 月 11 日乘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在专列上，毛主席 11 日又邀集河南十一个县委书记（信阳、南阳、洛阳、开封、商丘、登封等）座谈，11 日晚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五百多人，多则三千多人，难以应付。13 日毛主席又找信阳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八小时睡眠、四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 14 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他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 14 日接连开到 20 日，实际上是调查会。14 日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主席没有到场的我们事后都向他汇报了。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办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问题。后来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调查会，一个重要的用意是要我们上一堂调查研究的课，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学习实事求是。

武昌会议从 11 月 21 日开始，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 40 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 15—20 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 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第二天（11 月 22 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 月 22 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中央 1954 年撤销中央局一级组织后，1958 年 6 月又基本上按原中央局管辖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每区设组长和副组长一二人）。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 1959 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

3000 万减为 1800 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求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 12 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写令状，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 1959 年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 40 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 15——20 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 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第二天（11 月 22 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 月 22 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中央 1954 年撤销中央局一级组织后，1958 年 6 月又基本上按原中央局管辖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每区设组长和副组长一二人）。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 1959 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 3000 万减为 1800 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求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 12 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 1959 年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侍，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宠，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存理。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

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毛主席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 70 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 60 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 65 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 12 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 41 年，我们才搞 9 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

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 40 条（按：指 15 年至 20 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两亿吨到四忆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这次谈话谈得很直率，有时甚至相当激动。看来可能是经过下午同各大区组长的谈话，思想相当活跃，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深夜。

最后，毛主席要我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并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快些。我告诉他：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毛主席先提出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接着又考虑到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田家英提出，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我看可行，毛主席也同意这么办。

这样，我 23 日飞回北京，当天向参加国内分社会议的同志和新华社、人民日报部主任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当时我考虑到毛主席谈话中涉及一些重大决策与具体的人和事，没有全部向大家传达，而且传达时要求大家只记总的精神和要点，不要作详细记录。所以后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档案中都没有完整的记录。幸好毛主席 22 日深夜谈话的主要之点，有些在 21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已讲过，有些在 23 日会议中也讲了。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其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 1959 年计划，规定钢产为 1800—2000 万吨，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 900—1000 万吨，但仍然太高（1959 年 6 月颐年堂会议才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降为 1300 万吨）；粮食产量指标仍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虽然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但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毛主席从 1958 年 11 月初郑州会议起就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认为是“左”的偏向，这次谈话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这个过程经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到颐年堂会议（1959 年 6 月 11 日），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段（7 月 1 日至 15 日），前后历时八个月，都是纠“左”，都是毛主席带头来纠，这是很不容易的。可惜的是，庐

山会议的后半段，毛主席错误地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是始料不及的。无论如何，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对于我国新闻工作，实际上也关系其他工作，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襟八方带五湖控万里引三军——跟随毛泽东同志的几段往事

冯文彬

悠悠几十年，风云过眼，有些竟已完全忘却了。但与毛泽东同志接触的那些往事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因为，只有这些往事，才使我真切地感到，我的生命力实实在在地嵌在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永恒的历史四边形之中了。

“四一二”以前，我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四一三”反革命事变后，我们这些曾公开活动过的共产党人陷入极大的危险（当时我由于组织罢工斗争、在工人联合会工作的身份暴露，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活动难以开展，中央决定派我们去参加红军。

因此我从上海先到香港。在那里主持工作的聂荣臻同志原是准备让我去广西参与百色起义的，这时，我们听说中国红军第四军已经到了广东潮汕一带。

我在上海时便已知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洪湖、鄂南、海陆丰、黄麻、琼崖、平江等起义的英勇壮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挺、贺龙、彭德怀等人也早就成为我们白区工作人员景仰的对象。特别是红四军的战斗经历更是时时地激动着我们。现在听说红四军到了潮汕地区，便请求聂荣臻同志派我去红四军。聂荣臻同志请示上级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到潮汕、丰顺根据地的当天，正有一支红军部队从山下开过。在我们的要求下，东江特委连夜安排我们下山去参加了这支部队。恰好这支部队正是红四军前委所在的部队。陈毅同志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就把我留在前委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激聂荣臻同志和陈毅同志当时的安排。因为正是此次去潮仙才使我在中国革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关头，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同志指引中国革命战胜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所言所行所举所止。

丢报纸，毛泽东批评

有件往事，至今犹如在我眼前。那是最初跟随毛泽东同志，随同红四军前委行军时发生的一件小事。

有一天，毛泽东同志生气了。

毛泽东同志平时总是平易近人的，特别是对普通战士和老百姓更是和蔼可亲。可这次却跟一个挑夫发了火。

原来，挑夫丢了一捆报纸。

挑夫是个农民。对他来说，吃饭的家什、睡觉的行李、办公的用具，应当是这位大个子“毛委员”的“细软”。至于那一捆报纸，差不多都是看破了边、划满了道道的，没啥子值钱的。所以部队离开宿营地上路时，他就把这捆报纸丢在了宿营地，也没跟谁打招呼。等到毛泽东跟他要报纸看时，他才傻了眼。

毛泽东很生气，指着挑夫批评起来：

怎么搞的嘛！那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丢下不要了？所有重要的文件、报纸，是一件不能搞丢的！你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就扔了它们？那些报纸对我们红军是多么重要！

说老实话，从前我们也没有把报纸当做什么“重要文件”，何况那上面尽是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共匪”的胡说八道。这次听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在心里不断地嘱咐自己：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别弄丢了什么，特别是别搞丢了那些宝贝的“烂报纸”。但是，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批评还在后来的战争中。那些报纸，对于我们的确很重要。毛泽东从那里面了解到许多政治、经济、军事的形势，以及军阀混战等情况，为制定红军对敌斗争的战略和战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襟八方带五湖　控万里引三军

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一直把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看成是红军胜利的最关键因素。红军每打到一处，毛泽东都要让政治部和前委的工作人员到邮局去、到旧政权的办事机构去，尽量地找近期的报纸，不管是全国一级的报纸，还是地方办的小报，他都要。他要从中了解中国的形势，世界的形势，当然更要了解根据地区域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不仅重视从文字资料中了解情况，也同样重视从当地各种人物的嘴巴里深入了解情况。每到一处，我们常能看见毛泽东同志和当地人交谈。有时是当地乡绅，有时是衙门里的差役，有时是普通的老百姓，有时是旧监狱里的看守。

我记得，这些人在最初见到毛泽东时，都有些拘束、紧张。因为关于红军的谣传很多，关于毛泽东的谣传也很多。可是毛泽东象聊家常似地与他们交谈，渐渐地他们就没有拘束和顾虑了，都很愉快地和毛泽东交谈。

这种交谈，有时在清晨的饭桌旁，有时在傍晚宿营的院落里，有时就在行军的途中。现在我一想到与毛泽东最初接触的日子，脑海里就出现毛泽东穿着普普通通的，没啥气派的红军装同当地人交谈的情景。毛泽东那身发旧的红军装，上衣的前襟都挺长，敞开后，时时飘动起来。行军时，外面还常常加上一把雨伞，或者一条干粮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我的脑际，毛泽东那衣襟飘动的情景总是和唐初四杰王勃写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名句叠印在一起。王勃用“襟带控引”几个字形象地描画了南昌故都的重要地理位置，说它关联八方、牵制天下，居一地而连通万象。我觉得，毛泽东那飘动的衣襟，不也总是连动着中国五湖四海的革命风云吗！我想，正因为他能够襟八方带五湖，控万里引三军，才能使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毛泽东坚决地说：长沙不可再攻

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及时准确地把握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他认为，了解情况是制定正确决策的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从这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我党注重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的渊源。

的确，革命战争时期，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多方面掌握的情况，审时度势作出的。

1930 年，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留下的空隙，各地的革命暴动接连不断，革命形势又向高潮发展；然而这也助长了我党“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

抬头。李立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红一路军（红一军团）赶往长沙与以那里撤出来的红三军团会师，再一次攻打长沙。结果因敌众我寡，猛攻不克。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抵制了李立三的三攻长沙的命令，率领部队，主动撤离长沙。转战赣南根据地，使红军免除了一次厄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下，伤亡很大，毛泽东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拖下去，可能有被大批敌军包围，受重大挫折的危险。于是我们从长沙战斗中撤走。敌人也没有拼命追。走到株州，我们从邮局搜到了中央给我们红四军写来的密信。信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三军团已经占领长沙，一军团包围南昌指日可下，希望你部迅速占领湖口，向左保障武汉暴动胜利，向右直接进攻南京，以夺取全国胜利。

最后，密写信上还说要派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到红四军来。目的当然是督促执行此项命令。

我们把这封密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召集前委领导一起商量。毛泽东坚决主张不能再打长沙。因为那样的话，长沙不能攻下，反而会被包围。毛泽东主张部队原地待命，等待长江局代表周以栗。

当时，我在前委任特务大队政委，未直接参与领导们的商议，但是从毛泽东、朱老总等人商议、争论时的神色中，我也感到形势的严重。长沙显然不可能再攻，但是那封密信，又以其绝对的权威性压在我们这支队伍身上。部队的厄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厄运。因此，我和每一个人一样，都感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是生与死的决择。

我们等待中央代表的到来，焦急、不安。大家在心里嘀咕着：这位周代表会是什么样子？前委能说服他吗？说服不了怎么办？

毛泽东似乎也很焦虑，他更多地让我们收集所有搞得到的情报，更频繁地催促我们查找有用的材料。

几天之后，周以栗找到了我们。于是毛泽东开始了那场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对周代表的艰苦费力的说服工作。不仅毛泽东与他谈，其他领导也与他谈。最初争论不休，气氛很激烈。开始周代表态度很坚决，要部队执行命令。后来周代表渐渐地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两人出来进去地谈着话，还时常笑起来。当传出消息说不再打长沙时，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周代表终于被毛泽东说服了！

于是部队北上打下靖安，随后又放弃靖安回师南下，攻克吉安，向宁都、兴国开进，进入赣南根据地。

毛泽东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判断形势，阻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使红军摆脱了错误和困境，占据了主动，扩大了队伍，鼓舞了赣南根据地人民的斗志，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半架电台

哲人们说，历史是由无数的小珠子串起来的，很必然，也很偶然。想想红军的历史，也确实如此，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也是由一颗颗具体生动的小珠子串起来的吗？它们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永恒地放出异

彩。

下面要讲的往事便是这样的一颗小珠子，我把它叫做“半架电台”，我与它的关系也是既必然又偶然。

我们的战士，多数来自农民，不用说电台没见过，就是象样的武器也很少摸一摸。打长沙时，在文家市我们曾缴获了电台，可战士们不懂得它的珍贵，硬是将它给砸了。前委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下达一个专门通知，让所有部队今后注意，缴获了电台，一定要好好看护，不准破坏。

不久，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我们从张辉瓒部缴获了半架电台，俘虏了几个报务员。

为什么说是半架电台？因为它已被炮火炸坏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半架电台，在反“围剿”时起了大作用。

得了电台，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他非常重视，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同志为队长，我为政委。大概领导觉得我来自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熟悉这玩艺。其实，我也一窍不通。不过那时年轻，不管组织上让我干什么，我都敢作。

我一边做这些俘虏的教育工作，一边鼓励他们修电台，很快与他们取得相互信任。一天，兼任报务员的王诤同志对我说，电台肯定修不好了，不过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它的接收功能还好，可以收到敌人部队之间的呼叫联络，通过这些呼叫，便可以知道敌人各部队的位置。他问我，要不要把这些呼叫记下来。我想，这太好了，这不是最重要的情报吗？于是，我赶快让他接收，并要他们不断接收，任何呼叫都不要漏过。

当我急急忙忙地把第一份接收来的情报送给毛泽东同志时，他高兴极了，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同志，你知道，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给敌人当参谋长了。你们干得很不错，回去奖收报员两块大洋，买些鸡子，犒劳犒劳。

后来，还是因为这半架电台，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我。

那是在一场战斗刚刚胜利结束以后，部队马上转移了。由于我们需要整理电台、充电机这样的笨家伙，耽误了一会时间，便和前委大部队拉开了一段距离。

战斗刚结束，山林中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我看大部队已经走远了，很担心我们无线电队与那些国民党残余碰上。我们人少，如果遭遇上，电台就可能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于是我命令大家原地不动，等安全时再走。结果我们赶上前委大部队时已经迟了一天。

看见我们回来，毛泽东把我叫过去，劈头便问：怎么搞的嘛？为什么掉了队，出了问题怎么办？

看他脸色特别严厉，我一时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向他解释说，是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才掉队的。

听了我的解释，他批评的口气缓和了一些，“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早讲，出了问题岂不贻误了大事”。说完，他立刻命令从特务大队调一个排的兵力，专门负责无线电队的安全。

挨批评时，我觉得有些冤枉，可听见这道命令，我心里立刻高兴起来，看来，毛泽东同志是真的重视我们哩。后来，我军又缴获了完好的电台，地下党也从上海搞来一台较先进的。但对我来说，还是对那半架电台有感情。它，是红军成长壮大的标志之一；是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巧妙穿

插、打破敌人“围剿”的见证；它，也可以说是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排头兵。

人们说，岁月太匆匆，如电如川；而往事陈陈，如梦如烟。其实，这如梦如烟的往事中，有些也会象镜子一样，岁月越磨，它越清澈。因为岁月磨去时间的短暂，却保住了历史的永恒。与毛泽东同志接触的往事，对我来说，的确意味着历史的永恒。当然，我一生中与毛泽东同志有联系的事情并非只是这么几件。后来在大渡河边、在延河两岸、在西柏坡、在北京城，我与毛泽东同志还有许许多多的接触。我现在这里讲的往事，只是回忆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侧面，回忆了他注重调查研究、注意及时准确掌握多方情况的工作作风。

我觉得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英明之处。

（李正荣、郝一峰整理）

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

谭启龙

1993 年 12 月 26 日，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他老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17 年了，但他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并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进。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全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我们应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现将我接触到的有关毛泽东同志深入调查研究的几件往事回忆整理出来，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之情。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是 1933 年夏天。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主持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我在中央苏区马列学院高级班学习，因为入学前曾任湘赣省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家乡是永新县，便以永新县贫农代表的身份，荣幸地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时，苏区中央局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王明等人不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不调查，不研究，根本否认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推行了一系列极“左”路线。他们在土地革命中采取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将地主“扫地出门”，遣送白区，或从肉体上消灭，以及不适当地削弱和打击富农的错误做法，还严重地侵犯中农利益，迫使苏区一些地主上山为匪，或跑到白区成为反革命骨干分子，严重地扰乱社会秩序，并且增加了富农对革命的不满，影响了中农的革命积极性。为了纠正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召开了这次会议。

我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听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报告。他身着褪了色的灰布制服，清瘦的脸庞，有力的手势，显得神采奕奕。他的报告说理透彻，分析精辟，深入浅出，生动具体。作报告时还不时地使用各县方言和群众语言，听起来通俗易懂，显得格外亲切。他的报告，强调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系统他讲述了如何在农村划分阶级，完整地提出了党在农村的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主张限制富农经济，但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对地主阶级进行消灭，但对地主本人则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分得一份土地从事耕作，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他一再强调联合中农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农的向背，关系到土地革命的成败，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要团结他们向地主作斗争。这样，就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恶霸地主。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为了解各县情况，还亲自作调查，主持召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他坐在小方凳上，同各县贫农代表亲切交谈，问长问短。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大家感到非常温暖，毫无拘束。他向我们小组作调查时，首先向我询问了永新县人口及土地分配情况，然后微笑着问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他又问我：“你家住在永新县什么地

方？在家时干什么？”我说：“家在永新县象形乡黄塘村。三岁时父亲死了。十岁时母亲被国民党民团打死了。姐夫将我抚养了一年，后因生活困难，把我送到一个富农家放牛。十四岁参加革命。”毛泽东同志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并勉励我说：“放牛娃是雇农，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呀”。这句话，像一股暖流，通遍我的全身，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毛泽东同志在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这一时期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为我党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依靠准、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使党能够联合农村中占人口90%的贫雇农和中农，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条正确路线为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参加八县贫农团代表会议不久，我便离开中央苏区到湘鄂赣苏区工作。红军主力长征后，我在湘鄂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转战于华东数省，十几年一直没有见到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在浙江省委工作，1952年春在杭州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他还能记得我的名字，并说我是“放牛娃”、“红小鬼”。从此以后，毛泽东同志经常到各省检查指导工作。我也常到北京开会，当面聆听他老人家教导的机会也就多了。毛泽东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他曾经说：你们在地方工作，要特别注重调查研究。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运用调查研究这个武器，分析问题，制定政策，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依据。他多次对我说：你要搞好工作，就要了解实情，既要听取各级领导同志的汇报，也要深入下去，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掌握群众的脉博。要注意从四个渠道了解情况：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首先了解他自己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然后了解自己庄子里的生产生活情况，这些情况是真实的，可靠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教导我们这样做，他自己也带头这样做。他每年都多次到全国各地视察，经常走的路线是：乘火车从北京出发，经津浦线南下杭州，然后从杭州经南昌去长沙，再顺京广线北上回北京。有时也走相反的路线。沿途多次停车，或者找当地负责人上车汇报工作，或者下车到各单位调查。我在浙江和山东省委工作期间，曾多次上车汇报工作，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

记得五十年代初，我陪同毛泽东同志到浙江绍兴参观鲁迅故居时，他问我：以前来过这里吧？我说：来过，抗战时在这里打游击。他接着说：鲁迅有两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你记得吗？对待敌人就要“横眉冷对”，对人民大众就要做“老黄牛”。我牢记他老人家的这一教导，把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后来在上海买了鲁迅手书对联的影印件，至今一直挂在我的家里。

之后，在绍兴东湖农场参观时，毛泽东同志同随行的罗瑞卿、陈伯达等人谈论《红楼梦》，问我：你读过这部书吗？我答：读过一遍。他接着说：“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它里面有六条人命。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山东省营南县厉家寨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很差。1955 年建立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后，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战胜了穷山恶水，改善了生产条件，农业连年获得丰收。我们调查总结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毛泽东同志到济南视察时，我们将这个典型向他作了汇报。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批示：“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后来，国务院授予厉家寨大山农业社“ 英雄战胜了穷山恶水 ”的特等锦旗奖。从而为全国农业战线树立了一面旗帜，推动了当时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8 年夏天，有些地方在普遍成立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并大社，但对大社用什么名称拿不准，这时，河南省出现了人民公社的雏形，有两个典型：一个是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即全国第一个挂人民公社牌于的乡），一个是琅那山人民公社。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参观后，认为这个组织形式很好，便要省里管农业的书记去参观。我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也去参观。谭震林同志问我：“ 你们那里准备怎么搞？ ”我说：“ 我们没有经验，准备回去搞试点 ”。他说：“ 好嘛，按你们的意见搞吧！ ”回来后，我们选择办得比较好的历城县北园农业生产合作社作试点。8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参观河南的人民公社后，乘火车来到山东，先在兖州和泰安分别会见了济宁地委和泰安地委的负责同志，然后到了济南。我和裴孟飞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到北园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现省农科院）视察。在北园，当我汇报到“ 现在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 ”时，毛泽东同志说：“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在场的记者立即发稿，将这个消息通过《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迅速传遍全国，我也写了《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在短短的时间里，全国普遍办起了人民公社。在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毛泽东同志参观了农田的棉花，同从事农业研究的同志亲切交谈。当农科所的负责人汇报到把农业科研机构下放，在黄县、掖县建立小麦试点，在高唐、临清县建立棉花试点，在蓬莱县建立花生试点时，他很赞成这个做法，强调科学研究要面向基层，要为基层服务。

1958 年 11 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上，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尖锐批评。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送他审阅的《山东范县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材料上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 ”，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人“ 前去看一看 ”。会后，他们到范县去了一趟。毛泽东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 加一个‘ ○ ’（即 20 年）也不行。 ”这对当时刮起的“ 共产风 ”起到了遏制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颁发后，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基础问题，在干部群众中都有议论。为听取群众的意见，1961 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在历城县仲宫公社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会上，贫下中农代表问我们：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土地、耕畜、劳动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有矛盾，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应该放在头上（指人民公社）？还是腰上（指生产大队）？还是脚上（指生产队）？经过讨论，他们的意见是应该放在脚上。1961 年 8 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将反映群众这个意见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同志。他当时正在研讨其他问题，没有来得及看（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

也提到这个问题）。会议结束后，我向毛泽东同志请假，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老家——江西省井冈山脚下的永新县。在家乡住了两天，我便驱车登上井冈山参观。这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央有急事，立即回南昌，有飞机在等你。我立即打电话问汪东兴同志，他说：“主席有事找你，马上到南昌乘飞机来郑州。”我马上下山赶到南昌，乘上还等在那里的飞机，晚上 7 时赶到郑州。这时，毛泽东同志已去了邯郸。邯郸的飞机场太小，我们乘坐的飞机无法降落。我向中央办公厅请求改乘小型飞机去邯郸，中央办公厅没批准，并告诉我可以不去了。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到济南，要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同志，连夜赶到邯郸去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9 月 27 日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小范围的邯郸座谈会，就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听取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和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等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说：“看来还是放在脚上好。”29 日，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中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不应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而应是生产队。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调整，是对人民公社六十条的重大突破。

1961 年 3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对我们说，解放后十一年，我做了两次调查，一次是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出一本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每篇材料都看，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另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 34 个部门的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汇报，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

《高潮》一书共收集各省、市、自治区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6 篇，其中有山东的 10 篇。在这 10 篇中毛泽东同志加了按语的 4 篇。毛泽东同志对《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写的长篇按语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帐，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帐员。”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批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派人来学习，这对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十大关系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时说过：在处理这种关系上，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那种错误。他们片面地看重重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毛泽东同志接着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农业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他说：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厉害些，还是想得差一点？如果你是不想，那就打击轻工业，打击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想得厉害，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使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辩证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农、轻、重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把农、轻、重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后来他又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这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制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观点

十分正确。

毛泽东同志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用别人的话来说明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各地学生上街。工厂停产，批判干部无限上纲上线，大批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针对这些情况，在 1966 年 8 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在发言中提出“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明确地提出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讲到这里，特地对我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说：小谭，这是你和江渭清同志的意见。看来毛泽东同志从简报中看到了我的意见。1966 年秋，青岛市发生了学生同工人的冲突事件。当时，我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委，周恩来同志要我亲自去青岛解决问题。当时，我发现似乎有人在暗中策动崂山县农民进城“闹革命”，以使局势更加复杂化。我立即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力主中央不要让农民进城。农民应“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对此，毛泽东同志很快作了批复：谭启龙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通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这样，有效地避免了因农民进城可能造成的更大冲击事件。这是毛泽东同志善于倾听别人意见的例证。

毛泽东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正在继续指引我们前进。历史的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做，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违背这一原则就要受挫折，甚至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续和作风，在政治、经济、思想和党的建设方面，及时地研究解决了一些紧迫问题，取得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明显成效，深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进一步得到了弘扬和光大。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业正在方兴未艾地向前发展，全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们老同志已离开了第一线工作岗位，但值得欣慰的是：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已成长起来，毛泽东思想正照耀着后人前进。

回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

廖志高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冕宁，在石龙桥和县城里，我们冕宁地下党组织了欢迎，很多群众也自发地欢迎红军。5 月 20 日中午一位红军战士来石龙桥找我，说中央要我进城，我就同他一道由廖志源二弟送到了冕宁县城，住在我的继母家里。那位红军同志告诉我：有事会来通知你，你不要离开家。晚上即接到通知，要我七点到赵家开会，我刚到赵家，就有人将我介绍给毛主席，这是我从来未想到过的。第一次见到主席，我心情十分激动。主席叫我们坐下，当时到场的还有陈云、王首道、李井泉、王遵、黄映龙、陈荣檀等。我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只是静静坐着。只见毛主席边抽香烟边开始讲话。他说：今天找同志们来谈谈大渡河两岸的形势和你们的任务。形势是前后都有敌人，前面是川军阻拦，后面有薛岳追兵，正面是彝族。我们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是不容易的，但还是有办法的。最要紧的是团结好彝族，回旋余地还是很大的。这就要有策略。老红军有经验，新同志要向老红军学习，只要你们能团结，又团结好彝族，就可以把敌人拖住，你们还是可以在这里住下来的。当然还需要地下工作的配合。你们可以逐渐壮大自己，学习怎样对付敌人，学会打仗，敌人总是可以对付的。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团结自己，办法就出来了。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湖南同志，从未听到过湖南口音，许多话听不懂，只听懂了大概。毛主席说：同志们如何分工？由王首道、李井泉同志给你们谈，我就不说了。主席讲完后就先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然后李井泉又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让我留下来坚持地下党的工作，陈荣檀、黄映龙组织游击队。但是第二天，又决定我随红军北上，就这样我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北。

宣布战略决策

1947 年 3 月蒋介石决定抢占延安，命令胡宗南向延安进攻，国民党军的飞机对延安接连轰炸了数天。3 月 18 日我们开始撤离，19 日中央撤出延安。在延安时中央己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同敌人周旋。我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安子文告诉我，要我带几个人与中央一道留在陕北，直接听中央指挥。1947 年 3 月 21 日中央直属队 180 多人，成立了一个支队，任弼时宣布，由邓洁住司令员，师哲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下面成立四个大队。番号叫九支队。开始走时，部队太分散。第二天早晨，毛主席把师哲、叶子龙和我找去，问：你们是怎么搞的？一出发就把队伍搞散了，人也找不着。是谁搞的？问叶子龙和我，我两人只知道是奉命行事。他说：你们没有责任，照样工作。师哲就要负责、撤职。以后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委。随即下命令出发。到了一个小坝子，周恩来对我说：开支队全体大会，由你主持，毛主席讲话，会上，主席说：我们这支队伍很小，是精干的模范。我们的野战军也不大，但是我们留在陕北，就使敌人在其他战场无法增兵，胡宗南的部队被我们拖在陕北，敌人就无法增援山东等地。我们中央留在陕北，在这里，群众基础好，能保密，地形也好，敌

人的机械化无法发挥优势，我们可以脱离敌人。群众可以供给我们粮食，敌人则得不到，我们生活虽然苦一点，但群众的粮食不给敌人。我们不要怕，距离敌人一、二十里也可以跑掉的。同时可以逐步消灭敌人，争取一次又一次打胜仗，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杨家湾争论

在青化砭、羊马河战役胜利之后，我们到青羊岔，又到杨家湾，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敌人发现毛主席住的方向，由刘戡率一个集团军向我扑来，妄想消灭党中央。双方相距不远了，司令部下了命令：全支队向北，再向东转。但是迟迟没有行动。我到司令部去问情况，看到主席、恩来、弼时、子龙同志都在，主席正在发脾气，说：这是什么命令！完全符合敌人口胃。这正是敌人的想法，我们不能这样干，在这种情况下，下命令向北走，敌人追来时，就向东撤过黄河，这正中敌人的计，这样做是错误的，必须改变。我们的行动是要坚持留在陕北，这时不能过黄河。这时过黄河是违反延安决定的，我们过黄河，敌人就活动了，兵力就可随意调动了，这是有利于敌，不利于我的，现在要改变为向西行动。任弼时承认是他下的命令，他说：我这样办，是为了主席的安全，不致中敌人的计。这是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着想的，不是为我个人的。延安的决定我是赞成的，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处在危急时机，万一主席出了问题；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无法交待。主席说：你这样想也不现实，如果敌人兵力活动了，各根据地压力增加，我各野战军受害，他们的困难就很难想象。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全党、全军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办是错误的，必须改变。周恩来说：我和弼时单独谈谈再定，主席同意。恩来和弼时到另一个窑洞谈了十多分钟，回来对主席说：谈好了，就照主席的意见办。改变命令，向西走。主席说：就这样决定吧，敌人已离我们不远了，再扯就误大事了，那就由你下命令，到小河再说。当天，支队到了田茨湾，后来又到小河宿营。

主席决定我去西康工作

1949 年秋，中央在讨论进军西南时，谈到各省干部的配备问题，原来提的是另一位同志任西康省委书记。主席说：是否找一个本地人较好，因情况复杂，一个对当地较熟的人，了解情况，好办事。王维舟说：廖志高同志就是西康人嘛。主席说：廖志高就是西康人，对！就决定他去担任区党委书记、省主席、军区政委，这样好吗？大家都知道他，同不同意，都同意，就这样决定吧。会后，安子文通知了我，主席使用干部，很注意用了解情况的干部。特别是问题较多的地区，了解情况的人去工作是比较好办事的。

1950 年某次会议上见到毛主席，他问：你的家乡是何时开发的？我说不知道。主席说：是唐朝开发的。我又问：你怎么知道的？毛主席说：是看你们的县志。毛主席到什么地方就找那里的县志看，所以他的见识很渊博。

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民族干部

1955 年在中南海讨论到民族工作时，毛主席说：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民族

干部。做民族工作要注意培养干部，更重要的是按共产主义的标准培养，如果符合标准，这样的民族干部多有几个，这个民族就不会搞民族主义，而是搞共产主义。不搞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更不搞资本主义，这样这个民族的革命就不会变质。我当时在西康省工作，民族工作的任务也很重。这次会议的具体细节虽已记不清了，但主席的这段话却使我难忘。

回忆毛主席在河北的几个片断

刘子厚

我是建国以后在湖北工作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当时心情激动，又兴奋，又紧张，竟至彻夜无眠。1958 年 5 月调河北省工作，同毛主席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河北省环拱着首都，主席南巡，都要经过河北，常常在河北作短暂停留，找河北省委及一些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谈话，还在天津市、邯郸市和徐水、安国、成安等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仅从 1958 年到 1966 年，毛主席来河北就有 20 多次。河北省同毛主席接触过的各级干部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不下数百人，受过毛主席接见和检阅的群众达数十万人，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他老人家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范，在河北省的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 17 年了，我也年逾八旬，记忆力又不如前，但对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和谆谆领导，仍然觉得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特别是毛主席对河北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关怀，使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人民公社要划清两种界线

我调到河北省工作的时候，“大跃进”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农村中普遍酝酿着小社并大社。不久，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很高，干劲很高。当时面临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往前的路应该怎么走，大家都在探索。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于 1958 年 8 月 4 日到徐水是、8 月 5 日到安国县视察。在视察期间，听取了地委、县委的汇报，又同基层干部和社员进行了座谈。毛主席看了庄稼的长势很高兴，对群众的干劲很赞赏。他反复询问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总的感觉很乐观，但是对于过高的估产表示怀疑。当一个基层干部说一亩甘薯试验田要产到 20 万斤时，主席随口就说，能产到两万斤就不少了。在座谈中，他着重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变化、大社好还是小社好、社的规模以多大为宜等问题，征询大家的意见。当时正在酝酿办大社，有的已经把几个小社联成了一个大社。至于社的规模，很多人认为一个乡办一个社就行了。主席很风趣地问：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接着说，你们这里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就象《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过后才知道，毛主席这次视察是为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作准备的。那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央的这个决议虽然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还是“按劳取酬”，但是在下面的具体执行中，还是急于搞“过渡”。比较突出的是徐水县，当时正在那里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中央、省、地委都派人去了。

为了摸清真实情况、主席派出 18 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徐水县深入调查，发现了不少问题。10 月 16、17 两日，主席把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定县、唐县四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找到天津，听取他们的汇报。同时，把我从邯郸叫到天津。主席问我：“你到徐水去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去。”主席笑着对我说：“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我问主席：“调查什么问题？”

主席说：“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又问：“用一个星期行不行？”主席说：“用不了，三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我连夜组织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和正在参加地、市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同志共70人，到徐水县分别住进农户里调查了3天，21日简单地碰了碰各自的所见所闻，我和省委的几位同志赶忙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对我们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我们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两千斤，他们却说可以产八千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在汇报过程中，主席边听边讲看法和意见。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主席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主席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还明确指出“家俱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主席满怀深情他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1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最后，主席说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做起来，瞅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象什么都好”。当时，我们还不能完全领会毛主席谈话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帮助保定地委解决徐水的问题。直到11月初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以及随后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线，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着重批评了那种主张废除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主持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批评“共产”风错误的同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浮夸倾向。这时我才开始理解主席抓徐水具这个典型的意义。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我们认真贯彻《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毛主席1959年2月23日来到河北，在天津听取了省委关于整社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在谈到瞒产私分和原来的穷寓社之间有矛盾的问题时，主席说，瞒产“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个什么样的规律，可以分析研究一下。”“强调统一就吓住了，农民还是怕共产，……所以刚秋收后，就来了个瞒产私分，怕你拿走。”主席还指出，富社怕穷社吃“洋落”嘛？就是怕共产，强调“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没有差别就要造反的。光讲统一就行不通。”主席对省委要改变党代表会议时强调统一过多，现在只统必要统而且可能统的部分的做法比较满意，他先风趣地说：“你们在党代表会议时还没有摸底，那时强调统一，现在你们被农民说服了。”接着就明确指出：“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主席这次谈话以后到了山东，2月24日又给我写信要整社的文件。又过了几天，中央

政治局在郑州再一次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分析了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指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主要矛盾，并围绕公社所有制这个中心问题，从理论上、政策上展开了系统的论述。这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制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时，我才更加清楚地理解了主席在天津找我们谈话的深刻涵义，他既向我们作调查研究，又向我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脚上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虽然强调指出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批评了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一奖”（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的居多，或者只把生产权下放给生产队，分配权仍然掌握在生产大队手上。也有少数的实行“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由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定额包干，其余由生产队自主分配）。究竟怎样做好，我们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实行“分配大包干”好处很多，深受群众的欢迎。这些好处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解决了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而分配权在大队的矛盾，克服了大队统一分配所产生的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 1961 年 3 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三北会议”和随后毛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汇报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好处。这两次会议都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结论，广州会议以后，省委和一些地委的同志，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和试点。

这年的 7 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了“分配大包干”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赞成这个办法，也有少数同志有怀疑、有顾虑。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来到天津。我们向主席汇报了保定地区唐县岗完公社各生产大队实行“分配大包干”的情况：这个公社的各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除交国家和大队的以外，统由生产队支配，按照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公社粮食连年增产，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连年增加，牲口、猪羊肥壮，在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安排得比较好，没有发生浮肿病，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同时，我们也汇报了三级干部会议讨论的情况。主席认为“分配大包干”是个好办法，指示我们继续试行下去。

9 月下旬，主席又到邯郸，找山东省委、河北省委和河北的 5 个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主席先问我，你们想谈什么问题，我说还是上次说过的“分配大包干”问题。主席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主席对崗> 公社的分配办法很感兴趣，并且说：“三包一奖”算帐算不清，最后还是强迫命令定局。我说：“三包一奖”太麻烦，几个地委对这个问题都有调查，一年至少吵四次，吵得一塌糊涂，搞得复杂的有 37 道工序，49 个百分比，要算 1128 笔帐，简单的也要算 800 多笔帐，只能会计搞，许多大队干部文化水平低，弄不懂。说到这，主席说，这是烦琐哲学嘛？“三包一奖”不适应目前农村干部的文化程度。

为适应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得实行“大包干”。主席还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基础，也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主席研究这个问题非常细致，反复核对情况，并询问了不同看法和反对意见，亲自作了记录。最后，毛主席说，“六十条”（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就是缺少这一条。你们把那个公社（指崮> 公社）的“大包干”情况写个四五千字的报告，我批给省、地两级去试一试。这次谈话会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邯郸谈话会精神，研究了在全省普遍推广“分配大包干”的问题。这次会议上，我们摸了个底，全省试行“分配大包干”的约有 2700 多个大队，还有 4800 多个大队名义上是“三包一奖”，实际上也是“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有 7500 多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 15%。后来，随着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贯彻执行，在河北除极少数大队以外，都实行了“分配大包干”，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了脚上。

这年年底毛主席路过天津，又找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总结经验问题时，毛主席说：“过去搞过‘三包一奖’，搞过平均主义，搞过形式上的评工记分，取消地委，搞食堂，搞粮食供给制……，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但是非常宝贵，……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反面的经验。”

一定要根治海河

正当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进一步好转的时候，1963 年 8 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各河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 101 个县、市的 5300 余万亩土地被淹，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毛主席对河北这次遭灾非常关注，灾后的八个月里，四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的安排。毛主席问得很详细，包括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了灾，哪些县没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办，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有多少，采取了哪些救灾措施，等等。主席一边问一边嘱咐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讲清全国的形势，也要讲附近的情况，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等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的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激励我们说：“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当时衡水地区受灾最重，毛主席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之事，书经有载。”毛主席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 1949 年到 1963 年 15 年间，3 年大灾，5 年中灾，3 年丰收，4 年中收，受灾率分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毛主席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我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主席问了林铁、阎达开和我的年龄以后，深情地说：“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七十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

水治好吧！”当时，我们正在搞一个抗洪斗争展览，请主席为展览会题词，主席当即答应，接着又说：“我现在不作湖南人了，要作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过了五天，在 1963 年 11 月 17 日，毛主席挥笔题了七个闪光的大了：“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主席的题词，为根治河北水患、保障天津市和京广、津浦铁路干线的安全确定了明确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对河北的救灾工作和根治海河工程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多次听取汇报，并给予具体指示。灾后不久，李先念副总理就来到灾情最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深县农村，逐户了解群众生活安排情况。当即确定增调粮食，以保持农民的体质。同时还对县城的恢复作了具体部署。在国务院、华北局和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和帮助下，1964 年我们制订了根治海河的全面规划，1965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展开了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从这一年开始，在 1958 年以来已修建十余座大型水库的基础上，每年冬春都动员 30 万以上的劳力，按照统一规划，有步骤、按顺序地开挖中下游河道的工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期间，也一直坚持施工。当时正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年代，不少地方拦路设卡，武斗不断，但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方面，对于根治海河的车辆一律放行，根治海河工地上秩序井然。这固然是由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也由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经过连续 15 年的艰苦奋斗，到 1980 年，大规模排洪、排涝工程基本完成，共开挖、扩挖防洪排涝骨干河道 53 条，总长 3641 公里；修筑防洪堤防 3260 公里；修建各种闸涵建筑物 2331 座；架设各种桥梁 1114 座，总长 91700 延长米；完成土方、石方、混凝土方总工程量达 13.35 亿立方米。这些工程完成后，排洪入海能力由 4620 立方米/秒扩大到 24680 立方米/秒，提高 4.43 倍；排沥河道入海能力从 414 立方米/秒增加到 3180 立方米/秒，扩大 6.68 倍。根治海河工程使河北省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低洼易涝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处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市和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也从而基本免除了洪水的威协。当年经常受灾地区的干部、群众，至今仍然津津乐道根治海河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河北要粮食自给

河北自然灾害多，农业生产条件差，历史上是缺粮省分。1957 年是丰收年，粮食总产也只有 81.91 亿公斤，社会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过 223.19 公斤，还要靠中央调入 7.27 亿公斤粮食，才能安排下来。从 1953 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到 1981 年，不包括天津市，全省粮食购销逆差累计达 110.88 亿公斤，加上专项用粮开支和必要的储备，累计纯调入粮食 133.2 亿公斤，平均每年调入 5 亿公斤左右。遇到大灾年，调入粮食高达 15 亿公斤以上，就是这样，在六十年代农村人口的口粮也只能安排到每天 8 到 9 两，余粮地区全年口粮最高不得超过 210 公斤 城市人口依人定量,成年人每月只有 15 公斤，1961 年，实在过不去了，我到中央找周恩来总理要两千万斤粮食应急，当时全国都有困难，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踌躇再三，才下决心说：“就给你两千万斤”。当时，我看到周总理为难的样子，内心十分不安，深深地感到愧疚。那个时候粮食问题对河北是个巨大的压力，从国家来说，每年为河北大量调入粮食，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河北因为缺粮，使整个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我到河北的时候，曾听到一个说法：“北方落后”，还听周总理说过“河北农业落后”。当我感受到粮食问题的巨大压力之后，才理解到所谓“落后”，就在于自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毛主席对于河北粮食严重不足的状况十分关怀，每次到河北来，都要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引导我们研究发展农业的途径和措施，同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酝酿“八字宪法”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他多次他讲到：“河北省要保丰收，粮食问题还是水的问题。”指出河北的河网化不发达，要搞地下水，又谈到“农业上去首先要解决水、肥。水就是修水库、打井、洼地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要土洋结合。”1959 年 9 月毛主席到邯郸地区成安县视察的时候，明确提出了河北“粮食自给”的问题。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经历了三年暂时困难，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接下来 1963 年河北又闹大灾，粮食自给问题就暂时被搁置下来。经过了三年调整，到 1965 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这年的 11 月，毛主席到天津找河北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再一次谈到河北实现粮食自给的问题。当时，林铁同志和我汇报了省委计划五年实现粮食自给，想尽量上得快一点，争取三年解决。毛主席思考了一下，很慎重地说：“搞成了才算数。”我们汇报了各地上报的产量和来年的计划时，毛主席说：“粮食拿到手才算数。”我们理解，毛主席对河北实现粮食自给是积极鼓励的，但同时提醒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搞。

1963 年大灾之后，省委、省政府就反复、认真地研究了加快发展粮食生产的问题，认识到河北粮食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什么也发展不起来。1964 年确定了把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作为全省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和主攻方向，经请示华北局李雪峰同志同意，又经中央批准，调整了农业种植结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河北每年少种 400 万亩棉花，少给河北调入 5 亿公斤粮食。1965 年省委、省政府又确定以水、肥、机为重点，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加快发展河北的粮食生产。1965 年毛主席再次提出河北粮食自给问题之后，从这一年冬季开始，省里组织了“机井大会战”。周恩来总理坐镇邯郸，亲自抓河北的打井，掀开了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历史画卷。在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围绕着打井配套，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排灌动力机械和水泥生产，进而发展了钢铁、煤炭、化肥、拖拉机和汽车工业，逐步建成了比较配套的支农工业体系，从而强化了农业生产的基础。1965 年末，全省共有水浇地 2503.3 万亩，1970 年发展到 3877.76 万亩，1978 年底达到最高峰的 5334.09 万亩；农用排灌机械 1965 年共有 10.29 万台、8.23 亿瓦特，1978 年发展到 89.12 万台、73.72 亿瓦特；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 1965 年的 25.3%上升到 1978 年的 54.6%。农用化肥的产量 1965 年只有 3.38 万吨，1978 年达到 80.11 万吨，1980 年突破了 100 万吨大关。同时，养猪积肥也有很大发展，猪只年末存栏头数 1965 年为 772.88 万头，1975 年达到 1622.84 万头，以后一直维持在 1300 万头左右。基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地方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65 年，全省产原煤 2492 万吨（其中地方煤矿产原煤 170.9 万吨），生铁 38.46 万吨，钢 29·25 万吨，水泥 82.2 万吨；1980 年，原煤产量达到 5353 万吨（其中地方煤矿产原煤 1328.6 万吨），生铁 251.57 万吨，钢 190·59 万吨，水泥 549.82 万吨。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致使河北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回收，1970 年粮食购销顺差 2.96 亿公斤。从 1970 年到 1979 年整个七十年代，全省共生产粮

食 1446.67 亿公斤，收购粮食 204·06 亿公斤，销售粮食 207.04 亿公斤，粮食购销逆差总共只有 2·98 亿公斤。十年间有四个年份粮食自给有余，三个年份缺粮不到 0.5 亿公斤，只是遇到灾年才需要调入较多的粮食。这和 1953 至 1969 年 17 年间每年平均缺粮 5.48 亿公斤来比较，是一个明显的进步。1975 年中央开会时，我们汇报了河北当年粮食自给有余、生铁产量达到 178 万多吨，钢的产量突破了 100 万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听了非常高兴，他风趣地说：“你们成了上中农了”。姚依林同志听说河北不仅不向国家要粮食，还能调出一点，惊喜他说：“啊！河北改变性质了。”

河北从缺粮到粮食良给，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比原来设想的时间长多了。这固然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延缓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场动乱，河北实现粮食自给的进程会要快得多。

向群众寻求真理

毛主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也一再教导我们要注重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五十年代末，他就对河北省委的同志讲过：“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毛主席就是作调查研究的典范。他 1958 年到徐水、安国视察时，正值中伏，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农民已经“挂锄”，一般不下地干活了。毛主席到徐水县大青各庄，先看了俱乐部、缝纫部、卫生所、食堂、米面加工厂、敬老院、幼儿园、商店、猪场等生产、生活设施，又到田间看了庄稼，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到安国县流村视察时，下车后没有进村，而是顶着的人的烈日，一头钻进闷热的上稼地里，边看边问，走了个把小时，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才在干部、群众的劝说下，走进地头一个用苇席搭起来的小窝铺里稍事休息。他坐在一条窄板凳上，同当地干部和群众拉家常，作调查。1958 年 8 月毛主席到天津，在林铁同志陪同下，视察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在南开大学看了化学系的四个生产车间。毛主席对他们试制的“敌百虫”农药很感兴趣，问了农药的用途、用法，多少钱一斤，农民是否买得起。对他们实行勤工俭学给予了鼓励。随后又到天津大学看了学生的实习工厂，几乎在每台车床前都停留一下，详细地向学生们询问了吃得好不好，住得怎么样，觉够不够睡，还问了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对他们把学习与劳动生产结合起来表示赞许，并告诉他们注意劳逸结合。毛主席在作调查时，主要是看、问，听，问得很细，自己却讲得不多。他常常这样说：“我就是听听你们的，我没有什么意见，北京就是不产生意见的，开工厂没材料，等候你们的材料加工。”

毛主席十分平易近人，以一个真正的普通劳动者出现于群众之中。他有极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初见主席的人，往往心情紧张，甚至不知所措。可是，毛主席能够针对不同的说话对象，说几句很有风趣的话，或者在人名、地名上开个玩笑，使气氛很快轻松起来，让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而是觉得主席是那样的慈祥可亲，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到徐水视察时，问陪同的保定地委书记叫什么名字，是哪几个字，李悦农回答说是喜悦的悦，农民的农，主席笑着说，啊，你喜欢农民。在安国和一个社员握手，顺口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叫高增福，主席很亲切地说：

“你这名字很好，增福增寿。”在成安接见四个棉花姑娘，得知两个姑娘的名字都有“梅”字时，毛主席笑着说，邯郸有“二度梅”，你们也是“二度梅”。主席尊重人，体贴人，平等待人，给我们每个见到主席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悦农有一段身体不好，毛主席曾向我们打听他的病情，后来见到他本人，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我们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有时提出的问题我们答不上来，他很快就转了话题，从不使我们感到为难。在列车上找我们谈话，主席亲自在每个小桌上摆上一盒烟。在成安县道东堡接见棉花姑娘和当地干部时，在长条桌旁的正中间为主席准备了一把铺了毯子的宽大木椅，主席没有坐，他招呼棉花姑娘中的王素梅，让王素梅坐“第一把交椅”，让来让去，谁也没有坐。当时，送上切好的西瓜，主席亲手把一块一块西瓜分别递给四个棉花姑娘，还招呼坐得稍远的人说：“我偏了她们了，大家都来吃。”顿时，屋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和主席交谈起来，毛主席是很愿意多接触群众的。就是 1959 年这一次到邯郸，列车停在国棉二厂的仓库区。工人们得知毛主席住在这里，纷纷要求能和毛主席见上一面，毛主席知道了工人的这个要求，欣然同意，就在去成安视察之前，与聚集在道路两旁的四个棉纺厂的几千名工人见面。他没有坐已经准备好的敞篷汽车，坚持步行，边走边向工人们招手致意，走了几百米，直到群众队伍的尽头才上了车。1960 年 4 月底。毛主席到天津视察，随口问到“五一”节有什么安排，当省委的同志汇报准备在海河广场举行群众集会时，主席马上表示：“我也参加”。“五一”节那天，毛主席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和集会。游行的群众见面，兴致勃勃地看文艺表演，足足坚持了四个小时，散会以后才离开。毛主席的突然出现，使天津人民喜出望外，感到十分的幸福。

毛主席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主席几次到天津，都是住在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更衣室临时改造的房间里。我们觉得主席在天津住的很不方便，就为主席修了一处条件比较好的房子，主席知道以后，再到天津就不到市里住了，而是一直住在列车上。到河北的其它地方，主席为了不给当地增加麻烦，无论是严冬酷暑，都是住在列车上。主席吃的饭、菜十分简单，有时我们汇报时间长了，主席留我们吃饭，也是糙米饭和几盘小菜或大盘菜。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的生活更艰苦了，有一段时间他明确提出不吃肉，不搞鸡鸭汤，也不用味精，吃的菜里油也很少。那时几次到河北，只让地方供应一些蔬菜。当时主席年事已高，生活又那样清苦，大家都为主席的健康耽心，但又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由工作人员捉一些麻雀为主席改善一下生活。主席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毛主席在河北的革命实践活动内容非常丰富，以上只是我亲见亲闻的几个片断。就是在这几个片断中，都贯穿春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我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干部、群众，都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过去在指导我们的行动中已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后仍将长期地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缅怀与思念

白如冰

我初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 1935 年 12 月。

当时，为了解决中央红军的冬装问题，周恩来同志多次指示我们军委总供给部要抓紧落实。一天，我去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当我走进他住宿的院子时，看到一个身材高大、面庞消瘦的陌生人，他那宽大的棉军装上落着好几块补丁。这时，周副主席刚好从窑洞里走出来，看到我，笑着对我大声说道：“白如冰同志，你不认识他吗？”我摇摇头。“他是毛主席嘛！”经周副主席一介绍，，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毛主席。毛泽东的名字，我在 1928 年时就听说过，那时，“朱毛红军”的声望在陕北就已经流传开来。我记得，毛主席这次同我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总供给部尽快解决中央红军的冬装。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中，我在绥远、晋绥工作期间，曾几次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他的谆谆教诲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教育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

全国解放以后，我先后就职于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山东省。其间，同毛主席有过几次接触，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1956 年春，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达到高潮。在这一强劲的浪潮推动下，全国手工业系统已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有四百七十多万人，手工业合作社或合作组有十多万个，合作化比例达到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80%以上。当时，毛主席为了解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情况，分别召集三十四个部委的负责人汇报，我作为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也在其中。这年 3 月 4 日晚七时，我和贾拓夫（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主管轻工业、手工业）、邓洁同志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汇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参加听取汇报的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等同志。

我首先汇报了手工业系统资金积累的情况，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说：“按成本计算，利润率达到 7.5%，不算低，纯利 1.45 亿元，积累 2.4 亿元，纳税 1.2 亿元，很好。用收税的办法，国家有收入，合作社本身也有积累。”接着，我又汇报了我们组织铁器、木器合作社为农业服务和下乡修理农具的情况，主席说：“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你们。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是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当时，手工业合作化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绝大多数手工业者都进入了合作社。这时在合作化过程中产生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一些不具备集中生产条件的合作社被合并集中生产，特别是分散性较强的修理、服务行业撤点过多，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此引起群众的不满。当我汇报到这一情况时，主席插话说：“糟糕，现在怎么办？”彭真同志告诉他已经恢复了不适当撤掉的点时，主席打着手势，笑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

接着，我汇报了手工业合作社建立供销机构，专门从事采购、推销业务的情况，主席说：“你们直接采购原料，推销产品的办法，是合理的，这是陈云同志的那些办法，国务院作过决定的。”主席说完，转头问陈云同志：“他们的办法可行吗？”陈云同志点点头，说：“手工业自购原料，是合理的，手工业产品，除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负责加工订货的产品和选购的产

品外，手工业合作社自身进行供销业务，是可行的。”随后，我又汇报了我们在已组织的合作社中树立了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的情况，主席对此颇感兴趣，他说：“你们要在六万多个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各行业的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机械化的，半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那种书一样。”

时至晚十点钟，汇报尚未结束，主席提议休息一下，并留我们在他那里吃饭，进餐时，主席对我说：“你的汇报还可以，看来手工业的问题还不少呢！”饭后，我继续汇报。当我讲得快了，主席就提醒我讲得慢一点，我讲了一会儿，主席又说，我讲得太慢了，快一点嘛！

当时，有的地方党委对手工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的同志甚至看不起手工业，干部调动不容易，做手工业工作的一些干部也不安心。主席听到这一情况时，笑着说：“党委工作很忙，手工业排不上队。为什么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于是，我趁机向主席提出增派干部加强手工业领导的问题。主席说：“糟糕，我要你们汇报，你们倒将了我一军！”主席的一席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这时，邓小平同志在一旁对我说：“干部问题你可以找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同志去解决嘛。”

最后，我又汇报了 1956 年手工业产品分类计划和提高工艺美术品水平、保护民间老艺人的措施等。主席说：“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一切好的东西，搞掉的，都来一个大恢复。而且要恢复得更好一些！”他又说：“你们想办法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保护民间艺人，很好嘛！‘措施’妄赶快搞，搞得快一点，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办学院，召集会议，给予有名的老艺人以学术学衔。”

这时，虽已至深夜，但主席依然是精神饱满，兴致犹浓……。后来我才知道，主席听取三十多个部委负责人的汇报，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后，才提出了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三十多年过去，回想起来，当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认识手工业的重要性及其历史作用，如何排除手工业工作中受到的“左”的影响，如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优秀的传统艺术，如何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等等，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9 年的中国，在“大跃进”口号的冲击下，以高指标的浮夸风为特征的“左”倾思潮狂热地蔓延，人们的头脑也随之膨胀起来。

这年 4 月 13 日,毛主席来到山东济南的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生产大队视察。这时，我已离开中央手工业管理局调到山东省工作，有幸陪同主席此行。当我们驱车来到大辛庄时，看到田里的庄稼长势不错，大家都很高兴。此时，毛主席的心情甚佳，穿行在田间，一路谈笑风生。他的情绪也感染着我和在场的人。

在一块写有“典型田”牌子的前面，主席停住脚步，指着田里的小麦问陪同在身边的东郊公社书记郑松同志：“这里的小麦一亩能打多少斤？”“一千斤，”郑松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主席又转头问我：“白如冰同志，你看能打多少斤啊？”我说：“恐怕到不了千斤吧，但麦子长得的确不错。”他摇摇头，微笑着说：“好是好，不过，我看能打出五百斤就不错了。”听他的语气，我感到他对亩产千斤的数字并无兴趣，我赶紧说：“等到麦收之

后，我们向您汇报产量。”他说：“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一看的，”

9 月 20 日，毛主席途经济南，下车到泺口险工视察黄河。次日，我陪他再次来到东郊公社。在一片即将收割的玉米地里，他又提起五个月前所谈的话题。郑松同志的回答证实了主席的判断是准确的，小麦亩产只有五百多斤。在返回济南的路上，他的话语不多，他对我说：“这股风要注意啊，不要再听信那些话了。”他说起来很有些激动。

1960 年 3 月，党中央就反对官僚主义问题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指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两个文件中以山东为例，要求各地利用六级干部或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

5 月初，毛主席再次到山东视察工作，我向他汇报了山东的情况。汇报中提到目前有 70%的农民生活遇到困难，依靠国家的返销粮才得以渡荒。他听了之后，表情很沉重，只是问了一句，“能有那么多吗？”而后再也没说什么。在陪同过程中，我感到主席的心情不好，似乎有什么心事，听起汇报也不像以前那样专一，话也不多了。

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许多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此也已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今天反思起来，我感到，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不少重要的启示。

在毛泽东同志百周年诞辰的前夕，我仅以这篇短文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

（姚建平整理）

怀念毛主席

戎子和

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最伟大的人物。他作为我们党、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杰出领导者，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开始，在此后的多年中，我曾在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有幸得到主席直接的关怀和教诲。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激荡起我的不尽思念，往事如潮，涌上心头。

理解和支持财政工作

我从 40 年代初开始从事财经工作。无论是在晋冀鲁豫边区，还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或是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每一个时期，财政工作都得到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40 年代初，我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办副主任，当时担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和担任副主席的薄一波同志非常支持我的工作。40 年代末，我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同志也是十分支持我的。全国解放以后，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并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又得到主席、总理和陈云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当时，凡涉及财经方面的重大事项，都是由我们主管部门先提出意见，向负责中财委工作的陈云和薄一波同志汇报。中财委研究同意后，再送请总理和主席批准。特别重大的问题，还要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建国之初，一方面要继续肃清残敌，巩固人民政权；另一方面对旧政府留下来的数百万军政公教人员要收养；此外还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开支都十分浩大，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是十分严重的。1949 年 11 月，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分析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时讲：“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主席的这段讲话，既讲出了财政工作面临的困难，又给我们鼓了劲，增强了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教诲，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处理着各种棘手的矛盾。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公粮和城市税收。特别是公粮，这项收入在我们编制的新中国第一个财政概算中，所占比重仍然是占第一位的。这对农民来说，负担确实是很重的。但在当时特定的经济基础上，一时尚无法减轻，还必须由农民继续负担。

当时担任中南局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林彪对财政工作很有意见。一次，他从武汉来到北京，并向主席汇报说：现在财政上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那时，主席对财政工作心里是有底的。之后，主席把陈云同志叫去说“林彪来过了，他反映现在财政上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并要陈云同志布置我们就这个问题向主席汇报一次。不几天，

陈云同志带上薄一波、姚依林、南汉宸和我等到主席在玉泉山的住所向主席作了专题汇报。我们认为，在当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财政工作既要保证革命战争等各种供给，又要稳定市场，克服通货膨胀，还要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时期的财政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市场物价，农业税收及工商税收稍微重一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作法。听完我们的汇报后，主席明确表示："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支持你们。"听到主席这样说，我心里非常感动。主席对财政工作表示这样明确的支持，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我们汇报完工作以后，已接近吃饭时间，主席留我们一起吃饭。我感到很荣幸，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吃的是大米和豆子混在一起蒸的饭。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前夕，按照主席的意见，中央电示各地，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正是由于得到主席的理解和支持，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财政工作才得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平衡收支、稳定市场物价、克服通货膨胀以及统一财经的一个又一个成就，并为财政经济的全面好转奠定了基础。1950 年 6 月 6 日，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财政经济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经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1953 年 9 月，邓小平同志接替薄一波同志担任了财政部长，我在部里仍然分工负责预算工作。当时高岗担任国家计委主任，他在计划上开的口子很大，我们搞财政工作的只能拼命地挖掘潜力。当时担任财政部经建司司长的是赵子尚同志。这个同志业务上很强，很专于计算，我非常信任他。我让他打一个企业收入的预算，他打了一百亿。在研究 1954 年预算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就 1954 年的预算作了汇报。高岗发难说："戎子和，你这个预算是靠不住的。在研究 1953 年预算时你就哄中央，你现在还哄中央？！你这个预算指标也是虚假的，靠不住的[①]。"他说完这话后，会上还有一位同志也附和说："我看这个预算也有许多靠不住的地方。"两位政治局委员都表示反对意见，其他人不好说话了。主席盯住我问："戎子和，他们说你预算是虚假的，你觉得靠得住吗？"我当时很有信心，立即说："靠得住。"回答的口气是很坚决的。主席见我这样有把握，表示同意我们的预算。政治局会议也通过了。后来预算执行的结果，国家财政收入 262.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7%；国家财政支出 246.32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16.05 亿元。我们不仅完成了预算任务，而且还超额完成了任务。

倡导在党内建立好的文风

主席学识渊博，厚今博古。他不仅具有广阔的胸怀和伟大的气魄，而且十分讲究语言艺术，提倡通俗易懂的文风。无论是主席的讲话还是主席的文

[①] 高岗所说的哄中央是指 1953 年的国家预算，由于当时缺乏经验，不适当地把上年结余作为收入数打进去并抵作了支出，从而造成了财政资金的"一女二嫁"。

章，听起来、读上去都是通俗易懂、十分亲切的。我曾多次出席过主席召开的会议，聆听过主席的讲话。那潇洒的气度，诙谐的语言，生动的比喻，能使人们透过浅显的语言，领悟到其中包含着的深刻的道理，因此富有极强的吸引力。

主席对草拟文件的要求很严格，他提倡文字简练、文理通顺、通俗易懂，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限制地主的封建剥削。后来为了贯彻合理负担的政策，对农业税实行累进税率，这样，对地主、富农和地方粮多钱多者，实行的税率就比较高。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各解放区大都实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农村各阶级占有的土地大体平衡，这时对已实行土改的地区，利用税收调整阶级利益的意义已不再存在，而调整农民之间负担的问题突出了。因此，农业税实行比例税率，并按常年产量纳税，有利于激励农民努力耕作、提高产量的生产积极性。于是，1948 年 8 月，我们向党中央报送了《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草案）》，主席看到后，对其中将农业税由累进税率改为比例税率，将按实际产量征税改为按常年产量征税及降低免征点等做法感到尚好，便把一波同志叫去说：“现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都完成，新解放区的农业税很需要改革，你们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比较合适，你等回去再修改一下，以便中央批转各解放区参照执行。”

一波同志从主席那里回来后，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我们对《华北区农业税暂行税则（草案）》很快作了修改，又送呈给主席。主席看过以后还是不满意，他说：“你们的这个条例有些地方文字不够通俗，让外行人看不懂。”主席让一波同志再拿回去修改。的确，我们的条例行话太多，除了搞财经工作的同志以外，别人难以看懂。这回，一波同志把这个文件转给了杨秀峰同志（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请他找个不是做财政工作的同志，从文字角度把稿子再润色一下。杨秀峰同志把稿子交给了安志成同志。其实，安志成同志也曾搞过财政工作，过去还曾当过中学的国语教员，文字上比较好。经他一改，虽然文字变动不大，但通顺多了。杨秀峰同志让我再看一下，我认为改得很好。这个文件再送给主席，主席同意后即批转给各解放区。

诙谐、幽默，平易近人

毛主席是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所敬仰的一位伟大而杰出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免对他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其实，主席是很平易近人的，言谈中也时常带有一些诙谐和幽默。1952 年初，有一次我到中南海开会，会后，我们同在怀仁堂后面的食堂吃饭。当时，许多同志都觉得主席很威严，不太敢坐近。我则是个初生牛犊，什么也不考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边。主席看我坐过来，便风趣地说：“子和，我们今天吃的饭可全是靠你征收来的。”我当时年轻，脑子也反映快，随即回答说：“我们还不是执行主席财经方针和征收政策吗？所以，说到底还是吃主席的饭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

1952 年，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决定取消察哈尔省，把我们雁北十三县划回山西。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把雁北十三县划出山西，归属蒙疆自治政府，是当时日本人为分裂中国所搞的阴谋。解放后，我们仍沿袭这一局面。但我对此始终不赞成，虽然察哈尔省的同志对我很尊重。无论什么场合，我从来没有称过自己是察哈尔人，都说自己是山西人。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讲到

这个问题时，说：“这个问题呀（指雁北十三县划归察哈尔），连我们一些高级干部都想不通，比如戎子和……。”我一听主席点我的名字，吓了一跳。心想主席是不是又要批评我了。结果听下去才知道不是批评我，只是用我从来不称自己是察哈尔省籍人这件事来打个比方。我的心才放下来。

提倡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

主席是提倡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并认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同时，他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我觉得，主席的这个思想意义很深，包含着巩固关心和爱护干部队伍的用意。1953年，我在夏季财经会议上受到批评就是一例。

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重点是批判修正新税制工作中的问题。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个提法在当时是有些毛病、不太妥当的。而高岗则利用这一缺点发难，演出了一场“批薄射刘”的闹剧，企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新税制出台是比较草率了些，为了赶在1953年元旦前公布，没有来得及征求地方财政、税务部门的意见，也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甚至到新税制公布，都没有向主席汇报，听取指导，直到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后，主席“看报始知”。因此在一次会议上，主席很生气地批评了一波同志和我。

制定新税制，我没有直接参与，只是新税制最后定稿时送我看过，我没有看出问题。但我当时是财政部代部长、党组书记，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夏季财经会议以后，我受了处分，但仍保留副部长职务。我当时确实有些想不通，也不免有些思想包袱。邓小平同志到财政部担任部长工作后，还鼓励过我要放下包袱，不要消极。

大概是1953年底，有一天我到中南海去开会，见到主席吃完饭后独自一人靠坐在房前廊道的沙发上休息。他见我走过来，便招呼我说：“戎子和，这次财政部对你的批评你感到怎么样。”我说：“够呛。”主席微笑着说：“够呛？我看还不够呢！”接着又和蔼地说道：“你不要怕批评，只有好好地接受批评，以后才能做好工作。”听了主席的这一句话，使我非常感动，我抑制不住感情，眼泪夺眶而出，生怕主席看到，急忙扭过头去。我非常信服主席的这句话。我深深地体会到主席批评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提高认识，使我能做好工作，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呀！

（秦惠众整理）

永远不能忘怀的记忆

韩光

我是 1941 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全国解放后曾几次面聆他的教诲。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回顾我从渴望见到毛主席，到亲聆他的教诲，那些情景至今如在眼前。

一心向往

还是 1929 年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常听学校几位进步教师讲朱、毛在井冈山建立红军，领导工农闹革命的故事，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宣传“会剿”朱、毛率领的红军，然而总是剿灭不了的报道。1933 年至 1934 年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根本点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军民间的鱼水关系，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当时我任满州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中央苏区游击战经验，运用于抗日战场。从这时开始，我就日益加深地产生了向往朱、毛领导的红军的心情，设想如果能见到他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1935 年冬，共产国际调我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六次大会，因路途辗转迟到而未能出席，遂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这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陈云、邓发、高自力、滕代远等一些同志陆续来到莫斯科。他们经常应邀到东方大学作报告，讲红军的反“围剿”，斗争，讲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讲反“围剿”战争中“左”倾路线的错误及其带来的损失，特别是遵义会议最终结束了“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和极大的鼓舞。那时虽然对毛主席的伟大还没有直接的体会，但确实为中国革命有了英明的领袖而感到非常庆幸。

初见领袖

1938 年 5 至 6 月间，我从莫斯科回国，先到新疆，邓发同志把我留下，在八路军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1939 年 11 月间，被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来到了毛主席身边。当时，统战部部长是王明，副部长是柯庆施、南汉宸。统战部设党派科（友党科）、友军科、非党干部科、社会统战科等。我任党派科科长。党派科还设有一个传记委员会，专门负责撰写著名统战对象的传略，送中央和毛主席参阅。我曾写过张学良的传记。毛主席对送去的传记很重视，总是认真阅读，并做好批示，指出哪些写得好，有参考价值；哪些材料和观点存在问题，应当修改，等等。

我们统战部的住处在杨家岭后沟，与毛主席住的窑洞不过百米。一天早饭后，我去找赵毅敏同志。他是我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时的领导和战友，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到延安后因工作关系又与他常有联系。这天，在找他的路上，我刚转过山凹，就看到毛主席的窑洞前摆着十几张长凳，主席吸着烟，在窑洞前空地上散步。我当时多想走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握手啊。

但又想到，毛主席日夜考虑抗日救国大计，工作非常繁忙，不能去打扰他，想从旁快步走过去。但出乎意外，毛主席却向我走了过来，并向我伸出手。说真的，第一次与党和人民的领袖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我又兴奋又紧张，有点手足无措。这时毛主席已经握住了我不由自主伸出的手，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我耳边响起：

“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

我赶忙回答：“主席，我叫寒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毛主席又问：“是韩信的‘韩’吗？”

我说：“不，是寒冷的‘寒’。我正想改为韩信的‘韩’”。

主席风趣地说：“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诗说‘寒光照铁衣’嘛。”

主席又问我上过什么学校，做过些什么工作。我一一作答。

主席说：“好。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还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主席还说，统战工作很重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我们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时，一些领导同志陆续来到了毛主席的窑洞前，看样子是要开会。我赶紧向毛主席道别。赵毅敏来参加会了。我走过去与他打过招呼，来不及细谈，便离开了主席的窑洞。

这次见到毛主席并与我谈话近二十分钟。回来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和蔼可亲，胸怀又是那么地博大。有这样的领袖，我们的革命一定会成功的。从参加革命开始，我就向往苏区，向往见到党和人民的领袖。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

1941 年，全党整风进入准备阶段。

5 月的延安，冰雪已经融化，黄土高原已是层层新绿。中旬，中央决定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主席发表演讲。

一天，中央办公厅送来了出席会议的通知。其他几位科长都接到了出席会议的通知，却没有给我。那时听说会上毛主席要做演讲，就想：一定要去听听，我便去找柯庆施：“柯部长，别人都有会议通知，我也想去参加会议，不知是否可以？”柯庆施说：“按条件，你可以参加（当时规定，入党十年以上的科长以上干部均可参加）。这样吧，你写一个简历和申请，我给你送上去。”我按他的要求写好。柯庆施便把我的申请送给中央秘书长李富春同志。第二天，我便接到了会议通知。

5 月 19 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我聚精会神地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生怕漏掉一个字。毛主席的演讲，一个特点是不念稿子。桌上放着两三页纸，有时也看一眼。他总是立着讲，时而在桌前走来走去，举起右手作手势，引起听者注意。他讲得深入浅出，妙语连珠，虽然湘音很浓，可我都听懂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报告。会场上气氛热烈，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会心地笑声。毛主席在他的讲演中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理，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与革命

的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性的表现。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批评教条主义的两句话：“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那时我还不清楚毛主席批评的就是王明的教条主义，但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经历，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东北党组织执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做法的严重后果，确实感到毛主席的批评十分恰当和深刻。

当时，王明在延安兼着延安女大的校长，经常在女大讲课、做报告。延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去听，有时甚至因为弄不到听课证而懊丧。我们统战部的科长一般都兼着女大各班级的指导员，是每课必听的。王明每次去女大讲课，都是骑马（当时延安有马代步的干部并不多），还跟着副官、秘书、勤务员、马夫等，非常排场。讲课时，副官把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放在讲台。上。他一会儿翻开这一本引用一段，一会儿又翻开另一本讲一节，滔滔不绝。加上他从莫斯科回来不久，当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更带着一种高深莫测的架势。因此，不少青年知识分子都被他唬住了，觉得他很高明，懂马列，有学问。我对他张口闭口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条条，也觉得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联系到所经历的党的地方工作和军事斗争的情况仔细回味他的报告、讲课，总觉得对不上号，似乎什么问题也没有讲出所以然来。

我早年在东北工作时，正值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那时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不考虑东北已经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矛盾处在第一位的实际，仍要求东北和中央苏区一样的搞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脱离了群众，给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是有直接体会的，因此，当我听到毛主席的讲话，是那样联系实际，生动活动，脑筋大为开窍，深感教条主义的危害。当时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听毛主席讲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学习历史的论述。毛主席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听过《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之后，又听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使我受益终身。这期间我还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两篇光辉著作，越读越感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改造思想的最正确、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并且觉得学习这些著作不是读一两遍就能读懂和领会运用的，而要联系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去读，做为座右铭，工作中反复去读，才能逐步学会掌握运用。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要一辈子做到底的事。

要挤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又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们的国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最初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一开始，我们曾经基本上学习了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但是，毛主

席历来反对照搬马列主义的条条，也反对全盘照搬别人的经验。无论革命也好，建设也好，他都反复强调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1958 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我们党发动了“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运动的效果是不好的。但毛主席的初衷却是在探讨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道路。这年 8 月，周扬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记得讲的是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评，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了以后，认为写得不错。一天清晨三四点钟，毛主席召集我（当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段君毅（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经委常务副主任）、张玺（计委常务副主任）等十来个人到他的住处谈话。毛主席说，我们的各行各业正在大跃进，大家工作都很忙。但是，我们应当有更多的同志从事理论研究；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挤出时间读书，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主席又说，学习不能生吞活剥，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建设事业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丰富理论。主席说，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是极其丰富的，这些经验有待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你们不能只顾忙业务，忘记了理论学习。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使我感到十分中肯，十分重要。全国解放以后，我先在大连市工作，继在黑龙江工作，后又调到国家科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激动着每个人的心，干劲的确非常高；可也的确忽视了理论学习。这次谈话以后，我开始挤时间学习马、列原著。先读《资本论》，后来又读了《自然辩证法》等书，开始形成坚持挤时间读书的习惯。

记得自那次谈话之后，毛主席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后来他还亲自选了二、三十部马、恩、列著作印成大字本，让高级干部学习。毛主席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途着眼，号召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要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路

1963 年，我国在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时期。国务院各部委都在总结经验，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国家科委制定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和中央科学小组草拟的“科学十四条”初步完稿之后，毛主席听取了聂帅主持的“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的汇报。科委其他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汇报。

在听汇报时，毛主席说：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靠外援好？还是自力更生好？我看主要还是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力更生才最靠得住。当聂帅汇报中谈到国家科委是科学技术战线的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时，毛主席说：这个提法好。科委应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路。主席说，我们对自己的科学家、知识分子，要重视，必须做好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保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排除后顾之忧。主席还说，进口一些必需的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是应该的，这方面不要卡得太死，这也花不了多少钱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对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工作是很重视时。1962 年还曾经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冕。可惜后来未能坚持下去。经过十年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重新出现新的生机，正在欣欣向荣发展。我想，这种情景是可以告慰于

毛主席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殷切期望的。

毛主席领导中自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人民共和国，并且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永远不失其光辉。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每当回忆起与毛主席直接接触的情景和他的教海，我的心中总是激起一种异常亲切与崇敬之情。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忆毛泽东和援越抗法

罗贵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个月，在我国外交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悄悄地掀开了鲜为人知的一页。对我个人来讲，也翻开了新长征途中转折的一页……

一

新中国成立不久，1949 年冬，胡志明主席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写信给毛主席、中共中央，要求中国提供援助和派人去越南。1950 年 1 月，胡志明亲自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要求。

我党中央根据胡志明和印支共产党中央的要求，并报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我秘密去越南，作为中共中央与印支共产党中央的联络代表。少奇同志还亲自为我写介绍信：“ 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 8 人。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1950 年 1 月 17 日 ”。

这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正在莫斯科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会谈，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我于 1950 年 1 月由北京启程，秘密离开祖国。临行前，少奇同志交待三个月完成任务回国。然而，随着情况变化，一去就是近八年，我又经历了一个“ 八年抗战 ”，面对的敌人是法国殖民侵略者。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 1945 年 9 月 2 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不久，中国国民党军队即进入越南北纬 16 度线以北地区，占领河内；英国殖民侵略军和部分法国殖民侵略军进入越南 16 度线以南地区，占领西贡，并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以后中国国民党妥协，把所占领的越南北方地区交由法军接防。法军不但在海防等地登陆，还进入河内，对越南发动了新的殖民侵略战争。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动员全民奋起抵抗，坚持长期抗战。法国殖民侵略军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占领了几个重要城市和交通线，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军领导机关从河内迁移到越北山区，但仍然坚持继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法军对越北山区抗战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分割并不断进行军事进攻和狂轰滥炸。这时，战场形势处于相持阶段：法军不能征服越南军民，越南军民一时也难以发动反攻，只能分散打游击。

此时，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同越南建立联系，越南尚未取得国际地位，也得不到外援。如何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侵略军的问题，是中、越、苏三方最高领导进行磋商的大事。毛泽东同志和胡志明同志在莫斯科时，曾同斯大林进行过会谈。在胡志明提出请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斯大林认为这样做可能刺激各帝国主义国家，增加对越南的压力。而毛泽东同志却认为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后，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胡志明千里迢迢来中国，去苏联，是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援助，尤其是军事和财政经济的援助。斯大林认为，中国是越南的邻邦，熟悉越南的情况，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苏联还要帮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负担很重，希望援助越南的任务以中国为主。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要追歼蒋军残部，清剿武装匪特，要接管城市，举国上下正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而美帝国主义又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包围、封锁、孤立、甚至企图干涉、颠覆新中国。法殖民侵略者也在中越边境加强兵力部署和军事设施，封锁中越边境。法国飞机不断在中越边境上空盘旋，扫射轰炸，威胁中国的安全。法国殖民侵略者还支持、庇护蒋军残部和武装匪特，在中越边境进行捣乱破坏。

1950 年，美帝国主义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对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我国决定抗美援朝，派出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

在此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重，任务艰巨，困难很大的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毅然决定援越抗法，向越南大力提供无私的和无偿的军事援助、财政经济援助，派顾问去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二

1950 年 9 月 24 日，也就是在我离开北京八个月零七天后，我才第一次从越南北部山区返回北京汇报工作。我先遵照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的面示，将在越南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呈送中央各领导同志。两三天后，尚昆同志通知我，少奇同志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又来到熟悉的中南海。少奇同志告诉我，毛主席要亲自听取你的汇报。于是我和少奇同志一同驱车前往丰泽园。

康熙年间丰泽园是清皇帝春季举行演耕仪式的场所。这是一座标准的两套院四合院。两棵海棠树，两棵梨树左右对称，没有任何修饰，一派凝重庄严的氛围。上房正中是“颐年堂”，东西两厢是“烟雨图”和“云山画”，这就是毛主席的住处，朴素无华。

“颐年堂”内，从天花板到门框、窗扇、窗棂布满红木雕花，房内显得华贵，但只摆着十把普通的单人沙发，围绕一张小园茶几，脚下是块很旧的地毯，沙发后面有一张窄长条桌，这些占了会客厅的二分之一。四面看看，再也没有任何陈设了。我们党的主席、人民共和国主席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就是这样简单朴素。那时候没有什么严格的晋见规矩。我多次汇报，毛主席都是坐在靠南边的一把沙发上，有时我往他旁边一坐，有时又离他远点坐下。

少奇同志带我见毛主席时，朱总司令、周总理已经坐在主席身边。少奇同志首先谈了我汇报的情况。主席听完以后，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对我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少奇同志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打算吧。”周总理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主席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把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情况和我们派志愿军赴朝参

战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告我回越南后可把此情况转告胡志明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接着他话锋一转，突然问起我爱人和家庭情况。当我说到我爱人李涵珍同志是 1933 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时，毛主席高兴地说：“哦，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她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她干过机要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毛主席马上说：“好！让她也到越南工作，做你的助手。胡志明向我提议过，让你们的爱人到越南去，合适的我同意带去。”后来我们派到越南的顾问，少数人带了爱人去。少奇同志说：“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以后还要选其他方面的顾问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政治顾问团团长。”

毛主席听少奇同志讲到“总顾问”时，他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这次汇报，是我第一次直接聆听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教导和指示。

三

援助越南的第一步就是打通中越边境交通，援助越南的物资才能顺利运往越南。只要越南人民军占领了中越边境上的交通要道，法军则将失去第一个优势。打通中越边境的交通要道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打越南和广西接壤的高平；一个是打越南和云南接壤的老街。先打高平还是先打老街，或是同时打，印支共产党中央和我党中央都作了调查研究，反复酝酿磋商了近三个月。1950 年 7 月 2 日，毛主席给越共中央复电：“同意先打高平的意见，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陈赓同志是胡志明向毛主席和我党中央点的将。毛主席、党中央派陈赓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越南帮助组织指挥边界战役，军事顾问团参加了边界战役。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毛主席对此次战役非常重视和关注，许多重要电报都是由他亲自审批，甚至由他亲自起草。边界战役准备期间，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胡志明和印支共产党中央把一部分越南人民军开到云南文山地区进行休整、装备、训练的要求，并帮助这部分部队组编成两个大团（师），形成两个拳头，在边界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陈赓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大力的、无私的帮助。越南军民终于赢得这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越南战场的被动局势，打通了中越边界交通。胡志明、武元甲等对此表示非常高兴和满意。边界战役胜利结束后，胡志明于 1950 年 10 月 14 日向

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致信：“高平七溪战役（注：指边界战役）我们已获全胜。这胜利之最大原因是因为中共苏共之尽量援助，滇桂、粤同志们的感我的、热诚的，不辞艰苦的执行您们的指示而给予我们以直接的帮助。我应该指出陈赓、任穷、云逸、天佑、贵波、剑英、方方、国清及顾问同志们在战役中之特别功劳。总之，我认为这胜利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我不说‘谢谢你们’的客套话，而说‘今后我们越南同志们和人民将更加努力争取更大的最后的胜利，以成功来报答中共、苏共兄弟的深切期望与伟大的帮助。’”

四

1950 年 11 月，我再次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汇报中说到越南向我国提出希望援助的计划时，毛主席说：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有义务帮助尚未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人民，这是国际主义。越南正在进行抗法战争，孤立无援，困难很大，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和帮助，我们有义务援助和帮助他们；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是无私的、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凡是越南抗战确实需要的，而中国又有的，可尽量提供。毛主席又说：法国殖民侵略者是越南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帮助越南打败法国殖民侵略者，恢复越南和平，这是中国帮助越南。而越南把法国殖民侵略者打败了，赶出了越南，中国的南部边疆也就解除了法国殖民侵略者的威胁，这又是越南帮助了中国。不能只说中国帮助了越南，应当说越南也帮助了中国，帮助是相互的。

当我汇报到越南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不太切合实际时，毛主席说：“他们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可能是他们对我国的情况和对自己的情况缺乏了解，也可能与缺乏经验有关，要耐心帮助他们。”

我们在越南工作的几年中，对越南进行援助和帮助，不论是向越南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军事装备、粮食布匹、医药卫生、通讯器材、交通工具、各种食品等等的援助；也不论是向越南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都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这个指示和教导进行的。

中国顾问在越南帮助工作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为越南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无私奉献。我们在越南帮助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与越南同志同甘共苦，共同工作，共同战斗，共同生活，没有向越方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和额外报酬。

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和帮助，中国政府没有向越南要过钱、讨过账，没有同越南签订什么不平等的协议或协定，没有在越南建立任何军事基地和驻扎一兵一卒，完全是无代价、无私的，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伟大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也是世界上罕见的。

五

1951 年冬季，胡志明又一次秘密访华来到北京。

一天我陪他来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我们进去时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都迎出来，他们相互亲切地拥抱。胡志明主席早在中国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分别相识。他那带有广东味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可以不用翻译。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一点外交形式，胡志明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而热情。

他见到毛主席，像久别的兄弟，相互问候，说了一阵亲热的话语，很快话锋转入正题。

胡志明把越南抗法战争的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把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我国国内的有关情况，也向胡志明作了简要介绍。

在交谈中，胡志明问毛主席：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主席说：“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毛主席和胡志明交谈时，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观点和意向，都融化在家常话中，看似聊天，但细想想含义深刻又耐回味。胡志明是极富感情的人，看得出他被毛主席的诚挚感染了，他站起来说：“我和越南同志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到吃饭的时间了，毛主席、胡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我一起走进餐厅就餐。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提前告退。餐厅跟会客室只用一屏风隔开，只七、八步一挑簾就进丢了。餐厅仅有摆两张餐桌的地方，这时只摆一张餐桌。吃饭时，毛主席、胡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边吃饭边继续谈话。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插话，互相补充，谈得非常热烈。

席间，胡主席看到端上来的辣椒，就对毛主席说，“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无法下饭？”毛主席笑笑。胡志明又接着说：“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长得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大家饶有兴趣地听他讲完越北森林里的朝天椒以后，毛主席说：“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厉害；他（指我）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接下去的话题就是各自介绍各自家乡辣椒的烹制方法。然而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越南吃辣椒的方法。胡志明说：把这朝天椒放在鱼露[鱼]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这时毛主席说：“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 1932 年到 1934 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呢！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这次谈辣椒的事。

六

[鱼] 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

送走胡志明后，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把我留下，继续同我谈话。

毛主席：“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劳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少奇同志、朱总司令接着说：“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中央。”

接着，毛主席态度严肃而又有些激动地说：“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毛主席说：“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驻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划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毛主席又说：“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忌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对胡志明同志，不但中越两国人民非常尊重他，在国际上，就是反对他的人也非常尊重他。毛主席把对胡志明的尊重提高到如此高度是有根深的意义的。毛主席对我的这次谈话，给我的感受很深，使我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非常实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

七

毛主席总是把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革命事业当作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一样看待，用完全彻底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越南。毛主席不仅仅是这样教导我和其他顾问的，而且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无论是陈赓、韦国清和我向毛主席、党中央的请示电报，还是毛主席、是中央对我们的指示，无论是关于作战（如边界战役、奠边府战役、西北战役等等）、部队建设和部队训练方面的文电，还是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财经工作、土改工作、军事援助、财经援助和公安、情报、少数民族

工作等方面的重要问题的文电，毛主席都是亲自审阅、修改、签发，其中有些特别重要的文电，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毛主席对胡志明、越劳中央向毛主席、党中央征求意见文电的回复，或是毛主席、党中央给胡志明、越劳中央提意见或建议的重要文电，都这样写上：“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由你们决定，你们比我们熟悉、了解情况。”

王稼祥同志主持由中联部起草的中国驻越南顾问《工作守则》，毛主席审阅时作了重要的补充：“热爱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守则》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国际主义精神。

1952 年我回国述职，向毛主席汇报，谈到大多数顾问都能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安心在越南工作。但有少数顾问因为越南的气候条件又热又潮湿，蚊虫多，生活上下习惯，经常害病，打摆子，体重下降明显，加上战斗频繁，法军飞机不断骚扰、轰炸，担心病死、战死在越南，希望和要求提前回国工作。

毛主席听后，沉吟片刻，然后不紧不慢地说：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毫不利己，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他光荣地牺牲在中国，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是一位很好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永远缅怀他。毛主席又说：我们有许多北方人在南方工作、战斗和生活，有的人牺牲在南方；也有许多南方人在北方工作、战斗和生活，有的人牺牲在北方。我们的顾问都是共产党员，党派他们去援越抗法，帮助越南工作，为什么不能坚持在越南工作、战斗和生活？为什么不可以牺牲在越南？接着，毛主席吟出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他解释了这两句诗的含义。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对我和顾问们思想上震动很大。他是在鼓励我和顾问们要完全彻底地献身于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合格的国际主义战士。

八

解决越南的粮食和货币问题，是 1950 年 3 月胡志明、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向我介绍越南情况时，就作为需要帮助研究解决的最紧迫、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提出来的。

我把这个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报告。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指示我们：越南的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货币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必须彻底废除法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旧的一套财经工作制度和办法，建立一套新的财经工作制度和办法。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还指示我们：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采用过的征收公粮、回笼货币和发展生产的办法，基本上适用于越南，可提供他们参考。

我和顾问们根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这个指示，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介绍和运用中国的经验，从财经工作的政策、方针、规章、制度、条例，直到具体实施办法，对越南进行帮助。1951 年，越南的财经情况有了明显好转。机关部队有粮食吃了，不再挨饿了，群众家里粮食也多了，货币比较稳定了，通货不膨胀了，市场逐渐活跃起来。胡志明、范文同、长征、武元甲对此都表示非常满意。范文同总理高兴地说：毛主席，中国党无私地援助我们，又派来顾问帮助我们，1950 年帮助我们取得了边界战役的重大胜利，改变了越

南的抗战形势，打通了越中边境的交通。现在（指 1951 年）又帮助我们解决了当前最困难、最紧迫的财政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货币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中国党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又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对越南是有帮助的。

九

从 1950 年的边界战役以后，我们又经历了中游战役、宁平战役、东北战役、上寮战役、西北战役和红河三角洲敌后游击战等大大小小的战役，直到奠边府大捷，迫使法国殖民侵略者坐在日内瓦的谈判桌前签字停战，越南人民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越南抗法战争取得胜利的进程，也是胡志明同志、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国际主义思想充分理解的进程。

越南人民在毛泽东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极其尊重和爱戴毛泽东同志，把毛泽东同志亲切地称为毛伯伯，就像称呼胡志明同志为胡伯伯一样（这是越南人民对胡志明同志最尊敬、最爱戴、最亲切的称呼），感情真挚而热诚。

历史是最公正的，是最好的殷鉴。虽然时间在逝去，世界风云在变幻，但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毛泽东无私援越抗法的业绩将永垂越南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史。

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

熊向晖

一

1960 年，应我国工、青、妇等全国性人民团体分别邀请，六十多个国家的七百多位朋友到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节后，外宾们分批去外地参观。去郑州的一批人数最多，共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二十三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团等 101 人。

毛泽东主席在天津海河岸边的中心广场和当地群众一起欢度了六十年代第一个国际劳动节。随后，主席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陪同，乘专列去南方视察，预定途经郑州时，会见在那里参观的外宾。为此，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临时组成的包括我在内的工作组，赶到郑州进行准备。

工作组住在河南省委的招待所。1958 年 11 月和 1959 年 2、3 月间，主席曾两次在这里召开会议，纠正他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当时主席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就在这里一栋楼房的第二层。河南省的领导人这次仍安排主席在此居留。楼下一进门是大会议室，可以作为主席会见外宾的场所。

工作组把这间大会议室布置成接见厅。紧靠里墙中央部位的讲台上，安放一张条桌和几把椅子，作为主席和主要陪见人的坐位。在讲台两侧各放一张长条桌和几把椅子，作为译员和工作组其他成员的坐位。从大门到讲台留出通道，在通道的两边面向讲台安放的桌椅，作为外宾和陪同译员的坐位。

6 月 7 日上午，杨尚昆同志来到宾馆。他说，主席在专列上工作到凌晨才休息，现在还没有起床，主席可能今天下午会见全体外宾。杨尚昆看了接见厅。他说，这种布置官气太重，主席喜欢同被会见的朋友靠得近些，这样显得亲切。他指示：讲台上只为主席放一把椅子；通道两侧的桌椅环绕讲台排成半圆形，第一排要紧靠讲台。他同意刘宁一的估计，主席同外宾谈话不会长。他说，会见结束后，主席可能同外宾一起照相，地点就在接见厅的门外，分几行站在台阶上，其他的中国同志都不参加。主席不喜欢前呼后拥。

刘宁一说，主席定下会见时间后，请尚昆同志马上告诉我们，以便事先控制外宾的行动，不让外出。我们会注意保密，不过早透露，在会见前一小时再通知他们，安排他们提前十五分钟到达。杨尚昆说，主席一起床，就请示主席。

刘宁一让人按照杨尚昆的指示重新布置接见厅，他陪杨尚昆上楼查看主席的工作和休息处。不久，杨尚昆带着刘宁一交给他的外宾名册离开宾馆。

近午时分，刘宁一向工作组全体人员说，刚才接到尚昆同志电话，主席决定今天下午两点半会见非洲朋友，明天下午两点半会见拉丁美洲朋友，后天下午两点半会见亚洲朋友。主席指示，对弱小国家的朋友要特别尊重，不允许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这些朋友不要搞神秘主义，不要搞突然袭击，要马上把会见的时间通知这些朋友，就说毛泽东请朋友们来谈谈；生病的，身体不好的，年老体弱的不要来；不愿来的听便，不要有丝毫勉强；对不愿来的不要有任何歧视。主席指示，要向这些朋友讲清楚，这次来到郑州的外国朋友，有非洲十二个国家的 54 位，有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 25 位，有亚洲

三个国家的 23 位，先见后见，是根据这一点安排的，并没有其他含意、决不是厚此薄彼，要请这些朋友理解。

刘宁一派人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向外宾转达了主席的话。外宾们非常兴奋，非常感动，盛赞主席伟大而又谦虚。外宾没有一个不愿来的、有病的也坚持要来。不久，又接到杨尚昆同志电话，主席决定下午两点先到宾馆。工作组的几位同志猜测，主席带多少人来？有的同志说，除了杨主任，还会带秘书，保健医生，保健护士，几名卫士，另外还会有开道车，警卫车，至少有 15 位警卫人员。

1 点 50 分，刘宁一带领工作组的同志在接见厅门外迎接主席。不一会，一辆小汽车驶来，到接见厅门外停住，从车上走下三个人：主席、杨尚昆和一名卫士。

主席微笑着向大家挥挥手，走进接见厅，在讲台上看了看，同杨尚昆走向二楼，刘宁一和卫士跟在后面走。刘宁一吩咐工作组的礼宾人员，待外宾到达后，安排他们依序坐好，再到二楼请主席接见。

大约两点 15 分，自远而近响起一长两短的汽车喇叭声，这是事先约好的外宾所乘车辆的信号。想不到主席随即走下楼来，站在接见厅门外左侧等候。杨尚昆让法语、英语译员站在主席身后，其余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不出去，免得分散外宾的注意力。

三辆大轿车在指定地点停放好，外宾和陪同译员相继下车。一位外宾突然用英语高呼“毛主席”。其他外宾也发现了“目标”，振臂高呼“毛—泽—东，毛—泽—东”或者“毛—毛—毛”。有几位外宾想走过来，另一些外宾用法文或英文叫喊：“注意秩序！”“排好队！”“不要乱！”礼宾人员和陪同译员协助他们按顺序排成单行，他们快步（实际上是跑步）走向主席。主席微笑着依次同他们握手。每个外宾都想同主席多握一会，说几句话，可是身后的外宾不让，早就把手伸向主席。礼宾人员把同主席握过手的外宾引到接见厅各自的位置，但他们都不肯就坐，转身向门外观看。主席和排在最后的外宾握完了手，健步走进大门，走向讲台，全体外宾热烈鼓掌，高呼“毛—泽—东”、“毛—毛—毛”，他们的眼睛盯着主席，头和身体跟着主席逐渐向里转，主席走上讲台，向外宾鼓掌，外宾的掌声和“毛—泽—东”、“毛—毛—毛”的欢呼声更加响亮，不少外宾激动得流下眼泪。主席频频挥手，外宾仍然站着鼓掌欢呼。主席开始讲话，外宾才安静下来，掏出各自的笔记本坐下来记。

二

主席说：欢迎朋友们。我没有去过非洲。今天请朋友们当老师，给我上一课，讲讲非洲的主要情况，讲讲非洲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外宾显然出乎意外，大家愣住了。但很快有几十位外宾几乎同时举手。

主席说，很好，这么多朋友愿意给我上课，我很高兴。

主席坐着认真聆听，在拍纸薄上记下要点。十二位外宾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发言。他们说明，他们决不是作为教师向主席上课，而是作为学生向主席汇报非洲人民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他们发言后，主席又请尚未发言的外宾讲。一位外宾说，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多钟头，不应该再侵占主席的时间。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请求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教导我们如何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主席站起来，亲切地说：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席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怕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中国人一步一步觉悟起来，逐渐不怕了，我们从敌人那里学会了打仗，在战争中夺取敌人的武器。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胜利了？！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主席强调，还是人要紧，武器是第二位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就不怕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主席说，非洲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具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表示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

主席高度评价了古巴人民的抗美斗争，并说，有人认为最近几年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但是现在南朝鲜、土耳其和日本的人民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斗争。主席着重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

主席说，我讲了一些意见，也许你们不一定赞成。我们是交换意见的性质，再请你们讲一讲好不好？你们的情况和意见我很愿意听。

一位外宾提出，再过几天—5 月 16 日就要在巴黎召开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据说，经过大国首脑协商，可以避免世界大战，巩固世界和平。请问主席对四国首脑会议怎么看？

主席说，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我相信朋友们也都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避免打世界大战，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要两条腿走路。四国首脑会议，或者大国协商，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我们支持四国首脑会议或大国首脑协商，同时我们更支持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反对他们的压迫。

主席说，我很高兴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迷信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西方世界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怎么不行呢？我不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的好些。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白种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他们会觉悟起来的。这就是无产阶级，还有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所以全世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主席说，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一个、两个、三个了。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这是从战略上讲；从战术上讲，我们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研究，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谈话结束后，主席举起茶杯说：祝贺我们的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全体外宾起立，热烈鼓掌。主席邀请外宾到门外一齐照相，主席含笑同外宾一一握手告别，外宾们依依不舍，礼宾人员好不容易才请他们上车。他们边走边回过头来高呼“毛—泽—东”，“毛—毛—毛”，到车上又摇下窗玻璃，探出身来向主席鼓掌、欢呼、主席站在门外向外宾挥手，一直到外宾所乘车辆驶离很远后，主席才停止挥手，回到二楼休息室。7

月 8 日和 9 日，主席分别会见拉丁美洲和亚洲朋友。主席都是事先在门口等，合影后在门口送，礼遇与对非洲朋友完全相同，而这些外宾的热情表现也与非洲外宾毫无二致。

三

主席送走了非洲朋友，我去食堂吃饭。刘宁一忽然匆匆走来说，主席指示，今天会见非洲朋友要发表消息，等你去写。我跟着刘宁一走进主席办公室。主席靠在木制大躺椅上吸烟。我向主席问好。主席说，不握手了，坐吧。今天让你做“秀才”，桌上有烟，自己抽，增加点“烟士披里纯”。

我坐在办公桌后的长背木椅上，刘宁一和杨尚昆坐在单人沙发上。

主席说，人家要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就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3 号在济南开了一次，今天又开了一次。这些小国、弱国的人民不简单，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信，比赫鲁晓夫高明。天下事千奇百怪，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硬是迷信帝国主义。列宁不是讲过吗？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制度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赫鲁晓夫不赞成列宁。他说，现在有了那末多原子弹，能够毁灭全人类。所以，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避免战争，保持和平。他说，避免战争、保持和平必须依靠大国、强国的首脑，首先依靠美、苏两国的首脑。只要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信任，友好合作，达成裁军协议，就能让一切国家化剑为犁，天下就能永远太平。

主席说，赫鲁晓夫去年 9 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谈。他宣扬艾森豪威尔是爱好和平的。他 9 月 30 日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大放厥词，一吹他的美国之行如何如何成功，要我们不得破坏和平气氛；二吹他的裁军主张如何如何美妙，要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我们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他含沙射影，污蔑我们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主席说：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前年，他要在中国建立什么长波电台，搞什么潜水艇联合舰队。我们说，这涉及中国的主权，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他原来答应帮我们造原子弹，还签了协定，后来他说不帮了。不帮就不帮，我们不稀罕。中、苏两国之间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坚持原则，在内部对他进行批评，同时照顾大局，不由我们公之于世。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恐吓，说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会引起世界大战，必须马上扑灭。他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实际上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今年 4 月 22 日列宁诞生 90 周年，我们发表用红旗编辑部名义写的《列宁主义万岁》，对国际上的重大原则问题正面说明我们同赫鲁晓夫不同的观点。我们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注意维护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篇文章的内容不错，就是太长了，引经据典，书生气太重，一般人不爱看。所以在四大国首脑会议之前，我先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3 号在济南，我同拉丁美洲和非洲十四个国家工会和妇女代表谈话，尚昆没有参加，刘长胜和曹孟君参加了。我说，要发表简短消息。我有些“官僚”，没有看稿子。第二天报上登出来，虽然简短，内容有些不妥，写了人家唱“东方红”。写这干什么？大国沙文主义！今天再发表一次消息，写上非洲朋友讲话的要点，

写上我讲话的要点，要表明我们的反帝立场。不要长，要快，半个钟头够了吧。

我说，我就试试。

我稍微考虑了一下，用圆珠笔在拍纸薄上写。写完后看了一遍，作了个别增删。一共写了四段：

第一段：“新华社郑州7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他们是：（代表团名单容即增补）”

第二段：“在接见中，各个代表团都作了热烈的发言，介绍了他们多少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榨取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介绍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表达了他们争取彻底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并且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于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

第三段：“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完全支持。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主义斗争。毛主席感谢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祝贺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伟大团结，祝贺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第四段：“今天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刘宁一”。

我把稿子交给刘宁一。他和杨尚昆传看后，改了几个字，请主席过目。

卫士打开躺椅后的立灯，把木板架安置在躺椅上，把稿子放在木架上，主席一边吸烟一边看。

在审阅过程中，主席问：“代表团名单容即增补”，增补了没有呀？我说：我正在搞。

主席继续审阅，说，对非洲朋友的讲话，概括得还可以，有一句要不得。他让卫士递给他一只圆珠笔，划去了几个字。又加上几个字。

主席问：代表团名单搞出来没有？我说，搞出来了。

主席要我递给他，他看后问：名单为什么这样排？我说明理由。

主席说，排名单要能讲出道理。搞不好，人家会有意见。这个排法我赞成。我说，主席真细致。主席说，在济南做了一次“官僚”，现在“辞职”了。

主席要我从头到尾念一遍。我发现，杨尚昆、刘宁一把原稿最后一句的“祝贺”改成“并且确信”，“彻底”改成“最后”；主席把原稿第二段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划掉了；在第三段最后一句“并且确信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在“取得最后的胜利”前面加上“一定会”。

我念完后，主席说，就这样，下点毛毛雨，捅出去吧。刘宁一说，已经让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在招待所等。我说，我就去办。

我回到餐厅，把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雷行找来，他看了稿子，要拿回发。我说，稿子上有主席亲笔修改的字句，我要留作纪念，让他另抄。这时，刘宁一赶来了，把稿子拿走，说，主席还要再看看。

雷行说，他马上给北京新华总社打电话，报告这件事，总社要通知全国各大报，留出明天头版的版面。

不一会，刘宁一又匆匆来了，说，主席口授，他笔录，加了一段，内容非常好，主席让你再去谈谈。我随即跟他回到主席办公室。主席仍靠在躺椅上吸烟，我看到在原稿第二段“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正义斗争”之后，刘宁一笔录了以下一段话：

“他认为：南朝鲜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这种斗争，表明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将会有更大的兴起。这个斗争对于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将是一种支持。主席说，所以，全世界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我看完后说，刚才宁一同志对我讲，主席加的这一段非常好。的确非常好，把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的主要内容突出出来了。

主席说，找你来，不是让你讲“非常好。非常好”。我临时想了这几句，来不及推敲，你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我又看了一遍，说，在文字上有几点小建议。开头的“他认为”，改成“主席认为”，这样，前后比较连贯。主席说，可以。还有呢？我说，在“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之后，加上“风暴”两个字。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几次讲了“风暴”，“斗争风暴”比“斗争”更有气势。赫鲁晓夫经常鼓吹，现在国际关系晴雨表的指针，不是指向暴风雨，也不是指向阴天，而是指向晴天；改成“斗争风暴”，也是间接驳赫鲁晓夫的。

主席微笑着说，你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倒有点研究。还有什么要改的？我说，最后那个“所以”似乎可以不要。主席说，我常说“所以”，有点习惯了，刚才不知不觉说了出来，刘宁一就记了下来，这里不必要形成文字。主席风趣地说，所以，“所以”两个字可以删掉。

主席又让我把这条新闻稿从头到尾念一遍，念完后，主席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杨尚昆说，很好了，没有意见了，早点发出去，再迟，新华社就难办了。

我说，我这就去办。并说，今天人民日报第五版的新闻很重要，请主席看看。主席说，今天还没有看报纸，有什么重要新闻？我说，美国一架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打下来了。

主席说：美国的侵略行动搞到苏联头上，赫鲁晓夫还在幻想“加强普遍和平”。我看，我们将来应该出赫鲁晓夫全集。主席对杨尚昆说，通知北京，帮赫鲁晓夫一把，公开表示我们支持苏联打下美国的飞机，支持苏联对美国的抗议，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美帝，对苏联挑衅就是对中国挑衅，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挑衅。

主席说，时间很晚了，大家散了吧，我也要回火车去了。

四

5 月 8 日下午 2 时半，主席会见拉丁美洲客人。落座后，主席首先说，欢迎朋友们。拉丁美洲距离中国很远，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很不容易。利用这个机会，请朋友们向我介绍拉丁美洲的主要情况，并且欢迎朋友们对中国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几位外宾分别发言，主席坐着认真听取，有时在拍纸簿上记下要点。

一位外宾说，我们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到中国的，现在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主席站起来说，我讲一些情况和意见，不是作指示。

主席在详细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后说，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有中国的条件。经验不能照搬，只能参考。还希望朋友们作分析，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有哪些是成绩，有哪些是错误，现在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我们用整风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和批评。中国犯的错误，你们研究也有意义，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主席针对外宾们提出的反帝斗争的问题，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的问题，作了生动的深刻的阐述。

主席送走拉丁美洲朋友后，我回到卧室。不久，刘宁一来找我，说主席指示今天还要发消息，等你去写。我随他走进二楼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非洲朋友们很热情，拉丁美洲朋友也是这样。弱国、小国人民会议开得好，有共同语言。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们就宣布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领土主权决不容许别人侵犯，谁来侵犯，我们就要自卫，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对我们进行建设有利。我们也同帝国主义打交道，譬如 1954 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同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还在继续。我们坚持原则，不抱幻想，同赫鲁晓夫不同。对世界大战，我们说了两条，第一，反对；第二，不怕。赫鲁晓夫和我们半同，半不同。他反对世界大战，又害怕世界大战，越怕越有鬼，越怕世界越不和平，如今连苏联的领空也不和平了。世界为什么不和平？怎样才能和平？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赫鲁晓夫完全依赖大国协商，我们强调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小国弱国的人民同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以，还要发消息，让世人听听小国弱国人民的声音，听听我们的声音。照昨天的规矩，不要长，要快。

根据昨天的经验，我事先作了考虑，并且已写好第一段的导语，听完主席的指示，我着手写正文。写完交给刘宁一。刘宁一同杨尚昆、孔原传阅商量后，作了一点改动，送给主席。主席先让我念一遍。我念道：

“新华社郑州 8 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

“接见中，毛泽东主席首先表示了对拉丁美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向毛泽东主席谈到在中国参观访问的观感。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称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赞中国人民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贡献。他们还谈到了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日益发展的友谊。他们说，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介绍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并和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主席说，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正在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主席说，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主席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主席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主席说，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斗争也帮助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

我念完后，主席要我递给他，卫士安放了木板架，主席摆在上面看，亲笔作了修改，让卫士送还我，我发现主席改动了三处：把第二段中“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改成“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在这段最末一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之前加上“一定会”；把第三段第一句“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中的“称赞”改成“友谊”。

主席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后两处，主席改得非常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只表达了可能性，主席加上“一定。会”，就表达了必然性。“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太庸俗，主席把“称赞”改成“友谊”，含意和格调就完全不同，非常亲切、得体。只是对主席对第一处的改动，我不理解。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昨天写了非洲朋友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他们的原话，主席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删掉了，说是“要不得”。今天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

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刘宁一说，主席的指示很深刻，我们要好好学习。这篇新闻稿这就样定下来吧！

主席又要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当念到“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时，主席说，这里有点突兀，在“一定会”前面加上“这样”。我照加了。主席想了一下又说，加上“这样”，语气有些散，改成“就”字，“就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随最后胜利”，你们看怎么样？大家都说好。我涂去了“这样”，加上“就”字。

杨尚昆说，今天的新闻稿比昨天的更有份量，就这样发出去吧。主席点点头。我辞出，把主席审定的新闻稿交给已在宾馆等候的雷行。

五

5 月 9 日下午 2 时半，主席会见了西亚三国的客人。

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指出：根据中国的经验，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应当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蒋介石为什么被赶出大陆？因为他脱离群众，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他们是生产者，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生活。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还有别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知识分子——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少不了的。他们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主席指着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他是一个穆罕默德，今年五十三岁，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开会，我们不能脱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他信穆罕默德，又不是共产党，那没有关系。他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而且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那更好办事。有各色各样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只有一千三百万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力争团结六亿三千七百万非共产党员。被打倒的阶级，譬如地主阶级，我们也要改造。主席说要战胜帝国主义，不是短期的事，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外国来说，只能有选择有分析地来对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外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我所讲的话，只供朋友们参考。

接着，三国外宾各有一位代表简短发言，感谢毛主席的接见和谈话，表示要加强本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主席送走西亚三国朋友后，刘宁一把我找到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晚上我有事，今天没有请亚洲朋友多发表意见，他们不会见怪吧？刘宁一说，不会。今天的气氛和前两天一样热烈。主席说，这次在郑州，用三个下午开了三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三次讲话大同小异，发表消息每次有一个重点。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

斗争”；今天要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主席让我快写，我写完后照例送给刘宁一，他照例给杨尚昆传看后，送给主席。主席改了一个字，其余未动。

主席从躺椅上起来，说，我要回火车去了。

乘主席整衣的机会，我把新闻稿交给雷行。回来时，主席已走出办公室门外。主席说，都不要送了。主席同刘宁一和我分别握手，在杨尚昆和卫士的陪同下，离开了招待所。但这三天我的经历，却始终离不开我的脑海。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

袁宝华

毛主席曾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后来中央党校的同志请人用汉白玉刻好，嵌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山墙上。1947 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中央党校被破坏，老乡悄悄地把这四个字的刻石埋藏起来，直到 1948 年后，这四个字的刻石才重新放回原来的地方。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多年来，在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与毛主席的接触中，深深地体会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一、中央机关的任务是了解情况制订政策

我到延安比较晚。我是在“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七七”事变后回到我的家乡河南去做了三年地下党的工作，1940 年，在地方呆不住了，按照组织上的决定撤退去延安。那时，正 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去延安的路不好过，在西安呆了大半个月，后来跟着南汉哀同志坐汽车到延安，分配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了三个月，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一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离开延安。

在延安期间，我在中央组织部做干事，住在杨家岭，经常听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但和毛主席的接触机会比较少。中央组织部在杨家岭沟口北边山坡上，从中央组织部山坡上平着走，可以到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把着沟口，往里面去，是中央宣传部，再进去，是党务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再过去，就是毛主席的石头窑洞。毛主席搬到枣园之前，住在杨家岭，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延河边上或山坡上散步，后来搬到枣园，见的就少了。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了对我们的拨款。解放区一方面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进行了机构精减。这年 11 月，中央机关召开了经过精减以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我看了看，也就是百把人），请毛主席到会讲话，会议地点在中央办公厅门口的小广场上。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主持。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听他讲话。突出的印象是觉得他很朴素，很随和。当时生活已经好转，可毛主席还穿一件有补钉的大衣。他和大家见了面，看到门口有几个孩子，便走过去和他们一起玩。那次会议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毛主席讲话的内容。他主要是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要求，中央机关的干部办事情都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他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也是个主义呢！”他说，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个文明棍，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儿，要不为什么裤缝是直的，走路还要拿棍子呢？毛主席通过深入浅出的解释，深刻地说明了主观主义的危害之大。他指出，中央机关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制定正确政策。主观臆断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了解真实情况，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呢？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毛主席讲话，中央机要室的同志一般都要来作速记。这一次讲话，当时没看到有人作记录，后来也没有看到关于这次讲话的公开或内部资料。

二、坚持实事求是要从调查研究做起

我在延安期间，听到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就是调查研究，实是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了解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还说我们不了解外国，又不能到外国去调查研究，可是有外国人在延安，应该向这些人作调查研究。他当时讲，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柯棣华在前线死了，另外几个人走了），现在还有个巴苏华，就在延安医院里工作，你们要了解印度的情况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以找阿里阿罕；了解日本的情况，就要找日本战俘。那里延安办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前方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都在这里学习。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带头，真正沉下去，到农村、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只有王明这样的人小病大养，他是统战部部长，基本上不做工作。那时中央专门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干部的决定，还有一个关于非党干部的决定，都是中央组织部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找了很多人谈话之后起草的。陈云同志也亲自找了许多比较有名的从大后方来的非党人士谈话。调查研究，当时形成了风气。总的说，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对延安干部的提高有明显效果。

在后期的整风审干过程中，毛主席真正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了审于的九条方针。好多老同志尤其是从苏区来的老同志，讲起这件事情来都非常感激。苏区肃反的时候，往往抓住以后就杀掉，肉体消灭；在延安审干中，硬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是毛主席坚决主张的，要是依康生的意见是不得了的。讲究实事求是，并且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对柯庆施就是这样。柯庆施的事，是康生制造的。审干一开始没多久，高潮还没有掀起来，杨家岭就要开会揭发批判柯庆施，说柯庆施是暗藏的特务。根据是什么呢？在杨家岭大礼堂的二门门背后的墙上有人用刀子刻了九个字：“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康生就根据这个。大家都讲，这几个字很可能是康生派人刻的。批判揭发柯庆施的大会是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全体干部都参加，接着还开小会揭发批判。柯庆施这个人的嘴比较笨些，说也说不清楚。这件事后来让毛主席知道了，马上纠正，说揭发批判柯庆施是个错案。大约一个多星期以后，就传达下来，说毛主席讲话了，对柯庆施不要批啦。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代学风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汉书》里提到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作了古为今用的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丧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可以说，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正是“实事求是”的道理为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统一了思想，变成巨大物质力量的结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时期开创的一代学风，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

在延安时期，重视学习，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学习的条件。毛主席提倡，抓紧在延安这个和平环境中学习，强调高中级干部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先学习文化知识，动员一批年青人学习技术，1941 年初，中央还专门发过一个加强经济技术工作的决定。

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邓发是政治局委员，负责党校和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职工工作委员会也在党校这里）。他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毛主席有许多重要讲话，毛主席讲了什么，邓发同志马上传达，并组织我们学习。后来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机关也很重视学习。陈云同志是部长，他每个星期要把大家集中起来学习两天，有什么要传达的都是这个时间传达。我们一共 16 个人，集中在一个窑洞里，围着个长桌子学习和讨论。

1942 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组部除王鹤寿、武竟天去参加以外，干事中刘淇生（后做二机部副部长）也去参加了，他回来就给我们讲毛主席讲了什么。毛主席作整顿三风的报告，王鹤寿去听了，他回来后就给我们作了传达。这时候，直接听毛主席讲话有几次，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在会见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那是在杨家岭礼堂，中央招待英雄模范人物。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里，题目叫《组织起来》（后来大家学习这篇讲话时把它叫做第二个组织起来，第一个组织起来是 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有一节题目也叫“组织起来”，也是指把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号召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英雄模范人物起模范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在这次会上还讲了农民组织互助合作问题，讲了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经营，后来我们到地方上工作，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就是拿这个报告去宣传的。我们在延安学习，那是非常认真。从《共产党宣言》学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学。学《共产党宣言》，是译者柯柏年作的辅导，学《反杜林论》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译者吴亮平作的辅导。哲学是在我去延安以前学的，我没有赶上，那是由延安一个青年哲学家和培元作辅导的（我到延安以前他在延河游泳时淹死了）。陈云同志讲，学好哲学一生受用不尽。那时候，他是亲自主持学哲学的。

从延安撤退以后，毛主席在米脂县杨家沟讲话，题目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 1947 年底讲的。接着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时我已被派往东北工作，东北局都及时将这些文件发给我们学习讨论。学习紧密联系实际，热发热卖，这边学习，那边就用上了。有些在工作中一直困扰着你的问题，经过学习，豁然开朗，学习效果明显，解决实际问题。一直到毛主席提出“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时我还在齐齐哈尔，后来到了沈阳，都是这样学的。通过学习，确实把一大批人提高了，从思想水平、文化知识到业务能力水平，都提高了。

另外，那时候的延安生活比较单调。毛主席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提倡开展一些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那时由阿甲，付律衡、陶德康等有名的演员参加，组织了个平剧院。毛主席很关心，不光作了那个著名的批示，还找一些人谈话。每次排出新戏，他总要去看，大家在一起看戏高兴得不得了。有个人叫金紫光，是个作曲家，每到星期六晚上，他就组织几个人敲锣打鼓吹喇叭，号召本家一起去跳舞。虽然战争期间条件比较艰苦，还是尽量组织一些活动，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星期六跳舞、看看京戏，过年过节，跳秧歌舞，跑旱船什么的，生活比较活跃。

四、东北工业区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

1945 年日本投降，这是大家政治生活中的大转折。苏联是 8 且初宣布出兵，日本 8 月 15 日投降。毛主席 8 月 13 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一次报告，我们都去听了。毛主席讲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主席平时讲话总是娓娓而谈，这次讲话却是激昂慷慨。他在这个报告里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他说，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丢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到重庆去。听到去重庆的消息时，毛主席已经到了飞机场，大家都忧心重重，议论纷纷。毛主席坐的飞机起飞以后，少奇同志、朱老总到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一次报告。总司令宣布，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争取和平，为了全局，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去，估计不一定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但也要从坏处着想。还宣布了毛主席离开延安以前的决定，他离开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席。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9 月中旬，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还没有回来。一路上，我们一天到晚打听，担心毛主席的安全。

我参加了一个到东北去的干部队。先到张家口。12 月，我到了承德。年底，到了阜新，见到林彪，把介绍信给了他，他指示：“ 跟着三师行动 ”。1 月 1 日，进了通辽。那时，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叫作“ 先遣军 ”，在通辽城里，四周围着个电网，不堪一击。后来又随三师到吉林前郭旗，接着是东北七千人下乡，主要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分日本人搞的开拓地，后来才搞土改，分地主的地。我在那里作了三年县委书记。这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提出，以城市为旅馆，以农村为家，不把农民发动起来，站不往脚跟，就死无葬身之地。那时大家是决心深入群众的，过一段时间回到城里开个会，碰个头，马上分头下去。这几年是紧张的几年。一块工作的几个红军干部、新四军干部在战斗中牺牲了，因为我们是处在前线的县。

1949 年 4 月份，我到北平参加全国青年工作会议。那时我在黑龙江省委研究室工作，兼青委书记。4 月 20 日，百万大军过江，4 月 21 日毛主席接见。我们坐上大汽车到香山，就在香山大门口外面，毛主席坐着吉普车出来，同大家见面。主持人讲，毛主席一夜没睡了，现在要去休息，只能和大家见见面，不能讲话了，由朱总司令讲话。毛主席同大家招招手就走了。在香山礼堂里，朱总司令讲，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大军已经胜利过江。这一次见毛主席，连我们都很兴奋，好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年轻人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不愿意让毛主席走。

我在东北工业部工作三年。少奇同志 1949 年下半年和高岗一起到苏联

去，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选派了一批经济专家支援中国建设，派个轻工业部副部长波格达辽夫，作东北工业部总顾问。他带一批人到东北，各个局和公司里都有苏联顾问。东北工业部各行各业都管，一共有 10 个局和公司。少奇讲，毛主席说了要认真地虚心地学习苏联经验。我们东北工业部那时很认真，每天晚上都要听汇报，你们这个厂、这个局苏联专家提了什么建议，你们怎么执行的，每天要汇报。1949 年底 1950 年初，毛主席到苏联去访问。东北工业部管煤炭的、管电力的好几个人跟毛主席去。毛主席在苏联签订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回来，经过东北，在沈阳给干部作了一次报告。这一次我们都去听了，毛主席着重提出了要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当时全国的经济秩序非常混乱，帝国主义封锁，资本家捣乱，上海的物价一天要涨几次。为了使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物价不稳的影响，毛主席指示，东北的货币和关内的货币不统一，关内用人民币，东北还是用东北币。这样，东北建设有个稳定的环境，就保证了东北能够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东北工业部当时是上下动员，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东北工业恢复比较快，1949 年 7 月 1 日恢复鞍钢的生产，接着恢复本溪钢铁厂的生产。以这个为标志，东北工业很快恢复了，发展了。

1952 年初我到北京来参加编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我是东北工业部的秘书长兼管生产和计划。编“一五”计划，东北是大头。陈云、富春同志亲自主持（富春从东北调来任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也是中财委副主任），中央其他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朱总司令经常去参加会议，听汇报。到 1952 年；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到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这一段陈云同志真是费了劲了，他硬是用了一年时间把物价稳定下来，主要是上海。

五、对苏联的援助不要要求太高

1952 年上半年编了“一五”计划。1952 年 8 月，我跟着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到苏联去。总理是团长，团员 4 个人，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王鹤寿、陈郁、刘亚楼、罗舜初、宋劭文等是顾问，我们这些人是随员。这个代表团有百把人，各行各业都有人去，我当时是东北工业部的代表。稍后，东北工业部撤销，王鹤寿任重工业部部长，我又算重工业部代表。我们在苏联呆了整整 10 个月，直到 1953 年 6 月才回来，调总理去了后，依据毛主席的意见，向斯大林讲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包括抗美援朝的形势和我们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要求苏联对“一五”计划给予援助。苏联人娄研究一下，总理就回国了，把我们这些人留下。接着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总理又去，谈了谈，又回来了。苏联十九大后人员变动比较大，估计他们顾不了我们的事，直到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开始分别谈判。苏联计划委员会有 14 个副主任，我们就分成了十几组，分别对口谈判。我当时负责冶金这个组，他们专门有一个副主任管冶金。与他们谈判时，他们一天到晚追问我们的矿产资源，我们答不上来，因为我们的地质工作太粗糙，条件太简陋，只有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十几台钻机，就是东北有一点，底子也很薄。苏联援助的项目基本确定以后，派宋助文回国汇报，他那时是中财委秘书长兼计划局长。宋助文汇报时，毛主席亲自听了。他回去给我们讲，毛主席很高兴，说，苏联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签字了。举个例子说，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第一个五年内

提出要修一方公里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一共也就是三万公里，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修了几十年才修起来的，我们五年就要修一万公里，苏联人听了认为做不到。所以谈判时卡风诺维奇问我们，你说要修一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多少车皮，你这些机车、车皮谁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电气，这一套东西，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时答不上来，最后商量下来，把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五千公里；这时苏联才答应，觉得差不多。协定于 1953 年 5 月 15 日签字，当时苏方的谈判主持人是米高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贸部长），卡冈诺维奇（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交通部长）、卡维尔（他是贸易部第一副部长，留美学生，后来曾到中国检查苏联援建项目）参加；我们这边是富春同志主持，宋劭文、钱志道和我参加，我是管重工业方面的，钱是管军工的。签了协定，完成了任务，我们就动身回国。

六、敢想敢说敢干，一切经过试验

“一五”时期，从传达中听到的毛主席的讲话，还是实事求是的。

1958 年大跃进，是从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成都会议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讨论了计划、财政、金融、物资、商业等的体制改革问题，形成了好几个讲体制改革的文件。1958 年 8 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 1070 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 1070 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间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 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 1070 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

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 1070，是 1100 多万吨，发表 1070（上年是 535，翻一番是 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当时他要秘书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 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 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上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1070 有个背景，就是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于，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于，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 年 8 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讲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

毛主席的是非功过已经有了历史的评价，我们的同志，特别是搞党史工作的人，应该根据大量的材料和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和分析毛主席。绝不能笼而统之他说，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毛主席晚年错误百出。毛主席晚年是犯了错误，搞大跃进是个错误，搞“文化大革命”是个大错误，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和牺牲！但是，对他犯错误的原因要作具体分析，要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毛主席相信过“四人帮”，真正下决心揭露“四人帮”的也是毛主席，不是他，谁有那个胆识能把他们揭露出来，毛主席把林彪提了起来，后来发现了他的问题，毛主席不顾一切地到南方各地去做工作，一般的人，不是大智大勇的人做不到这一条。周总理病了以后，毛主席决定把小平同志

请出来，并且提出，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对于毛主席的功过一定要作具体地研究分析，最后才能进一步作出正确的具体评价。

于平凡中见伟大

罗青长

或许是人之常情，当人们失去一件瑰宝时，会愈发珍视它的存在价值。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和理论工作者们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之后，我们回首毛泽东光彩照人的一生，就愈发感到他的可亲、可敬、可佩，于平凡之中见伟大，对他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历久而弥深。这里，仅将我在追随他工作时的所见所闻记录一二，以兹纪念。

一、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人们都认为毛泽东在他的鼎盛时期，用兵如神，主政贤明。孰不知在“英明伟大”的字眼里面蕴含着多少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劳苦和艰辛。他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1939 年，长期在敌人营垒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吴德峰从西安返回延安述职。毛泽东得知后，从百忙中拨冗邀见，恳谈了一整天。他详细地询问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军政要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治态度，矩细不捐。从宏观上，了解这些人中有多少人主张对日妥协拥蒋反共，有多少人拥护我党抗日政治主张，又有多少人持中间态度；从微观上，他指名道姓要了解某些人的具体态度。以后又令整理了详细的调查材料。这不能不说对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制定的“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以及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起了积极作用。

抗战初期，在延安流行着这么一种看法，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国民党的职业特务组织“中统”、“军统”是一丘之貉。我经过对陕西省三青团的调查，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其中倾向进步的是少数，坚决反共的也是少数，多数介乎两者之间，其中只有个别的特务分子。为此，我撰写了《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呈报中央。没想到竟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据说，它对我党制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当作打击对象起到了一定作用。

毛泽东这种注重调查研究、广纳群言的工作作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不胜枚举的。1959 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上任不久，毛泽东看到《西欧的四分立裂》的调查资料，他阅后批示：“这篇文章和宦乡的另一篇文章都是好文章。”他在认真分析综合了各方面提供的材料之后，得出了“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结论。

1970 年，正当中央考虑如何打开对美关系时，毛泽东看到了《尼克松的心事》的调查资料，认为尼克松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不同，但为美国国家利益着想，还是愿意与新中国搞好关系的。毛泽东阅后，立即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可以说，这篇研究报告为中央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起到了较好的谘询作用。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一切正确决策都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二、对一则“反革命”传闻的调查

1942 年夏天，延安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住在边区政府窑洞里的一位县委书记被雷击死了，群众中议论纷纷，有的人甚至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话传到边区保安处那里，有关领导很震惊，认为这是反动言论，一定要追查。毛泽东知道后，严肃他说，这事不要去追查，你们倒是应该调查一下老百姓为什么会骂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当时延安地区军政人员过多，征收的公粮数额过大，老百姓负担过重，于是在部分群众中产生了不满情绪。毛泽东得知后，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决定采纳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搞大生产运动。从而缓解了矛盾，为克服当时业已存在的物质困难制订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豁达的革命胸怀和善于自我批评的高尚品格。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他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想，上述那段故事既是这段话的背景介绍，又是这段话最好的注脚。

三、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

1943 年，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杨家岭迁至枣园。当时枣园有十几户人家，其中一户是富农。保卫部门考虑到中央首长的安全，建议当地老百姓迁移。毛泽东听后很不以为然，他厉色道：“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党中央机关和当地群众水乳相融，鱼水情深。当地农户牧羊时就从毛泽东的窑洞顶上穿过，毛泽东在饭后茶余也时常找陕北老汉聊天。逢年过节时，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经常请当地群众来作客，当地群众也经常来中央机关拜年、扭秧歌，这些感人的场面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得到了反映。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决不是艺术的加工，而是历史的写照，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其中孕育的力量。

毛泽东联系群众的面很广，从党内到党外，从社会名流到普通一兵。他待人总是动之以情，以诚相待。1947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病故。当时由于“左”的影响，没有及时发消息。毛泽东知道后，发了火，他说，你们不发消息，那我毛泽东就写挽联。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寄托对那些曾经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的哀思，从张思德到李鼎铭都是如此。

1947 年 7 月，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因不满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几经辗转来到我中央后委所在地，但迟迟未能安排工作。毛泽东知道后，发了脾气。他说，当年人家赵寿山是正规军，我们红军是游击队，人家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人家垮了杆，落了难，我们要对得起朋友。当年人家怎样对待我们，今天我们就怎样对待人家。经毛泽东提议，赵寿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这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争取瓦解国民

党军、解放大西北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如之奈何？”

1947 年我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与敌人周旋，在这期间有许多惊心动魄的趣闻轶事。

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后，一些人考虑到党中央的安全，劝毛泽东东渡黄河。毛泽东诙谐他说：“我是一块臭肉，走到哪里苍蝇就叮到哪里。”他力排众议，执意要坚持在陕北。他就是这样在关键的时刻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减轻其他战略区的压力，主动承担起牵制十倍于我之重兵的任务。毛主席留在陕北，极大地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

1947 年 7 月，敌军马鸿逵部二个骑兵团、刘勘部四个旅南北夹击，妄图“捕捉中共首脑部”。毛泽东则巧妙地将中央前委置于胡、马两军接合部的定边之小河村。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一次，我中央警卫团担任外围警戒的一个排与敌军搜索营接了火，击退了敌军。我中央机关冒雨连夜向西转移。当时，敌军判断遇到我军主力，惧怕被歼，也匆匆向西撤退。恰与我相向而进，两军只一深沟相隔，敌人人喊马叫，均清晰可闻，情况十分险峻。中央有三天停止了和各大战略区的无线电联络。各大战略区的首长都十分担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危。险情过后，东北局来电，说东北有巩固的后方，欢迎党中央到哈尔滨坐镇东北、指挥全局。毛泽东回电说，东北我很想去，但这是打败胡宗南以后的事情。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他们就是抱着“得胜”、“必成”的坚定信念，在最艰苦最险恶的环境里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指挥着全国的战局。1947 年 10 月的一天，胡乔木、王净、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和我，在陕北佳县开完一个机要业务会议以后，结伴去白云山下看望毛泽东。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邀我们一起来到黄河边，并招呼我们站在他的身旁。他把两手叉在腰上，兴冲冲地大笑着说，“小鹏，来给我们照张合影，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如之奈何。”真可惜，由于小鹏的相机出了故障，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没能留下，但毛泽东那恢宏的气势、那潇洒的雄姿，却永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上述几点回忆，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只能算是沧海之一粟，但即便是一滴海水，也能映射出太阳的光辉。从上述几段趣闻轶事中，可以看到我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光彩照人的品格，集中回答了毛泽东之所以为伟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之原因所在。我们要永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挥送瘟神

徐运北

1955 年 11 月 16 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我，毛主席在杭州开会，要我立即去汇报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当时我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第二天早晨我即赶赴西效机场，乘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送文件的飞机去杭州。

一

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患此病者血吸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为毛蚴，侵入钉螺，发育繁殖为尾蚴，逸至水中，一般人接触有尾蚴的水即侵人体内导致发病。此病在我国流行，由来已久，晋隋以来的祖国医学文献中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本世纪七十年代先后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和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一男一女两具古尸，均在尸体中查出血吸虫卵，说明至少在 2100 年前此病就在我国长江中下游流行。解放前，有的专家学者对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曾作过一些调查，而国民党政府未采取任何防治措施。1949 年解放军在渡江作战和水上练兵中大批感染血吸虫病，引起注意，开始了防治工作。初步调查发现，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儿童得病影响发育，甚至成为侏儒。妇女得病多不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影响劳动，到了晚期，腹大如鼓，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造成许多农村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材。血吸虫病实在是危害人民生产、生活、生育、生长、生命的一种严重疾病。1953 年沈钧儒先生在大湖疗养，发现血吸虫病流行猖撅，9 月 16 日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极为关注，9 月 27 日即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将来信转给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处理。卫生部门也加强了调查研究和防治措施，作了许多工作，但和任务的要求差距还很大。随着广大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保障人民健康，发展生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任务。

二

11 月 17 日我到杭州后，中午就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毛主席在午饭时间，一面听我汇报，一面和柯庆施等省委书记商谈。毛主席说，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农民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当我汇报到危害人民的几种疾病，最严重的是血吸虫病，患病人数多、流行地区广等情况时，毛主席说，有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又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我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主席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省市委书记们插话谈到各地发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都赞成要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当时卫生部有一个十五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初步计划。有的省委书记说，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否可以提前消灭血吸虫

病。毛主席说，要考虑广大人民的要求，经议论，后来改为七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大家在讨论中谈到防治血吸虫病不只是卫生部门的事，也关系到农业、水利、宣传、教育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有统一领导。毛主席说，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由柯庆施负责。大家还谈到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当天下午毛主席和省委书记继续开会。晚饭时，仍然是一面吃饭，一面议论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最后毛主席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柯庆施为组长，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就叫九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地、县也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要迅速在上海召开，各省立即行动。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依靠党的领导。各有关党委要亲自抓，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并尽快编出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对毛主席的指示都很赞成。

毛主席还亲切地指示我："你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到上海准备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点疫区的情况，一定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亲自掌握情况……"。第二天上午，由浙江省卫生厅的同志陪我到嘉兴县重点乡了解病人和钉螺分布情况，然后转赴上海。在疫区，我耳闻目睹，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使我受到的教育终生不忘。

毛主席在杭州和南方省委书记研究农业问题之后，又在天津召集北方省委书记进一步研究，形成了《农业十七条》。1956 年 1 月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商议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形成《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接着，中共中央在北京邀请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科技文教等方面的专家和各界人士一千多人进行座谈讨论，又作了修改。1956 年 1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做为一项重要内容。

1956 年 1 月 25 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 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二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高潮的新形势。1956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 月 17 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主席的号召，成了全党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动员令。毛主席对当时广大农民和疾病作斗争的豪情壮举非常重视，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三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于 1955 年 11 月 22 日到 25 日在上海召开，由柯庆施主持。到会的有重点地区省市负责同志、血防工作干部和部分专家教授等。会议首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阐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重要意义，分析了由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提高，给消灭血吸虫病带来了有利条件。大家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认为毛主席高瞻远瞩，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高度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到议事日程，大家也检讨自己思想落后于形势发展，对群众关心不够，对血防工作认识不足的保守思想，决心进一步提高认识，搞好血防工作，魏文伯作了会议总结。

会上了解，有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十二个省、市区的 243 个县市（后陆续发现为 378 县市）流行血吸虫病，患者约一千万人，约有一亿人民受到威胁，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具体步骤是“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会议强调了血防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必须实行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既要积极治，又要积极防。会后又召开了血防科研会议，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挥中医作用。对科学技术工作强调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统一规划，同时要总结群众经验。

1956 年 3 月 5 日，我向毛主席书面报告召开第二次血防会议的准备情况，毛主席于 3 月 7 日即作了批示：“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省，也应让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外，钩虫病及其他严重的疾病也要加以讨论，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九人小组将参加血防会议的单位由长江中下游六省。市扩大为十二省市，并把钩虫病、丝虫病等其他几种危害人戾严重的疾病列入了防治规划。

第二次血防会议于 1956 年 3 月 24 日到 28 日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流行血吸虫病的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部分地、县代表，血防工作人员、科技人员、中央有关单位的同志。这次会议主要是检查第一次会议后的工作，总结交流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防治血吸虫病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各地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季节，因地因时制宜。

自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立和上海两次血防会议后，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动员，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制定规划，采取各种措施，充实防治人员，建立健全防治机构，加强科学研究，教育发动群众，血防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原来卫生部门有的血防人员认为任务重，难度大，防无妙法，治无良药，信心不足。现在情绪高涨，认为“有了奔头”。尤其是广大群众听了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传达，更是欢欣鼓舞。他们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才能消灭血吸虫病”。“共产党领导我们发展生产、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要以消灭血吸虫病的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各有关部门也积极配合，把防治血吸虫病作为本部门的一项工作任务。农业部门结合各项生产活动做好灭螺工作。水利部门根据“疫区优先治水，治水优先灭

螺”的原则，把兴建水利设施与消灭钉螺结合起来。畜牧部门承担了耕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共青团、妇联和疫区驻军也积极参加了防治活动。许多血防科技人员，深入疫区，结合实际进行调查和科学研究，基本掌握了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特点和规律，提出了水、湖沼、山丘三种不同类型及其防治对策，在灭螺、治病、防护等方面也研究总结出一些更加有效的药物和方法。从 1955 年底和 1956 年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各个疫区蓬勃开展。

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国务院于 1957 年 4 月 20 日发出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示中总结了前一段防治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强调要进行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深入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并要进行反复斗争。

中共中央于 4 月 23 日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的通知》，强调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防治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并定期向中央作报告。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柯庆施、魏文伯主持下，每年都召开血防工作会议，进行检查部署，并向中央作报告，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1962 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系统地总结了前几年防治工作的经验制定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条例（草案）》，报请中央批转各地试行，有力地推动血防工作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对血防科学技术工作非常重视。1956 年 2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先生向毛主席写信建议，消灭钉螺用火烧的办法更为彻底。毛主席 3 月 3 日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嘱请秉志先生参加血防会议。1956、1957 年毛主席还分别在广东、上海接见从事血防科研工作的陈心陶。吴光、苏德隆等专家教授，倾听他们的意见，指示研究的方向，给科学工作者很大的鼓舞。毛主席还十分关怀血防工作进展情况。1958 年在安徽视察时，亲自看了安徽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他在上海时也不只一次听取了魏文伯关于血防工作情况的汇报。毛主席对血防工作的关心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向血吸虫病作斗争。

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 6000 多病人，钉螺面积有 972000 余平方米，近几十年死于血吸虫病的有三千多人，有些村庄几百户只剩下了几十户，十几户。1956 年春传达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结合实施农业发展纲要，余江县委紧急动员，制定“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指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掀起了消灭血吸虫病热潮，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六千多病人也全部治愈，经过两年苦战，消灭了血吸虫病，疫区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劳力增强，产量提高，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58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主席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送瘟神》诗篇发表后，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励着广大人民再接再励，向血吸虫病进军，夺取更大的胜利。

几千年来血吸虫病危害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旧社会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对血吸虫病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积极防治，结合生产，发挥中西医力量，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进行反复斗争，“天连五岭银锄落”，“纸船明烛照天烧”，终于送走了“瘟神”，实现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送瘟神》是广大人民和血吸虫病战斗并取得胜利的革命史诗，又是从没办法防治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总结。在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中，虽然也受过左的和右的干扰，但毛主席制定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道路是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在卫生工作上的体现。

根据中央血防九人小组领导血防工作的经验，1960 年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加强鼠疫，克山病等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

毛主席总是把卫生工作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卫生工作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1960 年 3 月 18 日，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又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指出：卫生工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并具有移风易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意义。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新中国卫生工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难忘的 1975 年

铁瑛

1993 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回忆往昔，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其中尤以 1975 年最难忘。

1975 年春节将到，浙江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保密电话：毛泽东主席 2 月 8 日将从湖南乘专车抵达杭州。读完这一页薄薄的电话通知记录，肩头仿佛陡然搁上一副千斤重担，我心里沉甸甸的，坦率他说，是担忧大大超过了喜悦。尤其是来到毛主席专列即将停靠的昆山门车站站台上等候时，我不停看表，不时扭头向钱塘江大桥方向眺望，心绪不宁，焦虑万分。

这和我历次见毛主席的心情一点不同。

记得 1958 年夏天，我当时是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三次司法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前一天宣布：明天，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要接见全体会议代表。掌声似惊天动地的春雷，在会场里久久回响。

那一晚，我失去了往日的沉着和冷静，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眼角不时溢出幸福的泪花，兴奋地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参加革命二十一年了，我从参军当战士到当干部，从八路军到解放军，都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锁导和指挥下，亲身经历了我们的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了日本侵略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八百万的战斗历程。全国解放后，我担任过上海公安总队政委，又亲眼目睹担任市长的陈毅元帅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依靠全市人民，粉碎美蒋军事轰炸、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活动，并能化腐朽为新生，根除了上海滩的流氓、妓女，促进了城市工商业发展。二十多年的革命经历，使我打心眼里热爱和尊敬毛主席和党、国家的各位领导人；希望不仅从书报杂志和电影上见到他们，还能在现实生活中一睹风采！记得读抗大时，曾经看朱德总司令打过篮球，听他上过党课，还听彭德怀副总司令讲过话。解放战争时期和进大上海后，负责过华东局陈老总、三野首长的警卫工作，熟悉他们爽朗的笑声和幽默、智慧、宽阔、平易的胸怀。1950 年到北京向苏联专家学习防空，听过周恩来总理抗美援朝的形势报告。后来在南京也听过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见过刘伯承和叶剑英同志。只有毛主席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过去只读过他的著作，电影里看过他的身影、听过他的讲话录音。当知道明天就能亲眼看见毛主席了，作为一名老战士，我怎么能不激动？！

接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空地。那一天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四个会议的代表五六百人，按会议分片，片片相连，组成一个椭园形的“人造梯田”。整个第一排的座位都是空的，大伙猜想。毛主席一准坐最当中，照相机在大转盘上转一圈，把五个会议的代表都拍上。所以大家相互提醒：眼睛睁大点，盯着那中间的位子，千万不要失去千金难买的一瞬间。那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似乎用语言无法描绘。

1962 年，我去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做民主集中制的报告。毛主席的演讲从古到今，从中央到地方，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要实事求是，要民主集中，不能个人说了算。我记得非常清楚，毛主席用他浓重的湖南乡音说：个人说了算，迟早要霸王别姬！记得会议临近春节时，对开会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回去过春节后再回来开会，一是会议代表都留在北京过春节。大会征求意见时，毛主席凑近麦克风面向代表提了个建议：在北京

过春节吧，比你们那里还会热闹！一句话说到代表们心里去了，满场笑声掌声，气氛非常活跃！那种领袖和各级党政军干部自然、融洽、亲切、和睦的情景，让我久久回味，永世难忘！

谁能料到，自从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之后，事情竟起了变化。从主观上说，我希望自己能够跟上，可客观实际决定了我始终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刁已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总想不通：各级党委领导机关被冲垮，沿海边防部队也无法安心执勤上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能安心种田，学生不读书，照此下去，中国还能强大吗？！我常常心对口，口对心他说：毛主席已是古稀之年，他老人家对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还能否了解全面？！1968 年国庆，我有生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想想自己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礼，心情是异常激动的。尤其是站在走道边，望着毛主席从面前走过时，步履稳健，笑容满面，精神抖擞，并无老态，心里一阵宽慰和轻松。可是，看到周总理消瘦的脸庞上却没有一丝笑容，我的心不觉蒙上一层阴影。陈毅元帅身着便装，低着头走过来。他是我的老首长，我习惯地立正行举手礼，并向他问好。陈老总站住了，向我点点头，用力握握我的手，从他眼神中我明白，他一定认出我了，可他没说一句话，没露一点笑意，步履匆匆地离开去，我心像针扎一样！陈老总可是位叱咤风云的帅才，如今被批为“ 二月逆流 ”黑干将，他不说话，是怕连累部下啊！说实话，革命三十几年来，我从没像“ 文革 ”中这样犯糊涂：喜乎？忧乎？皆有；悲否？恨否？难分，真真实实是：剪不断，理还乱，心里只盼着早点结束“ 文化大革命 ”，早点结束无政府状态，让各项工作走上正轨，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脸上都能再展明朗的笑容，……

1972 年 4 月，我被中央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 五一 ”那天走马上任后，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狠抓工农业生产，浙江一度形势不错。可是，从 1974 年开展批林批孔以后，省委被冲击、分裂，全省派性斗争文一次泛滥，金华地区武斗频繁，且愈演愈烈，已不是一般的舞枪弄棍，而是真枪实弹，步枪、机枪、手枪、手榴弹两派都有，每天乒乒乓乓，枪声爆炸声不断。1975 年 1 月份，我受省委委托去金华地区收缴武器，虽说经过艰苦的工作，收缴了三四百支枪，武斗也停了下来，可当我被召回杭州开会的第二天，金华地区又响起了枪声！我深感痛心和困惑：党的领导如此缺乏权威和软弱无力的状况，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不曾有过！

这次毛主席从湖南到杭州来，金华是必经之地，省委向金华造反派下了死命令：2 月 8 日将有重要“ 外宾 ”专列途经金华，无论哪派有人开一枪，都要拿派头头试问！然而，“ 文革 ”以来天下大乱，党中央的命令造反派尚且看对不对“ 口味 ”，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何况连续被冲击被批判的省委的指示？！万一……

终于，喷云吐雾的火车头从远方驶来，那平时听到刺耳的汽笛声，今天却象一支优美动人的抒情曲，我禁不住笑着长长舒了口气。

谭启龙同志和我走进专列车箱里，原本坐在沙发上的毛主席，身体向前一倾，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双臂一用力，没要人搀扶自己站起身。从他利落的动作上看，很难想象面前是位八十二的老人。

毛主席先握住我的手问：“ 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

我心里一阵惊讶：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

不知为什么谭启龙同志没哼声。我便接口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那是几天前，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四届人大精神，造反派冲进会场，要把我们俩抓走，是警卫部队赶来才把人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但杭州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了，干部会议只能易地召开……。是呀，在“造反有理”的氛围之中，干部除了作自我批评还有什么理可言？！

落坐后，恐怕因为熟悉谭启龙同志，毛主席面带微笑地先问我：

“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哪？”

“河南人，南乐县的。”虽说是第一次与毛主席谈话，我心里并不紧张。

“在哪里读书的？”

“在保定二师。”

“哦，保定二师，那个学校，好学校。”毛主席明显带有赞赏的口吻。“谈谈省里情况吧！”

于是，我们就汇报了省里的生产情况：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省里许多工厂停工，象杭州钢铁厂，1973 年时生产形势很好，还炼出特等钢，批林批孔以后，造反派说：多生产几吨钢铁算什么！苏联钢多，不还是修正主义？农村也受武斗影响，江南鱼米乡，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

毛主席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有的地方点点头。前后谈了二十多分钟。直至我们再三请主席下车去宾馆休息，他老人家才停止询问。

毛主席毕竟已是八十老人，身材又魁梧，下火车已不太方便，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费了点劲，才下到站台上。汽车送毛主席穿过市区向西湖的南岸汪庄驰去。

毛主席住在汪庄一号楼，此次杭州之行，主要是医治眼睛，前后在杭州住了两个月零五天。省委分工我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所以，白天我去省委开会、工作、晚上住进汪庄六号楼。

春寒料峭，毛主席很少户外活动。这期间，他委派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伺同志，经常找我去汇报省里工作情况。

到底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运动遗留下来成堆问题的真实情况，还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我没有犹豫，毅然选择了前者。尽管自 1974 年以来，我被大小会批斗了数十次。批我否定“文化大革命”，举逸民、请隐士，宣扬“唯生产力论”等等，纲越上越高，造反派甚至想把我划到林彪死党之列。那时我毕竟已是年近花甲：被批斗一年多，不知人瘦，只觉原先量体裁制的衣裤变得晃晃当当，可是，我从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更不愿把责任推给下面。我当时心中有一个信念是从没动摇过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绝不会看轻中国黎民百姓的温饱冷暖！这倒不是林彪“大树特树”的“功劳”，而是我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的：

就说 1958 年夏天的那次接见，五个会议的五六百位代表，都急切地期待着毛主席接见的一瞬间，也只奢望一瞬间，毛主席多忙嘛！突然，掌声欢呼声骤起，毛主席在前，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谈笑风声地从怀仁堂内走下台阶，健步向我们走过来。

一个谁也没料想到的场面发生了：毛主席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到第一个会议代表前面，面向大家鼓掌，然后，回身在这个会议代表的第一排空位上落座，拍照。然后，毛主席带头又走到第二个会议代表前面，鼓掌、落座、拍照。如此这般，毛主席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块五起五落，前后用

了四十分钟，分别与每个会议代表合影留念！等于说，每个代表都能与毛主席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欢聚四十分钟！

我兴奋极了，四十分钟里手拍红了也不觉得痛，那是为毛主席的不凡气度，为中央领导的团结一致，更是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领导身居高位却具有极强的群众观念而产生的激情！

还说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大年初一晚上，毛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和大会代表们一起联欢。毛主席登上主席台时，记者蜂涌而至，拍照的，录音的，像在主席前面砌起人墙。此时，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极强的群众观念，他不断挥手让记者离开，直至能让大家都看到后，才离开主席台。1973 年中央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许多代表跑到主席台前看毛主席，工作人员扶主席离开，毛主席讲：他们不幸，我怎么能走。一直等到代表走完，主席才离去。此情此景实在感人！

细微之处见精神，我从没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赖！况且，1972 年 3 月 30 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解决浙江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同志，依据大量事实义愤填膺地揭发林彪及其死党的累累罪行后，周恩来总理面露微笑，握着我的手用力摇了摇，大声称赞说：“铁瑛同志，你真痛快！”然后又紧紧握了握马龙同志的手说：“马龙同志，你也痛快！”

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后，我永远记住了总理的微笑和“痛快”的赞许，什么时候都要坚持痛快地维护党的利益。

我把省里存在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一一汇报了，最严重的是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甚至出现了本人尚且不是党员，却当介绍人发展了七、八名党员的荒唐事。提出如果在省里为所欲为的几个派头头不调开，如果“双突”的问题不解决，已被解放、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就无法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无法按四届人大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发展工农业生产，全省就无法安定团结，北粮南调的悲剧还要继续重演……

我心里清楚，当时中央内部并不一致，我也知道，造反派头头是有人撑腰的，弄不好，我还可能被批判、被打倒，然而，个人的荣辱与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前途相比较，毕竟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

很快，中办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并作出了果断决定。那天我在场，中办领导同志拨通了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通知王洪文：毛主席批准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此一举，对杭州市起了稳定作用，无法无天的派头头的嚣张气焰受挫，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市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4 月 13 日晚上，我们省委正开会，突然接到中办领导同志的电话：主席今晚要走，谭、铁两位书记快来！

我们急忙向警卫处要车（那时警卫制度甚严，只有警卫处的车才准进汪庄）。我们象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火，足足等了四十分钟汽车才到。我们赶到汪庄时，中办领导同志迎过来说：你们怎么才来，毛主席想跟你们再谈一谈，现在来不及了，赶快去吧。我们快步来到一号楼，毛主席已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进汽车，隔着玻璃窗，毛主席看见了我们，他神情安祥地向我们挥了挥手。

汽车开动了，走远了，我心里十分懊恼，也非常惋惜。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我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会面，只是觉得因为汽车未能及时进汪庄，竟失去了一次聆听毛主席指示的机会，太遗憾了！但是，我又充满希望：我亲眼

所见，毛主席在杭州治病期间，通过中办领导同志，通过省委领导，通过其它各方面同志，了解了浙江大量情况，我相信，他老人家是会作出决策，使许多问题得以解决和明朗化。

此时，因周总理病重住院，邓小平同志己全面主持中央工作。毛主席回北京不久，中央便派纪登奎同志率领工作组来到浙江。纪登奎同志亲口对我说：这次带工作组来，小平同志亲自交代要为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制定出办法和措施。王洪文原来管华东的事情，纪登奎把他也拉来，本来王洪文不想来，（后来知道毛主席已批过“四人帮”）勉强来了，他也不正经参加会议，还要想去温州看看，因我们正开着会，他才未去成。

纪登奎同志还对我说：临行前，他去医院看望周总理，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交代。周总理很动感情他说：浙江是鱼米之乡，可现在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我听说，运粮的火车厢上大字写着送给浙江懒汉吃！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总理眼角闪着泪光，语调十分沉重，最后再三叮嘱：一定要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我听了这些，心情非常激动，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有小平同志整顿的决心，这次浙江问题，大有希望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

经过中央工作组的努力和浙江县以上干部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在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共中央 1975 年 16 号文件，并送毛主席圈阅后下发了。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浙江对各级机关、企业中“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大批人进行了清理，不够党员标准的，坚决劝退出党；不够干部条件的造反派头头，坚决调离领导岗位。从而纯洁了组织，打击了派性，扶植了正气，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各级领导。虽然当时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由于 1975 年贯彻中央 16 号文件时，浙江省委态度坚决，措施得力，比较有效地纯洁了组织，批判了“左”的思想和派性，因此，在 1976 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浙江没有大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浙江揭批查的工作和迅速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都得以较为顺利地进行！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毛主席晚年犯有错误，直至逝世不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一位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先驱，因而，1975 年才会亲自批准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 16 号文件！

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1975 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难忘。

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

于光远

我有机会多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了解到有关他与自然辩证法的一些事情。

一、在延安时有关自然辩证法与毛泽东的几次接触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我是在 1940 年 1 月。那时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我们想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会的筹备情况，请他参加成立大会，并做演讲，给大会做指示。他通知屈伯川和我两个人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去。毛泽东对成立这样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团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为陕甘宁边区建设作贡献，非常高兴，答应我们开会时一定去。那次谈话时间不长。除了谈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外，毛泽东还问了些他关心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人的情况。汇报和回答主要是屈伯川讲的，我估计我没有给他留下比较深的印象。但是那次谈话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原先我没有想到他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那样关心，没有想到他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哲学问题也那样关心。

1940 年 2 月 5 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召开。在延安的自然科学界和各机关、各学校的代表一千多人共聚一堂。在会上许多领导人发表演讲。正当代表们聆听陈云演讲时，毛泽东步入会场。在陈云结束了讲话之后，大家就欢迎毛泽东讲话。记得毛泽东在演讲中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生活生产都需要靠它来解决；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学习它。毛泽东还讲，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了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从自然界那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他说，边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更好地去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发展了。边区的社会制度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在这个演讲中还讲，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我们要研究自然科学。不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他那次演讲的时间有一个来小时，时间不算长，但是对自然与社会、科学与自由、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做了论述。这个演讲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很可惜演讲的记录当时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幸亏以后在《新中华报》上有一次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导，其中简单地记载了他这次演讲的一些要点。

第二次毛泽东和我谈话是在四个多月之后召开延安新哲学年会那一天。

1938 年延安成立了一个“新哲学会”。除了在延安的一些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外，毛泽东、张闻天也是这个团体的会员。当时我不在延安，我是后来由何恩敬介绍参加了这个学会的。1940 年 6 月 21 日，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开会的地点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毛泽东、张闻天和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恩奇作会务报告。随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和到会的会员们相继发言。开幕词、会务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哲学上作出的贡献。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人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这个会上没有专门讲

自然辩证法。但是在上件事情上同自然界的哲学问题发生了点关系。当时会上讨论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所讲的“防御阶段”到“相持阶段”之间是否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的问题。在这时候我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事物的质是由其内部一对矛盾规定的，这对矛盾解决了，事物就会从旧质向新质飞跃，就不会存在过渡状态或过渡阶段。如果事物的质是由多对矛盾所规定的，”那么就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其中若干对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旧质发生了变化，同时又有若干对矛盾还没有解决，因此旧质又未完全起变化。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旧质与新质之间就会出现过渡的状态或过渡阶段。当时我没有想出更好的例子，就用水和玻璃来做例子。我说水的化学成份比较单纯，所以在固体的水和液体的水之间就没有过渡阶段，而玻璃的成份比较复杂，所以在有一定形状的玻璃到完全流动的玻璃水之间就会有既呈形又不呈形的一种过渡的状态。毛泽东很注意我的发言。

会后，我们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我正好同毛泽东坐在一桌，并且就坐在他的旁边。他问我：“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我回答：“是。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又同我继续讨论关于过渡的问题。他说“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比如讲过渡的问题，你从自然科学讲到社会科学，这挺好嘛。”他就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讲了不少研究哲学的人要多学点自然科学这样的话，鼓励我继续在自然辩证法上下功夫。这次毛泽东和我一边吃着延安特产“三不粘”（一种用鸡蛋、面粉、油等原料精制的食品，吃起来不粘筷子，不粘碗，也不粘嘴），一边谈话，虽然谈的时间不长，可是我记得很牢。

第三件事要讲一讲的是，1944 年初毛泽东提出延安大学应该开一门全校师生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分三部分：先讲自然发展史，接着讲社会发展史，最后讲到中国的现实问题。开这样一门课，为的是使听众有一个关于自然、社会的完整的观念。他认为学马克思主义，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知识。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延安大学就决定开这一门大课。中国现实问题这一部分的讲授，由周扬担任，当时他是延安大学校长。社会发展史这一部分的讲授，由张如心担任，当时他是延安大学副校长。自然发展史这一部分的讲授，就由我担任。这件事我没有同毛泽东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接触。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周扬向大家传达的。但是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对自然发展史是给以高度重视的。

二、关于坂田昌一文章的一次谈话

上面三件发生在延安的事情，都是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在延安我也只是在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方面同毛释东有点接触。建国后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不限于这个方面，在有关自然辩证法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是由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引起的。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 1956 年制定我国 1956—1967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专门制定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规划》。随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建立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我兼任了这个组的组长。这个组从 1956 年 10 月起，办了一个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出了十

五期。1960 年夏遇到要整顿和减少现有刊物的事情。它停了一段时间，到 1962 年 8 月复刊。在复刊号上登出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1963 年 11 月 16 日，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 1962—1972 年科技十年规划时讲，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他接着讲：“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好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他问这个刊物是哪里出的。我回答了毛泽东的问题，但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本杂志这样的注意。回家后翻阅复刊后的那两期杂志，推断这是在刊物上发表了坂田的文章的缘故。

1964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接见前来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坂田时，对坂田说：“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当时我夜场，就完全证实了自己的推断。坂田见了毛泽东后问我毛泽东读了他的什么文章。我就告诉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登载了他那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第二天，毛泽东把周培源和我找到了他的卧室，从坂田昌一的文章讲起，有关自然辩证法的问题，谈了很长的时间。那次谈话我很快就整理了一个记录，在与周培源核对之后，定了稿。这份记录当时没有打印，我自己复写了几份。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在北京召集全国工业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当时我给了他一份复写稿。也在这个时候中宣部编印了一本供少数领导人阅读的毛泽东关于教育等问题的谈话，也把我的这份记录稿收了进去。文革中，红卫兵抄一些领导干部的家，我整理的这份记录稿就流传了出去，在好几种《毛泽东思想万岁》那样的本子里全文登了出来。

那天谈话的情况是这样的。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身旁的工作人员就把周培源和我领到了卧室。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第一句话是不无歉意地作了一句解释：“我习惯在床上工作”。我就说：“主席找我们来大概是谈坂田文章的事吧？”他说：“对了，就是这个事。”于是我们就坐在离床不远的两把椅子上。坐定之后秘书沏了两杯茶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都没有进来。谈话时房间里只有三个人，安静极了。于是，毛泽东就长篇大论他说起来。一开头他说：“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毛泽东讲：“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毛泽东又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毛泽东还说：“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球就更加多了。……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一大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在毛泽东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插进去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於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认识就深入了。

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我接着问：“哲学书里通常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毛泽东回答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的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这时，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后，他从天讲到地，从他讲到生物，从生物讲到人，就关于自然发展史的轮廓发表了一些想法，根本的思想是“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说的人类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是指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生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产生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代替它。”

话题又转到物理学的新发现上来。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但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辨证法”。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我在当时没有作记录，是用心地听、只是在纸上写了备忘性质的几个字。周培源倒是作了记录。回家后我马上作了追记，整理成上面提到的那个记录，共有四千字。上面我摘录的是那些同自然辩证法比较密切的段落。

由于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了李政道、杨振宁所发现的宇宙不守恒这种物理现象，并且提出问题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是这样。因此就在同毛主席谈话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和一些同志在同坂田一起坐船游昆明湖时，与他讨论了质量和能量守恒的问题，并把讨论的结果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第二年，即 1965 年 6 月，《红旗》再次发表坂田那篇《基本粒子新概念》的译文，由于坂田说苏联译得不甚准确，我们从日文重新译出，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并加了编者按语。同一时期还在“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专栏中发表一批文章包括朱洪元、龚育之和我的文章，其来由就是由于毛泽东对坂田文章的重视。这期《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对坂田文章中涉及的许多科学概念和事实的注释。朱洪元、胡宁、何祚麻、戴元本等物理学家后来在对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发展出“层子模型”的理论。他们运用了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这同毛泽东关于坂田昌一文章的谈话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毛泽东与自然辩证法”的回忆就写这一些。附带说一下，1948 年到 1951 年我兼任了两三年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毛泽东看过的书，属于这个

图书馆收藏的范围。其中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书，多半是比较通俗的。书的封面打上了“毛氏藏书”的图章，或者手写体的毛泽东签名的印记。部分书有毛泽东看过这些书的圈点、痕迹。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注意购买和阅读这些书的。

从我多次听毛泽东讲话、阅读毛泽东著作和上面讲的那些直接的接触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对自然辩证法一贯非常重视，有自己的见地，而且善于同社会科学、同他从事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也是毛泽东作为伟大哲学家的一个特色。

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

温济泽

我在 1938 年初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总社工作过。建国后到 1958 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在这 20 年间，听过毛主席很多次重要报告和讲话，偶尔参加过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和他接见少数同志时的谈话。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里记下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以寄托我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

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1942 年 2 月 1 日和 8 日，毛主席先后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

几天之后，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办公楼楼上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会。会议由毛主席主持。到会的约 20 人。我记得有：陈伯达，艾思奇，张仲实、柯柏年、丁玲、舒群，我也去了，还有哪些同志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开完会毛主席就走了。留下我们吃午饭，坐满了两桌人。

毛主席在会上说，召开这个会，是为了要编一本书。他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他说，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拿它作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

毛主席指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批评了当时延安知识青年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倾向。我记得，他在讲到绝对平均主义的时候，举例说，在座的同志，有人穿的衣服是斜纹布做的，有人穿的是土布，目前边区这么困难，斜纹布很少，多数人只能穿土布，要搞绝对平均主义，能行吗？他又举例说，晚上，有的同志用蜡烛，有的同志点油灯，目前边区的蜡烛很少，多数人只能点油灯，要大家都用蜡烛，能行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啊！

他归结起来说，产生这些思想，有立场观点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这些同志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改正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就容易发生错误。因此，要把帮助大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提出，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陈伯达，参加编书工作的，除他之外，还有张仲实和曾彦修同志。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我是学术秘书，除我们两人参加这个工作外，还有陈唯实、李又常（李续纲）等 10 多个同志。

两个研究室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首先把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延安能找到的外地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本，都搜集起来。然后分工摘录书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我们研究室的人多，大部分是我们摘录的。我们摘录、核对完了以后，交给艾思奇同志，他再核对，作了一些增删，并分类编排，加上标题，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他们摘录的论述加上，又加以总的编排、最后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对书稿看得很仔细。有些摘录，他又作了核对和增删。编排的次序，有些又作了调整。有些标题，是他修改和加上的。

最后的定稿，分为 4 章。

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下面分 4 节，重点是：论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旧社会主义的分歧；论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二章《理论与实践》，下面分 14 节，重点是：论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理论对于实际的重要性；论研究、分析具体环境、条件及历史特点，是决定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需要最大的灵活性；论主观主义、革命空谈与革命的实际背道而驰；论共产党员要成为有头脑的政治家；论必需终结书本与生活的脱离。

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下面分 11 节，重点是：论法则是从自然和历史中找寻出来，法则以合乎自然及历史为依归；论历史唯物论的应用不是固执的教义和抽象的格式，不是从“一般”的概念出发；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论考察基本的历史联系；论历史的方法与理论的方法之一致；论分析的方法——从单纯到复杂的思维过程与历史的真实过程相适应；论从事物的表现形式到本质关系的发现；马克思对若干错误学说的批判——把外国现实之理论的表现变成若干教义的集成，抛开事物内部的联系，抽出事物之一定的历史内容，咀嚼早已过时了的见解，主观主义的幻想，是庸俗经济学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征；论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一定的思想联盟之必要；论最伟大的科学家是反对偏见打破传统的创造家。

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下面分 4 节：重点是：论用批判的态度采取别国经验；论考察、研究民族的特点；论在一定条件下利用革命传统。

毛主席对分类和章节的标题改动不少，可惜这部书的原稿没有保留下来，毛主席改了哪些，哪些是毛主席加上的，已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章节标题都是毛主席审定的。可以说，这些题目，就是当时毛主席要我们学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要点。

这本书当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因为纸张缺少，印数不多。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重印了第 1 版，到 1963 年，印到第 6 版，6 版总计印数约 50 万册。

要把党的新闻事业办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4 年 10 月 4 日。

当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社址在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上。这天下午，我从中间山头上最高一排住的窑洞里下来，到西边半山腰的办公室去，走在山坡上，看见从山下上来两个人：毛主席同他的警卫员。

我加快步子赶忙跑去告诉博古和余光生同志。博古同志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光生同志是副总编辑。我跟着博古和光生同志到山坡上迎接，毛主席已经走到山上了。他微笑着同我们边握手，边说，“我来看看同志们。”后来知道毛主席是从飞机场回来，路过这里的。

博古同志要我通知大家，到印刷厂礼堂，同毛主席见面，听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谦虚地说：“我没有准备讲话，只是来看望大家的。”我转身就跑了。印刷厂在西边的一个山头，解放日报社在中间的一个山头，新华社和解放出版社在东边的一个山头，每个山头上都有三四排窑洞，每排窑洞有十几孔，从西到东一大片。我通知了一些同志，又要他们一排一排、一个一个窑洞去转告。大家听到毛主席来了，都急急忙忙往西边跑。山上立时出现了几条从东往西的人流。

印刷厂礼堂是一间简陋的土木结构的大房子，能够容纳几百人。整个礼堂都挤满了。人还没有坐定，毛主席在博古、光生同志的陪同下，已经走上讲台。

毛主席穿着一身兰灰色的布军装，容光焕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

在博古同志讲了几句热情欢迎的话以后，毛主席开始讲话。他的讲话很简短，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但是内容十分重要，深入人心，时隔多年，有些同志还能记得些大意。

毛主席说，党的新闻工作很重要。办党报，办通讯社，都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反映情况；一方面，指导工作。他指出，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别的来源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你们。党中央对于全国各地工作的指导，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靠报纸和通讯社。党的大政方针，都是通过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传达到各地和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去的。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了党的方针政策，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去奋斗，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他还讲到，报社同志不能关起门来办报，一定要靠大家来办，靠全党来办。报社要使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懂得怎样把报纸作为自己指导和推动工作的一种武器，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能利用报纸，共同来办好报纸，就可以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毛主席勉励大家一定要把党的新闻事业办好。他强调指出，你们不论是做新闻记者、编辑工作的，还是做出版、印刷工作的，做报务工作的，都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很多同志都会说，但是，如果不只是在口头上，而要真正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要每个同志问问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呢，或者是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的呢？他说，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做任何一件工作，办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夹杂着私心杂念，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语重心长他说，中国革命事业是长期的，是艰苦的。如果我们革命队伍里，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可以快些到来了。在不到一个月以前，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讲过一次为人民服务，这一次又反复他讲，并且告诫我们说，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极为深刻的。

要多做些科学普及工作

1946 年 6 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钱俊瑞同志约我一起去看看毛主席。

“你约好了吗？”我问。

“今天是星期六，王家坪有舞会，我们去参加，不是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吗？”他说。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吃了晚饭，我们就兴匆匆地到王家坪去了。钱俊瑞同志是刚从北平到延安的。当时北平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们党在那里办了《解放》报（三日刊，后改为隔日刊），还成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钱俊瑞同志是报社代社长（社长是徐特立同志，未到任）兼总编辑和分社社长。《解放》在 1946 年 2 月 22 日创刊，到 5 月 29 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报社和分社人员随即撤回延安。钱俊瑞同志过去长期在上海，在新四军中工作，到延安还是头一次，因此他很想看看毛主席。

我们到了王家坪礼堂的时候，人还不多。乐队奏起了舞曲。渐渐有些人跳起舞来。我和钱俊瑞同志就坐在旁边，等候毛主席。不一会儿，毛主席果然迈着轻快的步子进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江青和一个警卫员。

我们马上迎着毛主席走过去。毛主席也走过来，跟我们握手。我向毛主席报了自己的名字。

江青插话说：“这就是常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科学小品的温济泽。”

毛主席高兴地对我说：“你写的科学小品，我都看了，很好嘛！”我请毛主席对如何做好科普工作提点意见。

他说：“科学普及很重要。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懂得一点自然科学。要向干部普及科学知识，还要向边区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我说，群众中很多人不识字。

毛主席说，文字要写得通俗，要做到让识字的人念，略加解释，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

在谈到普及科学知识要着重哪些内容时，他说，一是要多介绍些生产知识，要能够帮助群众提高生产技术；二是要多介绍些卫生知识，现在边区者百姓不大讲卫生，要帮助他们懂得讲卫生的重要；三是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首先要破除迷信。

他还对我说：“我们党内懂得自然科学的人很少，你们一定要多做点科学普及工作，把这个工作做好。”

因为是钱俊瑞同志约我一起来看望毛主席的，所以我匆匆结束了同毛主席的谈话，赶紧让钱俊瑞同志与毛主席交谈。

毛主席向他问了北平的一些情况。他一一作了具体的回答。毛主席听得很感兴趣。

但是，为了不耽搁毛主席更多的时间，钱俊瑞同志谈了一会儿也就结束了。

我们都感到这是与毛主席的一次愉快的难忘的会见。

要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

1950 年 5 月 8 日。

那一天下午，中央三大新闻机关的领导同志到中南海去看中央文件。那时候，中央文件不发下来，要有关同志到中南海去看。这次去看文件的，有

人民日报社的邓拓、安岗同志，有新华社的陈克寒、吴冷西同志，还有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梅益、徐迈进同志和我。我们快看完文件的时候，胡乔木同志来通知说，毛主席要见见我们。

我们跟着乔木同志来到了毛主席办公室。毛主席站在门口迎接。乔木同志一一介绍，主席跟我们一一握手。大家在围墙摆着的一圈沙发上坐下。等别的同志都坐下了，只有主席办公桌旁的一张沙发还空着，我就坐到了毛主席的旁边。

因为乔木同志在介绍我的时候，说我不久前在《时事手册》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原子弹问答》，毛主席就问起我的工作近况。我说，我在广播事业局工作，兼做些科普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一个自然科学讲座，由我主持，我们请了一批科学家到电台播讲或者为讲座写稿。

寒暄了几句，毛主席就转脸向大家说：“请你们来，是想了解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党的政策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

大家谈得很随便。毛主席问得很仔细，从工人，农民，市民，学生，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工商界，民主党派，到国民党起义人员，都问到了。他不仅注意听好的反映，更重视批评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

谈了个把钟头，有的同志说要准备上晚班，有的同志说要参加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的一个招待会，就告辞了，毛主席要没有事的同志留下来。留下的有邓拓、安岗同志和我。

毛主席让我们同他一起吃晚饭。公务员提来一个四屉饭盒，其中三个菜，一个汤，又拿来一盆饭，一瓶红葡萄酒。毛主席给每人斟了一杯酒，他说他只能喝一杯，要我们随便喝。我们举杯祝毛主席健康，不过都没有喝干。

我们边吃边谈。毛主席问起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他知道我和邓拓同志三十年代初期都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谈起当时的一些情况时，他说，那个时候的作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吃完饭，又谈了一会儿，我们不想更多占主席的时间，就起身告别。

毛主席谆谆地对我们说：“报纸、广播都要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经常把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给中央。”

这次谈话，使我联想起毛主席过去多次关于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教导。我记起，在延安上党建课时，教本上第一课就讲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毛主席加了眉批说，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毛主席是经常教导我们，要把党和党员都看做不能离开水的鱼。

遥远的记忆

李希凡

我从少年时代就有爱幻想的毛病，尽管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孩子们的幻想，总归是画饼充饥。到了青年时代，欣逢解放，幻想却往往就变成了现实。譬如上学，特别是上大学，这是我十几岁和二十多岁时梦寐以求，而在旧社会终究不能实现，可青岛一解放，不过两三个月，我就被送进革命大学（干训班），结业后又分配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一直读到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班，但无论我怎样富于幻想，也从没有幻想过，因为写了两篇文章而为毛主席所重视，并掀起了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对此，近十年来已有了太多的海内批判和海外诽谤，然而，于我来说，往事总是美好的！

一、《在毛主席身边》

1989 年 11 月 21 日，《中国文化报》第一版发表了两帧照片：一帧是《抗美援朝战地文工团在被击毁的美军坦克上欢庆胜利》，一帧是《在毛主席身边》都是选自刚刚在中国美术馆闭幕的《我们同在年轻时代》摄影展。

这帧《在毛主席身边》，引起了我遥远的记忆。它摄于三十六年前（1954 年）的 12 月 21 日，那是在中国人民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第一天的大会上。（我只知道照片是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是人民日报苍石同志从当日会议照片中找出送给我的）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周恩来总理作政治报告，这是一次换届的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开过，毛泽东同志已当选为国家主席，他不再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而改任名誉主席，但仍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那是在没有改修过的怀仁堂，会场两旁还有廊子，场后连接着后堂，在周总理报告中间休息时，毛主席退场了，他从主席台走下来同委员们握手告别，那是怎样一个令人振奋的场面呵！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便都热潮般拥上前去，争着和他握手。要知道，在这个会议上，象我这样的青年人并没有几个，可以说中老年人居多，知识界更是如此。我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呢？我现在已说不清当时的心情，只记得握手后，我一直痴痴地跟在他后面走着，直至环行一周到东廊的尽头……。这帧照片上那种幸福、忸怩、拘谨的复杂的表情，大概就是我当时真情的流露，那场面，那情景，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在我，也包括我的同代人——共青团员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我们最崇敬的革命导师。在当时人们眼里、心里的毛泽东，就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就是解放了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不朽的历史功勋，虽然属于浴血奋战的各族人民，属于光荣的党，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属于那一代群星璀璨的领袖人物。然而，说毛泽东是他们的核心，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代表，却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的爱国的中国人，不崇敬他的，倒是个别的例外。在那热血沸腾的年代，又有谁不为见过他一面，或者同他握过手而感到自豪呢！

“毛主席万岁！”那是发自肺腑的欢呼声！我沉浸在幸福中……毛主席已在人群簇拥里走出了怀仁堂，我却仍然呆呆地站在东廊上。这时，胡耀邦同志走了过来（他是我们政协青年团代表小组的组长）拉着我的手说：“走，去见见总理！”我也看到了周总理正站在东廊出口处同一位委员交谈。现在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那交叉双臂的习惯的站势和交谈中不断发出的清朗的笑声。当听到耀邦同志的介绍时，他用炯炯有神的眼光打量着我，我也有点拘束。总理可能看出了我的紧张，就先同我聊起家常来。问我原籍哪里，哪年入的团，有没有结婚，“蓝翎是你爱人吗？”听了总理和蔼可亲的问话，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一一做了回答。当听到我说蓝翎是我的男同学时，总理开朗地笑了，说：“人们总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总理这次同我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会场上响起了铃声。谈话的大意是：毛主席表扬了你们的文章，可青年人有锐气，也容易骄傲。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警惕这些毛病，就会少犯错误。特别是你们，现在有名了，会有人包围你们。要清醒，不要犯生活错误，毁了自己。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为党工作。……总理的教导虽然久久回响在我的脑际，但毕竟没有刻骨铭心，在以后几十年的文艺道路上，有时还是犯了那些毛病，造成了很多损失。

当日（12 月 25 日）晚，政协在北京饭店酋楼宴会厅举行了宴会。我记得当时和我同桌的，有朱学范（他当时是邮电部长）先生，范长江同志等。我只知道范长江同志——因为他是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人们刚刚就坐，突然从进门的几张桌上响起了掌声，接着掌声响彻了宴会厅，全体起立了。我看到毛主席的高大身躯在一位同志的引导下，正健步走向厅中的主桌，随后是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周总理……

宴会开始了，我这一桌上的老同志多，他们一面祝酒，一面回忆、谈论着往事，小字辈就我一个，我只有默默地听着，不时地伸长脖子望着主桌上的活动。我看到总理频频向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张澜先生、陈叔通先生、李济深先生等含笑祝酒，也看到一些老同志和毛主席碰杯。我的心早已飞向主桌，我多么想也去毛主席身边祝酒，但看了看周围，又有点不敢。朱学范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意，鼓励我说：“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同志（可惜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名字），见我还踌躇不决，就拉起我直奔主桌，他一面向毛主席敬酒，一面介绍我说：“他是李希凡。”毛主席含笑起立和我碰杯，看着我说：“谢谢你。”我也急急忙忙他说了一句：“祝毛主席健康长寿。”这时，少奇同志也在毛主席身边。他把手伸给我，眯起眼睛瞧了我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很年轻嘛！”

我早就听说过，周总理有惊人的记人能力，我也有过亲身体验。那是隔了十几年后，偶然奉命陪他接见日本文化界访华团。我当时虽已比这张照片增加了三十公斤的体重，他仍然能第一眼认清我是谁，问到我个人的情况。可毛主席也有那么好的记人能力，却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这次宴会上敬酒的一瞥，我却没有想到还会给毛主席留下什么印象。一个多月后，政协在中南海举行 1955 年春节团拜，我得到了邀请。那时的怀仁堂两廊有隔开的小间屋，每屋设一桌席，我是在第二间屋的那张桌。我只记得同桌人有聂荣臻元帅和荣毅仁先生。聂帅看到了我的名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打完了。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这时，毛主席在中央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一一和大家握手拜年。我记得他同荣毅仁先生握手时还说了这样两句话：“你的建议很好，我们都看了，可以研究嘛。”我想那大概说的是当时工商界的事。最后是和我握手，还特别盯住我看了几眼，象是有些眼熟，又一时记不起这里的唯一的“小家伙”是谁，他似乎在追忆着，已经走出了这间屋又返回来，重新和我握手说：“你是李希凡？”

我真高兴极了，赶忙回答说，“是我，是我。”毛主席终于记起了我是谁，这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概也正因为有了这次小插曲，所以在 1956 年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耀邦同志把我介绍给他时，他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毛主席这句诙谐的话，引起了周围很多人的笑声，摄影家吕厚民同志曾经拍下了这个镜头，而且把洗出来的照片也给我看过。那是一个充满欢快的活跃的场面，也是我所能得到的毛主席和我握手的唯一的照片。很可惜，那时的吕厚民同志的原则性太强，仅仅由于毛主席的鬓角稍稍有点失光，无论我怎样苦苦相求，他都不肯把底片给我，而我也就永久失去了那张握手的唯一的珍贵照片……

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在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和我有关的，有两封书信。一封为大家所熟悉，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已收编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它虽写于 1954 年 10 月 16 日，但当时看到这封信的人并不多，我们也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只是从邓拓同志（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我们的谈话中隐约地听出，毛主席看过我们发表在 1954 年第 9 期《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此文批评了俞平伯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观点。毛主席在信中肯定了我们的批评，同时也涉及了当时文艺界的某些倾向性的问题。此信虽未公开发表，却在学术界开展了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对这场“批判”应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当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都有所涉及。而我则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已在拙著《文艺漫谈》和《文艺漫笔续编》的一些文章中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保存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的批语，涉及到文章内容的，主要是《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三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它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机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的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基本的是社会经济的原因。”

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作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恁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

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不管有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对意见，但是，从这几点批示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在五十年代是从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中关注古典文学研究问题的，他是十分认真的。

自然，严格地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主要是针对着党内的一种思想倾向的。我们当时虽没有看到这封信（也包括以上引的批语），却知道毛主席曾指示《人民日报》袁水拍同志写过一篇短评。短评对学术界、文艺界不注意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进行了批评，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他们的任务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生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途。”

（《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28 日《质问〈文艺报〉编者》）很明显，这决不只是支持两个青年人发表在山东海岛上一所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是对“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寄予着无限的希望，希望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担负起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历史责任。

所以，尽管至今对这封信聚讼纷纭，但我以为，建国初期，毛主席提出的这种要求，是反映了历史前进方向的。

三、《致袁水拍》

第二封信《致袁水拍》，是写于 1957 年 4 月 20 日，收辑在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里。全信如下：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旋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编者在我的名字下面有一个注释：“李希凡，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重视，于一九五五年调到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任编辑。”注释虽简单，却清楚地交代了我的简历

和工作情况。至于毛主席为什么在这封信里对我的工作提出了调动的建议？为什么批评我，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何所指？背景又是什么？虽然有些文艺界的老同志可能了解，却已不为多数人所知了，何况袁水拍同志也已经去世！

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来看，在写这封信的一年前，即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在 4 泪 28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当年 5 月 2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十大关系时，又一次提出要实行双百方针。其实，也就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下，自 1956 年下半年开始，学术界、文艺界都比较活跃。从文学创作上看，主题和题材都有相当的扩大。有些作品批评了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有些作品触及了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人民文学》1956 年 9 月号发表的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现在看起来，虽然仍觉得有些缺点，但却深感到作者塑造刘世吾这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并没有把它简单化。从性格刻划上讲，还是写得比较深沉的。作者不只写出了刘世吾在现实生活中较生动的性格特征，而且写出了他的性格的发展的历史，写出了刘世吾早先也曾是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却终于没有经受着生活的考验，失去了往日的激情，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冷漠、世故，敷衍着工作，应付着人和事。作者还明确地评论说：“他们（指刘世吾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的工作成绩里边，就象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里，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这篇小说在当时社会形势下的出现，还是有现实意义，也是有战斗性的，但是，那时文艺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有些人还很难接受这样的作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发表在《文汇报》（1957 年 2 月 9 日）的那篇《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是奉命之作，而且是在讨论会上集思广益的成果，但文责自负，文章是我写的，内容也不折不扣地反映了我的观点。现在看来，我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一些意见，一方面表现了我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自以为在维护党，实际上却是维护了官僚主义；另方面也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还不能适应当时百花齐放的文艺环境。此文的发表，又恰恰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同志联合署名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前后（1957 年 1 月 17 日），这真是无独有偶。今天想起来，我的那篇文章至少是违背“百花齐放”精神的。

据我当时在《人民日报》所听到的，毛主席对《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很有意见，为此，《人民日孤》还受到了批评。同样，毛主席在几次谈话里，也提到了我的这篇文章。大意是：李希凡到了《人民日报》，“到了高级机关”，就“当了婆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只不过，在这封《致袁水拍》的信中，批评用语虽比较含蓄，却触及了我犯错误的实质：“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脱离群众，正是造成教条主义以至“左”的思想的一个根源。可当时我虽然检讨了几句，却没有深刻地认识，因而，在以后的工作和写作中，仍然不时地出现这方面的错误，而毛主席却始终没有忘记我的这个致命的弱点，直到 1964 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还想到我的不深入群众和缺乏锻炼，特别指示《人民日报》领导人，点名要我到农村去。现在想来，在 1957 年看到这封信的当

时，我的理解很肤浅，更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观念，只恁少年气盛，怎么想就怎么说。当袁水拍同志拿信给我看，并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立即不以为然他说：我不会教书，也不愿去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而且当天就写了信。信的详细内容和怎样写的，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大概总是对主席的批评做了一点并不深刻的检查，表示了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但主要是表明自己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这在老同志身上，是决不会发生的问题（因为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何况是毛主席的指示），而在我身上却发生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挨斗时，这曾是我对抗“最高指示”的“罪状”之一。连姚文元在1974年看到这封信时，还阴阳怪气地对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你们至今还没有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可惜那时我已借调出来，在恭王府琴楼校订《红楼梦》，再回到报社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了！后来我也曾问过袁水拍同志，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袁水拍苦笑地说：“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么？”我沉默了，想得很多。我还记得在1954年，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时，我曾向邓拓同志和周扬同志都表示过，愿去文学研究所，而毛主席却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调我到人民日报来。现在发现我到人民日报，仍是脱离实际，就又考虑到我回学校更适宜。或许听了毛主席的话，几十年“边教书，边研究”，会使我走上另一种道路吧！不过，我至今觉得“文化革命”中斗我的造反派们（也包括姚文元在内），总是从他们那套惩罚主义思想出发，永远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什么？而毛主席的批评，却是为了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进步，甚至爱护和培养，更不强人所难！

这一切的一切，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因为连我自己都过了花甲之年，但它们却铭刻在我的脑际，恍如昨日……。

毛泽东与长江

林一山

毛泽东同志在世时，对长江的水利水电建设极为关注。他从战略的高度，对长江的防洪、水资源综合利用、南水北调等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953 年初，我曾随同毛主席航行。2 月 19 日，在从武汉启航的“长江”舰上，毛主席跟我谈了他对长江治理与开发的伟大设想。

旅程刚开始，毛主席就派人把我找去。我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主席的卧舱。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和我握手。当我把地图放在桌上时，主席指着地图问：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这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主席说：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早年我路过湘南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这时，主席拿起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在地图上移动，一面对我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这件事你想过没有？研究过没有？主席一开头即向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使我立刻想到毛主席曾在视察黄河时说过的同样的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主席已经把红铅笔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指到了白龙江，然后又指向略阳一带地区，指到西汉水，问：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我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我说了不行的理由。

稍停片刻，毛主席手上的铅笔，突然飞越巴山蜀水，一下子指到汉江上，问：引汉水行不行？我回答：有可能。主席问：为什么？我说：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的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这时毛主席指示：你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我表示一定这样做。

主席一边说着，手中的大笔一边又在地图上沿着三千里汉江的蓝色江流缓缓移动，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区，当指向均县附近时，突然下笔，画了一个圆圈问我：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些地方怎么样？我回答：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关键是要在这些地区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地点。

毛主席是这样熟悉祖国的山山水水！红色铅笔指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日后建成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位置。后来，我们在查勘过程中，找到了丹江口这个理想的引水到华北的地段。在以后的若干年，我随时写信，把查勘、规划和研究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向主席报告。重要的一次，我专门汇报说，根据查勘资料证实，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在地质年龄的古代，曾经就是汉江的源头，后来由于流入四川盆地的水系溯源侵蚀，切开了西汉水与川水的分水岭，因而将汉江上游的西汉水，袭夺为嘉陵江的上游了。因此，现在如果将被水流下切的山谷，用筑坝壅高水位的办法，可使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不做太大工程，再回到汉江；同时，也可将地势远较嘉陵江上游为高的白龙江，建坝壅水，也比较容易地引向西汉水，再经过汉江，引向北方。这就纠正了我过去仅仅从地貌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不能从西汉水、白龙江引水的片面看法。

在这次汇报中，主席还对我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啊！

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研究得怎样？我汇报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理编辑了长江历年的水文资料，这些资料页以万计，重以吨计，统统作了整理。但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打了多年的内战，干支流各站水文记录，时有残缺，互有矛盾。因此，在整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辨别真伪，用水文整编的方法，作些延伸或插补。主席对我说的水文资料整编的方法很感兴趣。又问：长江水灾成因主要是什么？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的分布怎样？我说是暴雨，并着重汇报了位于湘赣南部的南岭暴雨区，以及位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四川暴雨区，说明前者是在四至六月间首先降雨，赣江水系和湘、资水系开始涨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深入，到七至九月，暴雨出现于四川盆地，这两种洪峰正好错开。如果南水延长，川水早到，两峰相遇，往往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水灾害。这是长江流域普遍降雨的特点。还有一种是集中性的暴雨，例如 1860 年、1870 年和 1935 年。

根据资料，1935 年 7 月 1 日开始的一次大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一次的降雨量达 1500 毫米，汉江、澧水、清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了一夜之间汉江中下游淹死八万人，澧水下游淹死三万五千人的惨剧。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达二千余毫米。

毛主席说：真不得了！说着，转过身来对一路陪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说，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呵？罗瑞卿同志笑着回答：有一米八几。主席笑了，嗬！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暴雨积起来，比你罗瑞卿这个高个儿还高啊！毛主席还以极大的兴趣，多次询问了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的种种问题，问得十分细致、深入。他十分清楚水文资料对于一条河流的治理与开发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记得 1962 年 6 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资料大楼因偶然事故发生爆炸。当时毛主席正在武昌，当他得知楼内的水文资料仍完好无损时，十分高兴，并要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转告我，水文资料要复制四份，分藏几处，以避战乱或其他灾害。

在“长江”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毛主席询问了长江流域规划的各种问题，并且问：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我说，目前首先要抓紧堤防加高捂厚，辅以湖泊综合治理，然后要考虑兴建一批山谷水库综合利用；我展开了随手带着的长江流域防洪规划草图，汇报了那几年中我们初步研究的关于长江防洪的设想，我指着图上的大小水库说，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来解除洪水的威胁。我时而讲，时而被问，时而默记主席的指示。主席的目光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眠江，嘉陵江，乌江，三峡，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纵横万里。一直到了深夜，才听完我的汇报。

然后毛主席在图上划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我回答说：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来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主席又伸出手，指着三峡口上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毛主席准确地掌握了长江的洪水规律和三峡水库与其他一些水库的相互关系。我兴奋地回答：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毛主席含笑说：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

了的嘛。

我继续汇报了在四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博士所提出过的扬子江三峡工程初步计划。主席问我当时的造价，我说约需 13 亿美金。主席就向罗瑞卿同志问了美元的比价，自己算了一下。又问我工程要多少年完成。我一一回答。

毛主席又间：你们工程师有多少？我说：有二百八十多人。主席说，嗅，工程师讲百呀！他又问，技术员有多少？我说，有一千多人。主席说，噢，技术员讲千呀！

最后，毛主席和蔼地笑了起来：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还说，关于甫水北调工程，可立即开始查勘；关于三峡工程，我只是摸个底，你暂不要向中央管水利的同志汇报。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长江的防洪问题，把它视为心腹之患。1949 年汛期，长江发生大洪水，刚刚欢庆解放的人民却在长江洪水无情袭击之下，惨遭灭顶。长江中游防洪的重点地区，在特大洪水的袭击下，荆江大堤最为险峻的冲和观堤段，已出现严重的滑坡坍陷，只剩下笔陡单薄的一道土墙，幸好这时洪水快速下降，荆江大堤才万幸没有决口改道。

1949 年长江汛期过后，我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面开展堵口复堤，以工代赈，培修堤防；一面计划在防洪重点地区荆江大堤附近，兴建分洪工程，减轻和避免可能使数十万人民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洪水灾害，以争取时间研究防洪治本措施。经过反复研究比较，在 1950 年 2 月，正式提出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由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党中央和政务院。

毛主席在解放初期物力维艰百废待举之时，便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程的紧迫需要。1950 年国庆期间，毛主席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汇报，同时，提了一些问题，亲自审查了设计书，并立即批准兴建该工程。

1952 年汛前，荆江分洪工程作为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在 30 万军民的奋战下，以 75 天的速度胜利建成，该工程在 1954 年防御特大洪水时，三次启闸分洪，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迅速建成曾震惊中外，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从这项工程的实施中，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推翻旧中国，而且有能力领导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更使我难忘的是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际，中央送来两面大锦旗，锦旗上毛主席的题词是：

“ 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周总理的题词是：

“ 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

这两句话始终成为我们治理长江、齐发长江的根本方针。

在“ 长江 ”舰上，毛主席关于南水北调、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特别是关于长江防洪的一系列重要的指示，时常铭记在我心中。多少年来，每当在长江建设的重要时刻和重大工程的论证中，它总是激励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拨开层层迷雾，去争取胜利。

今天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自然地想到 1954 年 12 月中旬，在战胜了那一年长江上发生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后，当毛主席了解到如果修建三峡大坝可以减少洪灾损失，这个损失远远超过修建这项工程的投资时，在京广线上的专列上，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我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主席听完了我的汇报，便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问得非常

细。我回答说，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毛主席还问我们做了什么勘探工作。我说，在三峡坝区，孙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主席十分关切地问：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我说，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主席担心地问：如果这里风化层有一百米，那么，一百米以下呢？我说，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我想，在二十五公里长的火成岩河谷中，总会选到好的坝址线。接着我补充说，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主席顿时面带笑容地连声说：好！好！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毛主席询问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我表示，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毛主席问，你的根据是什么？我说：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兴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接着，我又说，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说到这里，我又补充说，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毛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分析。

毛主席关于长江建设的战略思想，指引着我们的规划工作逐步深入，并先后开展了重要支流规划和防洪、发电、航运等专业规划。担负长江流域规划的广大勘测设计队伍，广泛展开了全流域的查勘，上自金沙江，下达入海口，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规划工作，包括毛主席一贯关心的三峡大坝，汉江丹江口大坝和引水到华北的南水北调线路。

1956 年，三峡勘测科研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毛主席在畅游长江之后，根据他对三峡工程深思熟虑以后的重大决策，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磅礴、光彩夺目的词章，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壮丽蓝图，不仅给我们指明了治理开发长江的明确方向，并且，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一定要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坚强决心。

1958 年 2 月，党中央举行南宁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 3 月份的成都会议作准备。在南宁会议上，主席仔细审阅了三峡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且详细询问了有关这一工程的设计和造价等等。毛主席说，能利用水能发电的地方，尽量不要用煤发电。还说，三峡工程为了节约投资，可以少装机，先建大坝防洪。南宁会议以后，周总理出访朝鲜，2 月底回京，只停留了一夜，就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在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长江防洪重点地区荆江大堤的险工地段和三峡坝址。在三斗坪他对照地质剖面图，逐段逐节审视岩芯情况，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坝址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取出一截长岩芯，反复观看，赞不绝口，爱不释手说：”光我

们说好，还不行呵！能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让主席也高兴高兴才好呵。周总理问地质人员，能让我带走一截岩芯吗？地质人员回答，当然！能献给毛主席一截岩芯，太好了啊！周总理从岩芯箱中拿起岩芯牌，按照管理制度，在上面签了“周恩来”三个字作为收条，带走了一截岩芯。

周总理在查勘三峡过程中，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和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讨论。3 月 6 日，周总理到了重庆，又立即转赴成都，出席党中央成都会议，7 日亲自作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报告。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决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工，要看国内外形势和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进行具体安排。”这些重要的指示，给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指明了方向。1959 年我们完成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成为长江流域治理开发的指导性文件。

成都会议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一文中，专门有一段关于丹江口工程的决定。会后，周总理来武汉主持了一次会议，决定丹江口工程立即组织开工。兴建丹江口工程，除了综合利用水利资源、解决汉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外，还因为它是南水北调的关键工程。

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还高兴他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毛主席在爽朗的笑声中结束了谈话。这次谈话使我十分兴奋，说明我过去多次给他写的关于南水北调查勘研究情况和关于白龙江和西汉水可以向汉江引水的查勘报告，主席都仔细审阅并且据以作出重要的指示。

丹江口工程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鄂、豫两省人民的艰苦奋斗、通力协作下，第一期工程在 1974 年胜利建成，发挥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曾被周总理誉为“五利俱全”的工程，作为丹江口枢纽重要建筑物的南水北调陶岔引水渠首工程，在初期阶级，丐 1 水量为 500 立方米/秒；最终可在 1000 立方米/秒，按照规划每年可向华北调水约 200 亿立方米。目前，华北地区严重缺水的局面日益加剧，现在正当我们加快步伐，按照原来设计，研究加高丹江口大坝，增加水库蓄水量，以引水华北、这项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时候，我们回忆毛泽东同志 1953 年在“长江”舰上关于南水北调的指示和 1958 年党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重要决策，就更深刻、更具体地认识到，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同志具有多么深远的预见！

在成都会议以后，毛主席对三峡工程的考虑，更加深入，更加细致了。

1958 年夏季，在武汉东湖之滨，毛主席让我汇报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当我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但由于长江的年来水量比黄河大 20 倍，所以泥沙的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五亿吨。三峡水库寿命可以用 400 年，至少也可

以用 200 年。这是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他水库的话。

主席还是不放心，对我说：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可惜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更进一步展开了对泥沙淤积和水库长期使用的专门研究，我和一些水利学和研究泥沙的专家们，先后到东北、西北等地一些多泥沙河流的水利工程，包括古代的优秀水利工程，进行专门考察；结合国外资料，综合分析研究，逐步认识到泥沙运动的科学规律，并且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我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得到总理的赞许。总理在亲自审阅了我的报告后，转报毛主席。

六十年代初，由于国内暂时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周恩来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十分及时地先后提出了“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和“有利无弊”的方针，使我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在水库长期使用和防空炸等一系列重大专题方面，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军委总参的协助下，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贵的成果。六十年代中期，狂飚骤起，四害横行，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科研等各项筹备工作虽在继续进行，但是实际上步骤放慢了。

1970 年底，中央研究了葛洲坝工程的兴建问题。

周总理在认真研究了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的相互关系以后，于 1970 年 12 月 20 日向毛主席写了报告。25 日，中共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提请毛主席批示的报告中，明确说明：“修建葛洲坝工程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并强调在建设葛洲坝工程时，“也要考虑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的有效措施。”12 月 26 日，毛主席亲自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这个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批示，给我很大启示。这项工程在开工约两年之后，果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1972 年 11 月，周恩来总理带病听取了汇报，采取断然措施，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两年；成立由中央有关部委和湖北省负责人组成的工程技术委员会；并指定我作为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即现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设计。在这次会上，周总理进一步阐明了兴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的重大意义。

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葛洲坝水利枢纽这座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设备的万里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利枢纽，已经胜利建成，产生巨大的效益，誉满中外，并荣获首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这项工程采用多学科研究，解决了在大流量、宽河道，复杂地质、河势和泥沙条件下修建巨型水利枢纽工程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工程实践证明我们在设计、科研、施工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河势泥沙问题研究，通航水流条件研究，大流量泄水闸的低流消能防冲设计，复杂地基稳定和处理措施研究，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和大型金属结构设计制造等重大技术问题，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的技术水平，有些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在葛洲坝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来完成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达到毛泽东同志预期的目的。

今天，当我回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倍感亲切。数十年来，毛主席总是不断地为我们创造实现治理与

开发长江的必要条件，长江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远见卓识！

一代伟人，在万里长江的辽阔大地上，为我们勾勒的蓝图已经不断地显现出绚丽的色彩！

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

曾志

毛主席勤奋读书学习《模范英文读本》

1929 年毛主席在闽西虎岗苏维埃地区得了大病，全身浮肿。红军打下上杭县城后，用担架抬着毛主席到上杭县城治病。医生诊断为严重的疟疾症，经药物和加强营养治疗，不到二十天，毛主席病好了。我随毛主席到距上杭城百来里的山村——苏家陂，闽西特委就设在这里。毛主席同我们同住在一栋泥砖砌的小楼上，我们的住房与毛主席住房窗口对窗口，中间只隔几平方米的小天井。毛主席在这小楼上养病。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两本当时中学生学习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毛主席每天起码有两次端端正正坐在窗前桌子旁边念《模范英文读本》。一课一课地念读，一课一课地默与，学得津津有味。看他读得那样认真，我当时有些奇怪，英文不是小说，毛主席为什么这样起劲？干革命，读英文有什么用处？可见我那时的幼稚无知。

最贵重的是书

1932 年，红军打下了福建闽南漳州地区，我已于 1930 年调白区工作，当时奉命从厦门来到漳州。我们住在毛主席那里。主席住处下面约一里多远的地方，有一所漳州龙溪中学。那时学校已停课，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回家了。一天主席对我说：“曾志，走，我们到那所中学去看看。”这所学校是漳州有名的中学，校舍很宽敞，尤其有一很大的图书室，装着满满两个房间的图书。毛主席到了图书室，喜形于色，他一本一本地翻书，越翻阅，越兴致勃勃，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毛主席对我说：“曾志，帮个忙，去找几个萝筐来，我要找些书籍带回江西去。”我和勤务员找来了三、四个萝筐，毛主席一面挑选，我们就把挑出来的书往萝筐里放。毛主席在学校图书室，整整翻阅了一个上午，找人挑了两担萝筐的书借回住处。据说毛主席后来还去过该学校两趟，回江西时，带回了许多图书。

马克思主义要精读、多读

1939 年底，我从白区调回延安，很快就去看望毛主席。我报告毛主席说：“我要进马列学院学习，组织上已批准。”主席说：“很好，你在红军、苏区、游击区、白区都工作过，经验是有了一些，但缺乏理论基础，经验不能提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我说：“马列学院，我准备学一年。”“不行，一年太少，要学三年，至少也要学两年。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毛主席还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

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你现在进马列学院，是好时机，要坐下来好好学习，读它两三年，对你将来的工作，会有很多好处。”

毛主席的一席教导，我没有完全理解，也没有完全听进去。由于我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刚进马列学院学习时，书入不了脑子，一看书，脑子就开小差，老师讲课，也听不大懂。三个月后，学习才入点门。在马列学院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组织上调我，我也没有坚持，就离开了马列学院，.辜负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

硬是精读了两年马列主义著作

1956 年到 1957 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1957 年五、六月右派向我党进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部分学生，掀起民主自由的大辩论。毛主席派我去人大和北大做调查，采访、每个星期天向他作一次汇报，除了汇报，有时还谈一些别的问题，有一次闲谈中，毛主席讲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些问题，他感慨他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 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主席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读书也是休息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卧室床上，桌上、书架上，装满了古今中外，各式各类的书籍、杂志、报纸、参考资料等等，尤其他那特制的床，一半堆满书报，一半睡觉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毛主席经常来广州，随身带的除了一个十多斤重的荞麦大枕头，就是一大堆书报。一天，我问毛主席：“您到哪里都带许多书报，一天究竟看多少书报，看得过来吗？成天在看，不觉得疲劳吗？”主席说：“我一天收到的报刊、杂志、参考资料等不下二百份，每天都有几十万字，仔细看是看不完的。我请了几位秘书，有专门读书的，有专门看报纸杂志、参考资料的，他们先看一遍，值得我看的，用红笔划出来，我就挑着看。一样东西看多了，也实在累，我的休息方法，就是一样东西看久了，觉得疲倦了，就放下来，换上另一本再看，兴趣一来，疲倦就打消了。换着看书，就等于休息。”我看毛主席除了开会、处理文电、游泳、写字、吃饭、睡觉以外，都在看书读报，他睡眠基本上是倒着的，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报，写作。我们的早餐，他是晚餐。我们的晚餐，才是他的早餐。除了开会，做报告，不得已才改为白天工作。

六十岁请老师教英语

还是 1957 年，一次我向主席汇报人大、北大学生大辩论、大字报等情况时，毛主席问我学过英文没有。我说：“小时候在长沙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有英文课，学了一点。教会学校校长是美国人，老师们日常生活都用英语对话、我们住宿生与几个讲英语的老师住在一起，也学着讲几句，几十年过去了，什么都忘记了。”主席说：“你应该学英文，懂得一些英，对工作有好处。”我说：“都四十六岁了，记忆力不好，英文要靠熟记，我哪能学得进去。”主席批评我：“事在人为，只要下决心，年龄大，也可以学好。”主席说：“我六十多岁了，还请英文老师教我英文。每天学一至两小时英文，你才四十多岁，就没有信心吗？”这时主席的英文水平已经不错了。一次我在主席那里，见秘书拿了一份翻译成英文的毛主席文章，准备对外发表，送给毛主席亲自校审。“文化大革命”中，大约是 1966 年 10 月前后，毛主席对陶铸说：“你找人将这本语录（毛主席语录）翻译成英汉对照，最好是线装的，越快越好。11 月或者是 12 月，我在陶铸办公室好像见到过毛主席语录英汉对照的初稿，不知是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日理万机，博古通今，还要孜孜不倦地学英文，自己处理英文稿件，试问有何人曾做到过。

毛主席重视调查

行军途中调查

1929 年 1 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会剿”。红四军部队下井冈，到赣南一带迂回，以牵制敌军的行动。我当时在前委做民运工作，下井冈山离开了根据地，毛主席就布置我们做调查工作，给我一张表。表的内容大概是当天行军从什么村庄出发，经过什么村庄，村里有多少户人，是砖瓦房屋还是土砖破旧房屋。村子靠山、靠水还是靠大路，山的高矮、树木的多少，周围田地作物是些什么，土地的亩数，村子的贫困情况如何，村与村之间有多远的矩离，地势地形情况如何等等。每天出发前，我召集直属队宣传员，按照表的内容布置调查，宣传员随尖兵走在队伍最前面，一面调查，一面写标语，一到宿营地，宣传员马上把调查情形记下来，集中时口头上讲一讲，然后我把宣传员记下来的和口头上讲的，每天到宿营地向主席汇报。有时主席还当面交待明天行军途中还应调查了解的事情。如果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两、三天，我们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同志和连队宣传员，则要分头到群众中去做调查，访贫间苦。先到房屋最破旧的家庭去访问、宣传，首先了解村子里最富最坏的是谁，最苦最穷的是谁，了解气候、年成，了解租佃、惜贷，买卖、流通等情况，把了解到的情况和做了什么群众工作，都向主席汇报。除了打仗，我们走一程，就要调查了解一程。

向报纸杂志作调查

毛主席特别重视报纸，看报非常仔细，连报纸中间的小广告和寻人启事都不放过。我们每到一个有邮政的镇子，第一大任务是去邮局找报纸杂志。为了找报纸，有一次派了两个连。扛进一个城里去取报纸。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大事，也可以了解一些国外大事，从中发现军阀之间的矛盾，了解军阀混战的情形，分析敌军的行动方向等。毛主席常常把报纸看作军队行动的指南。

苏家陂召开调查会

1929 年，毛主席病后回到闽西特委所在地苏家陂。主席利用这段时间召开了很多调查会。在主席住的屋檐下，放一张四方桌子，一大壶开水，几个饭碗，他分头请一些乡亲们谈话，每次人数五至六人，他请雇农、佃农，也有中农，谈种田，谈收成，谈生活，谈过去和现在对比。主席要谈的，都是农民们日常很熟悉的事，你一言我一语，甲谈乙补充，商商量量，无拘无束，好像是在谈家常。毛主席要调查的都得到了，而农民们很高兴，他们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毛主席还找商人谈，他总是提出各种问题，启发和引导他们高高兴兴他讲，这次调查会，我在旁边打杂，主席自己记录。

向熟悉的干部做调查

1957 年五、六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煽动北大、人民大学等校部分学生贴大字报，开辩论会，宣扬什么美国式三权鼎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什么各党派轮流坐庄，搞政治设计院等，闹得不可开交。我那时正好在中央党校学习。距离清华、北大、人民大学都不很远，毛主席便委我去这些学校搞调查。一是看大字报，二是听辩论会，把大字报辩论会的主要内容摘要下来，而且要有数量统计，如大字报多方张，参加辩论会的有多少人，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多少人，批驳资产阶级民主的多少人，只看大字报和听人辩论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有多少，其言论情绪状况如何等等。另外，毛主席还亲自划了一张小表格，内容主要是统计数字，以教研室为单位，人数，学生数，教职员数，赞成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学生教员数，其中党团员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学生教员数，以及其中的党团员数，中间状态的学生教职员数及党团员数等等。主席要我拿着这张表格去人民大学找训练部主任李培之同志，请她组织一些党团员到各自的教研室，召开座谈会，对大字报、辩论会中的言论意见，展开讨论，畅所欲言。然后由我按表格的内容统计起来，交给毛主席。我参加人民大学两个教研崖的支部会议，讨论座谈会的思想动态，以及如何进行思想教育。还找人大几个教员、学生个别谈话，倾听他们的意见。毛主席还要我去见人民大学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化的学生中的头面人物林希翎。她住在一间楼梯旁的小房间里，说是病了，让她住在这个单间休养。去找她的人接连不断，甚至还有四川等外地来的青年人找她谈话。林希翎对去看她的人都不加掩饰地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那一套主张。去找她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学生，也有个别其他青年，赞同她意见的占多数，但也有少数青年反驳她的意见。她说：每天要收到全国各地信函约 200 多封，她很累，没有时间和精力接受采访，也没有时间看信和答复来信等等。毛主席交待我调查的事，按其指示每星期向他作汇报，主席就这样借我在党校学习的方便机会，让我去做调查，基本上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主席拿到人民大学统计的表册，笑着说：“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究竟还是少数，赞成的比反对豹多，两头少，中间状态的较多，要加强思想教育。”

毛主席生活简朴、廉洁

1929 年 1 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赣南、闽西，我们跟随主席行军，沿途没见他骑马，他的马不是给伤兵，就是给病号或给掉队的战士们骑。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他同我们小干部和身边的战士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行军中，出发早，吃饭早，各人都自带午饭。有一次我们行军休息，大概是上午十点多钟，大家照例拿出自带的午饭吃。那天毛主席因起来的晚些，他没带上饭。我们吃饭时，毛主席到了。他坐在我旁边，对我说：“起来迟了，早饭没吃，也没带上午饭，我的肚子饿得很，你的饭给我吃一点好吗？”我就把饭给他吃了。那时我没有什么感触，现在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我们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三年还是那双旧袜子

1932 年，红军打到漳州，我由白区厦门到漳州，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我盯着他的袜子看，主席把脚一伸，对我说：“这双袜子，还是 29 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子珍把袜底从中间剪开，翻到两边，又缝了袜底。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毛主席行军中唯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自从我们一同行军，见到的就是这条毛毯，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没收的毛毯，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他不要。

打下漳州城，毛主席伙食照旧

红军打下漳州，战士们都改善了伙食，我在十二师师部、东路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政治部都吃过饭，都吃到了猪肉，都有两样或三样菜，而主席那里，还是洋铁菜盒，还是一样蔬菜，不是豆芽，就是青菜，晒台上有一个大木桶，用水泡着三个一尺多长的海茄子，伙夫不会做，直到我离开主席那里，仍然泡在桶里。

六月中还穿薄毛裤

1957 年 6 月中旬，我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我们都穿单衣单裤，见毛主席仍然穿一条灰黄色的破旧毛裤，没穿罩裤，毛裤已经很旧了，上边有几个洞。我问：“主席，您这个时候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没有毛病，买不到适合我穿的宽大线裤。”毛主席说。“江青同志不帮您去订做吗？”我问。“她呀，我生活上的事，她从来不会关心。”主席说。“我在广州针织厂为您订做两套线衣、线裤好吗？”我问。“那就麻烦订做两套，我自己出钱。”主席说。

记得主席身上穿的毛巾布睡衣也打了补钉。主席这样简朴，有些人不相信，可我是亲眼所见，事实就是事实。我在主席那里吃过多次饭，总是二米饭，三到四个菜。来了客人，主席通知今天加点菜，也只是增加点份量，有鱼有肉而已。在主席那里，我从未吃过山珍海味什么的。这就是全国解放以

后，作为党和国家领袖毛主席的日常生活。

毛主席情谊永不忘

我和我爱人蔡协民（1934 年牺牲），离开毛主席那里，去开辟闽南根据地。临行，毛主席深情地拿出发给自己的伙食尾子，买了一只红公鸡，煮了。又拿出从江西出发前贺子珍同志为他煎炼的一小罐牛油（不是奶油），招待我们，为我们两人饯行。在江西行军中，我曾经听主席说过，他最爱吃牛油，在牛油中放点盐，炒饭，好吃极了。贺子珍同志为他准备的这罐牛油，是他珍贵的食品。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表达了他对我们的情谊，当时就使我很受感动。其实那种牛油，是很不好吃的，做菜很膻。炒饭，饭一凉就象染上一层黄腊。这种牛油一般都是用来加工蜡烛或加工肥皂的，毛主席当成珍品，可见那时毛主席的生活是多么艰苦。

毛主席的马送我上井冈山

1928 年 8 月初，我同蔡协民在袁文才的三十二团工作，红军退出永新城，我们就在永新到宁冈一带的农村发动群众，牵制国民党敌人进攻井冈山。史册曾记载：红军少数兵力，在永新宁冈一带，牵制敌人达 25 天之久，就是写的这段。后来，蔡协民又调到三十一团任党代表。一天，毛主席来到三十一团，发现我肚子大了，主席忙说：“ 你有了孩子，过去我怎么没看出来，不要随队伍了，到后方留守处去，生了孩子再回来，用我的马送你去，明天就去井冈山后方留守处，邓允庭是处长，你是熟识的。 ”我们就住在山下，好像是黄拗附近的村庄。第二天我骑着主席的马上山，坡陡，路窄，我当时还不会骑马，爬山坡马很吃力，走到很险峻的地方，马肚带断了，我和马鞍子都掉下了山坡。马鞍子还压在了我身上。幸好是沟不太深，送我的马夫同志把我扶起，把马鞍又重套上，继续上山。遇到坡陡的地方我就下马步行。毛主席的马送我上井冈山。不久，主席就带着队伍出发湘南，寻找迎接朱总司令和陈毅同志的队伍回江西。

毛主席会议民主

1929 年下井冈山的行军途中，毛主席差不多天天召开会议。一到宿营地，营长以上的干部就来开会。我看到主席总是先讲几句开会的内容，然后听取到会者的意见，引导大家把意见讲透，特别注意倾听不同的意见。最后才归纳大家的意见，说明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以及不同意的理由。求得意见一致，才做出决定。从井冈山到闽西，我见他召开会议时，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把自己的意见讲透，很少中间打岔，更不是强加于人，自己先讲一套，让人家无话可说，只有同意。

解放后，主席经常召开大区书记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听陶铸同志说：主席总是先让大家讲话，展开争论。大家在这种会议上，没什么顾虑，有话敢说，最后主席做结论，不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错的，对主席的结论都愉快接受。在讨论中，讲了错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压力。讨论问题时，主席不表态，则要认真慎重地再去研究。据我所知，毛主席在许多会议场合，都是先

发扬民主，然后才集中大家的意见，做出结论。

我所了解的毛泽东主席

王定国

谢觉哉同志早年结识毛泽东的时候，已经步入中年。他原是清末的秀才，从年龄上讲比毛泽东年长近十岁，从所学，所追求的思想体系来看，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差距，但改造中国、强盛中华的共同抱负与理想，他们走到了一起。1921 年 1 月，谢觉哉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新民学会”。1925 年，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生活中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工作接触中，谢老和毛泽东之间的革命友情日深一日。

谢老经常与我谈他和毛泽东主席交往的那些经历，听来感人至深。我自己也从与毛主席的接触中多次感到温暖与关切，从中受到的教育和鼓舞令我终生难忘。我愿写下这一片片早已铭刻在心的回忆，缅怀敌人，以告后人。

历史的记录

1921 年 6 月 29 日傍晚，湘江岸边，有一个中年人在为毛泽东、何叔衡二人送行，三个人都面带凝重而深沉的别情。北去的湘江奔流不息，一抹夕辉染红了江面，也映红了这三个人的身影和浅湾上印下的串串足迹。对于谢觉哉来讲，这一天是难忘的，应当在日记中记下这场非同寻常的送别，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这样做，他只好在这天的日记中画了一长串醒目的圆圈，这一串圆圈所记录的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时刻：毛泽东何叔衡二个作为湖南代表，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谢觉哉送他们来到湘江河畔，三人深情话别。

在中央苏区

谢老 1933 年 5 月来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时，已经五十来岁了。毛泽东同志当时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谢老初到苏区，是做毛主席的秘书。毛泽东为了欢迎谢老，自己掏钱、特意让县苏维埃主席朱开金同志从老乡那里买来几个鸡蛋，为谢老按风洗尘。鸡蛋在今天是极普通的食品，那时却算是最好的佳肴了。从那时起，谢老和毛主席共同过着缺吃少穿、没有半点特殊待遇的艰苦的苏区生活。一天、工作到深夜的毛泽东感到又困又饿，他看着比自己岁数大得多的谢觉哉，关切地问：“谢胡子，你白天吃那点子粮食够了吗？”谢说：“也够了！”毛泽东自然理解谢觉哉的回答，笑着说：“我去弄个南瓜来，你去弄点儿柴草，咱们煮南瓜吃。”，这天夜里，他俩美餐了一顿香甜的“兴国饭”。二十多年后的 1961 年，谢老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在日记里写下题为“偶成”的诗句：“厦门小吃，菊花锅煮菜根味，兴国当年，四星望月味最鲜；井冈山上，饱吃南瓜气力壮，谁清谁浊，南瓜剧里看分明。”诗中提到的“四星望月”是指用兴国县特有的一种小蒸笼装上四个菜。据许多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当年在苏区请人吃饭，多是“四星望月”。

谢老到瑞金的第二天，毛泽东请他草拟一个关于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不料送请毛泽东签发时，谢老写的通知被改得一字不剩。毛泽东添写上会议的中心内容，讨论的问题和应准备的材料。另外，会议的时间、地点、会期、

生活路费补贴办法，连同“自带碗筷，被子”等事项也都一一详写在通知里，使基层干部一看就能明白。多年之后，谢老不止一次提到毛主席改写的那个通知，总是感慨他说，那次无异于给他上了一堂新课，使他深感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谢老从那次以后，反省自己的不足，勤勉学习，使自己的工作方法很快适应了苏区工作的需要，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后来，谢老担任了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

长征路上

谢老在中央苏区时，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何叔衡一同被誉为“苏区五老”。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时，除何叔衡同志被决定留在苏区外，其他四位年过半百的红军老战士，都被编入了机关特殊连队，跟随毛泽东踏上了充满艰险的征程。谢老原来身体就不太好，长征路长又经受风寒饥饿和病痛的折磨，显得又黄又瘦，苍老了许多。毛泽东每次来看望他，总是关切的询问他的身体，见他坚持与战士一道步行，毛泽东也和他一起走。毛泽东对他说：“前面的路越走越艰难，我们准备把你们这些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的同志送出封锁线，设法转移到上海去工作。”谢老听了这话，总是说：“你们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毛泽东见他如此坚决，只好说，“你的身体已经很弱，再坚持下去会拖垮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常常是用强制的办法同警卫员一起把谢老扶架上马才肯离去。

有一次，部队送给毛泽东一块牛肉，他留给贺子珍一小块，又马上找人把大块的送给谢老。谢老不收，又亲自送还给毛泽东，说：“现在牛肉可是好东西啊！大家都很需要。你为大家操心，担子重，应该多吃点儿。我虽然年纪大一些，身体还能挺得住，牛肉我不能留，给你送回来”。毛泽东再三劝他收下，说：“现在我们都很艰苦，你年龄大了，身体这样弱，我本应多照顾你一点儿，可是我只能给你这么点儿牛肉。你就先吃点儿吧。”谢老仍是不肯要，毛泽东便提议说：“要不，就煮了，大家都吃点肉、喝点汤吧！”谢老这才同意了，和毛泽东一起与指战员共同分享了那块牛肉。

红军慰问演出

1935 年秋，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经两河口来到毛儿盖，作短时间休整。休整期间，两个方面军的战友互相慰问。当时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到红一方面军驻地慰问演出，演出之后，我们听说周恩来副主席正在生病，剧团的易维精政委和周武功队长带领剧团各股长共六七个人前去看望（当时我任道具股股长）。周副主席虽在病中，仍和我们亲切交谈，夸奖我们说：“你们剧团这些女孩子又行军，又打仗，又演出宣传，真是不简单！”这使我们受到了极大鼓舞。我们又去看望挨着周副主席住的毛主席时，毛主席用藏民的木头碗泡“茶膏”招待我们。当时茶树上最好的嫩尖芽做茶叶，老叶子做茶砖，剩余的筋筋络络捣碎后熬制成茶膏。在长征路上，毛主席也就只有一点儿茶膏喝。话题转到演出上，毛主席说：“你们演的剧里，刘湘投江了，（刘湘是四川军阀，我们当时演的剧目有一出叫做“刘湘投江”）可是演戏只代表人们的心愿。别忘了，刘湘还没死。反动派，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刘湘也是不会去跳河自杀的。”我们听了，十分

钦服。

识大义、讲大理、重统战

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三个主力军组成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打通“国际线”。西路军后来不幸遭敌重创，广大红军干部战士经过英勇顽强的拼杀，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悲壮的战歌，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生存者流落于青海、甘肃。毛主席对此忧心如焚，经再三斟酌，决定派谢老赴兰州，一方面开展救援西路军的工作，一方面着手建立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开展“西安事变”后西北地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7 年 7 月 17 日，谢老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驻甘肃代表去兰州，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为什么要派谢老去呢？一是谢老有政策水平，二是谢老与当时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是同乡，有过旧交。我和谢老就是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结合的。7 月 29 日，谢老抵达兰州。从 8 月到 12 月，谢老与贺耀祖，邓宝珊多次会晤。三个多月的时间，兰州及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发动起来，高潮一个接一个。在这个期间，谢老帮助中共甘肃省工委办起机关报《西北青年》，还帮助贺耀祖的夫人倪培君以及邢新华、王九金等妇女界人士积极地投身到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并帮助倪培君在兰州办起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杂志《妇女旬刊》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许多时候，谢老不便公开出面的时候，就由我来出面。西北抗日救亡运动局面打开的原因，一是八办、中共甘肃省工委和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统战工作的关心、重视。这个时期谢老和毛泽东，周恩来电报频繁。延安还不断地托人带口信给谢老，要求把统一战线工作当作大事放在首位来抓。我记得，毛泽民、贺子珍、钟赤兵都捎过这样的口信。

针对马鸿逵的“回回非民族，”的荒谬理论。谢老予以坚决的批驳，并帮助回族同胞制定回族运动纲领，在各地建立起回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回民学校，兰州创办了军分校，培养人才等等。

毛主席 1937 年 8 月 21 日电告谢老，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及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电文末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问题，又作了具体指示。从这短短的电文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程度。

延安书简

谢老回到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老在这段时间里公务异常繁忙，与毛主席之间来往的信件很多，主要都是谈团结民主人士，开好参议会的问题。毛主席给谢老写信或面谈时，总不忘提醒谢老保重身体。在延安形势稍安定后，毛主席就提出给徐老、林老和谢老几个人补贴几斤鸡蛋，毛主席去党校讲课时，将补助的事告诉谢老，说这是中央做的决定。

1941 年 3 月 2 日，毛主席在给谢老的信中写道：“林老宜即休养两三个月，劝他不要急工作。要他有放得下、不怕塌台的精神。请告他下决心，不可大意，你宜亦带半休养性质。只抓大者、要者，小而次者出入可也。保健精力，长期斗争，为上策。”在当年 8 月 7 日给谢老的信中说：“你身体有

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一个月后的 9 月 15 日，毛主席又来信，恳切关照谢老：“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生活，极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宜不写得太多。”

这时期，毛泽东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早已在党内确立，他被人民颂为大救星，但他在和谢老探讨边区大政方针的信中表露出的诚挚与谦恭实在感人肺腑。这里仅抄录 1941 年毛主席给谢老的几封信。

“谢老：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林老前有三年计划，亟欲一阅，林老昨示渭待增修重拟，不知在十天左右能脱稿否？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而此行动纲领，非根据一方案交换意见，过细研究，无法讨论与确定。我是毫无研究的人，为欲开此会，故愿加以了解，你的各信，我都过细地读了。在不妨碍你健康条件之下，如能草一条文式的方案，或即就林老三年计划，根据新近经验与研究加以增饰，那是最好的。我此刻尚未睡，上午能睡好，下午或派车子接你来谈，那时再定。即致敬礼！毛泽东、八月九日早。”

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在给谢老的另一封信中，交换了对边区财政问题的研究意见，其信未写道：“……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事。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敬候日安！毛泽东、八月六日。”

延安时期，毛主席与谢老的书信交往甚密，一封封充满温暖情谊的书信，如同滚滚延河水，涓涓不息地滋润着战友的心田，激励着战友精忠报国的情怀；一件件探索求实的函简，就象巍峨耸立的宝塔山，写照了一代伟人的正直挺拔和一代楷模的高风亮节。我在整理谢老的书信文集时，每每为之感慨万千，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我的工作和学习，也由此获益匪浅。

爱才、重才、借才、用才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人才的开发，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期，延安成立了边区人民政府和参议会。当时的参议会就是人才济济的地方。李鼎铭先生本来是个中医，与谢老颇有交往，常来我家。由于环境的艰苦，长期战争生活使毛泽东同志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吃了许多西药也不见效愈。谢老知道后，就把李鼎铭先生介绍给毛泽东。在日常接触中，毛泽东的抗日救亡的大道理，打动了李鼎铭的心，久而久之，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说了。李鼎铭先生大胆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这个方案一提出，毛主席就非常重视。把整个提案抄在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圈了起来。在案边加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后来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先生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

每每提到李鼎铭，谢老总是说：“毛泽东是个爱才、重才、惜才、用才的人。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里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党外人士担任要职。1942 年安文清曾担任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李丹生是常驻议员，霍连城、

霍子路都是边区政府的厅、局长。

大生产运动

四十年代初期，延安的局势很严峻，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经济封锁和延安地区恶劣的自然气候环境，使边区军民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战胜面临的困难，毛主席深思熟虑，以他一贯蔑视困难、勇于挑战的胆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王震同志率领正规军三五九旅进驻荒山野岭南泥湾，从事大规模垦荒生产，当时边区政府机关以及家属都分配了生产任务，毛主席也在百忙中抽暇和工作人员一起耕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那时常说：“别忘了，我们也有两只手，我们要么就散伙，各自活命去；要么就靠一双手自己救自己，省得给饿死。”正是毛主席的话激励着我们，脸朝黄地背朝天。把贫瘠的黄土高坡地变成了陕北的江南。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不但没有被困死、饿死，还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实践证明，是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气魄又一次挽救了中国革命，边区大生产运动不但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还发展壮大了人民的武装，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年近六十的谢老当时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工作繁忙，我在参议会秘书处做党务工作，同时又做收发工作，我们还有三个小孩儿，大的不到五岁，小的才一岁多。在参议会机关的生产小组里，我把谢者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为生产的主力军。我们不辞劳苦，起早贪黑，干个不停，终于获得了硕果累累的大丰收。在我们小组种的地里，收获的茄子像小盆一样大，大白菜一棵就十六斤重。我们小组喂的几头猪滚瓜溜圆，又宽又厚的猪背可以平平稳稳地放个脸盆。我们牵着猪，挑上蔬菜，来到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参加展览，结果全都获了奖。我和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同志几次获得边区带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毛主席看了展览对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非常赞赏，称赞我们是边区妇女中的豪杰，是边区机关工作人员的典范，还亲自给我题写“再接再励”四个字作为嘉奖。

从最初谢者让我用自家种的粮食蔬菜做成可口的小菜送给毛主席以后，毛主席和谢老之间数十年来“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便逐渐增加了“物质交往”。有时毛主席直接向谢老“要食”，有时让人捎来条子，点名要家乡风味的“茶食”。每逢这时，谢老就高兴地忙手忙脚地亲自动手或者督促我来料理。谢老是出生在大家族的秀才，以往是根本不下厨的，但为了毛主席，他却总是碍手碍脚的在厨间帮我做事。毛主席要的“茶食”，我既没有做过，也没吃过，便只好照谢老讲的大概意思，琢磨着做，还专门去请教过别人，终于给毛主席送去了他要的“茶菜子”。毛主席说：“味道好得很！地道的家乡味，十多年没吃过了！”尽管我不清楚那到底是属湘味，还是川味，但我心理确实是像蜜一样甜。毛主席最爱吃我做的“酸茄子”、“霉豆腐。”和“泡辣椒，”做这几样菜是很费事的，谢老知道毛主席爱吃，就不厌其烦地教我做这几道菜。每当收获新鲜蔬菜，谢老总要自己动手摘收第一茬时鲜送给毛主席。我们地里粮菜收获极丰，所以谢老也总有东西送给毛主席，光我做过的小吃、小菜也有二十多种。毛主席对谢老所赠从来照收不误，有时我们没送过去，杨家岭的管理员就来拿回去给毛主席和机关小食堂的同志们吃。1988

年我去参观西柏坡展览馆时，见到了当年延安杨家岭的那位管理员，他对往事也记忆犹新，问我还做那些小菜吗？他说记得那时毛主席常常风趣他说：“谢老好哇，堂客（即妻子）又勤劳又贤惠，”“谢老有福，有个贤内助。”每当谢老向我转达毛主席对我的问候和夸奖，我内心的高兴和感动之情便禁不住溢于言表，至今回想起来都不由得怦然心动，倍感亲切和骄傲。

战地手足情

1947 年，中国革命处于光明与黑暗大决战的前夜，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作出暂时撤离延安的决定。在分批撤离的过程中，谢老随参议会先毛主席几天撤出，可是他心里总是挂念着日夜为解放全中国费神操心的毛泽东。10 月 23 日，谢老步行很远的山路，从山西临县后甘泉，过无定河，来到陕北佳县的神泉堡，看望毛主席。适逢毛主席上山去察看地形，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谢者失望之中又不甘心就此口转，便找见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一直谈到傍晚。毛主席回来了，一见谢老，便上前拉住谢老的手摇晃着说：“谢胡子，你还活着啊！”（谢老早年曾与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一同被称为“宁乡四髯，”毛主席在非正式场合，总是亲切自然地称谢老为“谢胡子”。）虽然从延安撤离还没多久，他俩却像是几年没见面了，兴致勃勃地一直交谈到深夜。第二天清晨，二人在窑洞门前合了一张影。那张珍贵的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每当翻看，引出无限的回忆和怀念，照片上毛主席和谢老，沐浴着朝霞，分别坐在条凳上。毛主席翘着左腿，踌躇满志，胸有成竹，笑得恰然；谢老两手揣袖，憨厚质朴，满目慈祥，融融情意尽在不言中。

仅时隔五天，10 月 28 日清早，谢老又去白云山看望毛主席。当时他总觉得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一天不见毛主席、心里就不踏实。那又是一个促膝交谈的愉快夜晚。次日，秋高气爽，谢老陪同毛主席游览了白云山。在敌人大兵压境，我党我军最高指挥部频繁转战的岁月中，他们度过了少有的轻松愉快的时刻。他们边游览边交谈，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民俗，军机政治，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毛主席对谢老说：“自作战以来，身体比前好，每天能有目的地走上十里，而不是散步，这最好。用脑过度则疲倦，倦到洗澡都不能支持。写文件将要完成，如感到倦，又强行写完，就会倦到手发冷，须躺下数小时才能恢复。”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地工作，却没有任何索取，他只对谢老这样的知己和兄长才泄露点点疲累。毛主席对谢老是无话不谈的，并且只对谢老有所求。他曾对谢老说：“你是真秀才，不抽烟，不喝酒。把分给你的烟，都给我留着啊！”于是以后的许多年中，谢老总是将他得到的或者分给他待客的烟，细心地收留起来，每过些日子就给毛主席送去，边区参议会的工作人员王炳章种了一点烟叶送给谢老，谢老便像个道地抽烟人一样，熟练地捻碎烟叶，用碎纸条将烟叶卷起来，舔湿纸边再用手抚平，卷成一支支“大炮”，给毛主席送去。

在那个时期，毛主席和谢老每个星期总要互访一次，如若不见，也一定会捎个字条致以问候。谢老古诗文的功底好；毛主席在难得的闲暇时，总爱和谢老研究古体诗，作为消遣。这个情趣，他们一直延续到进城以后。

儿女情

1949 年 10 月，晚秋的北京，凉爽宁静而清新，来自中南海的一张请条，带给我们一股暖人心肺的浓浓情意。请条上写着：“ 岸英要结婚了，为了节约，只请你们夫妇俩作客吧！ ”这张毛主席的亲笔字条如同我们在延安时常见的那样，毛笔字写得遒劲洒脱，不拘一格，落款“ 毛泽东 ”三个字如龙飞凤舞一般，令我暗自感叹。

谢老和我如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为其长子举办的婚礼宴席竟是那样的简朴。这时的毛主席完全是一位平凡的家长，慈爱的父亲。毛主席与往常一样，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脚穿尖口黑布鞋。新郎官岸英和新娘子思齐，则只是穿着整齐干净的布衣服，没有更多的装饰打扮。毛主席关照岸英和新熄妇招呼我和谢老，为我俩泡茶。毛主席为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几个亲友，有毛主席的弟媳钱希均，还有陈谨昆，梁淑华夫妇等。而后，毛主席引领大家入席。一张圆桌，碗筷、饭菜已经摆好——只不过比平时多了几道家常菜，没有鸡鸭鱼肉，没有满座佳宾。席间，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声，一次又一次动手为我们几个客人拨菜，毛主席把一块腊肉夹到谢老碗里说：“ 尝尝，比你在延安送给我的腊肉怎么样？ ”饭后，毛主席嘱岸英夫妇领我们去看新房。新房是在朝内大街中联部李克农办公室院内的一间旧平房，布置得极简单：一张木床，两床花布被子，唯一的一件奢侈品就是一个苏联朋友送的一件小小的装饰品。时隔几十年，至今回想起我所参加过的这次身份地位最高的友人之子的婚礼，我的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使我更为钦佩和感动的是，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刚起，毛主席就毅然送岸英赴朝参战。新婚才一年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独自承担了生离死别的失子之痛，却以慈父般深沉的爱心分担儿媳的痛苦，他将思齐认做女儿，并送她到苏联去学习。那期间，毛主席给思齐写信，总是亲切地称她“ 亲爱的思齐儿 ”，1961 年，毛主席以父亲的名义写信给刘思齐，劝她“ 下决心结婚。 ”在岸英牺牲十一年后，思齐在 1962 年 2 月，同杨茂之结婚，毛主席这次是嫁“ 女儿 ”，我又一次参加了思齐的婚礼。思齐婚后和丈夫一起去看望毛主席，后来有了小孩儿，又带着孩子一起回“ 娘家 ”，毛主席仍一直如疼爱女儿一样关心思齐。

最后的信

1968 年，84 岁高龄的谢老已经病痛缠身几年了。因偏瘫右手不能拿笔，他还坚持用左手给毛主席写信，祝毛主席七十五岁生日：“ 主席，我好久没做侍了，今遇您的生日，制了几句不成诗的诗，送给您看看，祝您万寿无疆！正是从心所欲年，名传环宇德齐天，一池春水无心皱，万古云宵着意旋，算定帝修反必败，眼看亚非拉争先，人民万岁欢呼遍，雨露阳光在眼前。1968 年 12 月 24 日 ”。

这是谢老一生中最后写给毛主席的诗和信，后来由于谢老的健康每况愈下，连一直坚持写了七十年的日记也不得不中断了，写给毛主席的这封信，成了谢老笔耕硕丰的文字中最后的篇章。现在毛主席和谢老早已辞世，但谢老奉诗的意境却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

回忆往事，感情所系，使我浮想联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毛主席的高尚情操，令我无限敬仰，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一次次出

现在我的眼前，激励我在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尽我的能力，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好事、实事，为教育下一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回忆毛主席

曾碧漪

我从 1928 年冬从广车到江西寻乌和古柏同志在一起工作，并与他结了婚。

1929 年 1 月底，古柏所在的游击队听说毛委员、朱军长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了寻乌，他们就派古柏同志为代表从阳天嶂跋涉几十里路到菖蒲圩去迎接。古柏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向毛委员、朱军长汇报了工作，聆听了他们的指示，回来后心情很激动。古柏兴奋地将毛委员、朱军长的指示向游击队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全体指战员作了传达，并根据毛委员、朱军长的指示将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干部、伤员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

1930 年春，毛委员又率领红四军到了寻乌。当时，古柏同志是寻乌县委书记，我负责妇女工作。我们同毛委员同住在县城边马蹄岗的楼房里。因毛委员要在这里作社会调查，就专门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子开座谈会用。古柏同志根据毛委员提出的调查内容和要求，提供了调查对象，帮他作笔记、整理记录、刻腊板、油印等，还兼当翻译，因寻乌上话不好懂。我主要是下乡做妇女工作，但一有空也去帮忙。

毛委员对这次寻乌调查非常满意，他说：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范大明等人，他们提供不少材料。多谢他们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的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还说：“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毛委员回到军部，又高兴地对朱军长说：有收获，这个县城有意思。古柏情况熟悉，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

毛委员当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破了自己打，还教别人怎样打草鞋；他和大家吃同样的伙食，青菜、淡饭、辣椒。从表面上看，毛委员是个很严肃的人，其实一经接触就知道他是个很好接近的人，他对人诚恳热情，会帮助人，会教育人。

毛委员在寻乌工作中了解到古柏的工作才干，经他提议，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古柏调到前委任秘书长。在红四军即将离开寻乌时，毛委员同古柏谈了前委的决定，并要古柏动员我也一起走。我对古柏讲：“我搞地方工作合适，到部队里去能做什么呢？”我还说：“我走了，怕寻乌的妇女工作没有人做。”古柏把我的话告诉了毛委员，毛委员找我谈话说：“碧漪同志，你不想同古柏一起走吗？工作不怕没有人做，你走了就有人做了。我们这个革命工作本来就没有人做，现在不是有人做了吗？你还是去吧，我们已经决定你离开这里，妇女工作会有人做好。”我觉的毛委员说的有道理，又知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只好同意离开寻乌同古柏一起到前委工作。

对于把古柏调离寻乌，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舍不得。有一位县委委员对毛委员说：“毛委员，你不能把古柏同志带走，把他带走了，这里的工作就没有人负责了。”毛委员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答：“我叫赵镜清。”毛委员说：“噢！你叫赵镜清。我的意见，古柏走了就由你干，你负责。古柏走是组织决定的，不好改动了。”赵镜清还是说古柏走了不行。毛委员说：怎么不行？你先开个会把工作讨论部署一下，大家照着去做，有什么事情再召集开会，各方面比较一下，哪个长，哪个短，哪个可以做，哪个不可以做。

这样不就行了吗？再说我们走了以后也相隔不远，反正就在赣南、闽西一带，有不会的还可以问嘛。

我和古柏跟随毛委员、朱军长从寻乌出发到闽西，在长汀南阳出席了一个会议，时间是 1930 年 6 月，随后，我们又转战到赣南。

第二次打长沙之前，我们驻扎在吉安肢头，在一起的女同志有贺子珍、康克清和我。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分别同我们讲：“部队上前线打仗，要你们几位女同志留下组织妇女团，开展妇女工作。”我对说刘说：“我们不是怕死鬼，应该到前方去。”随后我又去找毛委员，我说：“你看，我在寻乌时不愿来，你要我来；这回我要到前方去，你又不让我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还是要去，到前方死了也死的光荣！”毛委员说，“情况不同了，你现在身怀孩子嘛，不是前方不需要人，你去了可以做些工作，但某些地方会增添很多麻烦，在前方生孩子怎么办？还得派同志照顾你。再说，贺子珍、康克清也都不走。”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就留了下来。

我们几个女同志在肢头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贺子珍当主任，我和康克清当教员。我们走在一起；见到的人就讲笑话，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后方司令部”。他们认为，前方有毛委员、朱军长、秘书长组成的司令部，后方有我们三个组成的司令部，所以平时一讲笑话就讲我们是“后方司令部”。

我在总前委工作期间，做的是机要工作。帮助毛委员抄抄写写、搜集报纸，将报纸上有用的材料一段一段剪下来，有时遇到两面都有用，就剪下这一面，将另一面抄写下来。还帮助毛委员收发文电，把从苏区以外各地送来的写在衣服、布匹或《红楼梦》、《水浒》等书上的情报，用药水冲洗出来。

毛委员这个人很风趣，也很会帮助人，发现你有什么困难，他会尽量帮你解决。我记得在前委工作时，我又带孩子又抄报纸，总有抄错的地方。我把抄重的地方完全涂掉，毛委员看到后就说：“哎，碧漪同志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我说：“好呀。”就走了过去。他说：“你贪污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心里很难过。我说：“我一不管钱，二不管物，怎么个贪污法呢？”他说：“对，你不管钱，不管物，但你还是贪污了。”我说：“毛委员，这你可要说说清楚哇！”他说：“叫你过来就是要跟你说清楚。”他指着涂掉的地方说：“完全涂悼看不见就是贪污了。”我说：“抄重了一句不涂掉怎么办？”他说。“要涂掉，但不能完全涂掉，这样什么字也看不见了。如果你是管帐目的话，收了一千元钱，又将一千元几个字完全涂掉，后面再写上九百元，这还不贪污钱了吗？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在抄错的地方打个框子，再在框里转转画上几道，这样还看的清楚，即使有错的还可以改过来。如果完全涂掉，就改不了了。以后要注意，在错的地方不要完全涂掉，只要打个框子画上几道就行了。”毛委员的工作是很仔细的，人家做在前面的，不对的地方，他一查就查出来，并教别人如何改正。他做什么事都是认认真真的。后来我看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列宁也是在错的地方打个框子，里面画上几条线。这使我进一步明白毛委员教我这个办法的意义。我和古柏在前委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与毛委员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吃饭时，常共用一个菜盘，南方有一种分成几格的菜盘，毛委员夫妇的菜放在靠近他们的菜格里，我们的菜放在靠近我们的菜格里。虽然是这样分开放，但吃起来就不分你我，而是“各取所需”。毛委员爱吃辣椒，他吃的主菜是辣椒炒豆腐，我是广东人，不太敢吃辣椒，古柏是江西人，他敢吃，能跟毛委员吃到一起。晚上睡觉，不行军时，我们与毛委员就近相住；但行军时，由于当

时条件所限，为尽量少占用民房，我们四人往往就同住在一间房里，放两付门板，中间拉块布隔一下。布的一边是毛委员夫妇，另一边是我和古柏。我们同住一间房时，毛委员和古柏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无所不谈，忽而平声切磋，忽而朗声大笑。我和贺子珍白天行军累得不得了，躺下不一会就呼呼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觉，他俩还在说。我叫他们别谈了，抓紧时间睡一会，他们一边笑一边对我说：“你们睡你们的，我们不困，再谈一会。”于是，我又在他们的低语声中重新进入了梦乡。

那时，我们的军事秘密保守得是很严格的，不该知道的人绝不会让知道。比如搞军事演习时，我和贺子珍事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常被突然的紧急集合会弄得手忙脚乱，除能带上公用的文件外，其余生活用品、食品等往往只得心疼地就地扔下，直到转回了原处，才知道是演习。有一次贺子珍同志说：“要不是演习，真把这些东西扔了多可惜！”毛委员却笑着说：“扔了被老百姓捡去还不是一样有用，反正没有浪费。”

我同毛委员、贺子珍在一起工作时，总的感觉他夫妇俩的关系是不错的。毛委员这个人很好，关心贺子珍，关心小孩，教育小孩，只要有时间，什么大小事他都管，贺子珍照顾毛委员也不错，协助毛委员做点生活上的工作。不过，贺子珍同志的个性较强点，有时同毛委员吵嘴。有一次吵得还挺厉害，起因是毛委员得知杨开慧同志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后，心里很难过，连着两天没吃饭。贺子珍同志见毛委员这样难过，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诸，使毛委员很恼火，毛委员说：杨开慧同志是为革命牺牲的，是革命烈士，我们都应该感到痛心，都应该深深地怀念她，你如果有革命同情感，也应该和我一样两天不想吃饭！每次贺子珍同毛委员吵嘴，古柏都要出来劝解，而且以批评贺子珍同志为多。古柏对贺子珍说：“你不能只把毛委员看成是你的爱人，而首先应想到他是我们革命的领袖，你应该尊重他，维护他。”而贺子珍对古柏的意见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对古柏的批评总是心服口服。

第一次反“围剿’、时，我同贺子珍保管文件箱随部队走。我军在龙冈打了一次歼灭战。毛委员、古柏都在前沿指挥，我同贺子珍在后面和挑夫看管文件箱。听到我们部队打了大胜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和贺子珍就爬到山头上去看。结果被毛委员、右柏回来时看见了，毛委员批评我们说：“你们离开文件箱子，被人家挑走了怎么办？”我们回头看看文件箱还在，就强词夺理他说：“噢，打了胜仗还不许我们看上一眼！”

这一仗活捉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赞，让他跟着总前委一起走，还让他骑马。如果让他步行，就拦不住老百姓打他。其实，即使他骑在马上，也还有很多人用石头扔他。毛委员在路上一再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劝群众不要打，说：“把他打死了就不知道敌情了。”到了驻地，司令部要张辉赞讲敌军“围剿”的情况，讲要求活命的条件。苏区的群众受张辉赞的害根深，非常恨他，不让群众出出这口气是不行的。于是，组织了几次群众斗争大会，让老百姓控诉张辉赞的罪恶。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敌机经常来骚扰，乱扔炸弹。1931 年 9 月的一天（即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牺牲的那一天），我和贺子珍随军转移，太阳将下山时，毛委员、古柏他们前面走了，我们掉了队。我们正在路上走，忽然敌机来了，乱扔了一阵炸弹，有一颗炸弹落在我们附近。我们忙卧倒在一堆墓地旁，被炸弹溅起的泥土几乎把我俩活埋了，幸好没有受伤。天黑了，四下无人，我们摸黑下山去找总前委机关驻地，直到深夜才找

到。毛委员、古柏正在为我们担心，因为通讯员曾经告诉他们说他亲眼看见敌机的炸弹落在我俩身边爆炸了。毛委员、古柏见我俩回来了，高兴他说：“啊，你们回来了？！我们正要派人去找你们的遗体呢！”毛委员还和我们开玩笑说：“你们是人回来了呢还是鬼回来了？”逗的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毛委员搞调查很有一套办法。当时司令部有个侦察队，部队出发前先由他们探明行军路线，弄清行程，寻找带路人。毛委员一到驻地，就到田头同农民蹲在田埂上边抽烟边聊天，或者同农民一起车水，边车边聊。农民们觉得这位同志哥很关心他们，对待他们又很和气，但不知他就是毛委员，就无拘无束地同毛委员聊，什么都讲，有问必答。毛委员就从同他们聊天中把当地的阶级状况和第二天行军的路线、里程等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晚上毛委员召集参谋们汇报情况时，听后往往还是毛委员自己补充，告诉大家这里到城里要经过什么河、什么山，小路去比大路近。翻山去更近，哪个镇上有民团，要注意什么，等等。毛委员尊重农民，农民信任毛委员，调查到的情况实在，工作效率很高，这是一般同志难以做到的。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江西中央苏区时，古柏同志挨整，毛委员自己受排挤，已无力救助古柏。古柏挨整时，被调到粮食部工作，我则到了会昌，所以红军开始长征时我与古柏不在一起。以后我和古柏虽然都被留在苏区，但没有接上头，谁都不知道谁在哪里，直到 1937 年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广东韶关。），我收到地下交通给我送来的一封信，信的落款是“润之”，我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给我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古柏同志牺牲了，他很悲痛，同时劝我不要过于悲伤。得到这个噩耗，我悲痛万分，但又不能对任何人讲，因为相识者和我的母亲、孩子都相信我对他们说过的“我的丈夫在南洋做生意。”后来国共两党的关系有所缓和，毛主席又叫贺子珍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去延安，但由于信件通过地下交通传递延误了时间，交通发生问题，没有去成。

1950 年初春的一天，贺子珍的妹妹贺治坐着吉普车从江西吉安县到广东南雄来找我，告诉我贺子珍已从苏联回来了，要我带着我的儿子去北京。我当然很高兴，我与贺子珍同志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我们同车北上，到了江西省泰和县境，夜幕已经降临，本该停车休息第二天再走，因那时公路的质量很差，又是山路，但贺怕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硬要连夜赶路，结果走了不多远汽车翻到山沟里去子，贺怕和我的儿子一起遇难，我的一条腿也被压断了。毛主席访苏回来后看见了我，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翻车的经过。沉默了好大一会，毛主席说：现在解放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帮助解决，唯独你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儿子已经死了，无法挽回了。过了一会，他又劝慰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想开一点，我们入党时宣誓要为劳苦大众谋解放，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现在解放了，你的儿子不在了，很可惜。干革命总要有牺牲的，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父母早已不在了，我的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都为革命牺牲了，毛泽覃的一个儿子才十八岁就被敌人活埋了，杨开慧也为革命牺牲了，还有小毛（指毛主席丢在江西的儿子）也没找到。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家里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不能老去想自己的事，自己的儿子，应当多想想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多想想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事业。然后他问我，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全国妇联。他说：好，全国妇联是妇女同志之家。你也可以住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员之家。这样，过了不久，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了我的住处和生活。毛主席还叮嘱我说：

我们都是革命老同志，有什么事情可以同组织说，也可以到我这里来，先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我会抽出时间的。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去看望毛主席时，毛主席专门嘱咐厨师准备了我爱吃的南方菜。吃饭时他说：“苏区时我们同在一起吃饭，很艰苦，现在情况不同了，可以吃得好一点。”晚饭后在他家看了电影《攻克柏林》。我走时，毛主席还送给我一匹白绸布，说做夏衣或做别的用都可以。

国庆十周年那天晚上，我随陈正人，彭儒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着赫鲁晓夫对我说：“这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同志。”

1960 年夏天，我和我从江西苏区找回来的小儿子古忆民随朱总司令一家去北戴河休养。一天下午，忆民去海边玩，正在同王稼祥同志聊天，看到毛主席游完泳从海里出来，赶紧跑过去一边叫毛主席，一边深深地向毛主席鞠了一躬。毛主席不知他是谁，只是带着慈祥的微笑说谢谢；谢谢！王稼祥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古柏同志的儿子，叫古忆民，是从江西瑞金找回来的，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忙紧紧握住我儿子的手说：找回来了就好，找回来了就好！接着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忆民的身体、学习、爱好等情况。然后他问：你妈妈来了吗？现在哪里？忆民忙从休息室把我叫出来，说毛主席在找你！我赶紧走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很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又见面了，还见到了你的儿子！在休息室，毛主席细问了我的近况，然后用责怪的口气问我为什么好久不到他那里去。我说：你工作很忙，不好老来打扰你。可毛主席说：工作再忙，老同志在一起聊聊天还是可以的。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向来都是很关心的，这次他又对我说：身体要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先把本钱充实起来，才好工作呀！没有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能工作呢？……。

有关毛主席和罗荣桓交往的片断回忆

林月琴

一

当我十三四岁时，便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一开始听说有朱毛红军，我还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到 1930 年，我的家乡河南省商南县搞立夏暴动以后，我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青团，才知道朱总司令和毛主席是两个人，他们正在江西苏区领导中央红军闹革命。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已经是长征以后到了陕北了。我在党校时听过他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讲话。至于他认识我、同我亲切交谈已是我和荣桓结婚以后的事。

1937 年 7 月 10 日，荣桓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正收拾行装，准备到部队去。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的住处去。当时，我有点紧张。这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前，毛主席曾经冲荣桓发过一次脾气。事情是由一位外宾要到延安来引起的。当时荣桓看到毛主席用的被子已经十分破旧了，感到让外宾见到不大好，就叫供给部给毛主席换一床棉被。毛主席见到这床新被子，立即追问是谁让换的。当他得知是荣桓后，就打电话给荣恒，责问为什么要换被子。他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他说话声音很大，虽然有湖南口音，我在电话旁边仍听得清清楚楚的。荣桓接完电话感到毛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立即让供给部去把原来那床旧被子再换上。

由于有这么一件事，我感到毛主席脾气很大，去时我有点紧张。到了他住的窑洞，我看到贺子珍也在。毛主席起身招呼我坐下后，很和蔼他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我回答说：“我原来是四方面军的，抬过担架，当过宣传员，到川陕后带了一个营的女工兵。”毛主席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你们结婚还没有请我吃糖呢。你们那一天用什么来待客？”我回答：“宋裕和从西安捎回了半袋洋面，吃了一顿面条。”毛主席风趣他说：“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我不忍住笑了，刚来时的紧张和拘束感一扫而空。接着，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说起了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桓曾先后在长沙、北京、青岛、广州、武汉等地求学。1927 年在武汉大学入了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派遣，到鄂南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暴动，带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枪到江西修水，参加了湘赣秋收起义。几个团一开始都打了败仗，后来便从文家市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进军。到三湾改编时，有些人在艰苦的斗争中动摇了，有的甚至不辞而别。荣桓坚定地留了下来，被任命力我军第一批连党代表之一，上了井冈山。古田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名荣桓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并建议任命他为第二纵队党代表，随后又任红四军政委。讲到这里，毛主席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

提到老实，我不由得向毛主席说起荣桓曾向我讲过的他一段亲身经历。通城暴动以后，农民自卫军见他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学生，便推举他保管自卫军装在一只皮箱里的现金。队伍从通顾问修水转移的途中，荣桓提着这只沉重的箱子，感到十分吃力。这时，有两名农军战士走过来对他说：“先生，

你辛苦了，我们来帮你提吧！”不由分说便把荣桓提的箱子夺了过去，荣桓看这两人是队里的战士，便松了手。等到宿营时，那两个人连影子也找不到了。荣桓和我谈起此事时说：“走进革命队伍里的人也并不是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看，从这件事上，他这个老实人也悟出了一条真理呢！所以他对是和非、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毛主席还告诉我，第四次反“围剿”以后，荣桓被调离部队改任总政的巡视员和动员部长，仍然老老实实为党工作。他在一个地区领导扩大红军，三个月完成扩红三千人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接着，毛主席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已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最后，毛主席关切地问我：“你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我立刻回答：“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说：“好，以前你当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当红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罗！”

从毛主席那里告辞出来，贺子珍送了我一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和罗荣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了。她感到荣桓十分忠厚老成。长征之中，她骑了一匹小骡子走得慢，经常掉队。当时荣桓所在部队负责殿后、收容，她经常掉到荣桓所在的部队，荣桓一见她来，立即安排她的宿营、警戒。电话线一架好便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放心。贺子珍说，她掉队到荣桓所在部队就像到了家里一样，感到十分安全。

从毛主席那儿回来，我向荣桓讲了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他是不习惯流露自己感情的。他把毛主席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加紧了奔赴前线的准备工作。临分别的那一天，他才对我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二

1942 年是山东抗战中最艰苦、最紧张的一年、荣桓曾将这一年比喻为“拂晓前的黑暗”。就在这一年年底，因劳累过度，荣桓得了尿血的病，人日见消瘦，但查不出病因。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内实行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决定叫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但此时荣桓因病情严重。1943 年 3 月 11 日，他致电中央，请求准许他休息半年。毛主席接到电报，感到十分突然并表示关切，12 日，他和朱德复电：“你的病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同时建议让荣桓的战友黎玉、萧华等多分担一些工作。从那以后，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一直非常关心，经常发电报询问病情，安排治疗和休养，当山东军区新的机构组成以后，毛主席便批准荣桓赴新四军，请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国际友人、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诊治，我陪同荣桓干这一年 5 月间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岍贻县黄花塘，罗生特大夫诊断查明，荣桓的肾脏有病变，但究竟是肾癌还是多囊肾，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罗生特也无法确诊。这时，国民党派李仙洲率九十二军人鲁反共，山东斗争形

势顿时紧张起来。尽管在新四军医疗、休养条件均好于山东，但荣桓在黄花塘仅住了一个多月，便返回山东。这一年秋季，为了就近为荣桓治病，陈毅同志将罗生特派往山东。但当时在山东仍未买到大一点的X光机，罗生特仍做不出正确的诊断。他建议让荣桓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后发报请示中央。毛主席复电同意，我便陪同荣桓前往新四军三师，准备从那里再通过地下交通线去上海。毛主席发出同意荣桓赴上海的电报后，又很为荣桓的安全而担心，很快于1944年2月8日又发了封电报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的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毛主席的电报，关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当军区收到这封电报时，我们已经出发了。直到2月27日我们到达三师驻地，才看到这封电报。荣桓红军时代攻打梅县中，腹部负过重伤，身上有伤痕。毛主席所说"实含若干冒险性质"即指此。荣桓看到这份电报后，即决定不去上海，又返回山东。

到1945年，荣桓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毛主席考虑到荣桓兼职很多，担子太重、决定将林彪调往山东。8月26日，毛主席亲笔撰稿，致电山东分局："林彪、肖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之职务，林、肖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然而，到了9月19日，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央又决定调荣桓去东北工作。此时荣桓因病重已难于支撑下去。他曾向中央提出，希望能休养一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去东北，他请求不要让他当部队主要领导人。中央复电，由于斗争需要，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于是，荣桓便率山东军区部队6万余人于1945年底前陆续到达东北。途中，荣桓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名为民主联军）第二政委。

到达沈阳后，荣桓立即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待调到东北的部队基本安排就绪后，荣桓抽空到前日本陆军医院作了身体检查，照了X光片。日本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东北局报告给中共中央。当时，前日本陆军医院政治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为了保证安全，毛主席经慎重考虑后，主张让荣桓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为此毛主席还向金日成同志和苏联方面发了电报，作好了安排。我们在平壤，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热情接待。

在平壤苏军医院，荣桓的病再次被确诊为肾癌。由于这所医院是野战医院，不具备施行肾切除手术的条件，院方建议尽快去莫斯科治疗。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联络部门同苏方联系。1946年7月，我陪同荣桓赴莫斯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手术保证了荣桓能以比较健康的身体投入解放战争紧张的工作。

但是，1949年四、五月间，荣桓在天津视察时，又突然病倒了。他只有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有一天他在同一位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了。毛主席得知后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荣桓治疗。黄临行前，毛主席给荣桓写了封亲笔信，托黄转交。毛主席在信中要求荣植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来安慰和鼓励荣桓，遗憾的

是由于“文革”中抄家，这封珍贵的信件已经找不到了。

建国以后，毛主席对荣桓的趁康仍然十分关心。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政干部部部长期间，工作相当繁忙。他经常要到总政和总于机关去办公，时常还要去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由于经常劳累过度，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毛主席知道后，于 1950 年 9 月 20 日，在荣桓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免书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到 1956 年，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他怕贻误工作，便写报告请彭德怀同志转报毛主席，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主席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主席提名，又选举荣桓为政治局委员。

以后，由于身体不好，中央有一些会议，荣桓没有参加，但是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我陪他去了。会址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荣桓参加了一次会议后，毛主席就指示他，会中可以退席，不要勉强坚持下去，可以在宿舍看看文件。有一天，我陪荣桓在院内散步，看到毛主席也在散步。当时，正在除四害，到处都在轰赶麻雀。但金牛坝招待所内无人轰赶，因此许多麻雀都飞到招待所里来，喊喊喳喳，十分热闹。我们和毛主席打了招呼后，毛主席挥了挥手说：“你们看，麻雀都到这里来避难了。麻雀还有个避难所，比我们当年下井冈山时还好一点。那时我们连个避难所也没有了。”毛主席说到这里又看看我说：“还是我说的对吧，我们这位病号可是老实人呀！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看来，毛主席仍然记得他 1937 年同我的谈话，他的话似乎就是接着那一次谈话说的。

三

尽管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派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但是由于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尚不能进行肾移殖手术，荣桓的健康每况愈下。到 1960 年底，林彪把谭政整下了台，经罗瑞卿和萧华提议，毛主席又决定让荣桓复出，当总政治部主任。荣桓又带病工作了两年多。1963 年秋季，不仅血压高，心绞痛时常发作，肾功能也衰竭了，住院不久便报了病危，毛主席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但是，用尽所有办法，抢救无效，荣桓于 1963 年 12 月 16 日下午逝世。

这天晚间，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主席提议与会者起立为荣桓默哀。默哀毕，毛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 1902 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当晚，罗瑞卿同志便让郝治平同志把毛主席的话说给我听。毛主席对荣桓的评价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后来我听说，荣桓逝世后，毛主席十分悲痛，几天内都睡不着觉，他写成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主席这首诗在 1963 年并未发表，发表此诗已是 1978 年 9 月，其时毛主席逝世已经两年了。这首诗正如《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者所说，是“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诗的内容上，也表现在诗的书法上面。从诗句看毛主席的激情犹如江河直下，对用词来不及推敲，从书法看，他写时手有点抖，到最后两句，看笔势似乎已经不能成篇了。这一篇的手迹同毛主席同时书写的曹操诗《龟虽寿》之潇洒奔放，形成了强烈对比。毛主席写这首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书法看，都说明他在荣桓逝世后一度处于极度悲痛之中。由此可见毛主席和荣桓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我想，这不仅因为荣桓从秋收起义开始便在毛主席领导下战斗，而且也因为荣桓对毛主席十分尊敬，而毛主席也十分器重荣桓。我这一生中直接同毛主席交谈就有两次，而这两次毛主席都反复强调荣桓老实。我想，毛主席器重荣桓的主要也就在这一点。

我感到老实这个词含义比较宽，它不仅仅指忠厚老成，也不仅仅指在个人利益上能够让人，常常吃亏。我想，它的含义主要是指实事求是，也就是陈云同志所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唯上、不唯书，并不是说不执行上级指示，不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荣桓对于上级的指示，只要是正确的，是经过努力便能办到的，便坚决去贯彻，不讲价钱，不打折扣。例如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的关键时刻，林彪因敌人增兵四个师而一度犹豫，荣桓便对他进行了劝说，林彪终于坚定了攻锦的决心，这是大家已经熟知的。1953 年，在学习外军经验时，有的同志主张将我军一贯实行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改变为一长制，降低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荣桓知道后便去见毛主席。平时他是很少去见毛主席的，他怕打扰主席的工作，但那一次他去了。事后当毛主席谈起此事时说：“有的同志要搞一长制，罗荣桓向我反映，气得说话时嘴都在发抖……”荣桓为什么激动呢？这是因为他认为实行一长制便背离了我们党在军队实行的根本制度和我军的优良传统。

但是，荣桓也不赞成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上级来了指示，他都要结合实际进行认真研究，在执行中会发生问题的，便及时向上级提出来，建议予以变通修改。

1942 年，山东同各根据地一样，也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并取得了很大成绩。1943 年中央要求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行审干。当时、康生在延安夸大敌情，胡说党内军内“特务如麻”，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这一切当时都被称为“延安经验”。它传到山东后，荣桓仍然结合山东实际，估计了干部队伍内的政治状况，认为干部中潜伏在党内的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他也不赞成通过放任自流式地发扬民主以暴露敌人的方法，他认为在敌后、在部队中不宜这样搞。他向中央报告了山东分局的作法。毛泽东并未因山东分局的作法与延安经验不同而对荣桓的报告有任何不同意见，相反，他很快批准了山东的

做法，从而防止了反内奸斗争的扩大化，保证了山东党的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由此可见，毛主席并不喜欢下级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他的指示。他认为这样做就是怠工，同样不是老实的做法。

老实，实事求是，我想，便是我们应从毛主席和荣桓的交往中所汲取的最可宝贵的教益。

（黄瑶记录整理）

深切的怀念

李银桥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唱出了亿万人民对领袖的深情。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都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往事一件件涌现在眼前。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亲眼目睹当代伟人毛泽东的非凡气度，亲眼目睹过他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情景。同时，我也亲身体验到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体恤民情的丰富情感。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我对老人家的怀念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反而愈加强烈。他那慈父般的音容笑貌，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时时索绕在我心头。

近几年，我曾应邀到各地党政机关、军队、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进过近百场“毛泽东的故事”。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他老人家的炽烈感情，使人激动、难忘。我常想：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今天，人们的观念和追求与毛泽东在世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人民群众对他依然怀有那么深的感情，这是为什么？正像一位青年朋友对我说的那样：毛泽东来自人民，他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又为人民能过上好日子，耗尽了一生的精力，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爱戴的人，才是人民深深怀念的人。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五年，感受最深的也正是这一点：领袖爱人民，人民爱戴自己的领袖。在这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怎能不深切地怀念他。

为国家日夜操劳

我是在中国革命处在一个重要关头时到丰泽东身边工作的。那时正值延安保卫战。当时我军与敌人的兵力悬殊很大、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毛泽东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他或是在行军的马背上，或是在老乡的炕头上、锅台边，昼夜操劳，指挥着身边和千里之外的全国各个战场。

1948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到了西柏坡，在这之后的半年间，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进入了大决战的时期。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分工，毛泽东和周恩来负责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军在四个多月中，歼灭敌军一百多万，取得了推翻蒋家王朝的决定性胜利，在这次大决战中，毛泽东倾注了全部精力来指挥战争，常常几天办公室的门都不出。他有时一天中要给各战场起草，签发十几份、几十份作战命令。夜间工作是毛泽东的习惯，但那几个月中，白天他也极少合眼。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为指挥锦州战役，两天三夜没上过床，靠几包烟，几杯茶，连续工作。指挥三大战役那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可是他有超人的精力，工作起来我们四个卫士都熬不过他一个人。当时，负责照料他生活的有我们四名卫士，轮流值班。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在白天还挺精神，可是一到夜里，特别是后半夜就常常睏得抬不起头来。有一次一名卫士值着班睡着了，结果被仍在工作的毛泽东发现，亲切地给这名卫士披上一件御寒的大衣，这名卫士醒来后很不好意思。作为卫士，我们见毛泽东长期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心里很着急，可又一下子想不出好办法让他睡觉率是把他从那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拉出来散散心。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看到他批阅文件时，就上前扶他坐在藤躺椅上，这样，他看文件，我则站在他身后为他筐头。毛泽东很欣赏这样做说：“银

桥，你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蓖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我听后很高兴，可每次蓖头后又很后悔，因为笆一次头，毛泽东就取消了一次睡眠。以前，毛泽东身体很健康，满头乌发。可就在平津战役进入后期的一天，我为他蓖头时，发现他的头上出现了一根白头发，当时我惊叫了一声“主席，你有白发了！”我见毛泽东的眉梢也动了动。“拔下来吧！”当我将白发拿到他面前时，毛泽东只用眼睛凝视了一下，乐观他说：“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

长期的战争生活，使毛泽东养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然而，作为一个几亿人口大国的领袖，毛泽东无法摆脱接二连三的那些亟待处理的国内外大事，因此，白天的睡眠对他来说也是难以保证的。有人问我毛主席平均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我答不上来，因为他的一日时间表与我们普通人习惯的作息时间不一样。通常，他从吃完饭后便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清晨四五点钟，还没睡二三个小时，就会又有紧要事催他起床处理，而这一起床，也许又是不分昼夜地连续办公。从我到他身边工作直到 1962 年离开的十五年间，毛泽东的工作时间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要计算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只能用“周”来计算。有个卫士曾经给毛泽东计算过一周内的工作与睡眠时间。结果在一周 168 小时中毛泽东的睡眠时间还不足 27 小时，其余的时间几乎全在工作和读书。

毛泽东超人的精力，是我接触到的众多领袖人物中最不平凡的一个。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党中央带着我们进了北平城。当时我们这里的卫士都很年轻，心里天真地想到：我们胜利的大局已定，毛泽东能松口气了，然而，万没想到他老人家的工作却更加忙了。刚进城时，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为了筹建新中国并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几乎天天要接待和拜访各界人士，常常忙得连吃饭时间都被挤掉，当时为安全起见，毛泽东白天进城，晚上回香山，每天乘着车来回跑，体力消耗很大，可他老人家从没因此而减少过手头上的工作。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想尽可能为毛泽东做些。事。可常常徒劳，端到他桌前的饭，总要热了一次又二次。一天，工作了廿多个小时的毛泽东感觉肚子有点空了，便叫值班卫士到厨房烤几个竿头，端上芋头后，卫士便从办公室退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卫士进屋发现，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而他的嘴里竟还半含着一个竿头呢！毛泽东就是这样，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直到劳累得不能自持时才会歇一会。为了能从工作中把毛泽东拉出来休息片刻，我们不知想了多少招术，可常常被他老人家“说破”。毛泽东在工作中偶而休息十分钟散散步，扩扩胸，有时为了让他多换换脑子，我经常在这十分钟上做点小手脚，可是常常被他发觉。虽然毛泽东每次是让值班卫士记时间，但只要一到十分钟，他几乎都会分秒不差地准时回到办公室，只有下雪天他出来散步才例外。毛泽东一生酷爱雪，一见雪就会忘情。一次又一个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到了，我见他在雪地里那兴奋的劲头，便故意、把休息延长了十分钟。廿分钟到了，我再不敢耽误，便说“主席，时间到了。”毛泽东听后又像以往发现我做“手脚”似他说：“银桥，你的表怎么又出毛病啦！”我不敢撒谎，说：“主席，我多给你了几分钟。”毛泽东听后乐呵他说：“可我觉得今天的时间太短了。”这样“浪费”时间，在毛泽东一生中实在太少。

记得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毛泽东上午开会，下午参加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晚上又回办公室开始工作，一直到 10 月 1 日清晨还没有休息。我和几名卫士

都非常着急，因为下午他还要参加举世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他休息不好，出点什么意外，这是谁也担当不起的责任呀！为此，周恩来同志一连三次打电话来询问主席睡觉了没有，并且命令我无论如何要想法子让毛泽东好好地睡上一觉。无奈，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屋，可见他老人家伏案聚精会神工作的情景又不敢多去打扰。长期在他身边，我深知毛泽东的耳惯，在他工作时是不允许别人随便打扰的。毛泽东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你们劝我休息是对的，不过，次数多了，反会影响我的工作。每天大大小小那么多事都在等着我处理呀！”时针已经指到早晨六点了，毛泽东还在伏案办公，于是，我硬着头皮又一次进屋轻轻劝他休息，并把周恩来的话一起报告了。毛泽东没有作声，继续看着写着。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他才起身到院子散步。十分钟后，他对我说：“银桥，我睡觉吧。”我赶忙服侍他洗澡，上床后，便从卧室退出，但是凭我的经验推测和在门外听到的细微动静，我肯定这一上午毛泽东也没睡几个小时。下午一点我叫醒他后，吃完饭，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便陪他步行至勤政殿。三点正，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这天，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除中间有一次回中南海吃饭外，站了几个小时，十点多钟回到“菊香书屋”。尽管如此劳累，可毛泽东一进办公室，窗前那盏明亮的灯，又是彻夜未熄。

时刻挂念人民疾苦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搞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新课题。为了使人民尽早地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开始把精力转移到这一新课题上。

还在转战陕北的紧张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在指挥对敌战争的同时还在关注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并着手为全国解放后实行全面土改作准备。记得那是 1947 年 4、5 月，我军运用毛泽东的“蘑菇”战术，接连在青化砭，羊马河和幡龙三战三捷，彻底打垮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使留守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我军从战略上由被动变成了主动。10 月，部队转战到了佳县神泉堡村，此时山东临沂的战役也在激烈进行。有一天，毛泽东对我说：“银桥，准备一下，明天开始跟我到佳县附近几个地方走一走，少奇同志他们在西柏坡开会通过了一个《中国土地法大纲》，现在刚在解放区传达，我们下去调查一下看看怎么样。”这一次社会调查共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毛泽东沿黄河边走了几个村庄。他每到一地，白天不是听汇报，就是跟农民一起边劳动边聊土改的事。晚上，便在煤油灯下挥笔疾书。这次调查，为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著名报告，以及后来向党内发出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重要文件作了准备，充实了大量材料。对当时解放区土改工作和加快解放战争进程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次社会调查我也得到了很大收获。遵照毛泽东指示，我把所见所闻整理出了一篇“旅行集”，毛泽东看后笑了，抓起笔把“集”字改成了“记”字，并在文中又改了不少错别字，挥起大笔批示道：“写得很好，大有希望。”毛泽东，还要我把“旅行记”寄回老家给我父母和乡亲们看，他说：“告诉你父母，你在我这里工作，有了进步。”我父母和村里人见了这份由毛泽东亲笔批示，签名的“旅行记”十分高兴，特别是村干部，说也要像延安解放区那样，把土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倾注在为广大农民尽快摆脱贫困上。五十年代初期，他亲自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几亿农民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分散、革一的小农经济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1955 年这一年。当时，为了鼓励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以极大热情一次又一次地到各地巡视。这年的下半年，他为了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吩咐我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独自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看啊写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将全书的一百多篇文章逐篇认真地进行了审阅修改，并亲自写了 104 条按语。那段时间里，他的办公室每天长夜彻明，早上总有一堆修改好的文稿让秘书拿走誊写。两个月后，这本巨著就与读者见面了，为当时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由于我们的人民政权是在旧社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农民到底有没有饭吃，老百姓的日子到底过得怎样？这是解放初期毛泽东每天在操心的大事。为了考察民情，毛泽东多次突然通知我们，说他要到郊区农村或普遍市民家看看。就是在欢送外宾从机场回来的途中，有时也提出要到饭馆里坐坐，在外出开会或巡视中，为能够真实地了解民情，他总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有关地方的领导，不要惊动下面，以便能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同群众聊聊天，只要有机会能接触群众，毛泽东总不愿放过。后来，出于安全考虑，亲自到下面的机会少了，可他依然始终不放过任何了解民情的机会。一方面，他每天阅读大量群众来信和各地各部门送来的材料，一方面动员身边的卫士和警卫战士到基层一线作实地调查，或者让我们利用探亲、休假的机会了解民情。

1955 年初，毛泽东要我到我的老家河北省安平县搞调查。这时正值搞农业合作化之际，我回到家乡发现那里的农村干部工作简单化。为了让农民入社，村干部把村民召集起来后，插上两块牌子，一块挂着毛主席像，一块牌子上写着蒋介石，然后让村民根据各自的心愿站到牌子下面。这样简单化的工作损害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情和入社的积极性，我把这一情况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说道：“这怎么行！不能这么简单嘛！中国农民很苦，过去在地主的剥削压迫下没有土地，新中国分给了他们土地，现在一下子要他们交出土地走合作化的道路，思想很可能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做工作的同志要给他们讲道理，讲合作化的好处和意义，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站站队就能解决问题的事。说完，他随即给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纠正那种“入社站队”的作法。

为了更多地了解来自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不久毛泽东又指示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给他专门成立一个警卫中队，这个中队的成员都是从各地区挑的，并且有一定文化水平。毛泽东亲自规定了中队的三项任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帮助他搞社会调查。

1958 年至 1962 年间，由于天灾人祸以及决策上的失误，我国面临重重困难，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为此，毛泽东日夜焦虑，我们几个卫士和警卫中队的同志也不断被派下去了解情况。一天，一名卫士探亲回来，带了一个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糠皮的窝头，含着泪水对毛泽东说：“主席，我讲实话，乡亲们就是吃的这个……”毛泽东两眼怔怔地盯着那个窝头，双眉紧锁。只见他接过窝头时双手直在发抖，费了很大劲掰开一块放入嘴里。老人家嚼着嚼着，流下了眼泪。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将掰开窝头分给我们

几个卫士：“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食人吃的口粮……”他吃着说着，最后便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们站在一旁也难过的掉泪。那时刻，我们仿佛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人民领袖关切和体恤百姓疾苦之心的跳动声。

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身体不太好，我们知道，那是因为百姓吃不饱饭使他日夜牵肠挂肚所致。为了尽快想出解决办法，毛泽东不顾医生的劝阻，又开始带病南下巡视。并且接连召开会议，制定了几项重大决策。当时毛泽东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想法让挨饿的百姓能早点有饭吃，吃得好一点。

南下巡视回到北京，毛泽东把我们几个卫士召到他的办公室，郑重宣布：现在国家和人民都在受难，我们人人都要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他说：“老百姓吃定量了，我也应该定量嘛。是不是肉不吃了？银桥，你们愿不愿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我当时表示愿意。可看到毛泽东日趋衰老的身体，我不由劝阻说：“不过，主席你年纪大了，不比我们年轻人，而且每天又有那么多大事要办，就别……”

“不行”毛主席立刻打断了我的话：“我是党中央主席，更应该带好头。从今天起，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顿了顿，他又朝我说：“我还得另加一条：把每月的工资减少一些。银桥，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交待的事情就要照办，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敢违反。就这样，在国家最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整整七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坚持不吃猪肉。

人民的疾苦，国家的灾难，时刻牵动着毛泽东的心。1960 年 12 月 26 日这一天，毛泽东又把我和林克、高智、叶子龙、王敬先、封耀松及汪东兴叫到他的屋里，心情十分沉重地对我们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我老了，只好请你们帮我办了。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到底下面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要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

我们几位同志默默地点点头，表示一定按照他的指示去办。为这件事，毛泽东辗转难眠，又专门为我们下去的事写了一封信，让我们认真一阅。我和同志们看着他的信，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这一天是毛泽东 67 岁生日。以往每逢这一天，我们总要搞点“小花样”，让毛泽东乐呵乐呵，可这一次意义不同寻常。

夜深人静时，我给多日不能入睡的毛泽东梳头，我发现他的白头发不知不觉又多了，不由一阵心酸……。当年在西柏坡我发现毛泽东第一根白头发时，他老人家说：“打胜了三个大战役，白一根头发，值得，”而如今，他的白发已不是一根两根了，而是一片一片的。那都是为全国老百姓操心太多了呀！

除汪东兴外，我们一行六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到河南许昌地区鄢陵县搞了半年社会调查，后来，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回到北京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年工作和劳动锻炼的体会。他听了很高兴，并说；“以后，我的身边人员都要下去锻炼。”

严于律己是楷模

毛泽东生前十分重视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我们的干部能不能经受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争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当中央机关决定从西柏坡向北平搬迁时，一天他问我：“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我自以为满有把握地回答道。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我的太阳穴。见我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我听了顿时如听到警钟一般肃然。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占北京城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毛泽东经常用这一历史教训提醒党的高级干部要引以为鉴。在向北平进发的乘车前，毛泽东还这样幽默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是进京赶考去嘛！”

他的话逗乐了大家。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习惯地用大手在胸前一划，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他是这样一次次地告诫过全党。当帝国主义分子不能用武力和战争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阵营，而企图用“和平演变”来实现他们推翻红色政权的目的时，毛泽东更加重视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不要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软化自己的革命意志，要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保持共产党人的骨气和优良传统。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行动典范。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穿的是与士兵一样的衣服，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他衣服的补丁特别多，甚至连毛衣上都有补丁。别人听来似乎不相信这点，可我是在他身边关照生活的卫士，他的衣食我最清楚。在陕北杨家沟时，我见他的衬衣已经补了又补，硬得像纸板似的，实在不能再穿了，我便拿给他看说：“主席，您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您在台上作报告，一做手势，这衣服就裂开了。”

没有他批准，任何衣物都是不能扔的。这次他从我手中把衣服接过去，看了又看，说：“它跟我多年了。”停了片刻，他说：“这样吧，用它补别的衣服，让它再继续发挥作用吧。”解放后，日子好过些了，可毛泽东的衣着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传统。五、六十年代，他老人家身上，穿的衣服只有两套比较新一点，那就是参加开国大典和去苏联时穿的衣服，其余的衣服不是有补丁的，就是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旧衣服。他的内衣内裤上的补丁多得实在让人看了心酸。我几次提出添几件新的，可他都不同意。毛泽东虽然身着带补丁的衣服，但仍然不失领袖的风度。

有人会说一国之主，干吗搞得这么寒酸，可毛泽东说：“有条件了，吃得好点，穿得好点，我不反对，可我是一国之主，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吃得好、穿得好、我心里才高兴。“平日里，他老人家虽然经常教育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要艰苦奋斗，但看到我们一些年轻卫士穿上一身新衣服或换了一双新

皮鞋，他也会高兴地欣赏起来，或者开一句玩笑。在穿着上，他的原则是：“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

毛泽东在吃上也是十分艰苦和节约的。战争年代，他就吃“二米饭”（大米和小米混在一起蒸），菜是一半野菜一半酸菜。另外，是他一生离不开的辣椒。解放后，他吃的还是十分简单，以红糙米和竿头为主。他和家人的生活帐是由我负责的。记得五十年代开始工资制后，一天我把他和他家人的每月生活费列了个计划，其中伙食一项是每天三元的标准，拿给毛泽东看时，他的目光停在“每天三元”一栏上，问我：“三元一天是不是高了呀？”我解释说那里包括招待客人的开支，他这才批了两个字“照办。”

毛泽东严于律己的作风，在现在一些人看来有点“天方夜谭”可生活中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从 1953 年至 1962 年的十年间，毛泽东只做过两套新外衣，没擦过什么“霜”“膏”“油”之类的东西。他睡的是硬木床，枕的是白布养麦皮枕头。有一次，他在外地巡视，当地在他就餐时拿来一付象牙筷子，他坚持不用，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对工作和生活环境，毛泽东也是十分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始终保持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人民领袖的风范。

毛泽东爱游泳。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便在玉泉山修了一个小游泳池。一天毛泽东到了那里，一听说游泳池是为他修的，当场气呼呼地把那位干部批评了一通，并吩咐我让秘书从他稿费里拿出三万多元交给有关部门，算作修这个游泳池的费用。以后，毛泽东根本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

毛泽东严于律己，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子女问题上。他老人家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搞一点特殊，他曾说：“我的荣誉不准孩子们沾，我是我，他们是他们，靠他们自己去闯。”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八岁时母亲杨开慧牺牲后，他带着两个小弟弟流落上海街头，吃尽了苦。毛泽东非常疼爱他，但仍然严格要求他。当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便送他几件带补丁的衣服，叫他下乡跟着农民去种田，说是让他补上中国农业大学这一课。

到西柏坡后，毛岸英与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恋爱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是赞成的。一天，岸英找父亲提出要结婚的事，当时，岸英已 27 岁了，可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满 18 周岁，毛泽东不同意儿子马上结婚，说刘思齐满了 18 周岁再结婚。结果，岸英不高兴，主席批评了他。

岸英说：“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毛泽东说：“你找谁结婚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

岸英顶嘴道：“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

毛泽东生气了，毫不留情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 18 周岁，你们就不能结婚！”

直到一年后的 1949 年 10 月，岸英和思齐才结了婚。婚礼是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西屋里举行的，只准备了一桌饭。他俩没做新衣服。新婚夫妇穿的都是平常的衣服。毛泽东仅送了儿子一件“礼物”——那件他穿过的呢子大衣。毛泽东风趣地对儿子、儿媳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晚上可以当被子盖，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看到他老人家这样对待和要求自己的爱子，我们几个卫士都很感动。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毛泽东决定派儿子去朝鲜。当时岸英正在一家工

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一些同志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工作很忙，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就不要去朝鲜了。

毛泽东先给他们讲了一大通道理，最后，他还是那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没多久，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当毛泽东听完叶子龙报告时，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把目光转向茶几上的烟盒，伸手去拿烟，手抖得很厉害，没有拿准。我忙上前帮他把烟取出点着。

毛泽东默默地连抽两支烟，眼圈都红了，可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最后，他还是喃喃自语地说了那句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我听后，忍不住地掉泪，他老人家一生失去了好几位亲人，如今又是晚年丧子。当时，我想：要是能为他老人家分担一点痛苦有多好！

后来，岸英的忠骨同普通志愿军烈士一样埋在朝鲜，这也是毛泽东的决定。

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毛泽东疼爱她，但从不溺爱。

在转战陕北到进北京城初期，李讷一直是我爱人韩桂馨带的。毛泽东几次对小韩说：“阿姨，不要以为毛泽东的孩子就特殊，从小开始就不能灌输这种思想。要教育我的孩子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不能叫孩子打着我的招牌享受特殊待遇。”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韩桂馨就带着李讷吃大食堂的饭。

李讷上中学后，吃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我不放心，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僻静处，然后由卫士进校找她，出校后再悄悄坐车回家。此事不知怎么被毛泽东发现了，便严厉地批评了我。我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走夜路不安全……”

毛泽东两眼盯住我问：“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了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自行车回来。”于是，我便从天津给李敏、李讷姐妹俩各买了辆飞鸽自行车。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吃不饱，脸色不好看，一天，卫士尹荆山问她是不是病了？李讷忸怩了半天才小声说：“叔叔，我确实很饿……”

听了尹荆山的汇报，我心里又急又难过。且不说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饿成这样，我也不能不管呀！于是我们搞了点饼干悄悄给李讷带学校去。

不料此事又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把我叫进屋，厉声道：“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我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

从此，我再也不敢给李讷带饼干了。

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在生活上对自己，对子女却那么严格。他一生中没有过任何奢求，可是，他对同志，对我们却关怀倍至。我在他身边工作，对我的识字学习，我的恋爱婚姻，以及我离开他身边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挂在心上。

我十一岁离开父母参加革命，廿一岁来到毛主席身边，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十五年，我得到的是任何人都不曾给予过的慈父之爱。我是幸福的。

我常常回忆起与毛主席分别时的情景：我们相对落泪，他对我那令人肝肠寸断的话语，他把我揽入怀中难舍难分的别离之情，对我离开他后的工作安排和嘱托……我终生难忘！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您的功绩，您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您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深情——回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时的几件事

高智

向毛主席报到

我是陕北佳县人，1944 年入党，在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刚十七岁时，就调到延安分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科工作。建国初在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搞会议服务工作。

那是 1952 年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你给主席当机要秘书”。一听这话，我既高兴，又紧张。到毛主席跟前工作，是荣幸的事情，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主席听不清，给他老人家增加麻烦，影响了工作。再有毛主席是湖南人，说一口湖南话，我听他讲话，有些地方硬是听不懂，真担心万一由于口音关系发生差错，误了大事。所以，要我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开始是不敢承担的。经叶子龙主任一再说明，这是组织上研究决定的，又对我作了些说服工作，我才答应试试看。同时，也向叶主任要求：“如果不行，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因为，我意识到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责任重大。

第二天上午，我到丰泽园去报到，毛主席由于连夜工作，睡得很晚，还没起床。这时，毛主席的另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便先找出一些文件，让我一面翻阅，一面熟悉情况。

罗光禄同志长我十来岁，是位老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已工作多年。当老罗告诉我应如何整放文件的时候，他指着办公室桌后面一个多斗立柜的倒数第二格，严肃地对我轻声说：“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啊！……”我不禁一怔，连忙点点头。

我第一次见岸英是 1946 年他从苏联回来。平时他从不以领袖爱子自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礼貌待人，酷爱读书，在延安杨家岭，见他上厕所都拿着一本俄文书读，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主席是很重感情的人，岸英是他全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我们这些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理应尽量避免引起他老人家的悲伤。所以，我在毛主席跟前工作的近十个年头里，我从未翻出看过存放在那个多斗柜里有关岸英同志牺牲的材料，更未与任何人谈过。

这天，快到午饭时光，值班卫士电话告诉老罗：“主席睡醒了。”老罗放下电话，便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好。”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又更紧张起来，在脑子里盘算：见了毛主席我该说些什么呢？毛主席又会问我什么呢？心里不断地打起小鼓来。

我一进毛主席的卧室，看见他老人家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在那里深深地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

老罗一进门，就向毛主席报告说：

“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接着老罗把要给毛主席看的文件等放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

我听老罗一介绍，就身不由己地走到毛主席跟前，激动地向毛主席说：

“主席，您好！”

“啊！欢迎，欢迎。”毛主席边说边放下手里的那张报纸，缓缓起身，

与我紧紧握手。接着便很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陕北佳县人”。我笑着向他老人家回答。

“啊！佳县我去过”。毛主席吸了一口香烟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在哪里上过学？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我逐一作了回答。

当毛主席听说，我完小毕业后又考入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时，他眉毛一挑高兴地说：

“啊！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毛主席很注意人的文化素质。不过，听他老人家这么一说，我倒感到脸上阵阵发烧。

当我回答说，我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时，毛主席没听清楚，便说：

“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向他老人家解释：

“霍是霍去病的霍。”

“啊我听懂了。”毛主席笑了。

说到“碧”字时，我边说边用右手把“碧”字分解为“王、白、石”三字，定在左手心上让毛主席看。毛主席点点头，表示知道后，我又拉着长声说：

“英——是英雄的英”。

“噢！现在我全明白了”。毛主席把“霍碧英”三字，又重复了一遍，高兴地笑了。

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平易近人，又很谦和，我原来的紧张和忧虑，随之逐渐消失了。我看时间已不早，怕影响毛主席工作，又知道他起床后还没吃饭，便准备起身向他老人家告别。末了，毛主席对我又十分亲切地说：

“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我急忙说：“好，好”。

毛主席把调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是看作要“绝对为我服务”，而是特别强调一个“帮”字，说成帮他做一点事、这使我十分感动。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确是不论职务高低，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向毛主席报到的时候，一进毛主席的卧室，就看到屋内布置很简单朴素，清清楚楚，真可谓“一目了然”。房内没有任何豪华设备，更无一件古董，日用家俱只摆有两个单人沙发，一张坐椅。睡的是大木板床，床上左边多一半堆放着许多书报刊物和一些文件，床头右边是一个约二尺多见方的小藤桌，铺一块干干净净的白布，放在上面的也是一些文件和正在阅读的书报，还有一些削好的“施德楼”牌铅笔。再就是放着一个小的普通烟灰缸，几支香烟装在一个折叠起来的普通纸烟盒里。床下放有一双陈旧的拖鞋和一双半旧不新的布鞋。挂在衣架一旁的一件睡衣，已打着好几块大补钉。

毛主席住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屋柱上的油漆，已残缺剥离，而那几株粗壮的松柏，却挺挺而立，高出屋顶，则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春意盎然。

这一切，又使我不禁想起了，毛主席在 1947 年转战陕北时，给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他老人家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心里只有人民。

从向毛主席报到这一天起，直到 1962 年 5 月 7 日，我除到河南和江西学习、锻炼过一段时间之外，日夜就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工作。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

1960 年 12 月 26 日，是毛主席六十七岁生辰。按他的本意是不主张给自己做寿过生日的。但每逢这天，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要提醒他一下，擀碗长寿面条给他吃。有几次，毛主席还把他身边工作的几个同志请来，一起相聚，吃顿便饭，和大家拉拉家常。这一天，他原来打算休息起床后，在晚饭时再同大家聚一聚。可是，他一早上床，直到下午，怎么也不能入睡。李银桥同志告我：主席决定先和大家一起坐坐，吃了饭再休息。

于是，叶子龙、汪东兴、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我七人，便到毛主席办公室那个只能摆一张圆桌的过道里，同他老人家一起吃饭。

日常，毛主席吃饭就很简单，这顿生日便饭，因在困难年月，所以更简单。记得只有一个荤菜和两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李师傅特地又擀了一点面条。

这天，毛主席由于没有休息好，显得有些精神不足，那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上去也比往日小了，我真为他老人家睡不好觉心里感到难过。但是，他在饭桌上，仍热情地与我们亲切交谈。除谈了早年革命斗争的一些事，更主要的是要求我们认真读马列著作，还以告戒的口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就会空虚。”又说：“现在，咱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的向群众学习。不然，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类似这些话，毛主席过去也对我们说过。记得有次随毛主席坐火车去上海，火车停在半路，大家搀扶他老人家下火车去看庄稼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今天，他为什么又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呢？心想这里边一定有重要原因。我正一面听着，一面思索着，忽然毛主席睁大眼睛，把大伙儿一扫，提高声音问：“你们谁愿意下去？”

我紧坐在毛主席的右边，就向毛主席报名说：“我愿意下去。”“好！”毛主席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

“你们谁还愿意下去？”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也愿意！”……

大家争着一个接一个都报了名。

这时，毛主席老人家精神大振，高兴地笑着说：

“好！你们明天就下去！”

“主席，明天就下去不行，还得学习学习，准备一下才行。”我笑着对他老人家说。

毛主席平日常说“明天”如何，“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件事，都得按他说的“明天”去照办，即便是要办的事，有些也是可以视具体情况和时间看是否可能，然后与他老人家商量的。

“那好，你们去北京参加两个星期的训练班，准备一下再下去。”毛主席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以后要轮流下去，其他同志，等你们回来再下去。”

那个时候，毛主席要中央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也要加强调查研究。

有的地方，还对下去的同志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学习。就这样，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下午，与我们一起吃罢饭，才去休息。不过，当晚他还是没有休息，仍然阅批了一夜文件。第二天清早七时许，毛主席按电铃，把我叫去，拿他夜里批阅过的文件等，同时交给我用铅笔写的一封信，当面指示我交给汪东兴同志办。我接过一看，啊！原来是他老人家连夜给我们准备下去的几个人写的：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人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 67 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我读完这封信，眼睛润湿了，浑身感到热呼呼的。在交汪东兴同志办时，建议照个像给我们每人都洗印一份，以作为珍贵的纪念。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只得用照像洗印的办法。毛主席对我们下的几个人，考虑得真像慈母一样的周到。可能是怕我们的身子骨支持不了，看过信阳的一份报告，认为那里有救济粮，气候也暖和些，便把原定去山东改为去河南信阳了。那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已决定不吃肉了，却在信中对我们说：“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在他的生活和身体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却把身边平时最熟悉的同志抽出来，下到农村进行调查，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感人啊！

经过两周准备，1961 年 1 月 15 日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又约见我们。我们都穿着下乡的衣服，他老人家“检阅”后很满意，并同大家一起合了影。下乡的同志，除原定的六人，机要室和警卫局又抽出局、处干部四人，共十人。

这次，毛主席在谈到下乡的意义时，对我们着重指示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集体吃食堂到底行不行？群众有什么意见，如实反映上来。一定要讲真话。”还说：“你们下去以后，既要了解当前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要向群众学习一些生产知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不几天，我们就坐火车到了郑州。河南省的吴芝圃和赵文甫等负责同志，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亲自给我们介绍了河南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抽出一百人，与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将原定信阳专区又改为许昌专区部陵县，在五女店稍作训练就下乡了。

我们到鄢陵县时，正逢青黄不接之际。一进村，我们就和社员群众一起吃集体食堂。由于自然灾害，加上一些干部的浮夸虚报，强迫命令，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我在的这个生产队，已没有多少粮食，只有上万斤红萝卜和一些干红薯片、红薯蔓子，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一天三顿饭，至少有两顿是红薯面拌的糊糊汤，不少群众已浮肿，小孩很多是大肚子，汤把肚子喝的滚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十人，大部分人的腿和脸也浮肿了。每到开饭时

间，队上就打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端着盆，有的提着罐，排着队，唉声叹气地把饭打回家去吃。不管风吹日晒，下雨下雪，天天如此。这怎么能叫“社会主义”？！怎么能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我心里着实觉得不是个滋味，尽管我们也感到饥饿，但从未想过要毛主席他老人家送牛羊肉，相反大家倒是更自觉地以毛主席为榜样，越在困难的时候，越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持与社员群众一起排忧解难。为了改善群众生活，我们也曾多次和管理食堂的社员同志一起研究，尝试用红薯蔓和红萝卜蒸丸子，或在红薯糊糊汤里加红萝卜块。这样，虽说饭菜花样增多了，但群众普遍反映还是不如自家做着吃好。我们也亲眼见到，大家把饭打回去，往往还要再加工，或是搀和点粮食，或是搅拌些菜蔬，才可以吃得稍好些。可是，我们所在的队干部，有的却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反以极左面孔出现，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一看到谁家烟囱里冒烟，便闯进去打骂，甚至把人家的锅砸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行为，我们与地、县同志研究后，将个别群众意见大的干部作了处理，给群众撑了腰，受到群众的好评。

我们把群众对集体吃食堂的意见，以及了解到的其他问题，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反映。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根据我们的反映和各地的调查，纠正了农村集体吃食堂的作法。由于落实政策，开放了农贸市场，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年底，鄢陵县委张书记来信说一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十来个鸡蛋。

当年下半年，正逢南方收割早稻时节，我们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到江西省贵溪县白田公社的几个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体验农村生活。周总理闻讯也把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抽出，和我们一起到江西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封耀松同志，开始分在白田公社的枫林湾生产队，吃住在队长裴禄祥和一户贫下中农家里。当时，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让我们去的，但对我们都很关心、体贴。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割稻、插秧；我们与他们一起耘田、种菜、修路、补桥，上山打柴和挑送公粮……。他们把我们看似一家人，我们也把自己当成是枫林湾的一户新社员。这里的人民，生活非常安宁，真可谓人和世风好，村人互爱相助，生气勃勃，真像一个和睦勤劳的大家庭。但是，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里缺医少药，群众看病却很困难，到公社所在地白田看病得步行十多华里。

进村不久，听说一位贫下中农病得历害，便到他家去看望。我一进门，只见病人上吐下泻，脸色焦黄，已几天卧床不起。我问了病情，又摸了脉搏，确感病势严重。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临行前，毛主席让医生吴旭君同志给我们准备的药包。

这个药包里，共有二十一种药品，从治一些严重的炎症，到治感冒、碰伤、牙疼、胃痛和呕吐、发烧，以及消化不良、失眠等等，应有尽有；还备有棉球、棉签、纱布、皮膏等，可说样样俱全。另外，还打印有一份用药说明书。

于是，我根据病人的病状，按照用药说明书，给他服用了“四环素”。这药在当时是“药王”，离京时，李志绥医生叮嘱，一般炎症是不用的。果然，药到病除，三天后便见好，可以下床吃东西了。我和大家都很高兴，病人一家也十分感激。表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中国劳动人民的忠厚诚挚的情感，使我既感动又不安。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不能谢我，要谢也就谢毛主

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准备的药包啊！

在江西的几个月里，省上和县里对我们也很关心，嘱咐干活不要太累。但是，大家都是尽力争着干活。开始不习惯赤脚走路，经过锻炼，我可以打着赤脚走长路，肩扛担挑百十多斤的稻谷或柴禾。我们的身体健壮了，对南方的农活也熟悉了，既学习了农业生产知识，也领略了这里的乡土人情，风俗文化，又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群众观点，思想上也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强调要实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以及“不能老浮在上面”的深刻道理。

我们从江西回到北京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次在颐年堂接见我们，显得格外高兴，格外亲切，并与我们合影。当他知道农村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离别前后

1962 年 4 月 19 日，是我离开毛主席之前，他老人家约我谈话的日子。

这天下午不到三时，当我抱着女儿提前到达颐年堂时，服务人员说，毛主席一个人早已坐在沙发上等我。一听这话，我急忙把孩子交给服务科的同志帮助照看，便急步穿过颐年堂的小过道，走到毛主席跟前，他老人家立即招呼我坐在他的左身旁。他老人家一边吸着香烟，一边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说：

“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离开？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想离开到其他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以提出。谈谈你的意见。”接着他又恋恋不舍地说：

“你要是同意的话，是可以不走的。”

显然，从毛主席的内心来说，还是想让我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的，但他又很尊重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叫我作主。这越发使我激动。

在毛主席与我谈话之前，心想，在毛主席跟前工作，直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工作多年从未出过差错，他老人家也未批评过自己一句话，反而多次受到表扬。虽然工作紧张，常顾不得管家务，还是感到十分幸福的，的确不舍得离开他老人家；但从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考虑，特别是想到几个老同志都走，也是毛主席关心大家的成长。所以，我听毛主席说罢以后，便谈了自己的心情：

“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可是，您又多次对我们说：一个人不能老浮在上面，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下面去工作，锻炼。”

“啊！……”毛主席依依惜别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问：

“如果走的话，你想到哪里？”

“到西安。我是陕西佳县人，回家乡。”

这也是我考虑的结果。原来也有同志向我建议说：如果走，也不要去陕西，留在北京，或在上海等毛主席经常去的地方，以后见毛主席方便。

但是，我深知毛主席是提倡干部到地方上去接近农民群众的。因此，我决定回陕西去，那里是我的家乡，生活比较习惯，了解情况也比较容易。我虽早年失去父母，可西安还有岳父母两位老人，回陕西照顾他们的生活也方

便得多，而且我也更爱我的家乡——陕西。

毛主席自 1948 年 3 月东渡黄河以后未到过西北，但对西北、对老区人民，对延安和陕北，却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听我说愿意到陕西，稍停一会儿就说：

“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紧接着他又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讲：

“那么，你先走，打前站，我随后就来。”那神色，就好像陕北也是他的家乡一样。

是啊！毛主席在延安和陕北生活了十三个春秋，1947 年转战陕北时仅在佳县就住了将近三个月。这期间，他在梁家岔亲自指挥西北野战军，消灭了胡宗南的主力三十六师；在朱官寨亲自制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领导全国军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神泉堡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角。在佳县期间，毛主席还游览了县城、黄河、及香炉寺、白云山等名胜古迹，并为佳县县委亲笔题写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目中，陕北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了，而那些扎着羊肚子手中的庄稼汉，那些喜欢穿红挂绿的婆姨女子，也早已是他的“乡亲”了。他对陕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又怎能不特别思念呢！甚至对于一些乡土传闻，他都念念不忘，想了解个一清二楚。

有一次，我随毛主席外出去南方，在专列上他与专列服务人员和身边的几个同志聊天时，就曾向我这个佳县人问道：

“高智，为什么人家说：佳县人爱喝面汤？”

“还不是因为穷嘛！”我回答说，“听老人们讲，在旧社会，佳县的受苦人到外地去谋生，有的在路上连买碗面条吃的钱都没有，只好向人家讨碗面汤喝。可是，有一次，一个掌柜的硬是把面汤倒了也没给喝。这个讨面汤的佳县人就同他打了一架，群众也同情，才挣来了一碗面汤。从此，就流传开佳县人爱喝面汤的说法。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有的见佳县人吃完面条，就开玩笑地问：你喝不喝面汤？有的则是怕佳县人打他，所以总要问：你还要不要面汤喝？”

毛主席和大家听我这么一说，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见他老人家笑的声音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

毛主席更希望陕北人民能够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早日过上幸福生活。1959 年在江西庐山，一天，我随毛主席到水库去游泳，汽车行在盘山公路上时，他从车窗里望着那一座座色的峰峦，片片青松翠柏，便兴致勃勃地问我：

“高智，你看庐山这么多树好不好？”

我回答说：“好得很呀！”

“要是陕北的山上，也有这么多树就好了。自然条件也可以得到改变。那里多么需要植树造林啊！”毛主席一面沉思着，一面自言自语地又说，十年行不行？十年不行，二十年行不行？二十年不行，三十年行不行？”

“行！”我一面回答，一面便急忙拿起照像机，在车上朝着对面一座翠绿的山峰，拍了两张风景照，记下了他老人家此时此刻对陕北人民的深情厚意。

正由于毛主席的心中，深深地埋藏着对陕北人民的思念，那天毛主席与

我谈话，一听说我愿意回家乡，他就把他的“乡情”闸门打开了。在谈话中，他老人家格外显得有精神，感情浓重。他热情洋溢地对我说：

“你回到陕西，要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

“那当然好了。”我沉思了一下，又说“不过，到了西安，不知人家怎么安排，得听当地组织的安排，不能由我自己”。

毛主席点点头，又说：

“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你都要继续为我做点事情。”他略一停顿后，又十分关心地说：“还有，你走之前，订一个学习计划交给我。”

“是！”我一一答应着。

毛主席要继续为他做点事情，我理解的是，虽不在他身边工作了，仍应像到河南和江西那样，把下面的情况继续如实地向他老人家反映；让我走前订一个学习计划交给他，则是对我要不断进步，努力学习的关怀。

在离别前夕，我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依然对我如此信任和关心，两眼充满了热泪，除了连连点头作答，再也说不出多少话了！

毛主席看到这神情，眼睛也湿润了，变得沉默起来。良久，他又吸了一口香烟，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喊着我的名字说：

“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等你爱人生了孩子，住段时间再说。”

听到这样暖人心的话，我更是既感动又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向他老人家说过我爱人快要生小孩的事情，他怎么知道的呢？

当时，我爱人的预产期是到了。但我想，如果在北京生孩子，我至少要耽搁两三个月的时间，而到了西安生孩子，我就能早日投入新的工作，利用工作之余，照顾家庭。这样，可以做到两不误。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毛主席后，他也再没说什么，就算默许了。毛主席下午还有其他活动，我看时针已指向三时四十分，便起身向他告别。

“你不要走！”毛主席又突然把我叫住说：“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太好了。”我急忙高兴地回答。

1947 年转战陕北时，在靖边县小河村，我曾向叶子龙同志提请毛主席和我们机要科的同志照了一个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则从未想过提出单独与他老人家照像的事，平时见他工作忙，总不忍心打搅，现在一听毛主席说与我照像的话，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于是，我搀扶毛主席从沙发上慢慢起来，随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同志，给我和毛主席合了影。我与毛主席合影后，服务科同志便把我的小女儿送过来。我抱起孩子，毛主席站在原地又和我亲切地拉起话来。

“你的女儿几岁了？”

“五岁。”

“叫什么名字？”

“小妹”

“为什么叫小妹？”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起了个名叫小妹。”

毛主席望着孩子笑笑，紧接着又说：

“你抱着孩子，咱们再照一张！”

其实，富有采访拍照经验而又深知领袖心情的吕厚民同志，这时已咯嚓

咯嚓的照了好几张。这些幸福的合影，成了我家最为珍贵的纪念品。温暖着我们全家人的心，他给我和子孙后代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离开毛主席前，我把自己订好的学习计划交给他，又把他老人家在办公室和卧室的文件和其他材料，齐齐地整理了一遍。整理时发现，他借给我看的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仍放在床上，我没有取回，留下了。各地要求毛主席题字的信件也整理在一起，并打印了一个目录，把毛主席一些未发表的诗同也整理好，随后，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交代。1962 年 5 月 7 日，我牢记他老人家让我“打前站”和继续为他做点事情的嘱托，依依不舍地离开毛主席，8 日回到我的家乡陕西。

到西安不久，我就投入了新的工作。后来在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或其他单位，以及在延安地区和洛川县工作的时候，我都曾经给毛主席老人家写过信，汇报过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也如实地反映过一些情况和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据说，有些信件和材料，毛主席阅后还批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了。

在西安和延安地区工作时，我曾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寄送过陕北的小米和洛川的苹果。1963 年 12 月 21 日，林克同志受毛主席老人家的委托，给我来信说：“主席嘱我写信转告你，你前后几次的来信和两次送来的小米都收到了，谢谢你。他因工作忙，未能作覆，望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并向你好！”

我没有忘记毛主席老人家的叮咛和教导，不论在哪里，也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尽力积极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毛主席的心情，却一甚一日，难以控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候，夜深也不得入睡，躺在床上想着他老人家，回忆着以往的一切，常常情不自禁地暗暗淌着热泪。在睡梦里，也常梦见毛主席，不是跟随他老人家外出巡视，就是梦见他老人家要我给他找什么文件，或是让通知一些负责同志开会……，也常在梦里发出主席——主席——”的喊声，醒来方知是场梦。我虽说在北京整整住了十三年，仍然渴望再能有那么一天，到北京去看看毛主席！

这一天终于到了。1965 年 1 月，中国与印尼通航，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陕西去一人，组织同意我去。其实，我并不是想出国，主要是能有机会到北京见毛主席老人家。于是，我便提前离开西安，乘火车经郑州前往北京。一路未睡，我牢记着毛主席让我“打前站”的嘱托，把西安至郑州段的铁路状况作了详细观察。因为这段铁路，毛主席没有走过。

1965 年的 1 月 13 日，我到北京。一下火车，便急不可待地朝那最熟悉又最亲切的地方——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奔去。由于我离开北京才两年零八个月，警卫室和站岗的同志都还认识，一见我去就热情地让我进了中南海西门。

进了中南海西门，在西楼看了过去一起工作的同志，就经过怀仁堂、居仁堂迳直到了毛主席住的院落。当时，毛主席还在休息，我在卫士值班室等候。不一会，毛主席就睡醒了。这时，我走后给毛主席当机要秘书的徐业夫同志先去向毛主席报告，说我来看他老人家了。毛主席一听说我来看他，就告徐秘书让我“马上去”。

通常，毛主席睡醒，不马上叫秘书的话，总是由卫士先去毛主席那里。今天我去了，徐秘书和大家也都高兴，徐秘书就先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一起床，习惯喝杯茶，我等徐秘书把给毛主席的茶水倒好后，就随老徐一同快步到了毛主席的卧室，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我以激动的

心情，向他老人家问了好。毛主席从床上起身与我紧紧地握手，高兴地让我坐在他床边的一张椅子上，我给他老人家点着一支香烟后，就亲切地和我交谈起来。

毛主席问了我的工作情况，我向他老人家简单地谈了陕西的外事工作，汇报了我的工作和学习，也倾诉了想念他的心情。毛主席鼓励我“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再次说，我过去在他身边工作得很好，他很满意。还说，我给他的信和小米都收到了，只是由于工作忙，没有亲自复信；要我把西安的具体住址和电话，给他留下。

当谈到延安时，毛主席越发显得兴奋，他说：

“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在江西只七年，从 1927 年至 1934 年；在延安和陕北住了十三年嘛！”他老人家一面说，一面板着手指计算着。

还说：“在那个时候（指延安和陕北时期），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说到这儿，他稍一沉思，更充满深情地说：“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还要沿黄河走一趟！”

说罢，他便像以往行军作战那样，向我这个“打前站”的人询问：“从西安到郑州的铁路情况如何？”

我就把已经了解到的这段路况，即共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涵洞行车需要多少时间，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儿可以歇脚等等，一一向他老人家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

毛主席对一件事，总是问得细致，想了解得清清楚楚，从不含含糊糊的。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只要老老实实，他是满意的。过去随毛主席外出时，几次问我从某地到某地有多少公里，行车需多少小时？有的我答不出，得问了随专车的铁道部的负责同志，才向他老人家报告。为了方便毛主席，自己也争取主动一些，我曾请铁道部的有关同志，把从北京到华东、中南各省、市沿路主要城镇的行车里程和时间，以及可以停车的岔道制了个图，以后他老人家问，我就可以答出。这张图表至今我还保存着。

时间过得真快，我一看表，时针已指向下午五时二十五分，毛主席起床后还没吃饭，晚上又有事情，就向他老人家告别。毛主席握着我的手叮咛，要我从印尼回来后再来见他，并说晚上春藕斋有舞会，要我随他一块去。

当天晚上，我随毛主席去春藕斋参加跳舞晚会。从毛主席住的地方到春藕斋还有一段路。路上，毛主席与我们谈笑风生，边走边还习惯地做着如同“道家养身长寿术”之“回春功”的“单转肩”的动作，显得精神格外好。我见他老人家身体很健康，心里很高兴。这使我在感情上得到很大满足。

我深知毛主席之所以那样崇敬黄河，那样思念黄河，是把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看待的。他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对人民最重感情，到了晚年他又怎能不特别想回延安和陕北故地重游，还要沿黄河走一趟呢？！这也是他的感情的需要啊！

可是，我日日思，夜夜想，月月盼，年年望，万万没有想到，十一年过后，却于 1976 年 9 月 9 日，突然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与世长辞的噩耗，这使我的感情受到巨大打击。我当时呆了，傻了，悲痛得泣不成声，几天不思饮食，直到 13 日，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于翌日晚上八时半乘飞机到了北京。

按着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安排，我在 16 日下午五时，到人民大会堂

瞻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遗容。在毛主席老人家的遗体前，我沉痛地站了许久，泪不断地往下流，难以压抑住自己的悲痛，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老人家说，……主席，你安息吧！我永远会记着您。

这天下午，从人民大会堂回到住地——民族饭店，直到天明也未睡着，我想着毛主席！想着过去的许多事，我想着他对我们的教导，想着他要我“打前站”……可是，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这怎能不使我难过呢！

毛主席他老人家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伟大的思想和精神，却永远光照人间，永远将激励着我们象黄河之水那样，汹涌澎湃，浩浩荡荡，奔向前方，奔向那灿烂美丽的明天。

从中南海到克里姆林宫——回忆给毛泽东同志当翻译

李越然

1949 年 8 月某日，在北京中南海，我第一次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当年我 22 岁，是在我们的前辈师哲同志的领导下参加这次工作的。作为一个青年，能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来到首都，并见到了全国人民无限敬仰和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时我心中的幸福感和激动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这天下午三时许，几辆小轿车从新华门缓缓驶入中南海，车里坐的是十几位普普通通的苏联朋友。她们是当年沈阳铁路局的苏方职工或职工家属，领队的是位男同志杜拉索夫局长，其余都是女同志。她们是随同刘少奇同志和第一批 200 多名苏联高级顾问一起乘专列从沈阳来京的，在餐车上担任临时服务员。由周恩来同志安排，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她们。毛泽东从勤政殿北面的旁门进来。他步伐稳健，走得较慢，满头黑发，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目光炯炯有神，容颜慈祥，神采奕奕。他同我握手时问道：“你这个小鬼是干什么工作的呀！”，我又激动又紧张，竟然说不出话了。站在一旁的王学文副局长代为回答说：“他是翻译，也在我们铁路局做秘书”。主席微笑着说：“噢！翻译，那好啊，请你告诉苏联同志，我们很感谢，她们一路上辛苦了”。这是一句很普通的寒喧语，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一次考试，“辛苦了，”这句话如果翻译不好，在俄文上会被理解为“你们累了”，这样就不确切了。当时我译成“”谢谢你们的服务和劳动”，看来这样表达比较合适。苏联朋友很高兴，说：“感谢毛主席接见我们，在火车上做了点工作，是应该的”。主席还和苏联朋友作了亲切的交谈，希望他们在北京多看看。这十几位苏联友人下塌在当年的哈德门内的德国饭店。主席接见后，他们回到旅馆久久不能平静，有的说：“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有的把这次活动写进了日记，有的马上写信把这喜讯告诉自己国内的亲友。

同年 11 月初，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等一起来到当年的铁狮子胡同苏联顾问团总部，参加苏联专家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毛主席在集会上讲话，感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感谢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们的辛勤劳动。他说：“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也很复杂，希望你们常和中国同志接触，了解我们的国情”。还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的革命能否取得成功，有人怀疑过，但我们终于胜利了，如果中国革命不能胜利，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译好毛主席的这段话，最后一句是关键。就是“不灵了”，就语言的表层来说是反义词，它的深层含义恰恰是“灵”，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把握了这一思想才能正确地表达主席这句话的实质。毛主席的话引起了全场中外同志的阵阵掌声。

50 年代我参加了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部分重要会谈的翻译工作，其中包括 1957 年毛主席第二次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

1957 年 10 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下午 3 点多，毛泽东吃过“早饭”，踱出屋门，到院里散步，我忙轻步追随去。

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由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并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和郭沫若等许多领导人。组织上确定我跟随毛泽东出访，担

任翻译。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安排我们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主席，尽量熟悉老人家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毛主席带着思考问题的神色漫步走了一会儿，侧脸望我一眼，问“哎，李银桥呢？”“我在这儿。”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跟上来。主席站住脚，指着我和李银桥说：“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我和银桥都笑了。主席又对我说：“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主席说着，掏出一支烟，银桥替他点了火，我说：“主席，你抽烟太多了，我记得伏老来时曾劝你戒烟。”“唉，伏老劝我戒烟，戒不掉怎么办？”主席面带难色地说：“只好点一支，看着冒烟，不往肚里吸。”毛主席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天，我告诉他说：“伏老到警卫团参观，一进连队宿舍就立正敬礼，说‘红军战士伏罗希洛夫前来报到！’”“是吗？嗯，他是老红军，斯大林的老朋友，打过不少仗”。毛主席提到伏罗希洛夫时总带着一种亲切友好的语气。“你了解赫鲁晓夫这个人吗？”毛主席忽然问我。“不太熟悉，只是跟总理和彭真同志出访时和他接触过几次。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敏锐，很精明，比较开朗，有时容易锋芒外露，据说这个人脾气是比较暴躁的。”“赫鲁晓夫有胆量。”毛主席不无赞赏地说：“不过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毛主席的举止总是高度的镇静，走路慢，步伐稳健。他时常停立在一个地方沉思着什么。聆听主席的谈话，要时刻考虑翻译上的难点，力求有所准备。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俄语纸老虎怎么说？”我回答之后，他老人家用英语重述了一下，“拍泼太格儿”（papertiger）。他的湖南乡音很重，一本正经地走了腔，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于是，主席也笑了。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刻都在注意着毛泽东此次访苏的行程，几乎每天都要来电话询问代表的启程日期等情况。

快到出发的日子了，尚昆同志把我叫去，吩咐说：“小李啊，你即刻约见一下尤金，向他转告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并说：“这个交涉你要尽力办好，请尤金报告苏联领导，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能够照办。”尚昆同志说：“主席的意思是要请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下飞机就走。”我忙说：“这恐怕不行吧？”。尚昆同志说：“你去谈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主席。”尚昆同志又讲了几点主席生活作息方面的事后说：“王敬先（警卫局长）已经去莫斯科了，请按他的意思做好准备”。

电话联系后，我驱车赶到苏联驻华使馆。尤金迎上来，开口就问，“怎么，行程有改变吗？”我忙说：“不，没有。”尤金放心了。“尤金同志，我来找你是转告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我讲述了毛主席的请求。“哎呀，这可不好办。”尤金耸起圆滚滚的肩膀，摇动红润的四方脸盘，波浪形卷曲的头发随着摆头颤动不已，“我可不能作主。我立刻报告，请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讨论决定吧。我能做到的就是如实传达毛主席的请求。”“谢谢”我点头表示理解，“另外还有毛主席的生活习惯……”“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做好准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主席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穿了好几年，这次去苏联参观

庆典活动，起初主席不同意做衣服，经中央决定才做了一身中山装。49 年的一双胶底黑皮鞋一直穿到莫斯科。他只睡硬板床，而且在双人床的一半堆放着书，其中有许多线装古书，他是位手不离卷的人，我到他房里去，几乎他都在看书。饮食方面主席也很简单，我常见到的是小米稀粥、辣子加几片火腿，绿豆饭，豆腐汤。他喜欢吃鱼，而且吃的非常细和巧，鱼骨头和鱼刺干干净净放在小碟里。他不习惯吃面餐，只喝些西餐汤，其他菜吃得很少。不过在苏联时他曾赞赏苏联厨师做的烤鹌鹑，说：“这个秃尾巴鸟做得好，颜色好看，吃起来也可口”。

1957 年 11 月 2 日上午 8 时许，毛泽东登上“图 104”客机。一位塔斯社记者虽然想方设法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但最后还是落空了。“图 104”在送行的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频频招手中载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徐徐起飞。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有办公的桌椅也有休息的床铺。机组人员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很平稳，精选来的空中小姐个个都漂亮、热情、庄重。她们包围了毛泽东主席，争着握手，握住了不肯放，热情地问候，纷纷表达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好了，好了，可爱的姑娘们。”尤金走来为毛泽东解围。毛主席没有休息，先去看望同机出发的宋庆龄等代表团成员。毛主席对宋庆龄副主席非常尊重和关心，到她的客舱中问候：“怎么样，还适应吧？”“感觉还好”宋副主席微笑点头。“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后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主席关切地说。“主席，您事情多，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宋庆龄感谢地回答说。主席回到前舱后对我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尤金进来，毛主席请他坐到桌子对面。“你是哲学家，又是老朋友。”主席开玩笑似的眨一下眼，“对不对？”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很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跟您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下意识地用手指理理头发，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主席笑笑，接着又问：“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一个劲眨眼，终于作难地叹道：“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考住了？”毛主席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笑道；“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快到伊尔库茨克了，飞机将在这里降落暂停。尤金告辞去办一些事，我借机将一份讲话稿送给毛主席。按照惯例，首长在公开场合的讲话稿事先总要给翻译一份，预做准备。我说；“主席，这是为您准备的机场讲话稿。您过过目吧？”毛主席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地握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扫过字里行间。随行的摄影师侯波见主席在飞机内聚精会神看稿子，便轻轻地靠近过来，选位，对焦，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主席看过讲话稿，头也不抬地吩咐：“去把尚昆同志请过来。”“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毛主席用商量的口吻问道。“这是公开出访，依照惯例还是讲几句好。”尚昆同志解释。毛主席略一沉吟，又问：“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就算了。”“这只是做个准备，不一定照着念。”“好吧。”毛主席将讲话稿放进上衣袋：“留作备用。”

“图 104”在伊尔库次克机场降落。苏联派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专程来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波斯别

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深度眼镜时戴时摘，说话慢条斯理，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莫斯科宣言》的起草情况和活动日程安排，又向杨尚昆主任介绍会议组织筹备情况。

下午 3 点左右，飞机抵达莫斯科，降落在伏努克机场，舷梯下红地毯铺成长长一条路，当毛主席的身影在舱门一出现，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赫鲁晓夫满面笑容热烈鼓掌，在他身后是一大批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也来了。毛主席一边下梯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相互问候，亲切拥抱。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拥抱时尤为亲切。毛主席顺序同前来迎接的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用他那激昂高亢的湖南腔说：“同志们好！”向接受他检阅的苏联三军仪仗队大声问候。“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发出了三声震耳的欢呼。欢迎仪式完毕，赫鲁晓夫陪同毛主席上了第一辆“吉斯”车。这种车很宽大，主席和赫鲁晓夫坐后排，我和李银桥“哼哈二将”坐在前后排之间拉出来的活动椅上，前排是司机和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副局长札哈洛夫少将，他被指派为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的卫士长。我侧着身为两个共产党的领袖翻译谈话。“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吗？”毛主席问。赫鲁晓夫搬动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主席很感兴趣地问：“他们住在哪里？”“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回答，并有意补充说：“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驻地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毛主席对这种特殊友好似乎并不在意。而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对他们象对我一样……”。“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毛泽东点头：”“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他接着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忙着解释道：“是的，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都照惯例办的。您这样尊贵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没用了。”毛主席微笑着吮一吮下唇。他高兴或者生气时往往做这个动作。毛主席观看道路两旁建筑楼房，赫鲁晓夫介绍了住宅建筑的情况。主席观看了好一会，他点头道：“看得出，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了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穿着也都不错。”

毛泽东主席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札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和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特别留意了毛主席寝室里的木板床和改造过的蹲式马桶。

在下榻处的会见大家谈得很热闹，赫鲁晓夫扯扯同毛主席谈笑风声的伏罗希洛夫的衣服说：“我们该告辞了吧？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休息了。”苏联领导纷纷握手道别。赫鲁晓夫殷勤地向主席介绍道：“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一声，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一切都按照您的希望做了准备……”

可是，毛主席到为他准备的房间里没呆多久，便慢步通过走廊，到了楼下，直朝我们住的房间走来。我和保健医生住在一起，见主席进来，连忙起

立。没说什么，在屋内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主席点点头，回身走出去，上了楼。我正心里犯嘀咕，不知怎么回事，李银桥来了，拽着我就；“你来一下，主席找你。”我忙跟随李银桥上楼走进主席的寝室，见他老人家独自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付若有所思的神情。我在离他三米远的地方站住，听候吩咐。主席招手要我过去，我走到他身边。他用很轻的声音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往，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我一怔，头立刻摇起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看你，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我解释道。“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我出屋，没去找苏联同志，先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尚昆同志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各国党的代表团纷纷抵达莫斯科，彼此之间的互相拜会、会谈、宴会等活动很多。毛主席不常自己出面，这样其他领导同志自然就更忙。

毛主席自第一次访苏后，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 年初，斯大林与世长辞。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一党一国的范围。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后，他很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在国际事务的全局中是十分重要的。而支持苏联，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对外政策。

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1954 年 9 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第一个最高级代表团来中国，当时就曾提出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毛主席在与赫鲁晓夫交谈中曾表示过：“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赫鲁晓夫回答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该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毛主席表示：“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赫鲁晓夫这次来，还是办了几件重要的事：移交中长铁路、旅大港和新疆的几个合营公司，还请中国派遣工人到苏联去参加工作。我们对苏联代表团的接待是高规格的。赫鲁晓夫等取道东北回国，由朱德同志和师哲同志陪同在旅大、鞍山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并给予了最高礼遇。

1956 年下半年，在东欧发生波匈事件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曾派遣我们党的领导人先后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就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

1957 年 5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时又一次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

所以毛主席第二次访苏，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庆典，受到隆重的接待是可想而知的。

1957 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既有适当的支持，也有中肯的批评。他曾讲过，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这次在莫斯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毛主席同赫鲁晓夫的交谈是比较多的。在 60 多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红花虽好，也得绿叶相扶，我

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内容深刻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重视，在宴会席间，赫鲁晓夫曾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斯大林，两条腿象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妥善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着点心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是很不得体的。有一次，毛主席批评赫鲁晓夫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同时也说自己有时 488 也有这种情况。又说：“各个党都有它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赫鲁晓夫没有完全听进去，他承认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您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毛主席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你们对待他们和对我一样，看作朋友。”赫鲁晓夫也说：“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可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

在这次访苏期间，毛主席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同一些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交换了意见。毛主席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进行了友好而又坦率的交谈。哥穆尔卡是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毛主席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面，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表示：“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哥穆尔卡有话肯讲也敢讲。他直截了当他说他不同意纸老虎这个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毛主席也很坦率，他说：“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接着又说：“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从哥穆尔卡的反应看，他对事物的理解与原来是有所不同了。

南斯拉夫不主张讲阵营，他们不出席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主席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他可能不来……”。毛主席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又问：“铁托不来，还有没有别人来？”赫鲁晓夫说：“有，是卡德尔，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主席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60 多个国家党代表开会的时候，卡德尔出席了。毛主席的席位正好同他斜对面。在讲话中毛主席面对着卡德尔说：“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

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话说得很简单，可卡德尔受到了感动。

毛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的 19 个昼夜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情接待。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除了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庆祝大典的活动以外,还出席了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了 68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两个会议中间，同各国党的领袖们商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和各国党的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两个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上了签了字。

最后，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毛主席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们这么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接着，他说中国有首古诗：

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这次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国际活动，在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后记

为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我们约请了部分长期追随毛泽东进行革命和建设工作的老战友、老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撰写回忆文章，编为《缅怀毛泽东》一书，以表达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是作者不顾年迈、体弱、工作繁忙专为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撰写的。有几篇文章的基本内容，虽已见诸报端，但作者这次又重新作了改写和增补。因文章较多，我们分为上、下两卷出版。其中上卷 40 篇，40 万字。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赵福亭、蔡刽珍、刘益涛、蒋建农。汪裕尧看了全部书稿，给本书编辑工作以很多帮助。在编辑过程中，还得到了冯惠、高风、黄允升、李捷、薛培松等同志的帮助。

《缅怀毛泽东》编辑组

一九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